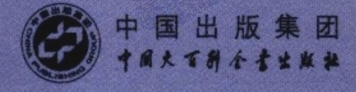


乌克兰史

保罗·库比塞克 著　颜震 译

The History of Ukraine



The History of Ukraine



定价：30.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乌克兰史

保罗·库比塞克 著 颜震 译

The History of Ukraine



图字:01 -2009 -55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克兰史/库比塞克著;颜震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 -7 -5000 -8242 -2
(世界历史文库)

Ⅰ.乌… Ⅱ.①库…②颜… Ⅲ.乌克兰-历史 Ⅳ.K5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68040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言

乌克兰，乌克兰语中为“Ukraina”，意为“在边缘”或“边疆”。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乌克兰处于一种中间地带的位置：东西分隔开俄罗斯与波兰（后来为奥地利—匈牙利），占据广阔的欧亚大草原的最西端，成为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的中心。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但当苏联于 1991 年分解为 15 个国家的时候，乌克兰获得了独立。在人口上，乌克兰为后苏联时代国家中的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而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乌克兰的国土面积排行第二位（同样仅次于俄罗斯）。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乌克兰却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而在今天其历史的重要性已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乌克兰东西区域的分裂；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经验缺乏使其有争议的后苏联时代转型更为困难；现代国家形态的欠缺使乌克兰民族认同复杂化；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其与邻国，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在沙俄和苏联时代都曾统治乌克兰。因此，把握乌克兰历史的各个方面，厘清其历史线索成为新乌克兰国家的重大挑战。

本书详细介绍了乌克兰的历史全貌，着重于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历史。本书收集多种第二手资料，包括一些普通读物和一些专题学术著作。本书的一部分，尤其是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主要参考作者本人于 1992—1993 年在利沃夫国立大学公民教育项目做讲师时的研究成果。在这段时间内，乌克兰的生活状况无疑是艰难的，但我仍

然对乌克兰历史与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从我的学生和同事那里收获良多，并几次重返乌克兰，参加过许多项目的研究。人们很容易对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而2004年的“橙色革命”给乌克兰政治社会的观察家们，尤其是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了急盼的一瞬希望之光。正如在本书中贯穿始终所表达的那样，我真诚地祝愿这块历史上饱受艰辛与磨难的土地能够拥抱更为光明的未来。

在翻译乌克兰和其他语种的文献时，我充分意识到乌克兰语和俄语中地名（如 Kyiv 或 Kiev，Odesa 或 Odessa）以及人名（如 Mykola Hohol 或 Nikolai Gogol）的区别。我使用了改进版的国会图书馆系统，省略了单词中的指示符（因此 Lviv 取代了 L'viv），省略了单词结尾的 i 和 j，并用 i 代替了乌克兰语中的 ї。因此，我选择使用 Hrushevsky 而非 Hrushevskyi 或 Hrushevskyj。如果人名和地名已有固定的英语译文（如基辅 Kiev，敖德萨 Odessa，克里米亚 Crimea，第聂伯 Dnieper，果戈里 Gogol），我将用它们来代替乌克兰语。而另一些（如利沃夫 Lviv，哈尔科夫 Kharkiv，扎波罗热 Zaporizhzhe），我将使用现代乌克兰语词条。最后需要留意的是，乌克兰 Ukraine 和乌克兰人 Ukrainians 直到19世纪才开始广泛使用，在此之前乌克兰人被称作罗斯人、鲁塞尼亚人、卢森尼亚人和“小俄罗斯人”，而且并不存在所谓“乌克兰”的土地。我在文中会频繁使用“乌克兰人的土地”（Ukrainian lands），并且使用“罗斯人”和“鲁塞尼亚人”指代这片土地上的早期居民。

历史大事年表

9 世纪 60 年代	基辅罗斯的诞生
988 年	弗拉基米尔大公治下的罗斯接受东正教为国教
1036—1054 年	智者雅罗斯拉夫的统治，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
12 世纪早期	涅斯托尔编纂《罗斯古编年史》
1240 年	蒙古人对罗斯的劫掠
1249 年	加利西亚（西乌克兰）王公丹尼洛驱逐蒙古人失败
1349 年	波兰占领加利西亚
1362 年	蓝水河战役，立陶宛人挺进乌克兰
1385 年	克列沃联合产生波兰和立陶宛的共同君主
1569 年	卢布林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1596 年	布列斯特联合成立希腊天主教会
1632—1647 年	彼得罗·莫吉拉任基辅大主教
1648 年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哥萨克大起义
1654 年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将哥萨克置于俄罗斯沙皇保护下

1667 年	《安德鲁索沃条约》使俄罗斯控制第聂伯河东岸与基辅
1687—1709 年	伊万·马泽帕任哥萨克盖特曼
1709 年	波尔塔瓦战役，沙皇彼得一世击败马泽帕
1772—1774 年	哈布斯堡奥地利占领加利西亚与布科维纳
1775 年	俄罗斯人摧毁扎波罗热塞契
1783 年	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
1785 年	盖特曼政权被废除
1793—1795 年	俄罗斯占领第聂伯河右岸与瓦莱尼亚
1840 年	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科勃扎琴歌手》出版
1845 年	基里尔—梅福兄弟会成立于基辅
1848 年	最高罗斯拉达在利沃夫成立
1876 年	俄罗斯帝国禁止使用乌克兰文
1890 年	第一个乌克兰政党（激进党）成立于利沃夫
1898 年	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发表《乌克兰—罗斯史》
1900 年	第一个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政党成立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1915 年	俄罗斯占领加利西亚
1917 年 2 月	沙皇退位
1917 年 3 月	乌克兰中央拉达（议会）成立
1917 年 11 月	布尔什维克革命；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1917 年 12 月	第一个苏维埃乌克兰政府成立于哈尔科夫
1918 年 1 月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
1918 年 4 月	德国支持斯科罗帕茨基成立盖特曼政权
1918 年 12 月	盖特曼被推翻，西蒙·彼得留拉执掌执政

	内阁
1919 年	布科维纳让与波兰，特兰西卡帕提亚让与捷克斯洛伐克
1921 年	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922 年	《里加条约》将加利西亚与西瓦莱尼亚置于波兰控制之下
1929 年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立
1932—1933 年	苏联当局在乌克兰制造饥荒
1933—1938 年	斯大林主义大清洗与恐怖统治
1939 年	苏联占领西乌克兰
1941 年	德国人侵苏联，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宣布乌克兰独立
1944 年	德国军队被逐出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抵抗苏联红军；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放逐至中亚
1945 年	西乌克兰并入苏联
1954 年	克里米亚由俄罗斯联邦转让与乌克兰
1963—1972 年	彼得罗·谢列斯特任苏共乌克兰领导人
20 世纪 60—70 年代	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发动争取人权和民族权利的运动
1972—1989 年	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任苏共乌克兰领导人
1986 年 4 月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1989 年 9 月	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成立，乌克兰人民阵线成立
1990 年 7 月 16 日	乌克兰发表主权宣言
1991 年 8 月 24 日	乌克兰发表独立宣言
1991 年 12 月 1 日	全民公决通过乌克兰独立；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当选为总统

1994 年 7 月	列昂尼德·库奇马当选为总统
1996 年	通过新宪法；新货币格里夫纳开始流通
1999 年	鲁赫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乔诺维尔因车祸身亡；库奇马再次当选
2000 年	后苏联时代乌克兰首年经济正值增长
2000 年 11 月	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被发现遇害身亡；录音带指认总统库奇马的嫌疑
2001 年	前总理维克托·尤先科成立反对党“我们的乌克兰”
2004 年 12 月	大规模“橙色革命”的游行示威后，尤先科当选为总统
2006 年	“橙色联盟”解体；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
2007 年	新一届议会选举；尤利娅·季莫申科再次当选为总理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历史大事年表 / 1

第一章 序言 / 1

一、地理与气候 / 1
二、人口 / 3
三、语言 / 4
四、宗教 / 5
五、区域主义 / 8
六、政府 / 10
七、经济 / 12
八、对外关系 / 14

第二章 基辅罗斯:乌克兰文化的奠基 / 17

一、前斯拉夫时代的乌克兰 / 17
二、最早的东斯拉夫人 / 19
三、基辅罗斯的建立 / 20
四、罗斯的黄金时代 / 24
五、基辅罗斯的终结 / 28
六、谁能够继承罗斯的遗产? / 30

第三章 波兰—立陶宛时期与哥萨克的崛起 / 33

一、立陶宛人对乌克兰的扩张 / 33
二、波兰对乌克兰的扩张 / 35

三、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治下的乌克兰 / 36
四、布列斯特联合与宗教政治 / 39
五、哥萨克的崛起 / 41
六、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 / 43
七、赫梅利尼茨基的遗产 / 46

第四章　俄罗斯帝国治下的乌克兰 / 49

一、哥萨克盖特曼政权 / 49
二、马泽帕起义与哥萨克自治的终结 / 52
三、俄罗斯的领土扩张 / 56
四、“小俄罗斯”的俄罗斯化 / 58
五、乌克兰文化的复兴 / 62
六、改革与社会经济变革 / 65
七、乌克兰的政治变迁 / 68

第五章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西乌克兰 / 73

一、哈布斯堡帝国对乌克兰土地的统治 / 73
二、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认同 / 75
三、帝国的改革与社会经济变迁 / 78
四、民族的觉醒:从鲁塞尼亚人到乌克兰人 / 80
五、区域差异:特兰斯卡帕提亚与布科维纳 / 84
六、乌克兰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 86

第六章　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 89

一、1917 年革命 / 89
二、德国的占领与盖特曼政权 / 94
三、西乌克兰的发展 / 96
四、执政内阁与内战 / 99
五、苏联的成立 / 102
六、异乡人:波兰治下的西乌克兰 / 104

第七章　苏联治下的乌克兰 / 109

一、20 世纪 20 年代的乌克兰化 / 109

二、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 / 112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乌克兰 / 121
四、战后的乌克兰：重建与报复 / 126
五、反对派运动的活跃 / 127

第八章 乌克兰走向独立 / 132

一、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境内民族主义的崛起 / 132
二、切尔诺贝利事故 / 135
三、乌克兰人为变革而动员 / 137
四、独立运动的发展 / 140
五、苏联的解体与乌克兰宣布独立 / 150
六、乌克兰独立全民公决 / 153

第九章 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1991—2004) / 156

一、维护乌克兰国家 / 156
二、乌克兰国家民主化? / 160
三、经济崩溃 / 165
四、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区域分化 / 168
五、东西之间的乌克兰外交政策 / 173
六、"库奇马门"和政治危机 / 176

第十章 "橙色革命"及其之后 / 180

一、推翻"权力党"运动 / 181
二、选举舞弊、大众动员和橙色阵营的胜利 / 185
三、治理的难题与橙色阵营的分裂 / 190
四、亚努科维奇归来 / 192
五、2007年议会选举——橙色阵营的第二次机遇? / 196

乌克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 199

参考文献 /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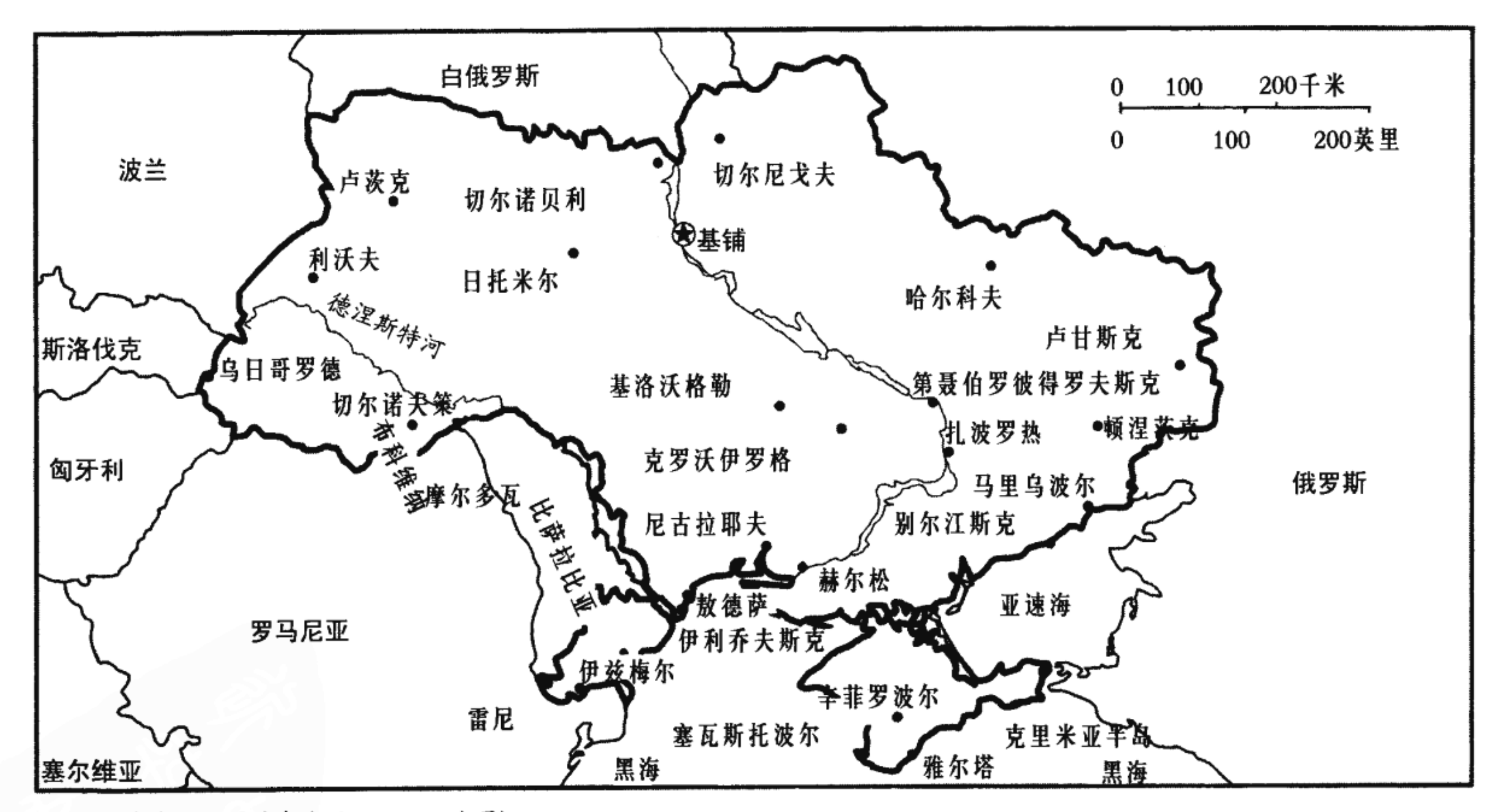
索 引 / 211

第一章　序言

一、地理与气候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北方和东方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接壤，西临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南滨黑海与亚速海（参见地图 1），东西跨度约 800 英里，南北宽约 550 英里，拥有长约 1 700 英里的海岸线。乌克兰面积约 233 000 平方英里，比德克萨斯州略小。其国土多为平坦无树的大草原，仅有的山脉为延伸至其领土西部的喀尔巴阡山一部分，以及克里米亚半岛沿黑海边的部分山脉。克里米亚半岛与乌克兰大部仅有一条狭窄的土地相连。由于缺少自然屏障，乌克兰成为无数战争、移民与文化影响的汇聚之地。其草原地带肥沃高产的黑土地则助其赢得“谷仓”的美誉，并使得农业生活成为乌克兰文化的标志。

乌克兰被自北向南流向黑海的第聂伯河（乌克兰语中为 Dnipro）分为东西两半。历史上第聂伯河是重要的商道，乌克兰众多早期定居点便在其左右，而首都基辅（乌克兰语为 Kyïv）即地跨大河两岸。第聂伯河历史上也曾经是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控制下的乌克兰的边界，因此至今仍经常被人称为“左岸”（东）和“右岸”（西）乌克兰。南布格河（Buh）与德涅斯特河（Dnister）位于西部，同样注入黑海，也曾是重要的商道，直到今天仍提供着丰富的水资源。



地图1 乌克兰（图片来自于Bookcomp公司）

3

乌克兰的气候通常被描述为“大陆性”。这意味着乌克兰的冬季十分寒冷，有时异常寒冷（-20 ℉或-30℃），西南部1月平均气温为26 ℉（-3℃），东北部为18 ℉（-8℃）。尽管如此，乌克兰的气候仍比俄罗斯温暖，加之其优越的土壤条件，使乌克兰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夏季相对温暖，西南部平均气温为73 ℉（23℃），东北部为66 ℉（19℃），日间最高气温可以达到90 ℉（32℃）。而克里米亚则享受着近似于地中海的气候，天气更加温和湿润。

二、人口

据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乌克兰拥有4 840万人口，比1989年的5 180万人口（当时乌克兰仍属于苏联）相比显著下降（6%）。据2007年的估算数据，[①] 乌克兰只有4 630万人口，年增长率为-0.675%。人口下降原因之一在于对外移民。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许多乌克兰人出国寻找工作机会，主要前往俄罗斯、波兰、德国、匈牙利、以色列、土耳其、加拿大和葡萄牙。生育率（每名妇女1.24个孩子）也极为低下。女性人口明显多于男性（54%：46%），多半因为女性寿命更长（女性预期寿命为74岁，男性为62岁）。出生率过低与男性预期寿命过短被视为主要的人口问题。

人口普查显示，多数乌克兰人（67.2%）为城市居民。乌克兰的大城市有基辅（320万人）、哈尔科夫（170万人）、顿涅茨克（170万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50万人）与敖德萨（110万人）。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08人（每平方千米80人），但人口分布不均。总的来说，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东乌克兰比西乌克兰人口密度要高。例如，东部顿涅茨克州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83人，而西部的沃伦州（每平方英里53人）与日托米尔州（每平方英里46人）则要低得多。需要注意的是，从比例和总数上来看，东部州与克

4

① CIA World Factbook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up.html, accessed August 15, 2007.

里米亚的人口下降最为显著。

乌克兰的土地上居住着 100 多个民族。其中人口最多的是乌克兰族（2001 年占总人口的 78%）与俄罗斯族（2001 年 17%），他们拥有共同的斯拉夫人背景。俄罗斯人曾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批来到乌克兰煤矿和工厂工作，现在占东部与南部人口比例较大。值得注意的是，2001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一部分乌克兰人口增长了 5%，而这部分人在 1989 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被视作俄罗斯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乌克兰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乌克兰国籍有着更大的优势。但是这次人口普查并没有详细调查混血人群的情况，而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联姻十分普遍。乌克兰其他民族还包括白俄罗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突厥—穆斯林人的一支）、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其中每个民族占总人口不到 1%。

三、语言

乌克兰官方语言为乌克兰语，为东斯拉夫语的一支，使用西里尔字母。西里尔字母是一种集拉丁、希腊和特殊的“斯拉夫”字母的融合体。乌克兰语是从 1 000 年前基辅罗斯时代的东斯拉夫语发展而来的。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拥有共同的起源，因此乌克兰语和其他 2 支现代东斯拉夫语言关系紧密也就不那么奇怪了。但是，每种语言的西里尔拼写版本略有不同（如乌克兰语中有字母 I 和 ї，而非俄语中的 Э 或 ы），在发音上也有些许差别。虽然在很多方面相似，但俄语和乌克兰语却无法直接进行交流。当然有些讲俄语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因为乌克兰与波兰关系较近，乌克兰语和作为西斯拉夫语一支的波兰语有很多相同的词汇（如 tak 意为“是”，robity 意为“去做”）。

直到 19 世纪中期，由于诗人塔拉斯·舍普琴科的贡献，乌克兰语才发展为一种书面语言，并达到某种程度的标准化。然而，乌克兰语也存在几种区域方言，主要分为“左岸”与“右岸”乌克兰语以及在 20 世纪初移民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乌克兰人所说的乌克兰语。部分西乌克兰人使用一种不同的斯拉夫语言，称为卢森尼亚或鲁塞尼

亚语，尽管有些人坚持认为这不过是乌克兰语的方言。以前，乌克兰人大多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文盲农夫，但现在99.9%的成年乌克兰人具备读写能力。

在苏联时代，不少以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人抱怨乌克兰语被边缘化，乌克兰人有失去自身文化及其关键组成部分的危险。因此在后苏联时代，乌克兰人致力于推广乌克兰语，以提升其地位。的确，在苏联时代，俄语主导了行政、商业和教育等领域，许多俄罗斯人只把乌克兰语当成俄语的一种农民方言。许多乌克兰人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不懈的努力，以便使乌克兰语成为学校的指定语言，并成为所有政府事务的官方语言。在许多乌克兰城市的街道上，尤其在比较俄罗斯化的东部，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俄语，因为大部分乌克兰人通晓俄语，不时可以听到对话的两个人中，一个人说俄语，而另一个说乌克兰语。他们彼此无沟通障碍，只不过选择自己感到舒服的语言进行交流。另一种叫做苏儿可（surzhyk）的语言也在兴起，这个词源自一种混合谷物制成的面粉，表现为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混合体。

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67.5%的人口认为乌克兰语为其母语，而29.6%的人认为俄语为母语。这2个数据与1989年相比，前者上升了3%，而后者下降了3%。说俄语者对国家的“乌克兰化”感到不公，并向政府游说，试图使俄语成为国家级、或至少是地方一级的官方语言。这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大选中的重要议题。赞成使用乌克兰语的人认为乌克兰语是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关键部分，而支持俄语的人认为乌克兰应该正视并承认相当一批以俄语为母语者的权利，并成为像加拿大那样的双语国家。

四、宗教

尽管宗教活动在苏联时代受到阻碍甚至压制，宗教仍然是乌克兰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一乌克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Razumkov Center）2003年的调查，75%的乌克兰人声称信奉上帝，37%

的人定期参加教会活动。[①] 乌克兰宗教组织众多。根据2006年的官方数据，乌克兰有超过3万个注册宗教组织和教区。它们大部分属于从中世纪988年基辅罗斯时代（参见第二章）就成为官方宗教的东正教。东正教自称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在1054年与罗马天主教会分庭而立。尽管如此，东正教与新教和天主教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三位一体、基督复活、来世、使用《旧约》与《新约》圣经）。东正教的特色在于其教堂的圆顶、圣像（刻在木头上的简朴的圣人雕像，经常被参拜者亲吻）、圣像屏（绘有圣像的屏风用来分隔中殿与圣所）。礼拜活动的特点在于信徒是站立的（没有座位）、颂唱较多以及使用较多的香薰。大多数东正教会沿用儒略历，使很多宗教节日与其他基督教会的日期不同（如东正教的圣诞节在1月17日）。

但今天的乌克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东正教会，而是存在着3个主要的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莫斯科大牧首，UOC-MP），乌克兰东正教会（基辅大牧首，UOC-KP）和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UAOC）。UOC-MP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乌克兰分会的继承者，并且是苏联时期唯一被允许保留的基督教会。尽管其在1990年被重新命名，但教会的领袖依然对莫斯科大牧首负责。其教会活动使用俄语，因此在俄裔居民众多的东部较为流行。到目前为止，其拥有乌克兰数量最多的教区，但其他与之竞争的教会声称对UOC-MP管辖的许多教区拥有所有权。[②]

UOC-KP成立于1992年，目的在于建成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乌克兰民族教会。但自成立之日起，便饱受争议，主要原因有：（1）许多人并不认同"民族"教会的概念；（2）卷入与UOC-MP的产权之争；（3）其大主教费拉雷（Patriarch Filaret）于1995年继任，他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主要由于他过去担任俄罗斯东正教会乌克兰分支的领导人，并在苏联时期帮助镇压其他教会。与UOC-MP不同，UOC-KP

① This, and other data in this section, comes from "Religion in Ukraine", accessible at en. wikipedia. org/wiki/Religion_in_Ukraine, accessed August 14, 2007.

② A good source for disputes among churches is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34—252.

并没有被东正教团体（Eastern Orthodox Communion）承认为合法的民族教会，但它仍在乌克兰境内和国际上为改善其地位而不懈斗争。其教会语言为乌克兰语，绝大多数教区居民居住在西乌克兰。

UAOC 于 1919 年成立于西乌克兰，当时这一地区许多人正在力争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作为独立教会，尽管保留了很多与其他东正教会相同的仪式，但其主教并没有向上一级主教通报的义务。因此，UAOC 把自己打造成更加独立的、乌克兰的教会，并因此于 1930 年被苏联政府取缔。但它在海外乌克兰人群体中继续存在，并且在 UOC-MP 之外修建新教堂，修复旧教堂。其主要教区居民集中于西乌克兰。

乌克兰其他教会主要有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有时被称作乌克兰天主教会或东仪天主教会。此教会由布列斯特联合于 1596 年所创立，当时乌克兰的大部分在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之下（参见第三章）。布列斯特联合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混合的天主教—东正教教会，以使 16 世纪末乌克兰土地上的东正教居民更为认同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并摆脱莫斯科大牧首的宗教权威。此教会坚持东正教仪式，其教士可以结婚，但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此教会在沙俄时期受到压制，后来因其与乌克兰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于 1946 年被苏联政府取缔。与 UAOC 类似，在海外移民群体中保有较多信众。尽管总部在 2005 年从西乌克兰的利沃夫移至基辅，大多数教民仍居住在西乌克兰。

根据前文提到的 Razumkov 中心于 2003 年的调查显示，乌克兰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居民中超过半数（50.4%）的人属于 UOC-KP，26.1% 的人属于 UOC-MP，8% 的人为希腊天主教徒，7.2% 的人参加 UAOC 的活动。

乌克兰也存在其他宗教团体。大约有 2% 稍多的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大部分为波兰裔，居住于西乌克兰。大概有相同数量的人口信仰新教，乌克兰有 4 000 多个新教团体（如浸信会、摩门教、第七日耶稣再临会）。在乌克兰，尤其在敖德萨和利沃夫活跃着犹太人群体。哈西德派犹太教于 1740 年创立于乌克兰，到 1800 年，乌克兰已有近

300万犹太人。然而，大多数乌克兰犹太人在德国人制造的大屠杀中被消灭，不得不说的是参与其中的也有他们的乌克兰邻居。许多幸存者移民到以色列和美国，而据 Razkumov 的调查，今天只有不到1%的乌克兰人信仰犹太教。乌克兰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为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4年一同被流放到中亚。1991年后，许多人返回故土，现在有超过250 000人定居乌克兰。

五、区域主义

当谈及民族、语言与宗教时，我们发现乌克兰有着很明显的区域划分。乌克兰最重要的区域划分为东部与西部。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东乌克兰在17世纪中叶便纳入沙俄（随后苏联）统治之下；乌克兰西部则被波兰—立陶宛、奥地利和（之后的）波兰与罗马尼亚分别统治，直到1944年方被苏联吞并。因此，东乌克兰在血缘上更接近俄罗斯人，也更加俄罗斯化。例如在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38%的人口为俄罗斯裔，而且过半数的乌克兰裔母语为俄语。[①] 与之相反，西乌克兰的公民更愿意认同自己的乌克兰人身份，更多地使用乌克兰语[②]，并且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例如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在沙俄和苏联统治下，乌克兰人生活在高压政治体制下；而在波兰和奥地利治下的乌克兰人生活在相对自由、宽容的政治环境中，使他们能够较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沙俄和苏联治下的东乌克兰很快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因此东乌克兰人口较稠密。西乌克兰则更加农村化，在波兰和奥匈帝国境内是经济发

① See All-Ukrianian Population Census of 2001.

②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2001 census, the popul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Lviv (95%) and Ivano-Frankivsk (98%) are overwhelmingly ethnic Ukrianian. Fewer than 1% of ethnic Ukrainians in theses regions claim Russian as their native language.

展最为落后的。[1]

当代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有着诸多的表现形式，这已经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东乌克兰人更倾向于与俄罗斯建立紧密的关系，往往投票给左翼政党（如共产党或社会党），并希望保证俄语的地位。西乌克兰人倾向与欧盟、北约和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往往投票给“民族民主”政党，例如鲁赫和“我们的乌克兰”，并希望提升乌克兰语的地位。在后苏联时代的选举中，东西部的分歧显著体现在对关键议题（如经济改革、对外政策）的公众舆论和投票上。[2] 在 2004—2005 年“橙色革命”期间（参见第十章），维克托·尤先科领导的“橙色”力量主导了西部、基辅和一些沿第聂伯河的“边界”地带，而“蓝色”政党区域集中在东乌克兰，尤其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一些人担忧，由于语言、政治文化和经济造成的严重区域分裂会使乌克兰分崩离析，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迹象表明“乌克兰人”的认同感在增强。[3]

一些人认为不应该把乌克兰简单地分做东西两部分。作为乌克兰特殊的地区，克里米亚在地理、人口和历史等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 18 世纪末，克里米亚仍在鞑靼人控制之下；今天，它仍然是乌克兰俄裔居民占多数（2005 年为 59%）的唯一区域。而它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原因只是由于 1954 年当乌克兰还处于苏联统治的时候，为了庆祝俄乌自《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参见第三章）签署 300 年以来的友谊，而将管辖权从俄罗斯移交给乌克兰的。

9

这次事件在当时看来无关紧要——毕竟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苏联——但当乌克兰独立以后，其严重性便凸显出来。许多俄罗斯人和克

---

① According to the 2001 census, the eastern regions of Donetsk (90%), Luhansk (86%), Dnieperpetrovsk (83%), and Zaporizhzhia (76%) over overwhelmingly urban. In contrast, those regions with an urban population of less than 50% (Transcarpathia, Vinnytsia, Ivano-Frankivsk, Chernivtsi, Rivne, and Ternopil) are all in western Ukraine.

② Paul Kubicek, "Regional Polarisation in Ukraine: Public Opinion, Voting, and Legislative Behaviour", *Europe-Asia Studies* 52, no. 2 (2000): pp. 273—294.

③ Taras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London: Routledge, 1998).

里米亚的居民都希望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因为得到一定的缓解，克里米亚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并非十分严峻。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从来不是乌克兰的核心区域，当地居民已经高度俄罗斯化，借用了18世纪沙俄时代的旧称来命名自己为“新俄罗斯”，宣称自己并非归属于乌克兰。许多远在西部和多山地的特兰斯卡帕提亚地区（州）的居民则认为自己是卢森尼亚人①而非乌克兰人，因此有权享受特殊的待遇或保护。

六、政府

除了1918—1921年这段短暂的时间之外，乌克兰直到1991年才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国家，因此乌克兰缺乏国家构建的经验，以及民主或代议制政府的实践。在苏联时期，乌克兰是15个加盟共和国（类似于美国的州或加拿大的省）的一员，共和国首府基辅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以莫斯科为首都的苏联由苏共掌控，禁止其他党派的活动，控制新闻媒体与经济，并且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表达。

在一系列事件的共同作用下，乌克兰于1991年取得独立，相关内容在第八章中有详述。许多人希望乌克兰从苏联统治下解放出来，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政府的好处。但是，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行之有效的民主体制并非易事。② 正如第九章中所叙述的，在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991—1994）和列昂尼德·库奇马（1994—2004）执政期间，乌克兰民主进程受到很多阻碍，主要在于政治腐败、政府操纵媒体、民间社团和政治反对派软弱无力、选举舞弊和敌对政治派别间无穷的争吵。经过尖锐的辩论，乌克兰于1996年通过新宪法，赋予了总统更大的权力。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的非民主性更加表露无疑。

---

①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Rusyns (or Ruthenians) should consult Paul R. Magosci and Ivan Pop, eds., *Encyclopedia of Rusyn History of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② Good sources include Kuzio, 1998, and Paul D'Anieri, *Understanding Ukrainian Politics: Power,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2000 年，库奇马总统被一盘录音带清楚地指证其曾下令谋杀反对派记者。这起事件导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后被政府强行镇压下去。

2004 年的大选中，库奇马指定的接班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试图伪造选举结果来赢得大选。而前总理尤先科领导的反对党识破其意图，进而鼓动上百万乌克兰人上街示威，这就是被尤先科政党颜色所命名的“橙色革命”。最后，由于游行抗议、乌克兰法院的干涉和国际调解，新一轮的选举将尤先科——其在竞选期间神秘中毒——推上总统宝座。尽管此事给许多乌克兰人带来新一轮希望，但因为亚努科维奇令人吃惊地在 2006 年成为总理，乌克兰仍然处于政治分裂中。毫无疑问，作为死对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之间很难进行合作，随后便产生了几次政治危机。

10

“橙色革命”期间的修宪给乌克兰带来了议会—总统体制。国家元首为总统，每 5 年由大选产生。总统必须赢得多数选票；如果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则必须由得票最多的前 2 位候选人进入下一轮选举。与库奇马时代总统享有的广泛权力相反，现在乌克兰总统的权力大多集中在外交与军事政策领域。

乌克兰立法机构称为最高拉达（议会）。正常情况下每 5 年改选一次，当然在像 2007 年那样的特殊情况下会提前进行选举。最高拉达有 450 个席位，采取按代表比例分布的党派选举制。这就意味着投票者需要选择一个政党，而一个政党所获得的席位与其获得选票的百分比成正比。例如，一个政党赢得 20% 的选票，就会获得 90 个席位（450 席中的 20%），使得该政党名单上的前 90 名党员成为最高拉达成员。为了赢得席位，一个政党至少要获得 3% 的选票。接下来由最高拉达选举产生总理，除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由总统任命外，总理任命政府其他各部部长（内阁阁员）。总理为政府首脑，拥有最高决策权。由最高拉达制定法律。总统可以否决立法议案，但最高拉达可以通过 2/3 以上的投票推翻总统的否决。最高拉达同样可以通过 2/3 以上的投票进行修宪。

乌克兰宪法法院成立于 1996 年，是唯一有权对涉宪问题做出裁决

的司法机构。宪法法院有 18 名法官，由总统、最高拉达与法官大会平均任命。法官的任期为 9 年。法院系统的最高级别为最高法院，法官由议会任命。法官数目并非固定不变（2007 年有 85 名）。最高法院下设几个专门法庭（如民事法庭、刑事法庭）。最高法院下为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代表国家负责起诉，由总统任命。如果不针对被腐败侵蚀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话，这一直是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热议的议题。

乌克兰是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国家政府与地区或次国家政府之间不存在分权。全国被划分为 24 个地区（州），每个州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被进一步划分为区或市。克里米亚作为地位特殊的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议会，可以通过仅在克里米亚地区实行，且不与乌克兰宪法或国家级法律相抵触的法律。基辅与塞瓦斯托波尔市（克里米亚主要港口与军事基地）地位特殊，并不受任何州一级政府的管辖。

乌克兰政党众多，其政党体制也是多变的。独立后即告成立的政党大多数已经消失或合并为新政党。只有少数乌克兰人加入政党，而许多政党只被少数人所控制。在 2007 年议会选举中，20 个政党和联盟提名各自的候选人，有 5 个政党和联盟超过了 3% 的门槛：地区党（34.4%）；尤莉亚·季莫申科联盟（30.7%）；我们的乌克兰（14.2%）；共产党（5.4%）；利特温联盟（4%）。

七、经济

传统上，乌克兰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当其他民族的人（如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犹太人）定居在城市中成为商人、工匠和公务员时，乌克兰人多为农民或小农场主，居住在农村。时光流逝，乌克兰人逐渐被城市化，但即使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业化开始之时，农业仍然是许多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苏联时期，乌克兰以占苏联 3% 领土面积的土地生产了全国农业产量的 1/4。主要的农作物为糖用甜菜、土豆、玉米、小麦、大麦和其他谷物，肉类和乳制品也是重要

的产业。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农业产值占到乌克兰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1%，近1/5的人口从事农业与食品加工业。[①]

乌克兰重要的工业部门多半是在苏联时代建设起来的。大多数“重工业”（如，化学与钢铁厂、矿业、工业设备、汽车业、军工业）集中在东乌克兰。尽管由于近期缺乏投资以及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许多工厂已经被荒废，但以钢铁为代表的一些工业产品仍是乌克兰的主导出口项目。不过乌克兰缺乏重要的石油或天然气储备，在能源需求方面依赖俄罗斯。鉴于俄罗斯提高燃料价格，或在乌克兰偿付欠款之前威胁掐断燃料供应，此类事件不时会造成政治危机。

12

乌克兰在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为共产主义性质，不存在私有财产，大部分经济计划（如食品价格、生产目的）由国家决定。工厂与农场或为国家所有，或者是集体财产，而集体财产实际上也由国家所控制。尽管国家计划和投资对乌克兰工业增长做出过贡献，但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明显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经济失败是共产主义在苏联崩溃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独立伊始，经济改革便凸显其急迫性。许多乌克兰人希望摆脱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接纳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然而，由于共产主义体制保证就业、福利以及对维持存在的国家资金非常重要，一些人并不情愿拥抱资本主义，尤其对东乌克兰来说，许多人害怕资本主义将导致大型工业企业的破产与大量失业现象。

和波兰、匈牙利与捷克等引入市场主导政策的国家不同，乌克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极为缓慢。虽然物价已经放开，但国家继续支持许多工业企业。许多公司被私有化，但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腐败，新的所有者也往往缺乏能力与资金使企业盈利。因此，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经济问题：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

---

① Data from www. worldband. org, accessed August 15, 2007. Unless otherwise cited, all data in this section come from the World Bank.

到了4 735%，从1991年到1995年经济每年平均衰退14%。[①] 少数有政治背景的公司通过腐败商业手段获利颇丰，但多数企业声称无力支付工人的工资，许多人的生活水准也直线下降，挣扎在贫困线上。"乌克兰化"这个词已经获得"使之毁灭"的另一层涵义。

自2000年改革开始加速后，乌克兰的经济经历了反弹。乌克兰吸引了更多的外资（2005年为78亿美元），经济开始持续增长，2001—200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8%。1996年起用的货币格里夫纳相当稳定，2001—2006年间年通胀率只有8%。因为许多人的工作收入为"灰色收入"，得以逃税，失业率的数据比较难以把握，但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失业率约为7%。[②]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好百顺。贫困，尤其是依靠小额养老金生活的老年公民的贫困状况依然严峻。平均月工资只有约200美元。世界银行的报告称2005年人均收入只有1 520美元，而俄罗斯为4 460美元，波兰为7 160美元，美国为43 560美元。[③] 腐败与公司治理是主要的问题所在。不平等的问题同样突出，不仅表现在崛起的超级"寡头"，同样表现在农村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基辅、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等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大城市。正如前文所述，许多乌克兰人离开故土，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机会。

八、对外关系

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国际定位是人们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苏联时期，乌克兰并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尽管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根据达成的妥协，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一同获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直到独立之后，乌克兰才开始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3—174.

② CIA World Factbook 2007.

③ Taking into accoun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 prices of products on the Ukrainian market), the CIA World Factbook estimates income per person to be $7 800.

认识到自身地处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理位置，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寻求一种“多向平衡外交政策”，与一系列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很明显，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在苏联成立前后，乌克兰与俄罗斯结成的纽带颇深。俄罗斯是乌克兰主要的贸易伙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整合为一体。乌克兰于1991年加入独立国家联合体，这是一个旨在使苏联和平解体，保持前苏联各国经济、政治、安全联系的组织。1994年，库奇马被选为总统，号召与俄罗斯结成更紧密的关系，并提出“更少的壁垒，更多的桥梁”的口号。

由于害怕俄罗斯会对乌克兰采取帝国政策或寻求重新兼并乌克兰的机会，许多乌克兰人并不想与俄罗斯保持亲近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与俄罗斯曾就乌克兰境内的前苏联核武器以及驻扎在克里米亚的前苏联黑海舰队的分配发生激烈的争吵。最终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和平解决——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和黑海舰队，并于1998年与俄罗斯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然而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问题远未终结，包括2003年围绕亚速海中刻赤海峡的领土争端，“橙色革命”中俄罗斯对舞弊选举的支持，以及俄罗斯试图提高售乌天然气价格。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是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潜在威胁，令许多乌克兰人为之担忧。对俄罗斯的警惕使得乌克兰加入了所谓的GUAM（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集团。此集团致力于修建绕过俄罗斯境内、起自里海的新石油天然气管道。

14

乌克兰同样热衷于与欧盟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确，后苏联时代的历届乌克兰政府强调将欧洲大西洋整合作为优先事项。乌克兰与北约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于1994年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乌克兰曾派遣维和部队协助北约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行动。同时，乌克兰也寻求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998年欧盟与乌克兰友好合作协议正式生效，1999年欧盟对乌克兰共同战略的提出，再次加深了双方的关系。乌克兰从欧盟与美国那里得到了用于经济改革、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清理、民主化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尽管有政治腐败问题，民主

建设拖沓和未经证实的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军售等记录，乌克兰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在库奇马政府后期还是得到很大的提升。

“橙色革命”后，尤先科总统试图使乌克兰更加向西方倾斜。他曾清楚地指出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想法得到乌克兰人民的总体认可。而欧盟只将乌克兰局限在欧洲睦邻计划（European Neighborhood Program）的框架下进行进一步合作。波兰是欧盟内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证明两国能把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时龌龊的关系置之身后。尤先科同时也主张乌克兰加入北约，但这个议题在乌克兰国内争议非常大，许多乌克兰人并不想加入一个被认为是针对俄罗斯的同盟。这一点也体现了乌克兰的外交侧重依然与其地理、国家历史和区域分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二章　基辅罗斯：乌克兰文化的奠基

乌克兰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尽管许多民族可以自称为“最早的乌克兰人”，但大多数史料证明，乌克兰起源于9世纪中晚期罗斯王国的建立，其首都为基辅。罗斯不仅是一个斯拉夫王国（尽管其创立者的起源颇有争议），同时也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其文化遗产——语言、宗教、艺术、建筑遗迹——在今天的乌克兰依然清晰可辨。虽然俄罗斯人也声称自己为基辅罗斯的后代，但乌克兰人经常自豪地指出基辅罗斯乃是自己民族的创造，以此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因此将自己与人口更多，更加强大的东方邻居区分开来。

一、前斯拉夫时代的乌克兰

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人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定居点可以回溯到大约15万年以前，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发现了史前人类（如石质武器、原始工具、墓葬）的物品。到公元前5000—前4000年，第一批农业部落已经在乌克兰西南部定居。有关这些早期的农业人群——所谓的特里波里文化——我们知之甚少，他们居住在大型村落里，到公元前2700年已经向东扩展到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沿岸。一些乌克兰人希望把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久远辉煌的年代联系起来，声称特里波里人发明

了车轮、书写和农业生产；帮助创立闪族与赫梯文明；建造了巨石阵；并且是基督、佛祖和查拉图斯特拉的祖先。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有些学者称其为“天方夜谭”（outlandish claims）。[①] 无论如何，人们都很难把这些古人称为乌克兰人——他们并不说乌克兰语，也没有“乌克兰”的概念，显然也并非基督徒。考古学发现证明特里波里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消失，更多的游牧部落取而代之。这些部落发现，乌克兰的气候与土壤更适合放养牲畜。

最早记录乌克兰定居者的文献见于荷马史诗《奥德修记》（*Odyssey*）。它称黑海北岸的乌克兰为“基麦里人的地方”。然而荷马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基麦里人的任何情况，尽管许多学者综合多方考证，认为基麦里人是娴熟的骑手，并使乌克兰进入了铁器时代。

有关斯基台人的记载则比较多。他们于公元前7世纪生活在今天的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与黑海沿岸）。有记载说先知耶利米（Jeremiah）称其为“残忍无情”“吞噬收成和面包”，并且“吞噬你的儿子和女儿”的北方民族。[②]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游历了斯基台人的土地，并把他们描述为饮人血、操一种波斯语言的凶猛游牧民族，政治权利掌握在军事贵族手中。除了征战掠夺外，他们也与黑海沿岸希腊殖民地通商往来。到了公元前4世纪，斯基台人已经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但在前339年被马其顿的菲利普（Philip of Macedon，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所击败。[③] 有人推测斯基台人为诺亚（Noah）之子雅弗（Japheth）的后代，并且是斯拉夫人的祖先。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在其1918年的著名诗作《斯基台人》（*Scythians*）中写道：“是的，我们是斯基台人！是的，我们是亚洲人/有着傲慢和贪婪的眼睛。”有些乌克兰人

---

①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

② Jeremiah 6: 22—23 and 5: 15—17, in *The New English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12—815.

③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p. 9—11.

将斯基台人抬到和特里波里人一样高的位置，称其对希腊的黄金时代做出过巨大的贡献。[①] 今天，人们还能在乌克兰南部找到斯基台人酋长的大型古墓。据希罗多德记载，酋长的一些部落成员、他的仆人和众多妻子中的一个为其陪葬。[②] 而且许多本地区河流的名称（如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顿涅茨河、多瑙河），可能来源自波斯/斯基台语。

斯基台人衰落下去后，另一支东部来的讲波斯语的萨尔马提亚人主宰了南乌克兰，尽管黑海沿岸仍有斯基台人和希腊殖民地的残余。和斯基台人相似，萨尔马提亚人是凶猛的武士，尽管其通商活动甚至远达中国。和斯基台人一样，一些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也声称萨尔马提亚为自己的先祖。17 世纪哥萨克领袖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就称自己为“萨尔马提亚王子”。[③] 然而，萨尔马提亚人在此地区的统治不断遭到其他自欧亚大草原西进的游牧部落的挑战。到公元 3 世纪时，萨尔马提亚人被东方的匈奴人、北方的日耳曼哥特人和西部的罗马人一同取代。

二、最早的东斯拉夫人

上文所提到的各类人并非斯拉夫人，即使今天我们定义乌克兰人是斯拉夫人的一支，他们与古代的联系也微乎其微。应该说所谓乌克兰文明或乌克兰民族的根基起源于斯拉夫人，更为确切地说是起源于东斯拉夫人。

大多数学者坚持认为，由许多部族构成的斯拉夫人早先定居于今天波兰和西乌克兰境内的喀尔巴阡山附近。特别是到 7 世纪的时候，他们从那里向新土地（如巴尔干、今天的俄罗斯）殖民。伴随着迁徙，他们的语言发展出 3 个分支：西斯拉夫语（发展为波兰语和捷克语）；南斯拉夫语（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等语言的前身）；东斯拉

---

① Wilson, 2000, p. 29.

② Michael Hrushevsky, *A History of Ukraine*, ed. by O. J. Frederiksen (New Haven, CT: Archon Books, 1970), p. 15.

③ Wilson, 2000, p. 31.

夫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俄语的前身）。

以乌克兰为例，早期斯拉夫人的历史很模糊，关于他们只有不多的文献记录。根据一些记载，包括12世纪初编纂的《罗斯古编年史》（或译为《往年纪事》）在内，认为斯拉夫人和前文所说的斯基台人一样，是诺亚三子雅弗的后代。他在大洪水之后得到了大地的北部和西部。另一个基于考古学发现并且传说色彩较淡的主张认为，安特部落联盟是东斯拉夫文化的开端。然而争论仍在继续，主要围绕着安特人是土著民还是移民，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斯拉夫人（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哥特人或日耳曼人），以及他们崛起的时间（一些资料说早在公元2世纪）来展开。[①] 波利安人是最大的安特部落之一。根据《罗斯古编年史》，他们在482年建立基辅城（乌克兰语中为Kyïv），据说其名称得自于一个叫做Kyi的波利安王公。一些人相信波利安人拥有一套使用一种前西里尔字母的书写文化。西里尔字母直到863年才由圣人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系统化。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波利安人与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拜占廷帝国有直接联系并熟知基督教这一点还是比较可信的。[②]

分散的安特部落联盟在602年被统治中东欧大部的突厥部落阿瓦尔人（Avars）所击败，然而东斯拉夫文化和特性被保存了下来。阿瓦尔帝国于公元9世纪早期没落。最终，在更加靠南部的几个斯拉夫部落被突厥民族的一支卡扎尔人（Khazars）所征服。而在北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吉人掌控了众多的东斯拉夫部落。由于受到外族统治，今天乌克兰境内的斯拉夫人的土地在公元9世纪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潭死水”。[③]

三、基辅罗斯的建立

尽管如此，到了11世纪早期，基辅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并且迅

① Compare accounts in Subtelny, 2000, p. 21; and Wilson, 2000, pp. 31—32.

② Wilson, 2000, pp. 31—34.

③ Subtelny, 2000, p. 22.

速崛起为全欧洲最为先进社会的大公国——罗斯的首都。今天的乌克兰人热切地表达罗斯荣耀为自己所有，其不多的遗迹依然留存在基辅以及全国各地；不过关于基辅罗斯崛起的问题却一直笼罩在争议中。

中心的问题是：谁是基辅罗斯的缔造者？一派观点，即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或维京人理论。《罗斯古编年史》中的记载如下：

> 860—862 年：纳贡者们把瓦兰吉人赶过海去，拒绝向他们纳贡，并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物。但是他们没有章法，互相攻讦，开始闹内讧，彼此间开战。于是他们说："让我们找一位王公来统治我们，按照规矩来治理吧。"于是他们过海到瓦兰吉人、罗斯人那里。就是这么称呼那些瓦兰吉人的——罗斯人，就像有的人叫瑞典人，有的人叫诺曼人，有的人叫盎格鲁人，还有人叫哥特人一样……（他们）说："我邦地大物博，却无秩序。请去做王公，治理我们吧。"他们因此选择兄弟 3 人，连同其族人，并带领所有罗斯人前往。[①]

这个故事的余下部分告诉我们，三兄弟中的长兄留里克（Riurik）统治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一个位于今天俄罗斯西北部的定居点，后被称为"罗斯的土地"。他的 2 个弟弟死后，留里克成为罗斯唯一的统治者，并且向其他斯拉夫人的城镇殖民。诺夫哥罗德贵族（波雅尔，boyars）阿斯科尔德（Askold）与德尔（Dir）得到留里克的许可后，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成为基辅波利安人的统治者。他们在那里发展壮大，甚至向君士坦丁堡发动过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据说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尽管并没有要求其臣民一同加入教会。然而他们的统治却戛然而止。879 年，留里克去世，其小儿子伊戈尔（Ihor，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为 Ingvar）的异教徒摄政奥列格（Oleh，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为 Helgi）进攻基辅，并在 882 年处死阿斯科尔德与德尔，从

21

---

① Samuel Cross and Olgerd Sherbowitz-Wetzor, eds. and trans.,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Cambridg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53), p. 59。（本段汉语译文参考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2005，pp. 18—19。——译者注）

而自立为基辅大公，将基辅确立为罗斯的新首都，并且宣布其为“罗斯诸城之母”（据《罗斯古编年史》记载）。[1]

这个故事的争议之处至此便显而易见了。无秩序的斯拉夫人无力管理自己，因而邀请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来统治自己。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解读这段文献时并没有只看表面，他们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不是受到邀请，而是为了寻找资源（如毛皮和贵金属）并控制通往君士坦丁堡和中东的水路，例如第聂伯河（注入黑海）与伏尔加河（注入里海）。鉴于《罗斯古编年史》编于此后几个世纪，一些人认为其记载根据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传说而写，是自利、充斥矛盾与偏差的，因此倾向于完全抛弃这段记载。例如乌克兰著名历史学家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在承认 9 世纪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生活在基辅及其附近的同时，认为基于“外国人的传说和为数不多记载”的“乌克兰早期历史仍然模糊”。[2] 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罗斯（Rus）一词的起源。格鲁舍夫斯基认为其来自于基辅附近的土著斯拉夫人，而其他人则指出其有可能源自西方古瑞典语后芬兰语中的 Ruotsi 一词。[3] 即便基辅罗斯最早的统治者不是斯拉夫人，然而正如《编年史》所指出的，他们也毫无疑问地斯拉夫化了（例如他们的名字已经斯拉夫化了）。

图 1 列出了早期基辅罗斯的王位世系关系。奥列格为第一个得到历史证实的基辅罗斯统治者。他的统治延续到 912 年，并开创了为世人所知的留里克王朝（以诺夫哥罗德的留里克命名）。奥列格的权威拓展到了此地区更多的斯拉夫部落。随着奥列格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并在 911 年与该城的希腊统治者签订了有利的通商条约，基辅罗斯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商业与军事帝国。伊戈尔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则不那么成功，并且不得不去扑灭拒绝向基辅纳贡的斯拉夫部落的起义。他的妻子奥莉加（Olha，斯堪的纳维亚语为 Helga）成为他们的儿

① Ibid, p. 61.

② Hrushevsky, 1970, p. 42.

③ Ibid, pp. 42—43, and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New York: Longman, 1996), p. 28.

子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的摄政。古编年史中对她评价很高，不仅在于她皈依了基督教，还在于她重新确立了对诸多部落的控制，并且把王国的财务状况打理得井井有条。斯维亚托斯拉夫是一名杰出的武士，他击败了与之竞争的斯拉夫诸部落、伏尔加布加尔人（Volga Bulgars）和卡扎尔人，并把他的统治区域拓展到伏尔加河、喀尔巴阡山和北高加索山脉。他于968年与君士坦丁堡结盟，并攻陷了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流域的多个城市。他甚至想把首都迁至保加利亚。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胜利却使君士坦丁堡反目为仇，他被迫退回到基辅。在撤退途中，他被游牧的佩彻涅格人所击毙，传说他的头盖骨被做成了酒杯。紧接着，他的死亡引发了3个儿子争抢王位的内战。在杀死二弟奥列格（Oleh）后，长子亚罗波尔克（Yaropolk）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由于害怕遭到相似的命运，小弟弗拉基米尔（Volodymyr，俄语中为 Vladimir）逃往斯堪的纳维亚。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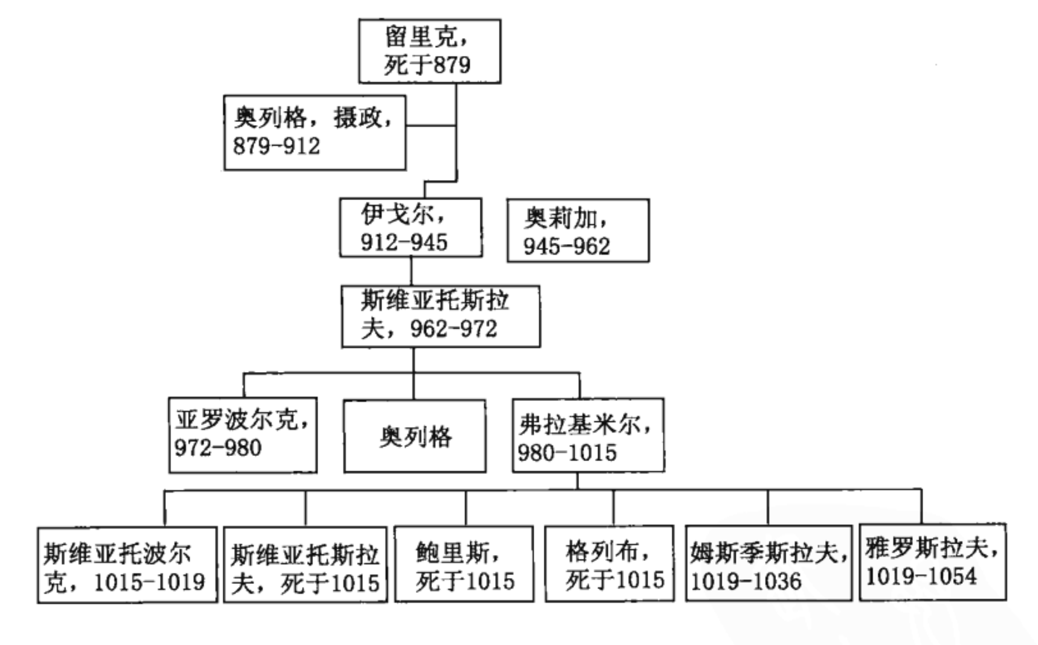


图1　早期基辅罗斯留里克王朝王位世袭关系

四、罗斯的黄金时代

在瓦兰吉人军事力量的帮助下，弗拉基米尔于980年推翻其兄亚罗波尔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统治将把罗斯的历史带入一个新时代。留里克王朝内部成员的争斗至此结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攀上了新台阶，罗斯的领土也随之扩张，成为欧洲最大的国家。其边界西部达喀尔巴阡山，北部和东部区域包括今天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罗斯与西欧的诸多国家发展了王朝联姻关系，甚至对强大的拜占廷（希腊）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尽管是没有结果的进攻。

23

弗拉基米尔对基辅罗斯，乃至后来对乌克兰文化最为持久的成就是于988年接受了基督教正教。在此之前，基督教在罗斯并非新鲜事物，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莉加即为基督徒；甚至有传说称圣彼得（St. Peter）的弟弟圣安德鲁（St. Andrew）于公元55年曾往斯基台传教；但是斯拉夫诸部落从未集体皈依基督教。弗拉基米尔上台时是异教徒，信奉斯堪的纳维亚神索尔（Thor）的翻版雷神佩伦（Perun）。在其统治早期，他以冷酷无情与拥有众多嫔妃而闻名。弗拉基米尔（接着是罗斯人）皈依基督教的故事记载于《罗斯古编年史》。根据此记载，弗拉基米尔感觉到有必要使其帝国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意味着需要接纳新的宗教。他曾考察几个备选方案。由于割礼和禁止食用猪肉与饮酒，伊斯兰教首先被他放弃。“饮酒”，传说他是这么说的，“是罗斯人的乐事，离开它我们没法活下去”。犹太教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的信仰，显然缺乏吸引力。天主教的礼仪太过严格，而且加入天主教意味着必须向教皇效忠。最终，拜占廷（希腊）帝国信奉的基督教正教被证明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堂金碧辉煌，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宗教礼仪隆重华美。罗斯的考察团回来报告说，当他们进入希腊教堂后，“不知自己究竟身在天堂还是人间。这里有人间罕有的辉煌壮丽，我们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们只知道上帝就

在那儿，在人们中间，而且其仪式远远美于其他任何国家”。[①] 弗拉基米尔不久便进行了受洗仪式，接着命令基辅的居民成群跳入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中进行受洗，异教神明的偶像被掷入水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全罗斯都陆续皈依了基督教正教。

然而，这次划时代事件的推动力也许更是出于实际的需要。987年，弗拉基米尔帮助拜占廷皇帝扑灭了一场内部叛乱。作为回报，他要求迎娶拜占廷公主安娜（Anna）。拜占廷皇帝不情愿地答应了，但要求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由于视强大的拜占廷帝国为罗马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急切地希望与之建立王朝联盟，因此答应了这个要求。当拜占廷试图拖延其婚礼时，弗拉基米尔占领了克里米亚的希腊城市，并威胁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随后，弗拉基米尔便与安娜成婚，不仅使弗拉基米尔本人，也使罗斯和拜占廷建立了紧密联系。

罗斯受洗的意义极为重大。由于选择了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弗拉基米尔使罗斯（以及罗斯的后继者）与欧洲而非中东联结起来。然而由于罗斯选择东正教而非天主教（两者于1054年正式分裂），东斯拉夫人与其西部的天主教邻居（如波兰人）分隔开来。但是，东正教帮助罗斯建构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为大部分斯拉夫文化奠定了基础，因而后世称弗拉基米尔为弗拉基米尔大帝。

24

弗拉基米尔在其统治时期决策英明。他引入希腊教士和工匠修建教堂、主持教会。希腊人带来了新的技术，从而激发罗斯经济与文化的觉醒和发展。东正教的精神与教义都支持君主制，为弗拉基米尔的权力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作为基督教统治者的一员，他能够与欧洲的君主们建立更好的联系，不仅提升了个人威信，也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弗拉基米尔死后，基辅罗斯重新陷入另一轮政治动荡之中。其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杀害了3个弟弟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兄弟雅罗斯拉夫（Yaroslav）则搬来瓦兰吉人的救兵，并于

---

① Both quotes from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pp. 97, 111.

1019 年击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雅罗斯拉夫坐镇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与占据切尔尼戈夫（Chernihiv）的兄弟姆斯季斯拉夫（Mstyslav）共同掌管罗斯。姆斯季斯拉夫于 1036 年死后，雅罗斯拉夫成为罗斯唯一的统治者，并前往基辅承袭了大公的宝座。

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的在位时期（1036—1054）通常被视为基辅罗斯历史的巅峰，并为自己赢得了“贤者雅罗斯拉夫”的称号。和他的父亲一样，雅罗斯拉夫成功地击败了异族敌人，并把国家的边界大为拓展，北达波罗的海，南至黑海。他下令修建教堂与修道院，后者成为重要的学术中心。在其统治时期，基辅一共修建了 400 多所教堂，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修建于 1037—1044 年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外部设计以及内部精美的壁画与马赛克堪称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翻版。经过巴洛克时代的修葺，教堂依然矗立，并且包含了不同寻常的精神与政治意义，诉说着基辅罗斯时代的荣光。基辅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基辅洞窟修道院（Pechersk Lavra，英文为 Kiev Monastery of the Caves）建于 1051 年。同年，雅罗斯拉夫任命伊拉里昂（Ilarion）为首位非希腊人罗斯大主教。希腊文的著作被翻译为教会斯拉夫文——一种礼拜语言，后来发展为罗斯的宗教和文学语言。当时大部分人为文盲，而圣人肖像以及木雕的二维圣像成为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并且成为联系人们与宗教之间的重要纽带。

罗斯的经济相对其他方面更为繁荣。一个法国的使团报告说“这块土地（罗斯）更加统一、幸福、强大，比法国更加文明”[1]。其人口的估计值有 300 万到 1 200 万的各种说法，但确定无疑的是其财富带来了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尽管大部分罗斯人为农民，但也有较大数量的手工匠和商人阶层，而农产品、毛皮、蜂蜜、蜂蜡以及战争中捕获的奴隶向南贩卖到君士坦丁堡，以换取奢侈品。

雅罗斯拉夫另一项重要的举措是修订了一部通用法规——《罗斯

---

① Bishop Gautier Saveraux, sent by Henri Ⅰ of France, quoted in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Boulder: Westview, 1997), p. 10.

法典》（Ruska pravda，英文为 Rus Justice）。《罗斯法典》被视为进步的法典，它保护私有财产，并且以罚款方式取代了血腥复仇的习俗（罚款根据受害者社会经济地位而定）。尽管作为君主的雅罗斯拉夫把自己的儿子们分派掌管罗斯的各个城市，但每个市政当局都有一个贵族议会——杜马（duma，现代俄语中意为议会）和一个向王公谏言并且讨论日常事物的城镇大会。每当一个新王公开始主持市政大权时，城镇大会有权与之达成在接受其统治的同时，确保王公不会僭越其传统权力的协议。①

通过联姻的方式，雅罗斯拉夫加强了罗斯同其他欧洲国家的联系。他自己迎娶了瑞典公主，把自己的 3 个女儿嫁给了挪威、匈牙利和法国的国王，并让自己的儿子们迎娶波兰和拜占廷的公主。因此他被称为"欧洲的岳父"，这也反映出基辅罗斯实力的强大。

然而不幸的是，在雅罗斯拉夫死后，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旋即告终。他在世的时候命令儿子们分管罗斯的诸多城市，根据《罗斯古编年史》的记载，在病榻上他还劝诫儿子们不要像他自己的兄弟们那样互相争斗，其长子将在他死后承袭基辅，长子死后则由次子继之。雅罗斯拉夫的用意在于令兄弟之间依次掌管最高权力。尽管此安排在短时间内奏效，但兄弟相承的做法违反了父子相袭的观念，尤其在王公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矛盾与日剧增，因而出现叔侄之间为争夺一块土地大打出手的场景。与此同时，在基辅爆发了反抗伊贾斯拉夫（Iziaslav）大公的叛乱（大公从波兰搬救兵扑灭了反叛），来自东部草原的游牧部落波洛伏人（Polovtsian）的进攻也愈加猛烈。许多城市的城镇大会变得更加自主，甚至要求某些王公下台并扶持另外的人代其职位，这些因素更加剧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但情况并非不可收拾。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Volodymyr Monomakh，1113—1125），身为雅罗斯拉夫的孙子以及拜占廷皇帝康斯坦丁九世的外孙，重拾了基辅的部分荣耀。在继位之前他就在几次

① Subtelny，2000，p. 44.

军事行动中击败过波洛伏人。在他父亲死后，鉴于他显赫的声望可以使基辅避免陷入又一次的社会动荡，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就任大公。他成功地团结了大部分破碎的罗斯河山，并且通过司法改革扩大了下层民众的权利。

五、基辅罗斯的终结

26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于 1125 年去世，基辅罗斯随后迅速衰落，而且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周期性的政治分裂卷土重来，众多王公在其统治区域寻求自主权。结果经过 12 世纪的发展，一些地区，例如西部的加利西亚（Halych，同见 Galicia）与沃伦（Volynia）、基辅北部的切尔尼戈夫，以及弗拉基米尔（Vladimir）、诺夫哥罗德和极北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取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基辅罗斯成为“有着众多由语言、共同的宗教文化和王朝联系的中心的实体，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并且彼此竞争”。[1] 然而对基辅的控制仍是极大的诱惑，这导致了政局的动荡（从 1146 年到 1246 年共有 24 位王公），甚至一些自封的王公也参与到对基辅的军事争夺中。

另外，基辅罗斯遭遇了经济衰退。意大利商人打通并控制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第聂伯河商道的重要性显著下降。而且来自游牧部落的进攻使罗斯更难控制黑海附近的南部边界。重新联合罗斯城市并且击败这些敌人的诸多努力也终成泡影。成书于 1187 年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The Song of Ihor's Campaign*）记载了切尔尼戈夫王公伊戈尔发动对曾被莫诺马赫征服的波洛伏人的军事征讨。而这次：

> 因为弟兄对弟兄说道：
> “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
> 关于小的事情

① Subtelny, 2000, p. 38.

王公们就说“这是大的”，
于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叛乱。
而那邪恶的人便节节胜利地、从四面八方
侵入罗斯的国土。①

给罗斯致命一击的是蒙古人。蒙古人起源于中亚，凭借其高度机动和指挥有方的军队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中东以及东欧。1237 年，蒙古领袖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Batu）率军攻陷了罗斯东北部的苏兹达尔（Suzdal）和弗拉基米尔等城市。到了 1240 年，蒙古人进攻基辅。尽管市民们英勇作战，基辅最终逃不过覆灭的命运。基辅绝大部分教堂被焚毁，城墙也被推倒夷为平地。基辅的荣光一去不复返。基辅大主教于 1299 年迁往弗拉基米尔，后又迁往莫斯科。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来看，这都标志着基辅荣耀的终结。

27

加利西亚—沃伦王公丹尼洛（Danylo，1237—1264）曾试图重新夺取基辅并驱逐蒙古人。他向包括波兰和匈牙利在内的欧洲国家寻求支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甚至也于 1253 年为其努力而祝福，并赠其一顶王冠。然而不幸的是，军事援助并没有到来，而丹尼洛不得不屈从蒙古人的要求，拆除了他建造的防御堡垒，以避免完全覆灭。尽管失败了，丹尼洛及其继任者仍然保持对加利西亚—沃伦公国的统治，一直到 1349 年方结束。加利西亚—沃伦公国成为此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积极参与波兰事务并从君士坦丁堡得到了自己的大主教。丹尼洛的孙子尤里（Yurii）甚至宣称自己为“罗斯国王”。一些评论家认为加利西亚—沃伦公国是第一个真正的“乌克兰民族国家”，② 其与西方（非俄罗斯）文化的广泛联系也是今天更加趋向欧洲的西乌克兰的吸引力和动力的来源。但在 14 世纪 40 年代，加利西亚

---

① *The Song of Igor's Campaign*, trans. Vladimir Nabokov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1), p. 45。汉语译文参考魏荒弩，《伊戈尔远征记》，北京，1957，p. 12。原文中“俄罗斯”一词大概不够准确，故改为“罗斯”。——译者注

② Stepan Tomashivskyi (1875—1930)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17.

屈从于波兰人的进攻，沃伦划人立陶宛的统治之下，乌克兰领土上最后一个主要的罗斯政治实体宣告终结。

六、谁能够继承罗斯的遗产？

在继续我们的历史叙述之前，有必要在此提出也许是基辅罗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历史争议的问题：谁能够继承罗斯的遗产？因为罗斯的地理区域覆盖了今天的大部分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半，因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都主张基辅罗斯是“他们”的第一个国家。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基辅罗斯文明是否最终传递给俄罗斯帝国，或者仍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地留存在乌克兰。

大多数俄罗斯历史著作认为基辅罗斯是俄罗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俄罗斯人（Russian，俄语为 russky）这个单词和 Rossiia（俄语中的俄罗斯）来自罗斯（Rus）。现代乌克兰首都基辅，如前文提到的，被视作“罗斯诸城之母”。弗拉基米尔大帝（俄语为 Vladimir the Great）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的保护神。因此，今天的基辅属于另一个国家的现实令很多俄罗斯人无法接受。不仅如此，很多俄罗斯古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Pskov）、罗斯托夫（Rostov）和莫斯科（最早见于史料是在 1147 年）——都是基辅罗斯的组成部分。按照这种阐述，在蒙古人攻陷基辅之后，基辅居民迁徙至北方的公国并保存了罗斯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从蒙古人手中得到了一定的自治权。到 15 世纪，莫斯科崛起，成为最为强大的公国并从蒙古人那里赢得了解放。莫斯科成为新斯拉夫王国的首都，而新王国将成长为最大的斯拉夫国家。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莫斯科自封为“第三罗马”，成为东正教信仰的中心。鉴于 14 世纪后乌克兰的土地上已经不存在任何东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人因此断定自己的国家为基辅罗斯唯一可能的继承者。

但大部分乌克兰人则反对这种观点。例如格鲁舍夫斯基声称发现一段基于种族而非国家建构的罗斯—乌克兰历史。他的中心论点认为，基辅及其附近区域的人群在种族上不同于远在北方的人，而那些留存

在乌克兰中部的波利安（基辅罗斯）人才是今天乌克兰人的祖先。因此这种观点——基辅罗斯各地区的人民并没有结合成为单一的种族——得到了古代史料的证实，并指出更加“文明”的波利安人和相对“野蛮”的北方森林部落之间的差异，同时还包括基辅各王公和城市之间冲突的记载。[①] 不仅如此，格鲁舍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在后来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领土上保存的基辅罗斯文化传统更加自由西化；而莫斯科深受蒙古人的复杂影响，加之生存环境相对恶劣，因此处于莫斯科治下的乌克兰受到专制主义的影响较深。在宗教问题上，一些乌克兰学者声称基辅罗斯的东正教信念以独立、“宽容”、“基督教普世主义”和“爱国主义”为特征；而其后莫斯科的宗教观与之相对，表现为“非理性”的特征，只不过是拜占廷传统的补充。[②] 一些人也指出现代乌克兰语和基辅罗斯时代的语言有着更近的关系。[③] 今天乌克兰的居民们仍然延续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叫法，称自己为罗斯人（Russes 或 Rusyny），译成英语为“鲁塞尼亚人”。

因为对乌克兰人身份认同观念关系重大，这些争论无论如何都是意义非凡的。如果采纳俄罗斯人的解释，那么乌克兰独立的特性与历史将会被否定，乌克兰人只能再次被唤作“小俄罗斯人”。反过来，那些持罗斯—乌克兰历史观的人坚持把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区分开，但却主张乌克兰人的血统世系更为久远（这大概会使俄罗斯人成为“小乌克兰人”），而在莫斯科崛起的是“罗斯—乌克兰”的“优秀”文化。

---

① Important sources are M. Hrushevsky, *Istoria Ukrainy-Rusy* (History of Ukraine-Rus) (New York: Knyhospilka, 1954), and Hrushevsky, "The Traditional Scheme of 'Russian'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a 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Slavs",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 (1952): pp. 355—364. One should note though that the Chronicles were compiled in Kiev, not in more northerly cities.

② Wilson, 2000, p. 12. See also John Fennell,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hurch to 1448* (London: Longman, 1995).

③ Ivan Yushchuk, *"Status rosiis'koi movy"* (Status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Slovo Prosvity* 2 (February 1998).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争端呢？在拥护各自的民族主义立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中间选项，即基辅罗斯为东斯拉夫民族共同的母亲，意味着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当然还有白俄罗斯人）都可以继承其遗产。罗斯古代史料中多次提及罗斯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这有力地支持了罗斯为单一民族的论点，而且他们与敌对部落共同作战则显示出“内部分歧可以被包容，而‘我们’和‘他们’的根本区别则在罗斯之外”[①]。罗斯各地的东正教有着相同的礼拜仪式，其教会建筑和圣像也有着相近的风格。罗斯也存在着通用的司法系统。即使对种族方面持有不同的见解，格鲁舍夫斯基也注意到罗斯有着共同的法律、文学、文化和“复杂的习俗”，尽管政治陷入分裂，“全罗斯的土地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统一性”。[②]

权衡之下，我们可以认为罗斯有着实质上的种族一体化特性。他们在很多方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民族，而且当时也不存在独立的乌克兰或俄罗斯身份认同。罗斯人之间的区别直到 1240 年之后才更多地体现出来，而且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看到，到了 15 世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与由立陶宛和波兰大公国统领的当代乌克兰的领土才走上不同的道路。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否认罗斯存在于现代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族之前的事实。以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为例，虽然阿拉伯的文化根基无疑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但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同为阿拉伯文化的继承者。同样，俄罗斯和乌克兰可以共同分享基辅罗斯的遗产。

① Wilson, 2000, p. 4.
② Hrushevsky, 1970, p. 88.

第三章　波兰—立陶宛时期与哥萨克的崛起

31

任何试图通过俄罗斯历史的棱镜来观察乌克兰历史的人都应该了解，乌克兰从1240年到17世纪60年代的400多年时间里是和莫斯科大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分离的。在这段时间内，乌克兰大部分先是分别处于立陶宛与波兰的统治下，后来处于1569年合并形成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这2个国家相对于莫斯科，有着不同的政治实践以及相对西化的地缘政治倾向。许多乌克兰人试图使乌克兰的命运摆脱俄罗斯的影响，而这些遗产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统治下，部分乌克兰的土地被哥萨克人所占据，他们被许多乌克兰人视为英雄。为了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利，哥萨克多次举行起义，反抗波兰—立陶宛人的统治。然而规模最大的一次哥萨克起义却以其领袖寻求俄国沙皇的帮助而告终。这个决策导致了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签署，将大部分乌克兰在未来的350年里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

一、立陶宛人对乌克兰的扩张

32

到14世纪早期，乌克兰的中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1240年基辅被蒙古人所摧毁，1299年时其宗教中心迁往东北部的弗拉基米

尔，并最终移至莫斯科。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基辅甚至没有一位常驻王公。乌克兰各公国原则上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然而蒙古人的内部争端妨碍了他们在乌克兰行使坚决而持久的控制。

首先趁虚而入的是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异教徒立陶宛人。在击退了日耳曼骑士团的进攻后，立陶宛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东方。他们在14世纪早期占领了今日的白俄罗斯，并在14世纪40年代推进到乌克兰。大公奥利格尔德（Algirdas）宣布“罗斯的一切都必须属于立陶宛人”。[①]

14世纪50年代，立陶宛人占领了数个左岸定居点，并于1362年占领基辅。次年，立陶宛人于蓝水河战役中击败蒙古人，使自己的势力深入第聂伯河流域的南部。14世纪末，其势力已到达黑海，使立陶宛——尽管今天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政治实体。

立陶宛人无疑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其扩张的过程并非全然充斥着武力征服。立陶宛人之所以得以控制这片区域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当地斯拉夫人的欢迎。立陶宛人注定比蒙古人受欢迎，部分在于他们并没有过多掠夺，而且他们给予当地贵族参与组织政府的权利。因此众多乌克兰精英阶层乐于和立陶宛人合作。另外，立陶宛人表现出其适应力强与宽容性的一面。许多人加入了东正教，而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语言——鲁塞尼亚语成为政府的官方语言，基辅罗斯的法律也继续得以沿用。国家的正式名称为立陶宛、罗斯与萨莫吉提亚大公国（Grand Principality of Lithuania，Rus，and Samogitia），其统治者称自己为“立陶宛及鲁塞尼亚人的大公”，名称的后半部分体现自己代表当地斯拉夫人的利益。随着时间推移，从名义上看立陶宛统治者的言行举止很像基辅罗斯的前代统治者，因此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立陶宛—罗斯”为罗斯国家的再造，而非强加于当地斯拉夫人民身

---

① Quoted in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 70.

上的外族政权。[①]

二、波兰对乌克兰的扩张

大约在立陶宛人进入基辅附近的中部乌克兰的同时，波兰占领了加利西亚王国。如第二章中提到的，加利西亚为蒙古人入侵后乌克兰领土上基辅罗斯古公国中最为强大的一个。1340 年，波兰的卡斯米尔大帝（Casimir the Great，1310—1370）展开入侵行动。但是波兰的统治遭到当地贵族和立陶宛人的抵抗。1366 年，在占领加利西亚全境和沃伦的一部分后，波兰与立陶宛人休战。

33

1385 年，年仅 11 岁的波兰女王亚德维佳（Jagwiga）与立陶宛大公亚盖洛（Jagiello，或译作 Iogaila）协议成婚，缔造一个新的统一王国，史称克列沃联合。这一政治举动更加巩固了波兰的统治。成为波兰国王的亚盖洛答应自己以及所有立陶宛人改信天主教作为回报，并“永远地”将其统治地——立陶宛和鲁塞尼亚领土并入波兰。波兰贵族发现比起女王的前未婚夫——强势的奥地利王公威廉，亚盖洛显然是一位更有魅力的伴侣。不过亚德维佳依然秘密和威廉成婚，可威廉随后被波兰贵族驱逐出境。亚德维佳欲追回其夫，却被强行带回并取消了和威廉的婚姻关系，随后以维护波兰和天主教的名义嫁给了亚盖洛。[②]

然而波兰人的统治却麻烦迭起。和立陶宛人比起来，波兰人在宗教上缺乏对东正教以及鲁塞尼亚人权利的宽容度。为推行天主教，波兰人只把贵族特权授予同意皈依天主教的人。例如在加利西亚地区，官方语言为拉丁语而非鲁塞尼亚语，而且天主教贵族被赐予土地以换取对波兰王室的效忠。亚盖洛堂弟维托塔斯（Vytautas）鼓动立陶宛与鲁塞尼亚的反对力量，并于 1392 年迫使亚盖洛承认其对立陶宛和鲁塞尼亚的实际控制。当维托塔斯于 1430 年去世后，亚盖洛最小的弟弟斯

---

① Subtelny, 2000, p. 72.

② Michael Hrushevsky, *A History of Ukraine*, ed. by O. J. Frederiksen (New Haven, CT: Archon Books, 1970), pp. 129—130.

维德里盖洛（Svidrigaillo）被选为大公，并表示出限制或甚至解除与波兰联系的意愿。波兰的入侵触发了立陶宛/鲁塞尼亚土地上围绕与波兰关系和东正教人口地位问题的内战，随着斯维德里盖洛在几年后战败，波兰对乌克兰的控制进一步扩大。1471 年，基辅以及周边领土正式成为波兰王国的普通行省，结束了任何哪怕是形式上的乌克兰自治权。

在应对地方的抵抗之外，波兰与觊觎乌克兰领土的外部势力展开争夺。在东方，莫斯科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统治了如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等古东斯拉夫城市，并在 1480 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蒙古人。1453 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即宣称自己为东正教信仰守护者及中心，逐渐发展自己为“第三罗马”的观念。一些不满波兰亲天主教政策的乌克兰东正教信徒转而寻求莫斯科的帮助。15 世纪 90 年代，当俄罗斯的军队迫近切尔尼戈夫及其他左岸城市并与立陶宛人交战时，许多当地人表示对他们的欢迎。1508 年，一些被莫斯科支持的乌克兰贵族起来反抗波兰以保卫自己的信仰，然而行动失败，他们被迫逃亡莫斯科。在南部，鞑靼人（蒙古人的一支）统治的克里米亚汗国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控制了黑海沿岸，并周期性地侵入第聂伯河沿岸的乌克兰土地，以获取奴隶和财物。在莫斯科的唆使下，鞑靼人在 1482 年摧毁了大半个基辅，以完成自称为“全罗斯统治者”的沙皇伊凡三世（Ivan III）的征服。[①]

34

三、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治下的乌克兰

到 16 世纪，立陶宛的国力明显衰落。1522 年，立陶宛将乌克兰东北部的切尔尼戈夫与斯塔罗杜布（Starodub）输给了莫斯科。从 1562 年到 1570 年间，立陶宛又卷入与莫斯科的另一场大战。面对有可能失去更多领土的现实，立陶宛人转而求助于波兰。在克列沃联合

① Jaroslaw Pelenski, *The Contest for the Legacy of Kieven Rus*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graphs, 1998), pp. 103—132.

下，波兰与立陶宛共同拥有一位君主，立陶宛保留了很高的自治权，波兰人答应立陶宛人的请求，但条件是两国必须合并为单一的政治实体。尽管心存疑虑，立陶宛和鲁塞尼亚领导人最终还是答应了波兰人的要求。

1569 年，通过卢布林联合，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波兰共和国，Rzeczpospolita）诞生。共和国有一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国王，设立一个共同的由贵族（撒拉赤塔，szlachta，由继承或军功授予爵位）选举产生的议会（色姆，Sejm），使用单一货币，执行一种外交政策。国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色姆负责制定法律和收税，未经色姆同意不得征集军队。鉴于拥有一个立宪制政府，国王权力受限，并且拥有相对广泛的代议政体（大约 10% 的人口可以投票选举色姆），可以说共和国的体制是相当先进的。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是当时欧洲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除了南方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其同盟克里米亚鞑靼人占据外，她实际涵括了今日全部的乌克兰领土。1578—1582 年，波兰接连击败莫斯科，甚至在 1610 年成功地使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的儿子被选为莫斯科沙皇，尽管随后在 1613 年的民族主义起义中被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khail Romanov）所取代。共和国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波兰人、立陶宛人和鲁塞尼亚人之外，主要还有日耳曼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

35

正当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英格兰、西班牙）经历中央集权化过程的时候，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却不寻常地走向权力分离。贵族掌握着大部分政治权力，用波兰著名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话来说，造就了“贵族的天堂”和“贵族民主制”。[1] 除选举国王之外，贵族们还享有在地方政府事务中，包括控制当地议会

①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ume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01, 321.

(sejmiki) 和法庭的特权。许多人掌握大量地产而成为“小国王”，无视来自王国首都克拉科夫（Krakow）的政令，并且经常彼此间争吵不休。[①] 最终，权高势大的地方贵族享受对立法的个人否决权，并使色姆的作用基本瘫痪。

随着王室、城镇和农民势力的衰落，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势力崛起，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们视城镇居民为贸易竞争对手，剥夺了他们的议会投票权，并禁止本土商人外出行商。城镇居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移居乡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减缓。而农民也在 1505 年后被色姆剥夺了离开村庄的权利，除非得到当地贵族的许可。农民逐渐演变为略好于奴隶的农奴，权利被地主所限制，并被强制进行艰苦的劳动。这些变化给依赖农业的乌克兰以沉重打击。一名观察者认为乌克兰农民处于“异常悲惨的状况下”，本地贵族“不仅拥有对他们的财产，而且对他们的生命的绝对控制权，而他们的生命无疑和波兰贵族的自由一样珍贵”。[②] 尽管农民遭受沉重的压迫，封建地产化的乌克兰土地仍然成为主要的谷物供应者，供养了不断增长的西欧人口。

当地的鲁塞尼亚贵族则处于皈依天主教和波兰化的巨大压力下。非天主教徒无法成为撒拉赤塔，东正教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被关闭，波兰当局甚至限制城镇中鲁塞尼亚人的户口数并对他们征收惩罚性税款。波兰精英们编造神话，称他们为古代萨尔马提亚人的后代（参见第二章）。鉴于有可能和波兰贵族建立共同的联系，当地的鲁塞尼亚贵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说法。17 世纪早期的一个鲁塞尼亚人这样抱怨道：

> 就这样，他们（波兰人）通过教化一步步诱使罗斯贵族投向

---

①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Boulder: Westview, 1997), p. 27.

② Gillaume le Vasseur de Beauplan, *A Description of Ukra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

> 罗马人的宗教，罗斯王公放弃东正教而受洗加入罗马教，改换了姓氏和教名，仿佛从来不是自己虔诚的祖先的后代。结果希腊正教失去了光彩，并被指责或忽视，因为人们为了获取更高的地位，瞧不起正统的信仰，放弃对教职的追求，转而只为满足那些出身低下的人的需要而接纳庸才。[①]

36

例如，共和国的大地主之一、为波兰国王打击哥萨克势力提供军队的鲁塞尼亚的维什涅夫茨基（Vyshnevestkys）改名为（波兰化的）维斯尼奥维基斯（Wisniowieckis）。这些变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丧失了文化和经济的精髓，鲁塞尼亚人变成了“无领导的民族”“无历史的民族”，[②]“鲁塞尼亚”也成为“农民”的同义词，而鲁塞尼亚语——现代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前身——直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为书面语言。

四、布列斯特联合与宗教政治

要让全体鲁塞尼亚人加入天主教，无论从政治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东正教的鲁塞尼亚人占全共和国人口的近1/4，并有可能向东正教兄弟莫斯科效忠，成为政治动荡的源头。针对这种可能性，波兰贵族采取了妥协方案：建立一个新教会，在保持东正教仪式的同时向罗马教皇效忠。

该教会由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合所推动，成为新的希腊天主教会（一些人称其为乌克兰天主教会或东仪天主教会）。一些正统教会的领袖对此极力支持，因为他们把这当作博得统治阶层好感的一种方式，进而可能进入色姆上院。毋庸置疑，一部分人认为建立希腊天主教会也许是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借鉴中世纪后期的拉丁西方文化，为重塑正统教义威信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使全体鲁塞尼亚人在

---

① Ihor Shevchenko, *Ukraine Between East and West*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1996), p. 118.

② Reid, 1997, p. 30.

共和国中的地位得到提升。[①] 但是另一些人认为此举在神学、文化、政治领域上来说都是不正确的。4 个新任命的希腊天主教主教中有 2 位畏于东正教信徒的骚乱而立即复归东正教信仰。遍及乌克兰的正统教会官员认定这是对他们的背叛。有关教会财产的争夺也开始出现。一些东正教贵族在他们的申诉被国王忽视后便以叛变相要挟，哥萨克也掀起武装捍卫东正教的浪潮。在这场争议中，波兰国王立场明确，认定反对新教会的人为反东仪教会者（dysunici，disuniates），拒绝承认东正教会的合法性。[②]

37 希腊天主教会自成立之日起，便伴随着许多人的争论、反叛和移民；但它的诞生反过来也促进了宗教的复兴。在许多城市的教会里，兄弟协会通过教育和出版活动来保存东正教文化。他们的活动也培养了一批志愿捍卫自己的宗教传统并能抵制皈依天主教诱惑的年轻教师。兄弟协会帮助彼得罗·莫吉拉（1596—1647）奠定了教会与教育改革的基础。莫吉拉是摩尔多瓦人，早年在巴黎接受教育，和波兰当局关系较好，曾帮助协调 1632 年波兰国王答应承认东正教的妥协。莫吉拉成为基辅大主教后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规范并改良东正教礼拜仪式，对曾经消极腐朽的神职人员施以精神援助，借鉴天主教耶稣会的模式使教育现代化，并加强拉丁文学习。他成立了东斯拉夫世界的第一所大学——莫吉拉学院（Mohyla Collegium）。[③] 尽管一些人指责他是拉丁化的帮凶，然而回顾历史，他被认为是鲁塞尼亚（乌克兰）传统的开创者或复活者，进而给乌克兰人带来了区别于罗马和莫斯科的自有的宗教认同感。[④]

---

① Jerzy Lukowski and Hubert Zawadzki,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9.

② Davies, 1982, p. 174.

③ Converted into a seminary in 1817, the Kiev-Mohyla Academy reopened in 1991 and is Ukraines' leading independent university.

④ Good treatment of Mohyla can be found in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4—55 and Subtelny, 2000, pp. 120—121.

东正教最终在共和国中存活了下来。不仅是因为莫吉拉的改革——当然存在诸多争议——帮助刺激了一种宗教精神的复苏，而且也在于希腊天主教会失去了部分吸引力。和早期的妥协承诺相反，东正教的主教们并没能进入波兰议会，教徒们仍然被当做二等公民，对于致力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波兰人来说这些人还不够“天主教”。尽管希腊天主教会在西乌克兰继续存在，但大多数乌克兰人仍然信奉东正教。然而与莫吉拉改革精神相反，乌克兰天主教会从来没有赢得过独立；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到17世纪60年代，乌克兰东正教会将会和基辅以及东岸乌克兰一起落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中。

五、哥萨克的崛起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封建地产制度并没有扩展到国土最远的角落。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汗国的边缘地带，第聂伯河下游沿岸的所谓荒原（Wild Filed，或 dyke pole）地区，一个新的群体——哥萨克人正在崛起。“哥萨克”来自突厥语的 qazaq 一词，由逃亡的农奴、宗教难民、不满的贵族和普通罪犯所组成，是一批处于政府权威实际控制之外的自由民。他们的存在首次记载于1492年克里米亚汗（王）对袭击一艘鞑靼人船只事件的控诉中。哥萨克占据富裕边远的土地（也被称作乌克兰，Ukraina，意为“在边缘”），成为渔夫、农夫、狩猎者，除此之外，首先便是成为土匪。在波兰和俄罗斯当局的支持下，他们经常发动对南部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进攻以进行掠夺，并遏制住了鞑靼人以前经常发动的对中部乌克兰大部的屠掠。经历了几十年自我管理的缺失，第聂伯河沿岸的哥萨克人组织起自己的塞契（要塞，sichs），主塞契（向所有男性基督徒开放，但禁止女性进入）于16世纪50年代在扎波罗热（意为“石滩以外”）地区第聂伯河中的岛屿上建成。塞契有自己的议会（被称为拉达，rada，今日乌克兰议会的名称）并且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称为盖特曼。

38

今天，哥萨克被赞为乌克兰的自由斗士，像美国牛仔一样富有传奇色彩。格鲁舍夫斯基认为哥萨克的活动是“一股强有力的民族运动

的肇始”，他们抗击凶恶的鞑靼人的勇气“给受压迫的乌克兰人带来了新希望”。[1] 然而哥萨克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乌克兰人。首先，哥萨克并不是乌克兰独有的，还有其他的哥萨克群体定居在俄罗斯，尤其在顿河流域。其次，哥萨克并不是一个种族共同体。尽管主要由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确实，为捍卫东正教信仰而抗击天主教波兰人、穆斯林鞑靼人和犹太商人是他们的主要行为——所构成，但哥萨克内部也包括叛变的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希腊人，甚至还有少数犹太人和穆斯林鞑靼人。再次，并非所有乌克兰人都是哥萨克。实际上，只有少数来自人口最多的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加入了哥萨克。简言之，哥萨克“民族”“无论在地理上还是社会上，都和‘鲁塞尼亚’不是一回事”。[2] 尽管在乌克兰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哥萨克人缔造了第一个乌克兰“国家”，然而他们的政治组织和现代国家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没有确定的边界、没有成文的法律、没有通用的货币、军政不分、没有固定的首都。尽管流行的乌克兰传说把哥萨克描绘为热爱自由，民主而非散漫无纪律的群体，而另一些人则把他们视为爱炫耀、暴力并且酗酒的人。17 世纪的一位威尼斯使节这样说道：“如果哥萨克人和斯巴达人一样不爱酗酒的话，那么这个共和国（指哥萨克塞契）倒是很像斯巴达。”[3]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哥萨克人已经成为潜在的军事力量。17 世纪早期，哥萨克曾帮助波兰人的军队，参与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针对莫斯科的军事行动。在 1600—1620 年间，哥萨克曾在黑海上发动过几次进攻，占领了几处奥斯曼帝国的据点，甚至在 1615 年和 1620 年将战火烧到伊斯坦布尔（即君士坦丁堡）郊外。1621 年，哥萨克在霍京战役（Battle of Khotyn）中挽救了注定将被土耳其人击败的波兰人。尽管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俘获并奴役斯拉夫人的行径表示不满，但在这方面哥萨克人与他们的敌人不相上下。17 世纪中期，阿勒颇（叙利

39

① Hrushevsky, 1970, p. 149 and p. 161.

② Wilson, 2000, p. 60.

③ Alberto Vimina, quoted in Reid, 1997, p. 31.

亚）的保罗（Paul of Aleppo）写道："每个富裕男子拥有七八十个鞑靼人，每个富家女子拥有五六十个女人或女孩儿。"哥萨克在欧洲被赞誉为英雄的十字军。"可怕的土耳其人咧开嘴，"一个波兰作家写道，"但勇敢的罗斯人将手猛地戳了进去"。①

这些行为对波兰国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尽管试图把他们收编为波兰军队，哥萨克人实在不容易被约束，而且习惯于抱怨并且对波兰当局倒戈相向。在 1591 年、1594—1596 年、1625 年、1635 年和 1637 年间都爆发过哥萨克起义。这些起义被描述为提升"乌克兰人"权利的努力，主要由几个并不一致的原因而导致：波兰对东正教的敌视，而哥萨克人把自己看做东正教真正的捍卫者；哥萨克希望跻身波兰权利上层；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和平时期的波兰人经常不兑现战争时期对哥萨克人的承诺，对哥萨克人态度摇摆不定；希望更多的政治自治权。尽管其军事行动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但哥萨克人的反抗仍是 1632 年波兰当局承认东正教地位的因素之一。然而在 1637 年取得一次针对哥萨克起义的主要胜利之后，波兰人不愿意再做更多的让步了，取消了册编哥萨克的自治权并取缔了盖特曼制度，将上千哥萨克从法律上变为波兰地主的农奴，实行恐怖统治。一个波兰贵族认为"哥萨克们就是我们国家的指甲。他们想长得更长，因此需要定期的修剪"。②

六、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

然而哥萨克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1648 年，由乌克兰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595—1657）领导的最大规模的哥萨克起义爆发。生于鲁塞尼亚贵族之家的赫梅利尼茨基早先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后于波兰军队服役。在 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他成功地经营着在中部乌克兰的家业，避免卷入哥萨克的

---

① Both from Reid, 1997, p. 32.

② Subtelny, 2000, p. 118.

起义，并成为忠诚的册编哥萨克。看上去他并不像是一个将会领导大起义的人物。然而在1646年，一个波兰邻居抢劫了他的庄园，把他的小儿子殴打致死，并抢走了他的未婚妻。在当地法院和华沙的参议院无法实现公正的裁决之后，他逃往塞契，并被选为盖特曼，鼓励哥萨克在其领导下再次起事。在得到过去的敌人——鞑靼人的援助后，哥萨克向北挺进与波兰军队交战。

赫梅利尼茨基最初赢得了几场大胜。他们在1648年4月的黄水战役中痛击波兰军队，而在1648年全年当中，哥萨克在进军华沙的过程中不断战胜波兰军队。起义军在乌克兰乡村得到了很多支持，农民趁机袭击波兰地主和那些文化上被他们所敌视、经济上又有利可图的犹太人。有记载说：

> 只要他们发现撒拉赤塔、王家官员和犹太人，便悉数处死，妇孺亦不留情。他们掠夺了犹太人和贵族的庄园，烧毁教堂并杀死教士，片瓦不留。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不手沾鲜血。①

东正教会试图把赫梅利尼茨基的起义变为一场圣战，莫吉拉的继承人、基辅大主教西尔维斯特·柯蒂夫（Sylvestr Kotiv）宣布赫梅利尼茨基为“新摩西”和“上帝的礼物”（乌克兰语本意即为波—格丹）。② 到1649年，赫梅利尼茨基已经占据了乌克兰中部的大部分，并称之为“盖特曼政权”，建都基辅。

不过直到此时，赫梅利尼茨基的目的并不明了。1648年，他数次写信给波兰国王表示自己的愤慨，但署名为“尊贵的国王陛下的扎波罗热之主人盖特曼”。在时机看似成熟的1648年末，他也并没有借机收复加利西亚。尽管很多乌克兰人把1648年当作民族解放战争的一年，实际上许多鲁塞尼亚贵族——波兰化的和依旧信奉东正教的——

---

① Subtelny, 2000, 127.

② Wilson, 2000, p. 61.

却起兵反抗赫梅利尼茨基。到 1650 年，赫梅利尼茨基甚至调转枪口，希望自己的儿子季莫什（Tymish）成为统治者而发动对摩尔多瓦的进攻。不仅如此，哥萨克内部的分歧也日渐严重，主要集中在是否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上（作为地主的赫梅利尼茨基倾向于保留农奴制）。和波兰人一样，哥萨克精英们也不断地宣称自己为萨尔马提亚人的后裔，以此来强调自己地位的合法性，这使得哥萨克人变得更具阶级性，而非早期乌克兰民族的代表。[①] 作为对鞑靼人的回报，赫梅利尼茨基允许他们随意到鲁塞尼亚（乌克兰）的村庄里获取奴隶，然后到克里米亚的奴隶市场上拍卖。[②]

苏联历史学家迫切希望抹掉这次起义中所有的“乌克兰”成分，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源于对社会经济的不满而非对新生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农民起义。

不论目的如何，赫梅利尼茨基最终没有成功。1649 年，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鞑靼可汗撤回了自己的援军，迫使赫梅利尼茨基与波兰国王达成临时协议。这个协议禁止波兰军队和犹太人进入盖特曼的领土，但要求农民恢复其农奴身份。1651 年，又一轮与波兰人的战争打响。在利沃夫东北接近别列斯捷奇科小镇（Berestechko）的一场大战中，波兰军队与哥萨克—鞑靼人联军共 15 万人对阵。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于鞑靼人临阵变节并绑架了赫梅利尼茨基，导致哥萨克人此役战败。签订了另一个和平协定后，赫梅利尼茨基于 1652 年重返战场，在巴托格战役中击败波兰军队。但很明显，此时的赫梅利尼茨基已经无力筹备一场针对波兰王国的决定性战役了。

就在这时，赫梅利尼茨基寻找到了新的外部支持：莫斯科。俄罗斯对乌克兰有着很强的兴趣：俄罗斯想西扩自己的势力，削弱对手波兰，并保卫东正教徒的权利。1654 年 1 月，在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Pereiaslav），赫梅利尼茨基接受了俄罗斯沙皇对乌克兰的统

① Wilson, 2000, p. 63.
② Reid, 1997, p. 37.

治权。赫梅利尼茨基期望俄罗斯人能宣誓保障哥萨克在自己领土上的权利，但俄罗斯人拒绝答应这个要求。相反，赫梅利尼茨基却单方面做出了对沙皇效忠的宣誓，从而使沙皇成为“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乌克兰）专制君主”。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协议》（Treaty of Pereiaslav），曾经远在欧洲边缘的俄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国，并迅速成为东欧的主导力量。尽管赫梅利尼茨基受到指责，但各种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解释还是为其辩护，认为他只是单纯寻求一个军事联盟或一种隶属关系（沙皇需为哥萨克提供保护但不得干涉其内部事务），或可能寻求一个基于共同君主但政府分离的个人联合。[1]

不管怎样，在协议签订后，俄罗斯开始了对波兰的入侵。在17世纪早期抗击波兰的瑞典同样起事，于1655年9月占领了华沙。瑞典人、哥萨克与特拉西瓦尼亚王国（今天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发动了瓜分波兰的联合军事行动。不过瑞典人也进攻俄罗斯，造成了哥萨克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未经与哥萨克协商，俄罗斯于1656年与波兰缔结和约，瑞典—哥萨克—特兰西瓦尼亚联军被击败。在哥萨克人内部的叛乱中，赫梅利尼茨基于1657年病逝。

七、赫梅利尼茨基的遗产

42

赫梅利尼茨基的死并没有带来战争的结束，接下来争战不休的30年是被乌克兰人称为“大衰败”的灾难时期。由于担心俄罗斯不断膨胀的势力，赫梅利尼茨基的继任者盖特曼伊万·维戈夫斯基（Ivan Vyhovsky）曾尝试与波兰人达成和解。1658年，哥萨克与波兰人签订《加佳奇协定》（Treaty of Hadiach）。协定规定基辅、切尔尼戈夫、布拉茨拉夫等省份为独立的大公国，成为共和国平等的第三方。大公国将享受空前的自治权，拥有选举自己的盖特曼以及拥有自己的法院、货币和军队的权利。哥萨克的传统权利得到保证，并且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哥萨克可以获得贵族地位。布列斯特联合被废除，因此天主教

① Subtelny, 2000, p. 135.

和东正教享有平等的地位。

如果这个协定能够付诸实施，那么绝大部分乌克兰的领土将从此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从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确，它的条款给予了乌克兰比以往波兰和立陶宛人统治时期的任何协议都要多的自主权，但是这项协议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甚至在协定签订之前，一支俄罗斯大军就已经踏上乌克兰的土地。虽然维戈夫斯基率军将其击败，但却面临一些同胞对他的指责，认为他向波兰出卖了哥萨克。最后，维戈夫斯基在叛乱中于1659年退位并逃往波兰。赫梅利尼茨基18岁的儿子尤里（Yurii）当选为盖特曼，在俄罗斯人的逼迫下签订了新的协议，将哥萨克的外交权拱手让与俄国，并允许俄罗斯在所有的盖特曼大城市中驻军。1660年，波兰与俄罗斯为争夺乌克兰的土地开战。乌克兰根据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Treaty of Andrusovo）被公然瓜分，俄罗斯得到左岸，波兰人得到右岸。按照协定，俄罗斯人应将基辅交还波兰，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做。波兰人、俄罗斯人、哥萨克和鞑靼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86年。同年，所谓的波兰和俄罗斯《永久和平条约》实际上确认了《安德鲁索沃条约》对乌克兰的瓜分，而且对波兰人来说无比屈辱的是，条约规定俄罗斯人有权以保卫东正教信仰的名义干涉共和国内的事务。原本致力于提升乌克兰自治权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到头来却使乌克兰分裂为东西两半，并将其中一半拱手让与俄罗斯。

鉴于结果如此，我们将如何评价赫梅利尼茨基的遗产呢？如前文所述，乌克兰人倾向于视其为一位为乌克兰统一与独立而奋斗的英雄。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多争议，不仅因为此人很大程度上有传说的成分，而且也很难辨别他是为谁（所有乌克兰人？所有哥萨克？或是哥萨克精英层？）而战。不管他的目的如何，我们知道他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而且他1654年臣服于俄罗斯沙皇的决策使乌克兰历史进入新的、也可以说是最受压迫的时期。19世纪伟大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写道：

43

你炫耀，我们曾经
把毁灭带给波兰。
没错：波兰垮台了，
但你也紧跟着被摧毁。①

沙皇俄国为赫梅利尼茨基树立了一座雕像，至今仍矗立于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对面，他手中的权杖指向东北部莫斯科的方向。出于俄国人的目的，这一姿势象征着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伟大联系。一段苏联时代的档案认为，“乌克兰人民只有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联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拯救”。② 然而，或许这座雕像的设计要比最初的设计好得多：赫梅利尼茨基和战马踩踏一名波兰贵族、一个天主教牧师和一个犹太人。的确，考虑到起义导致成百上千犹太人的惨死，被乌克兰人视为民族英雄的赫梅利尼茨基在犹太人的记忆中只能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① From Taras Shevchenko, “To the Dead, the Living, and the Yet Unborn, My Countrymen, All Who Live and outside Ukraine”,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本诗汉语译文由本书作者的英语译文译出。——译者注

② Subtelny, 2000, p. 135.

第四章　俄罗斯帝国治下的乌克兰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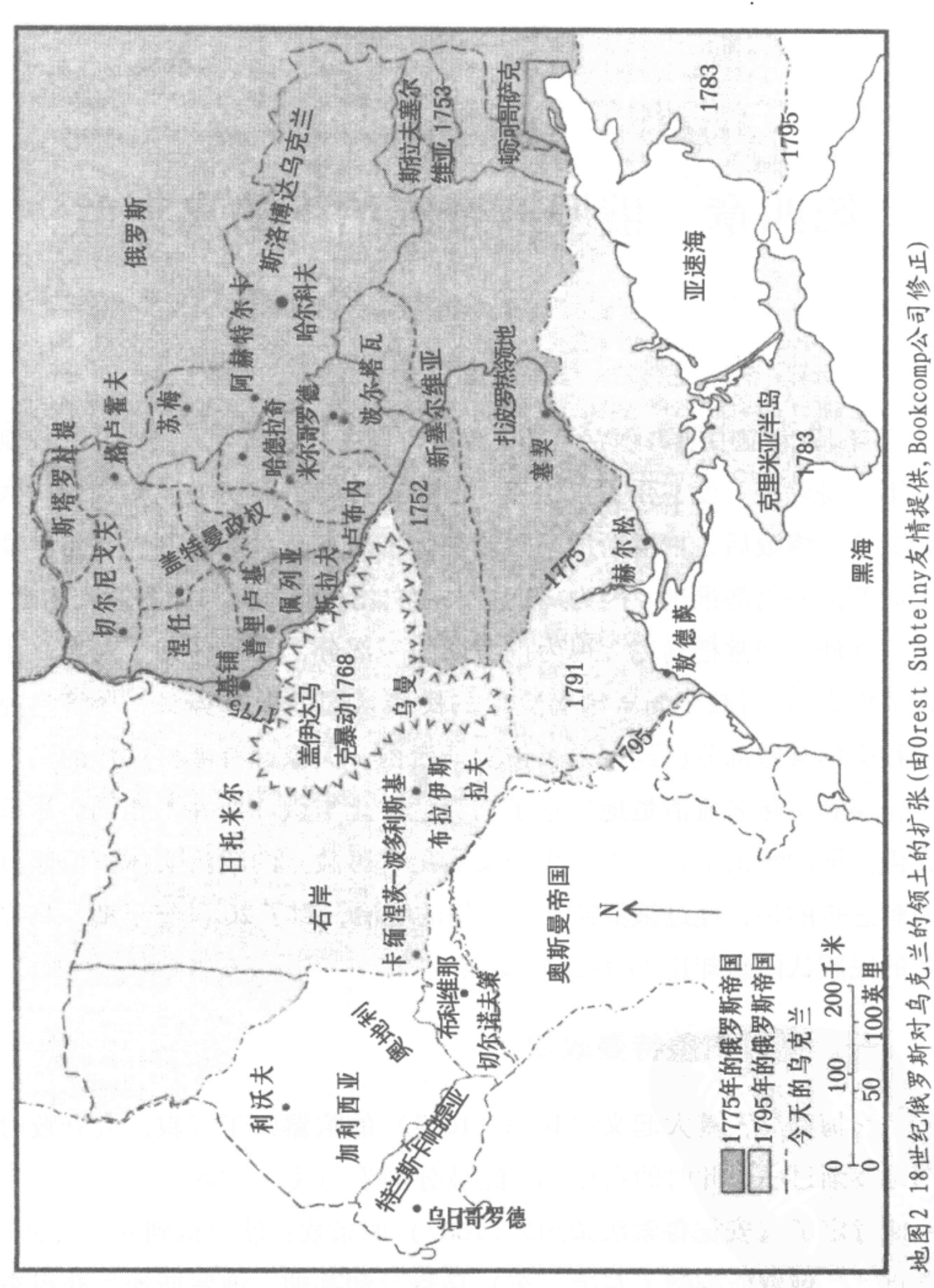
自17世纪中期哥萨克起义失败后，乌克兰大部落入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哥萨克一度享受了自治权，但在盖特曼伊万·马泽帕领导的大起义遭到惨败后，俄罗斯沙皇逐渐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控制，并将其疆土向西部和南部推进。因为乌克兰人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俄罗斯人相近，俄罗斯沙皇经常把乌克兰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并称乌克兰人为“小俄罗斯人”。行政当局压制乌克兰的民族认同的上升势头。尽管乌克兰社会的某些部分已经融入了俄罗斯帝国，但像舍甫琴科这样的乌克兰作家和文化名流清楚地表达了乌克兰文化与俄罗斯并不相同。尽管在俄罗斯的统治下，乌克兰无法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政治实体，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经过俄罗斯几个世纪的统治，到了20世纪早期，乌克兰的民族认同感却比17世纪时要强得多。

一、哥萨克盖特曼政权

46

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1648—1654）的喧嚣归于沉寂，大衰败时期也逐渐过去，此时的乌克兰已经被分割为两块。1686年，波兰与俄罗斯肯定了《安德鲁索沃条约》（1667）的条款：波兰得到右岸（西）乌克兰，俄罗斯控制了左岸（东）乌克兰和基辅。俄罗斯沙皇获得东岸乌克兰的主权，哥萨克同时保持了某种形式的自治权。哥萨克的领

土上实际存在着3个并立的自治政权：盖特曼政权、扎波罗热塞契和斯洛博达（Sloboda，“自由”）乌克兰。（参见地图2）三者中盖特曼政权是最大也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一个。



地图2 18世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的扩张（由Orest Subtelny友情提供，Bookcomp公司修正）

由于波兰重掌右岸乌克兰、扎波罗热塞契依旧享受着自治，17世纪后期哥萨克盖特曼政权只占有赫梅利尼茨基曾经控制领地的1/3，其行政首都位于基辅东北部的巴图林（Baturyn）。盖特曼政权被沙皇称为小俄罗斯（Malorossiia），其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接壤，人口密度远大于其南部的邻近地区。一些居民称其为“乌克兰”（字面意思为在边界上），这也是第一次以“乌克兰”来命名这块土地。它包括11座城市和1 800多个村庄，1700年时总人口约为120万。[①]

盖特曼政权的政治结构与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变，主要由哥萨克军队和拥有土地的上层精英斯塔西那（starshyna）所控制。斯塔西那通过挪用哥萨克政权的官方土地和攫取哥萨克政府的收入来扩展自己的权力。通过向沙皇服役，斯塔西那免于交纳赋税，并享有经商的权利，还可以自己酿酒，而在当时这可是非常的特权。

盖特曼政权下多数居民为贫苦农民。数据显示不到1%的人口占据了近一半的土地，而大部分人口所拥有的土地非常少。普通农民同时也要承担服役之苦，例如在彼得一世的北方大战（1700—1721）中便大量征调了乌克兰的士兵。地主不断增加对佃农的盘剥，普通农民也失去了成为军官和参与议会政策制定的权利。斯塔西那和“下等民”（chern）之间的紧张关系多次被俄罗斯沙皇当局利用，许多盖特曼政权下的农民逃往南方。[②] 1692年，一名不满的官员从盖特曼政权出逃到扎波罗热塞契并组织了对抗“嗜血”的斯塔西那的起义，以“使我们的祖国乌克兰摆脱莫斯科的统治”。在这场起义中，鞑靼人取代哥萨克占了起义军的半数，起义最终被扑灭。[③]

48

①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 159.

② Subtelny, 2000, pp. 181—184.

③ Subtelny, 2000, p. 161.

二、马泽帕起义与哥萨克自治的终结

后赫梅利尼茨基时代最大的一次起义是盖特曼政权起来反抗俄罗斯的统治。起义的领导者伊万·马泽帕于1639年生于右岸乌克兰的贵族家庭，在基辅与华沙接受教育。在17世纪60年代他曾担任波兰国王派往哥萨克乌克兰的特使。他被扎波罗热哥萨克逮捕过，但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并于17世纪80年代与俄罗斯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支持下，他在1687年被选为盖特曼。

很难想象马泽帕会起来反抗帮助过他的俄罗斯。在长达20年的盖特曼统治中，他继承前任的政策，给予斯塔西那更多的领地，并与俄罗斯沙皇培养友好关系。沙皇也允许他扩大自己的领地，从而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他作为艺术的赞助者，在盖特曼政权各地修建哥萨克或“鲁塞尼亚”巴洛克风格的东正教堂，包括基辅最大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St. Nicholas，1934年被毁）以及对重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巴洛克风格的整修。他扑灭了前文所述的1692年农民起义，并援助彼得一世对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的军事行动。他成为彼得一世最重要的参谋，哥萨克军官曾戏言“沙皇就算不相信天使也不会怀疑马泽帕”，俄罗斯官员也宣称“从来没有过像马泽帕这样对沙皇如此有益的盖特曼”。[①] 1703年，在波兰控制下的乌克兰爆发的一场哥萨克起义中，马泽帕得到彼得一世的许可，率领自己的军队占领了右岸。马泽帕因而得以统一大部分的乌克兰土地。

然而马泽帕与彼得一世的联盟开始显露出裂痕。俄罗斯与瑞典之间的北方大战于1700年打响；经过几次失败的战役，彼得一世启动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曾经许诺给哥萨克的自治权因此陷入重重危机。传统上主要在南部边疆打击鞑靼人、奥斯曼人和波兰人的哥萨克现在

---

① Subtelny, 2000, p. 161. See also Orest Subtelny, *The Mazepists: Ukrainian Separatism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1）.

被派往北方与瑞典人交战。由于瑞典人拥有优越的军事技术，战争往往以哥萨克惨败而告终。1705 年，彼得一世决定向哥萨克军团中指派俄罗斯和德国军官。这些军管鄙视“落后的”哥萨克人，经常把他们当作炮灰，这使得人心更加涣散。尽管斯塔西那和普通农民都感受到了战争的重负，但当谣传说沙皇想要用俄罗斯或外国将军来取代他时，马泽帕还是感到深深的不安。

最后一击是 1708 年彼得一世拒绝帮助乌克兰抵御瑞典盟友波兰人的入侵。而抵御波兰人正是《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基础。当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从莫斯科分兵进入乌克兰时，马泽帕选择与瑞典人结盟，以使乌克兰避免毁灭的厄运。在 1709 年春天缔结的协议中，查理十二世答应保护乌克兰，除非乌克兰从俄罗斯控制下解放出来，否则不与沙皇达成和解。

彼得一世斥责马泽帕为“新犹大”，他的军队进攻哥萨克的首都巴图林并屠杀居民。俄罗斯的恐怖统治降临到乌克兰的土地上。因为害怕俄罗斯人的报复，而且对与新教的瑞典人结盟放心不下，许多乌克兰人拒绝加入只领有 4 000 哥萨克军队的马泽帕麾下。1709 年 5 月，俄罗斯人摧毁了扎波罗热塞契（它是站在马泽帕一方的）。到了 6 月，俄罗斯人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击败瑞典人和哥萨克。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彻底粉碎了瑞典在北欧称霸的企图，使俄罗斯的势力扩张到波罗的海沿岸。对乌克兰来说，这场战役终结了任何与俄罗斯分道扬镳的希望。在俄罗斯人的追击下，查理十二世和马泽帕逃往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摩尔多瓦。马泽帕于 1709 年 9 月 21 日在摩尔多瓦去世。

马泽帕起义失败后，盖特曼政权被并入俄罗斯帝国。俄国军队驻扎在盖特曼政权的土地上，俄罗斯人也成为哥萨克军队的最高指挥官。1722 年，沙皇成立了由俄罗斯官员组成的小俄罗斯部（Little Russian Collegium）与盖特曼分权。同时哥萨克军队被调往北方，协助建设彼得一世的新都圣彼得堡。俄罗斯人在历史上首次获准在乌克兰拥有大量地产，彼得一世的宠臣亚历山大·孟什科夫（Aleksan-

dr Menshikov）成为盖特曼政权最大的地主。出版业受到监管，以防止乌克兰的书籍上出现与俄罗斯相左的观点。1721年，彼得一世将东正教会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并撤消了基辅大主教区。乌克兰的经济，尤其是谷物出口，掌握在俄罗斯的国家控制之下。俄罗斯当局监督盖特曼选举，以使选举结果符合俄罗斯的利益。1734—1750年，盖特曼政府公署成立。这是一个由一位俄罗斯王公领导的委员会，以取代盖特曼选举。

然而，俄罗斯兼并盖特曼政权持续了很长时间，盖特曼政权的权力不断受到限制，但直到1785年才最终被废除。部分原因是由于俄罗斯考虑到不能操之过急，避免使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人”的对抗升级、关系恶化，因为俄罗斯还需要他们来协助对付奥斯曼人。贯穿整个18世纪的俄罗斯—土耳其人的冲突对乌克兰来说是灾难性的：乌克兰人被征召入伍，并要为在乌克兰领土上的俄罗斯军队提供给养。虽然俄罗斯人拒绝赋予盖特曼和哥萨克斯塔西那更多的政治权利（如1763年曾提议组建贵族议会并确定盖特曼世系权利），但俄罗斯当局通过扩大斯塔西那的经济权利而赢得其支持，其中包括增加农民的义务，以及在1783年将农奴制引入乌克兰，从而限制农民的流动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进而束缚于地主本人。

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继承了彼得一世的政策，不仅在南方击败了奥斯曼人，同时也彻底废除了乌克兰人的自治权。她和彼得一世一样是集权主义者，致力于消除如盖特曼政权一类的“封建残余”。“这些省份”，她宣布，“应该被俄罗斯化……如果选用有才智的地方长官，这个任务会完成得轻松些。当盖特曼被废止后，所有一切努力都应该从人们的记忆中将他们以及他们的时代一并抹去”。摆在乌克兰上层面前的是胡萝卜加大棒：若有“妄想自治与独立的疾病”的表征就会受到惩罚，但若对俄国忠诚则有资格在俄罗斯帝国政府中担当

要职，并享受和俄罗斯贵族一样的权利。[①] 与奥斯曼人在南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冲突成为取消独立的乌克兰哥萨克军事单位的借口。无论如何，反叛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引入农奴制以及免去哥萨克贵族的服役义务等特权使得前盖特曼政权的领导层接受了正式被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安排，而且鲜有反对意见。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盖特曼政权，尤其是马泽帕本人呢？毫无疑问，盖特曼政权时期和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一样，成为乌克兰思想家和作家灵感的源泉。舍甫琴科写道：

> 曾经的盖特曼政权
> 已经一去不复返。
> 曾经我们自己领导自己
> 已经再也不可能。
> 但我们永远不忘记
> 那哥萨克的光荣。[②]

人们根据马泽帕的事迹创作了 3 部歌剧，李斯特（Liszt）做过一首诗，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做过一首颂词，拜伦爵士（Lord Byron）也曾贡献过一段精彩的诗篇：

51

> 没有人像你，马泽帕（追击）！
> 沉默寡言而功绩辉煌
> 自亚历山大到今日，
> 你是如此举世无双，
> 你和你的战马，
> 踏遍大江与荒野

---

① Subtelny, 2000, p. 172.

② From Taras Shevchenko, "Taras's Night",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汉语译文译自本书作者的英文译本。——译者注

塞西亚的名望也黯然神伤。①

对许多乌克兰人来说，马泽帕是一位传奇英雄，而他所领导的起义以及哥萨克盖特曼政权是乌克兰人渴望自由的象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马泽帕只服务于少部分精英阶层的利益，马泽帕本人也不过是一个自利的机会主义者，因而其领导的起义没有得到广大哥萨克的支持。马泽帕的起义确实归于失败，而且在短期内使乌克兰的自治权付之东流。然而从长远来看，盖特曼政权为乌克兰民族思想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而且经过理想化的热爱自由的哥萨克形象将会在后世乌克兰人的心里复生，用以区别自己同俄罗斯人，并成为乌克兰追求独立的精神动力。

三、俄罗斯的领土扩张

伴随着盖特曼政权的瓦解，俄罗斯的领土不断向其他“乌克兰的土地”扩张。通过在第聂伯河西岸扩张领土，以及最终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取黑海海岸，到 18 世纪末，俄罗斯沙皇已经统治了今日乌克兰的大部。

1775 年，俄罗斯军队摧毁了扎波罗热塞契，它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这一地区哥萨克的基地和逃亡农民的避难所。在 1772 年，俄罗斯哥萨克叶梅连·普加乔夫（Emil Pugachev）在南俄罗斯发动起义时，扎波罗热人为他提供了支持。而在 1768 年到 1775 年间，许多扎波罗热人在凯瑟琳二世的军中效力，抗击鞑靼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但是，当俄罗斯的宿敌被击败后，扎波罗热人对沙皇来说便没有什么用处了。1775 年 6 月 4 日，当大部分扎波罗热军队还在前线作战时，俄罗斯军队把塞契夷为平地。哥萨克首领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今天的南乌克兰也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扎波罗热的领地被俄罗斯贵族和德国、

① Quoted in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5。汉语译文译自本书作者的英文译本。——译者注

塞尔维亚拓垦者所瓜分，俄罗斯当局也试图清除扎波罗热哥萨克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进一步向南进军，最终达成了征服鞑靼人所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长久目标。1774 年，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鞑靼人的保护国奥斯曼帝国放弃了对此地区的主权。1783 年，凯瑟琳二世宣布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帝国。鞑靼人依旧居住在克里米亚，但是此地现在向俄罗斯人开放。俄罗斯人还在克里米亚修建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对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胜利，消除了帝国南疆最主要的冲突来源，实现了乌克兰南部成为定居地的可能，也标志着欧洲对 5 个世纪前入侵欧洲的蒙古人势力的残余取得了最终胜利。

52

在黑海沿岸的西部，俄罗斯开始开拓所谓的新俄罗斯。此地区毗邻扎波罗热塞契、波兰—立陶宛、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在 18 世纪期间曾有过少量定居者，但仍然保持某种“无人区”的状态。当俄罗斯人战胜扎波罗热和土耳其人，波兰—立陶宛公国陷入衰败后，这片土地被俄罗斯所控制。凯瑟琳二世为了刺激当地开发，给予愿意定居此地的俄罗斯人（大部分为贵族和军官）4 000 英亩土地，他们则以宽松的劳动条件（每周工作 2 天）来吸引乌克兰和俄罗斯农民前去垦殖。在从前希腊城市和土耳其人要塞的遗迹上，新的港口城市在第聂伯河下游和黑海沿岸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其中包括赫尔松（Kherson）、叶卡捷琳诺斯拉夫（Yekaterinoslav，今天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亚历山德罗夫斯克（Oleksandrivsk，今天的扎波罗热），以及最为知名的、日后成为汇聚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希腊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大都市敖德萨（Odessa）。港口进出的主要货物是谷物，而且到 18 世纪后期，黑海沿岸的贸易额已经攀升至天文数字。土地所有者，尤其是俄罗斯人，以前主要为国内消费生产，现在则利用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来为国际市场进行生产。曾经的边疆——乌克兰，如今正在成为俄罗斯和整个欧洲的粮仓。

最后一块落入俄罗斯人手中的是曾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一部分的右岸乌克兰。由于共和国的中央政府疲软无力，经常被国内贵族和外国势力所欺凌。在整个18世纪，共和国境内的乌克兰领土上一直风雨飘摇，反抗波兰地主的农民（主要为乌克兰或“鲁塞尼亚”裔）起义层出不穷。俄罗斯宣布自己为共和国境内东正教徒的保卫者，频频向共和国施压，以便压制任何使共和国中兴的努力。最终，共和国的3个邻国趁虚而人，于1772年、1775年和1795年瓜分了波兰—立陶宛。最终，波兰—立陶宛从地图上消失了。俄罗斯瓜分到了其领土的大部分（62%）以及人口的大部（45%）。到1795年，所有右岸乌克兰和沃伦地区都被俄罗斯所控制，奥地利（参见第五章）得到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Bukovyna）。如表1所示，到18世纪末大约有90%的乌克兰人所居住的土地为俄罗斯所控制。

53

四、“小俄罗斯”的俄罗斯化

在大多数乌克兰人看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是压迫性的。乌克兰人在哥萨克或波兰—立陶宛的统治时期享受的哪怕是极其有限的民主制度，此时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无宪法、无政治权利、无选举大会、无权力分立的专制政府。俄罗斯沙皇作为最高权威，不仅主宰世俗政府制度，而且控制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当地法庭受到地主的控制，而且警察——包括常规力量与1826年后组建的秘密警察——也异常严酷。1797年后实行的征兵制规定服役期限为25年，加之俄罗斯常年的军事行动和严酷的军队环境，对士兵来说往往相当于判了死刑。大多数乌克兰人（这个称呼在以后才流行开来，俄罗斯当局更喜欢管他们叫“小俄罗斯人”）被编为农奴，从而被地主束缚在土地上，并强迫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许多地主通过谷物贸易而暴富，但大多数农民则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文盲率居高不下；医疗条件十分恶劣。

54

表 1　18 世纪末的乌克兰土地

领土	土地面积（平方千米）	人口
左岸盖特曼政权（俄罗斯帝国）	92 000	2 300 000
斯洛博达乌克兰（俄罗斯帝国）	70 000	1 000 000
南乌克兰（俄罗斯帝国）	185 000	1 000 000
右岸乌克兰（俄罗斯帝国）	170 000	3 400 000
东加利西亚（哈布斯堡帝国）	55 000	1 800 000
特兰斯卡帕提亚（哈布斯堡帝国）	13 000	250 000
布科维纳（哈布斯堡帝国）	5 000	150 000
总计	585 000	10 000 000

资料来源：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 189.

不过，俄罗斯的统治也有重要的文化成分在里面。因为“小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从语法到文化上都非常相近，政府通常把乌克兰视为俄罗斯必不可分的土地。但俄罗斯并没有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趁着短暂占领东加利西亚部分的机会而扩大战果，进而兼并所有的“小俄罗斯人”。1793 年为纪念凯瑟琳二世而铸造的纪念币上刻着：“我拿回了曾经失去的。”[①] 这表明乌克兰的土地——从右岸到克里米亚——在历史上都被视为属于“俄罗斯的”，尽管这些土地从没被莫斯科统治过。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很明显地指出俄罗斯才是基辅罗

① Subtelny, 2000, p. 203.

斯的正统继承者；而且鉴于这块属于俄罗斯的土地上的人操着与正规俄语所不同的语言[1]，也非东正教徒，更为上天不容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并非俄罗斯人，那么这些人必须被“俄罗斯化”。

俄罗斯化包含方方面面的内容。“小俄罗斯人”不同于一般俄罗斯人的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他们不参加东正教会。这一点在右岸乌克兰的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右岸长期受波兰一立陶宛统治，很多乌克兰人转而信奉天主教（许多人也已经完全波兰化了），而且更为普遍的是，很多人皈依了希腊天主教（东仪天主教）。起初，俄罗斯人对希腊天主教会表示了一些宽容。但是在希腊天主教会领导层支持了1830—1831 年的波兰人起义后，俄罗斯当局改变了态度。1839 年，在波罗茨克（在今天的白俄罗斯）的宗教会议（Synod of Polotsk）上，俄罗斯领土上的希腊天主教会被查封，其教区被转交给俄罗斯东正教会。

但是俄罗斯当局并没有强制所有居民信奉东正教。有大量犹太人居住在今天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境内。因为被排除在政府事务之外，犹太人大量集中于商业领域，并聚居在基辅和敖德萨等中心城市以及在 19 世纪后期飞速发展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里。当俄罗斯占领右岸后，当局并不希望大批犹太人在帝国内随意流动，因此把他们限制在俄罗斯西部省份的所谓佩利安置区内（Pale of Settlement）内，其中包括乌克兰的大部。右岸犹太人的数量从 18 世纪末的 100 000 人增长到 1880 年的 100 余万人。[2] 尽管许多犹太人已经非常俄罗斯化了，但犹太人定居点（什泰特勒）仍然能够保留传统，包括沿用意第绪语。然而，反犹主义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蔓延开来，并在 1881—1883 年和 1903—1905 年发生了大屠杀事件（pogroms）。

55

① Russian itself was not fully codified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s readers of Tolstoys' *War and Peace* will know, the upper classes in Russia in the early 1800s spoke better French——regarded as a “civilized ” language——Russian.

② John Doyle Klier, *Russia Gathers Her Jews : The Origins of the “Jewish Question ” in Russia , 1772 —1825*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俄罗斯当局进行俄罗斯化的另一种手段是教育。现代乌克兰的首所大学于1805年成立于哈尔科夫（Kharkiv，俄语为Kharkov），另一所大学也于1834年在基辅成立，2所大学都采用俄语教学。初等教育也采用俄语，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语学校被关闭。这使乌克兰人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原因是他们无力承担在家里教育子女的费用。其结果是在俄罗斯统治时期，乌克兰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下降了。①

尽管如此，俄罗斯并没有制定一个全面计划以使乌克兰农民大众俄罗斯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作“小俄罗斯人”，所以这种假定认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最终接受“大俄罗斯”文化。直到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对乌克兰语进行明目张胆的打压之前，俄罗斯缺乏一个连贯的“乌克兰”政策，更不用说以一种明晰的政策来界定现代乌克兰人的俄罗斯身份认同。因此，“与尝试同化乌克兰农民大众相比，当局更注意阻止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深入农村”。②

对于能够获得土地并进入政府担任公职的精英阶层，包括哥萨克贵族后代在内，他们也被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能够放弃“小俄罗斯人”的“农民文化”，并有必要融入更广大的俄罗斯文化中。因此，作为个体的乌克兰人——土地所有者、官僚、东正教会人员、音乐家、画家和作家——最为知名的当属尼古拉·果戈里（1809—1852，乌克兰语为Mykola Hohol）——能够在俄罗斯帝国治下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因于俄罗斯当局的政策。以果戈理为例，尽管他的作品中包含很多乌克兰元素，但他是用俄语写作的，这使他的作品，如《钦差大臣》（1836）、《死魂灵》（1842）和多部《圣彼得堡故事集》，能够跻身经典俄语文学作品行列。③ 在积极政策和恶意

---

①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Boulder: Westview, 1997), p. 67.

② Serhy Yekelchyk, *Ukrainians: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7.

③ For more on Gogol with respect to the Ukrainian question, see George S. N. Luckyj, *The Anguish of Mykola Hohol, a. k. a. Nikolai Gogol*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1998).

忽略的双重作用下，讲乌克兰语或亲乌克兰的精英阶层在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消失了。用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话讲，俄罗斯化榨干了乌克兰，到19世纪前半叶，乌克兰已经成为一潭“文化的死水”。①

五、乌克兰文化的复兴

56

尽管俄罗斯当局不遗余力地压制乌克兰的民族认同，但并不意味着乌克兰人无力发展自己的文化。1798年，第一部现代乌克兰语的书籍出版了，这就是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Ivan Kotliarevsky）以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为题材创作的乌克兰语长诗（*Aneida* ），作家和民俗学者尤其是哈尔科夫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们编纂了乌克兰民间故事和“小俄罗斯”方言的语法。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看上去不会招致政府的反对，但到19世纪30年代，由于米哈伊洛·马克西莫维奇的努力，情况发生了改变，开始带有政治意义。马克西莫维奇经过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的研究，总结认为两个民族是联系紧密然而却相互独立的民族。他打破了官方的正统观点，开始使用乌克兰人的字眼以强调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独特性，甚至在他给朋友的信中都署名为“一个老乌克兰人”。②

到19世纪40年代，乌克兰的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基辅，并且更多地带有明显的政治特点。1845年，一批乌克兰知识分子成立了秘密协会圣西里尔—梅多迪乌斯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探讨如废除农奴制、出版自由和斯拉夫民族自由联邦等激进话题。像这样的秘密组织多受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俄罗斯的主要城市中比比皆是。沙皇政府自然对他们报以敌视态度，并将秘密警察打入他们内部并伺机逮捕其成员。1847年，兄弟会还未来得及辅助任何实际的宣传活动，便被强制取缔，主要成员或被逮捕

① Wilson, 2000, p. 76.

② Yekelchyk, 2007, pp. 40, 235.

入狱或被流放。

兄弟会中最知名的成员莫过于塔拉斯·舍甫琴科。他身为农奴的孤儿，早年便显露出艺术才华，被主人送去学习绘画并进入帝国美术学院深造。但舍甫琴科是以其诗歌成就扬名于世的。他于1840年发表的首部诗作《科勃扎琴歌手》(*The Kobza Player*）由民歌、农民土话和更为复杂的乌克兰语方言构成，雅俗共赏，被公认为乌克兰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舍甫琴科的诗作同样包含着政治色彩。他视乌克兰为被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压迫的独立民族。例如，在他1845年的诗作《大墓穴》(*The Great Vault*）中，波兰和俄罗斯被描绘为劫掠天地的乌鸦。他歌颂哥萨克的传奇，哀叹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在叙述哥萨克的失败后，"悔恨、悔恨不断增长，把我们的自由埋葬"，他又预言：

> 光荣会重放光芒
> 那乌克兰的荣光，
> 是耀眼的光而非落日余晖，
> 将再把我们的未来点亮。[1]

他把俄罗斯沙皇形容为"侩子手"和"食人生番"，在其1844年的诗作《梦》(*The Dream*）中哀叹：

> 是（彼得）一世将
> 不幸的乌克兰送上绞架
> 是（凯瑟琳）二世——她完成了
> 所有剩下的罪恶。[2]

---

①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91.

②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92.

因创作反俄作品，舍甫琴科被判处10年发配中亚充军，并接受管制，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舍甫琴科于1857年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宽赦，但不允许返回乌克兰。虽然如此，他所创作的为乌克兰和劳苦农民伸张正义的诗作，使他成为许多乌克兰人心中的英雄和榜样。不过，令舍甫琴科与众不同的是除语言之外的、对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定义，其中包含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乌克兰人，尤其体现在哥萨克身上的对自由的热爱，帝国主义俄罗斯奴役其他民族的企图。他1838年在寓言诗《卡特琳娜》（*Kateryna* ）中写道：

哦可爱的少女们，你们陷入爱情，
但不要被俄国佬（Moskaly，对俄罗斯人的蔑称）所蛊惑
俄国佬是外国人，
他们不会好好对你们。
俄国佬的爱情只为消遣，
总是大笑着离去。①

这些诗句的主题也被其他乌克兰作家所用，例如西门·古拉克—亚尔特莫夫斯基（Semen Hulak-Artemovskyi，1813—1873）创作了一部歌剧，赞颂扎波罗热哥萨克；莱西雅·乌克兰卡（Lesia Ukrainka，1871—1913）的剧作《贵妇人》（*The Noble Woman* ）把莫斯科描绘为聚集了野蛮粗鲁的亚洲人的地方，与虔诚纯洁的乌克兰形成鲜明对比。这部剧作自然无法在俄罗斯和苏联时期上演，但类似的主题也出现在她的《巴比伦之囚》（*Captives of Babylon* ，1902），暗喻乌克兰承受着俄罗斯化的痛楚。剧中人物谴责道：

那些被囚之人啊，
被迫讲着我们敌人的语言。

① Quoted in Wilson，2000，p. 92.

他们如何能够理解自己民族的诗歌，
而这些诗歌又如何能用外语唱诵……
被锁链束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羞耻，
但忘记它们则是更为严重的耻辱。①

19世纪60年代，积极的乌克兰活动家们试图通过组建秘密组织格罗马达（意为村社）传播乌克兰知识分子的观点。第一个格罗马达由基辅的学生于1861年组建，随后其他城市也出现了此类组织。舍甫琴科甚至在帝国首都圣彼得堡也成立了一个格罗马达，并出版了一份月刊《奥斯诺瓦》（Osnova，意为基地）。格罗马达的成员身着乌克兰农民的服饰，用乌克兰语发表作品，为农民开办周日学校，帮助他们识字，并熟悉乌克兰作家的作品。

58

俄罗斯当局不会欢迎这些变化，而且错误地将乌克兰崇拜分子视为波兰分离主义者的同盟。当1863年波兰发动反抗俄罗斯统治的起义时，俄罗斯内务部大臣签署命令查禁使用乌克兰语的教育和宗教出版物。周日学校也被关闭，格罗马达被取缔，许多乌克兰活动家被放逐。格罗马达在19世纪70年代复苏。其成员创办文学社，并出版乌克兰语的报纸。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7年签署了厄姆斯法令（Ems Decree，其名称来源于沙皇签署法令时正在德国厄姆斯河矿泉疗养地度假），查禁所有本地出版的和境外进口的乌克兰语书籍，禁止公众演出时使用乌克兰语。格罗马达的活动家被雇主解雇，许多人被流放到乌克兰境外。1881年，厄姆斯法令经修正后允许乌克兰语的歌曲和剧本进行演出，但乌克兰语的出版物必须与俄语作品的数量相当，以保持均衡。

六、改革与社会经济变革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5）中遭到惨败。战后，沙皇

---

①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98.

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以推动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乌克兰乃至整个帝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改革无疑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农奴之前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无法移民，无论从经济还是法律上都在地主的控制之下。虽然他们从技术上来讲并非奴隶，但当土地易手的时候，新地主将一并得到所属的农奴。尽管如舍甫琴科一样的少数农奴能够得到翻身的机遇，但大多数人不得不在农村中忍受贫困。

从理论上讲，农奴制被废除应该为农奴创造新的机遇。他们自此应该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或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沙皇也希望通过劳动力的流动来提高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

但不幸的是，对于大多数新解放的农奴来说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包括被迫支付一笔补偿金，才能从地主那里获取土地。几乎没人有能力购买农用器具，而他们的收成也不足以偿还债务。他们被迫出卖自己的资产，而农村高生育率和卫生条件的提高共同促成农村人口的过度膨胀。到1900年，乌克兰农民人均土地面积和19世纪60年代相比下降了一半。[①] 大多数乌克兰适合耕种的土地被5 000个贵族庄园所占有，许多农民被雇佣做日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地主满怀仇恨的农民掀起过多次农民起义。许多乌克兰农民迁徙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太平洋沿岸区域垦殖新土地，这一方面是为了逃避贫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的鼓励。

59

尽管一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乌克兰农业仍然是俄罗斯帝国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农民和地主之间不断暴发的冲突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乌克兰生产了帝国90%的小麦（世界的20%），以及大量的大麦和甜菜。19世纪末，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柱。[②]

乌克兰的现代化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顿巴斯盆地。铁路建设是工业化的第一步，乌克兰的首条铁路于1865年铺设，把主要粮

① Yekelchyk, 2007, p. 54.
② Yekelchyk, 2007, p. 55.

产区和敖德萨港连接起来。俄罗斯政府在 19 世纪 70 年代加大了对帝国境内铁路建设的投资力度，因而需要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的铁矿和煤矿。外国资本——主要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注入刺激了此地区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顿巴斯主要的工业中心尤佐夫卡（Yuzivka）就是以威尔士人约翰·休斯（John Hughes）的名字命名的（今天被称作顿涅茨克）。乌克兰的主要发展在于原材料——煤与铁的提取与初加工，而大半利润被外国和俄罗斯投资者通过高附加值产品所获取。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其他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卷入这次工业化浪潮，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便成为工业中心的东部乌克兰——尤其是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和克罗沃伊罗格（Kryvyi Rih）等周边城市——至今仍是乌克兰最为工业化的区域。

工业化改变了社会与人口结构。尽管部分乌克兰人脱离土地成为工人阶级，但大多数地主更乐于通过农业生产剥削农民。工厂主们不得不从外部引进劳动力，而劳动力主要来自俄罗斯。例如，19 世纪 90 年代，尤佐夫卡（顿涅茨克）80% 的工人是莫斯科来的新工人，而整个乌克兰超过 40% 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生地在乌克兰以外。[①] 在城市不断膨胀的情况下，面对外来工人的大量涌入和同化造成的压力，到 20 世纪初此区域内讲乌克兰语的人已经变成了少数族裔，而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则占据行政、文职工作和贸易等部门和行业的主导地位。乌克兰本土资产阶级规模较小，而工业中心的工会和工人运动也很少带有“乌克兰”色彩。 60

尽管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乌克兰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但绝大多数乌克兰人仍然是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在通常认为的最为“落后”的经济门类集中了如此多的人口，加之缺乏一个本土的领导阶层，所以一些人称乌克兰为“残缺的社会结构”。[②] 虽然如此，乌克兰

---

① Bohdan Krawchenko,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Ukraine*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1985), pp. 42—43.

② Andreas Kappeler, "A 'Small People' of Twenty-Five Million: The Ukrainians circa 1900",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18, nos. 1—2 (1993): pp. 85—92.

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还是将被卷入世纪之交席卷俄罗斯帝国的社会政治变迁的大潮中。

七、乌克兰的政治变迁

农村贫困状况的恶化、经济工业化的滞后以及严酷的政治专制导致了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要求。到19世纪80年代，农村知识阶层和一个小规模的劳工阶层的兴起产生了一批团体，他们自然比没受过教育而组织涣散的农民们具备更多的政治组织能力。

但是没有一个团体能够单独挑战沙皇的权威。而且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乌克兰的大大小小的团体致力于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症结寻找药方，众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对沙皇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乌克兰人中最响亮的声音来自米哈伊洛·德拉戈马诺夫（1841—1895）。他曾是基辅大学的教授，后流亡到瑞士。1876年到1882年间，他发表了乌克兰第一本政治刊物《格罗马达》（Hromada）。尽管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但由于乌克兰底层农民深受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因而他也从民族角度来看待乌克兰问题。他把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视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良方，主张变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成自治的公社。德拉戈马诺夫在俄罗斯统治下的乌克兰的影响仍然很有限，但他却成为奥匈帝国境内许多乌克兰年轻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导师。[①] 1891年，在卡尼夫村的舍甫琴科墓前，一批来自哈尔科夫的年轻活动家们组成了塔拉斯兄弟会（Taras Brotherhood）。塔拉斯兄弟会号召解放俄罗斯政治压迫下的所有民族。塔拉斯兄弟会还在乌克兰学生中发展了自己的分部。与一个正式的政党相比，塔拉斯兄弟会更像是个社会组织，后于1893年被取缔。[②]

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境内开始出现地下政党组织。俄罗斯社会

① Yekelchyk, 2007, p. 44.

② John Reshetar,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1917—1920: A Study in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11—12.

民主工党（1898）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政党，主要由弗拉基米尔·I·列宁（1870—1924）领导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组成。1903 年，该政党分裂为两大派别，列宁领导其中一派，称为布尔什维克（源于俄语 bolshinstvo，意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源于俄语 menshinstvo，意为少数派）都寻求包括东乌克兰在内的工人的支持。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工人并非乌克兰裔，因此他们当然不会欢迎讨论任何独立的乌克兰议程。

俄罗斯境内第一个乌克兰政党是 1900 年成立于哈尔科夫的革命乌克兰党（Revolutionary Ukrainian Party，RUP）。和德拉戈马诺夫一样，这个政党试图融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于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的，产生了一批左兜揣着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右兜里放着舍甫琴科诗集的年轻人。[①] 创立者之一的尼古拉·米哈诺夫斯基（1873—1924）发表了名为《独立的乌克兰》（*Independent Ukraine*）的小册子（1900），并成为政党的纲领。他承认民族主义力量，并指出乌克兰是被俄罗斯非法征服的，宣称乌克兰正面临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需要动员民众去创造一个“从卡帕西亚到高加索的自由独立的乌克兰”。他承认这个使命并不容易实现，但相信尽管“从数字上来看我们很弱小，但出于对乌克兰的爱我们很强大！”[②]

革命乌克兰党在 1903—1904 年间分裂为若干派别。更为民族主义倾向的乌克兰民族党（Ukrainian National Party），包括米哈诺夫斯基在内，把民族问题放在首位，视主宰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为仇敌。相比之下，更强调社会主义的斯皮尔卡（Spilka，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与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党相联合，指责民族主义者为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最终，革命乌克兰党的核心部分于 1905 年重新命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人党，并将社会主义

① Ivan Lysiak-Rudnytsky, *Essays o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nian Studies, 1987), p. 139.

② Quoted in Reshetar, 1952, pp. 2, 16.

理论指导与追求乌克兰自治的目标相结合。

此外还有更多的温和派团体纷纷成立，包括全乌克兰组织（1897）。其最初为一文化机构，后于1904年重新命名为乌克兰激进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一样，激进民主党主张对帝国进行民主改造，但对于社会改革的态度更为保守。它与俄罗斯立宪民主党结盟，一般被称为士官生（Cadets）。然而从总体上来看，乌克兰各色政治组织的规模一直不大，其主要成员来自学生和知识分子，而非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或工人阶层。

1905年，罢工、农民起义、士兵哗变的浪潮在帝国境内点燃了革命之火。沙皇当局取消了农民的赎金并成立一个有限的立宪政体，包括被称为杜马的民选议会。相对于沙皇来说，杜马只有很有限的权力。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于1906年和1907年两度解散杜马，并且修改选举法以确保地主精英阶层能够在选举中获取更多的席位。乌克兰的活动家则利用相对宽松的环境在1905年革命期间重建了格罗马达、教育社团和农民互助组织。乌克兰语的报纸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但由于仅有少数有文化的乌克兰人有财力订阅，因此只有乌克兰激进民主党的《拉达》（议会）得以从1905年一直办到1914年。

62

然而1905年的革命并不彻底。1908年，尼古拉二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重申权威。在压制杜马的同时，俄罗斯当局逮捕了很多重要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并查封了他们的组织。1910年，俄罗斯当局以阻止所谓奥地利所鼓励的乌克兰分裂主义倾向为名，恢复了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俄罗斯自由派领军人物彼阿得·斯特鲁维（Pyotr Struve）甚至批评乌克兰的运动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由国家支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俱乐部在基辅成立，目的在于“掀起反对乌克兰运动的社会和文化战争并捍卫乌克兰的俄罗斯国家的基础”。[1] 乌克兰作家们，无论从事文学写作还是热衷于辩论，都被迫转入地下，或者像以前那样，在控制宽松的奥地利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发

① Subtelny, 2000, p. 299.

表乌克兰语作品。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启动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改革。用首相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的话来说，这些改革是“在强者身上下注”。他将信用体制推广到农民身上，并帮助他们巩固和扩大地产。可是，斯托雷平于 1911 年 9 月间在基辅歌剧院与尼古拉二世观看演出时被刺身亡。[1] 斯托雷平之死导致新一轮对独立政治团体的镇压，对未来改革的希望也随之破灭。1914 年，俄罗斯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并最终使沙皇政权被推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乌克兰的民族意识仍然未得到充分发展。乌克兰的政治文化表达被沙皇俄国所打压；大部分乌克兰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被俄罗斯化；而讲乌克兰语的最大群体——农民阶层仍然贫穷且目不识丁。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生活在农村里的大多数乌克兰人知道自己并非俄罗斯人、波兰人或犹太人，但“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自己属于更广大的乌克兰民族”[2]。如果被问到身份，一个典型的农民很可能会回答他是一个穆色克（muzhik）——农夫——或者是一个东正教徒，或简单地称自己为图特希尼（tuteshni），意为“本地人”。[3] 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落后于东欧民族，例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落后于奥地利治下乌克兰的同胞。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提及。

63

尽管如此，至少此时已经存在萌芽中的乌克兰运动，以寻求从文化上定义乌克兰民族，而这在 17 世纪俄罗斯刚开始统治乌克兰的时候是不存在的。虽然很多乌克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俄罗斯人在民族性上的区别，而民族性的区别已经在早期民族发展中显露端倪。一位 20 世纪初游历乌克兰的英国作家写道：

---

① Dmitri Bogrov, the assassin, was linked to radical leftist groups, but some suggest he may also have been in the employ of conservative forces who were opposed to Stolypin's reforms.

② Yekelchyk, 2007, p. 54.

③ Reid, 1997, p. 76.

> 基辅城及其周边的乡村实际上是小俄罗斯，而非大俄罗斯的。这两个民族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语言、服饰、传统、民歌、谚语、民俗、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公共组织等。在各个方面，小俄罗斯人、南俄罗斯人、罗森人（Ruthene）和高格利（Khokhly），无论如何称呼，他们和北部的大俄罗斯人是不同的……应该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差别比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差别还大。①

当俄罗斯的国力在一战中受到削弱后（参见第六章），乌克兰运动走到台前来，加快了乌克兰从俄罗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进程，而这一进程最终到1991年方得以实现。

① Sir Donald MacKenzie Wallace, 1905, quoted in John Armstrong, *Ukrainian Nationalism*, 2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6.

第五章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西乌克兰

65

尽管乌克兰的土地大多逐渐被俄罗斯帝国吞并，但大部分西乌克兰领土却始终没有被俄罗斯所统治。西乌克兰经历了基辅罗斯和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统治，在1654左岸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后，西乌克兰的一部分依然保持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但到18世纪末，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如前一章所述，波兰的大部被俄罗斯瓜分，但波兰统治的加利西亚，连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布科维纳被并入以维也纳为首都的哈布斯堡帝国。经过哈布斯堡帝国一个多世纪的统治，这部分乌克兰的领土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红军占领，并被纳入苏联的版图之内。尽管只占到今日乌克兰的很小一部分，西乌克兰不同的历史经历直接影响到当代乌克兰的现状。由于长期置于俄罗斯和苏联统治之外，西乌克兰人更易于发展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认同，而且成为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以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的主要区域。和东乌克兰不同，长期处于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之下，使西乌克兰表现出更多的“欧洲”特性。

一、哈布斯堡帝国对乌克兰土地的统治

66

从16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是欧洲的大国。尽管德意志人是帝国的主体，但并没有占到人口多数。

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着众多的民族群体（如波兰人、捷克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而且比俄罗斯帝国表现出更多的对多元性的尊重。通过审慎的王朝联姻和军事征服，哈布斯堡帝国将其统治扩展到中欧，直至巴尔干半岛。

18世纪末，哈布斯堡帝国参与到对波兰的瓜分行动中，从而获得了部分乌克兰领土的统治权。虚弱的波兰被3大强权——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所分享。1772年，奥地利获得了以利沃夫（奥地利人称之为伦贝格，Lemberg，波兰语中为Lwow）为主要城市的东加利西亚。1774年，奥地利从被削弱的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加利西亚南部山脉众多、乌克兰人占多数然而民族混杂的布科维纳（Bukovyna）地区。特兰斯卡帕提亚（Transcarpathia）自中世纪便在匈牙利的统治之下，此时是哈布斯堡帝国（帝国在1867年改称奥地利—匈牙利帝国）匈牙利部分的领地。1795年，在最后一次对波兰的瓜分中，奥地利获得了主体民族为波兰人的其余加利西亚地区，并将西加利西亚（中心为克拉科夫）与东加利西亚合并为一省。

讲乌克兰语的居民被称为卢森尼亚人，在英语中被称为鲁塞尼亚人。[①] 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城市居民只占到人口的10%，余下的大多为德国人、犹太人和波兰人。大多数乌克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只有少数份地可供耕种，并且要忍受贵族，主要是波兰贵族的剥削。被孤立在偏僻的村庄里，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乌克兰农民的人均产量只有奥地利农民的1/3，粮食短缺和饥荒是稀松平常的事。对波兰的瓜分也切断了与俄罗斯市场的联系，使加利西亚，尤其是乌克兰人聚集的东加利西亚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境内最贫穷的地区。[②]

乌克兰人中甚少有自己的土地贵族或商人阶级。奥地利人派德语

① Throughout this chapter, I will refer to "Ukrainians", unless I am referring to a group that explicitly uses the word "Ruthenian" or "Rusyn."

②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p. 213—214.

官员来帮助治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但本地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地主仍然保持了的大部分传统权力，商业则为犹太人和德语商人把持，乌克兰人基本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唯一可称得上是精英的人群是乌克兰教士。在西乌克兰，大部分教士隶属于希腊天主教会（东仪天主教会）。尽管大部分教士的生活并不比农民好多少，同样经常遭到波兰贵族的蔑视，但他们与农民之间保持很紧密的联系，而教会也成为乌克兰社会的中心。

67

二、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认同

和罗曼诺夫王朝不同，哈布斯堡帝国很少用主导文化来同化乌克兰人，因此与被改造成俄罗斯人相比，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并不那么容易变为德意志人或奥地利人。尽管如此，对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大部分乌克兰人来说，民族认同的政治——主要是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在广大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给自己定位这样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奥地利统治下的乌克兰土地上，波兰文化占主导地位。在哈布斯堡帝国之前，西乌克兰人只能处在接受波兰习俗和文化的强大压力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分子。直到1818年，哈布斯堡帝国的初等教育还由波兰语所垄断，而高等教育只有波兰语和德语两种语言。因此哈布斯堡帝国时期波兰化依旧在继续。一位那个时代的学者指出："波兰化……在1795年后比1370年到1772年的400年间还要厉害。"[①] 由于学生倾向于接受波兰语或德语教育，尝试建立乌克兰语中学的努力也归于失败。到19世纪30年代，一些乌克兰人甚至推广使用拉丁字母来拓展接受文化的渠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人受到变为波兰人的压力。大多数乌克兰人只接受了有限的教育，他们的社会活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其所

① Roman Szporluk, "Ukraine: From an Imperial Periphery to a Sovereign State", *Daedalus* 126, no. 3 (Summer 1997): pp. 100, 108.

在的村庄。大部分人享受不到自己“选择”文化或加入波兰精英阶层的奢侈权力，而只能保持自己的农民身份。当然，因此引发的对波兰贵族的仇恨与攻击也不在少数。哥萨克的传说——他们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和加利西亚无关——同样激励着乌克兰分离主义观念的产生。很多希腊天主教教士也反对波兰化，包括反对皈依罗马天主教的行为。尽管一些乌克兰人，尤其是技术工人确实被波兰化了，但反波兰的情绪仍然为19世纪日益明显的乌克兰民族身份认同提供了来源。

乌克兰人的另一个选择是成为“政治上的奥地利人”，由此获取文化和物质上的机遇——这一点并非强制性的同化，而是由皇室当局，尤其是在19世纪末提出的方案来抗衡波兰化的势力。最典型的加利西亚—奥地利人是利奥波德·冯·萨克—莫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1836—1895）。他生于利沃夫，学习过德语，后来成为作家，擅长描写乡村生活和其特点（受虐狂“masochism”一词从他的名字而来）。但奥地利并没有资源及能力实现成熟的“民族化国家”，而始终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帝国，权力和特权下放给了地方精英。到19世纪晚期，出于对波兰分裂主义的恐惧，奥地利人试图发展出一个乌克兰的精英阶层，但这更像是一个把乌克兰置于国家机器中的庞大政治计划，而非对乌克兰人民大众的文化改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成为部分西乌克兰文化吸引力的来源。与俄罗斯在东乌克兰不遗余力地打压乌克兰民族认同的行径相比，这的确极具讽刺性。波兰精英公开尝试将乌克兰人波兰化，但乌克兰人却从俄罗斯那里找到了抵抗的理由。在19世纪早期，俄罗斯已经发展出相对完善的“高级文化”和书写文字，同时在与波兰人的长期纷争中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对于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很明显是一个威胁，但一些乌克兰人认为俄语是从“小俄罗斯语”发展而来的，许多农民则视沙皇为救世主，可以“消灭犹太人、惩罚波

兰人、把土地从地主老爷手中抢回来并分给农民”。[1] 可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人强调东正教信仰，这就意味着许多乌克兰人必须放弃作为自己认同的一部分、而在俄罗斯却被禁止存在的希腊天主教。奥地利对俄罗斯势力的恐惧——从俄罗斯在巴尔干的行动得到了证明——与俄罗斯在东乌克兰步步进逼的现实相结合，在哈布斯堡帝国和当地乌克兰人中共同产生了对亲俄罗斯倾向扩散的强烈对抗性反应。

最后，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存在着发展出独立的乌克兰或“卢森尼亚”民族认同的可能性，这种认同在 19 世纪早期是很难实现的。除了波兰人的抵制，乌克兰人也缺少经济资源、政治意识、成熟的知识阶层，甚至缺乏共同的语言。仅在加利西亚就流行着早期乌克兰语（最早被哈布斯堡当局称为斯拉—卢森尼亚语）的众多方言，而且许多人讲雅志奇语（yazychie，意为通心粉），一种没有正式语法的大杂烩语言。[2] 关于语言的争论尤其分化。19 世纪 30 年代，尽管一些人倡议乌克兰人使用俄语或波兰语，但使用一种被称为“独一无二的”乌克兰语（鲁塞尼亚语）的当地方言的主张赢得了大多数支持。这种语言在 1837 年的一个民间故事《德涅斯特河美人鱼》（*The Nymph of the Dniestr*）里得到了正式的表达。它是被称为鲁塞尼亚三人小组（Ruthenian Triad）的利沃夫作家群体创作的，而这个群体与东乌克兰的作家们保持着联系。可是他们的努力被希腊天主教会谴责为“低贱、下流，并且很可能是颠覆性的。”[3]《德涅斯特河美人鱼》在利沃夫被禁止出版，作家们不得不去布达佩斯另行出版。这个时期的“罗斯爱国主义”仍主要以教会为中心，可教会则认为乌克兰“高级文化”没什么吸引力，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当时，认为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人有着普遍的联系、有可能是一种人或一个民族这样的概念，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模糊的观念。

69

---

① Ukrainian historian Yaroslav Hrytsak, quoted in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7.

② Wilson, 2000, p. 106.

③ Subtelny, 2000, p. 241.

三、帝国的改革与社会经济变迁

19世纪前半叶，由于一些意外事件和政府相应的政策，有节制地渐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得到一次大爆发。1848年，全欧洲的民族群体，包括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起来反抗帝国统治者，这些事件被统称为“民族的春天”。加利西亚的波兰人组织了波兰民族委员会，要求推进“波兰”在加利西亚的自治地位。这个新动向惊动了奥地利加利西亚总督弗兰茨·施塔迪昂伯爵（Count Franz Stadion），他决定在占半数人口的乌克兰人（鲁塞尼亚人）中建立一个政治组织以维持平衡。在希腊天主教高层的参与下，以格里戈里·亚希莫维奇（Hryhorii Yakhymovvych）主教为领导的“总罗斯拉达”成立，以对抗波兰的影响。拉达起草了一份宣言，声称鲁塞尼亚人是不同于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独立民族，但是和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其他鲁塞尼亚人同根同源。[①] 拉达同时要求维也纳承认鲁塞尼亚人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并将东加利西亚分离出来，成为更加单纯的“鲁塞尼亚”省份。拉达还在乌克兰创办了第一份报纸——《加利西亚曙光》（Zoria Halytska，1848—1857）。这些举动被一些人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首次表达。

至少在维也纳看来，拉达取得了成功。乌克兰领导人没有支持波兰对自治的诉求。其他改革，如1848年废除农奴制、在利沃夫大学成立鲁塞尼亚语言文学系、鼓励乌克兰语教育和出版业，号召成立民族议会等举措都有助于赢得乌克兰人的支持。尽管缺乏组织经验，乌克兰人仍得到了权利，选举产生加利西亚100名代表中的25名。总罗斯拉达甚至试图组建武装力量以帮助奥利地在匈牙利的镇压活动。

然而改革与奥地利—鲁塞尼亚人的合作精神注定不会持续太久。
70
通过对革命活动的镇压，议会被解散，绝对君主专制重新确立起来。

---

①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6—47.

奥地利人再次与加利西亚的波兰精英阶层达成谅解。到19世纪60年代，波兰语取代德语成为行政语言和利沃夫大学及其他高校的教学语言。1859年，倾向于地主阶级的省议会成立。尽管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议会席位却主要由波兰人把持，乌克兰人只占有1/5的席位。

因为对奥地利帝国不再抱有希望，一些乌克兰人把目光投向东方。尽管一些人，尤其是老一辈比较亲俄罗斯——俄罗斯保护邻国的斯拉夫人的渴望，以及俄罗斯人是值得信赖的反波兰盟友——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更广泛的鲁塞尼亚（乌克兰）观念正在形成。加利西亚的鲁塞尼亚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强调自己与边界另一边的“小俄罗斯人”的共同点。那些认为自己与“小俄罗斯人”相似而与“大俄罗斯人”不同的加利西亚人被称为民粹派（narodovtsi）。和19世纪30年代的鲁塞尼亚三人小组一样，他们想把乌克兰语发展成为现代的书写文字。鉴于舍甫琴科的文学成就和他对农民（narod）的关注，许多人转而从他那里寻求启发。民粹派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剧团、经济合作信用社、运动队和文化组织，包括普罗斯维塔（Prostiva Society，启蒙社，1868）和舍甫琴科学社（1873），后者的成立得到了东乌克兰人的情感与财政支持。

对初生的鲁塞尼亚（乌克兰）人的觉醒，各方反应不一。波兰人认为这是希腊天主教会教士们的阴谋，而讽刺的是，许多俄罗斯人视其为波兰人干涉俄罗斯对波兰土地施加影响的策略。亲俄罗斯派拒绝接受“鲁塞尼亚主义”，认为其筑起一堵墙，会隔断与俄罗斯之间长期的文化、语言与血缘联系。不过奥地利当局开始担心波兰的民族主义以及俄罗斯在东方的威胁，因此支持本地区的乌克兰中心主义以对抗亲俄罗斯派。到19世纪90年代，尽管波兰人反对，乌克兰语成为了学校教育语言。虽然如此，尽管被称为民粹派，崛起中的文化知识分子与乌克兰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还是很有限的。[①]

---

① Subtelny, 2000, p. 321.

在乌克兰开始文化复兴的同时，哈布斯堡帝国控制下的乌克兰在19世纪末也出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迹象。早先，维也纳视此区域为食品与原材料，尤其是木材的供应地。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资本开始注入到Boryslav和Drohobych等村落附近油田的开发中。到一战前夕，这些油田产出了占世界总产量4%的石油。到20世纪初，利沃夫的人口已经增加到20万，虽然规模仍然比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以及欧洲的标准要小。不过，乌克兰人只占到本地工人阶级（1902年为23万人）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和犹太人。[①] 农村依然普遍贫穷。一些农民开始用激进的怠工和其他行动来反抗地主阶级，而另一部分人因为感觉翻身无望而背井离乡。1890年到1914年间，有717 000乌克兰人离开奥地利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形成了海外乌克兰移民群体的第一次浪潮。[②]

71

四、民族的觉醒：从鲁塞尼亚人到乌克兰人

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乌克兰开始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转轨”。在19世纪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之前卢森尼亚人或鲁塞尼亚人的自我定位，开始使用新的称谓——乌克兰人，这次称谓的改变是现代乌克兰民族认同的胜利。[③] 这个新称谓十分重要，它强调了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境内所有乌克兰语使用者的共同性，主张乌克兰和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一样，也是一个民族，这与19世纪早些时期的文化表述和民族“表达”已经截然不同。19世纪90年代，乌克兰的活动家们（尽管只占人口的很少部分）提出了把乌克兰独立作为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最终目标。

与在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民族认同被当局所接受。1893年，奥地利政府承认了由东乌克兰人潘特雷蒙·库里什（Panteleimon Kulish）发展的乌克兰书面文字作为加利西亚学校

① Subtelny, 2000, p. 312.
② Yekelchyk, 2007, p. 61.
③ Yekelchyk, 2007, p. 62.

的正式教学语言。到1914年，加利西亚已经有超过2 500所乌克兰语小学和16所国立及私立高校。标准化语言教育成为塑造民族认同和缔造新一代民族活动家的决定性因素。[①] 乌克兰语出版物也得到了出版许可，到20世纪初已经有70份乌克兰语刊物发行。此外，安德烈·舍普蒂茨基（Andrei Sheptytsky）在1900年成为希腊天主教领袖。虽生于波兰贵族家庭，但他支持乌克兰民族建设的努力。这一事件体现了乌克兰民族运动世俗性的变化，再次确认了教会仍然是乌克兰民族认同的支柱。

到19世纪90年代，乌克兰民族政治运动开始在政治上成形。其中一个原因与60年代相似，那就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他们只能在加利西亚的杂志上自由发表观点，对加利西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社会主义者德拉戈马诺夫的观点就深深影响了激进党（1890）的创始者。1895年，激进党要求乌克兰自治与最终独立。1899年，相对温和的民族民主党成立，把独立作为最终目标，但在短期内则希望把加利西亚分割为西部（波兰）和东部（乌克兰）两部分。民族民主党成为加利西亚最受欢迎的政党。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899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代表本地区规模依旧很小、但正逐渐壮大的工人阶级利益。依赖互相之间的经济协助、期刊、青年社团和读书俱乐部，这些政党开始动员大众为民族主义诉求而斗争。1907年，奥地利政府开始实行男性普选权，乌克兰政党在加利西亚赢得了22个席位（民族民主党17席，激进党3席，社会民主党2席），而亲俄罗斯派只得到2个席位。但是在倾向于地主精英阶层的加利西亚省议会中，波兰人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加深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对立。大学校园中对立团体之间的争吵也很普遍。1908年，乌克兰学生米罗斯拉夫·斯琴斯基（Myroslav Sichynsky）刺杀了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总督。

72

---

① For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ionalism, see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乌克兰人的觉醒得到了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他是东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1894 年被聘为利沃夫大学第一位乌克兰史教授。格鲁舍夫斯基的多卷本著作《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把乌克兰的历史追溯至基辅罗斯时代，并认为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正如第二章中所述，这对于整个乌克兰民族观念来说是异常关键的。威尔逊写道：

> 将罗斯重命名为"乌克兰—罗斯"后，乌克兰人再也不必把古老的哥萨克浪漫传说当作他们认同的基础了。格鲁舍夫斯基之后，他们可以扭转旧的主流观念，宣称他们的文化比俄罗斯人的还要古老——俄罗斯的文化只不过是窃取了乌克兰人一开始就应该享有的权利。[①]

73 格鲁舍夫斯基很快成为文化和政治的知名人物，帮助改造舍甫琴科学社，使之成为类似于乌克兰科学院的机构，[②] 团结了一批来自俄罗斯和奥地利—匈牙利的学者，同时也邀请了许多知名的欧洲学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德拉戈马诺夫的学生伊万·弗兰科（Ivan Franko，1856—1916）是当时乌克兰最多产的作家，创作了小说、诗歌、讽刺作品、心理分析短剧和社会评论等作品。其社会主义思想可见于小说如《大蟒》（*Boa Constrictor*）和《鲍里斯拉夫在笑》（*Boryslav is Laughing*），后者描写了石油工人生活中遭受的残酷对待。但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他和格鲁舍夫斯基一起加入了民族民主党。利沃夫国立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乌克兰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研究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与波兰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空间"，而且乌克兰人在种族上和俄罗斯人并不相同。和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人不同，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不满足于从文化上表达自己。他们有

① Wilson, 2000, p. 109.

② Serhii Plokhy, *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着清晰的政治议程，这一点通过采用作家尤里安·巴钦斯基（Yuliian Bachynsky，1870—1940）的口号“乌克兰人、独立、合众国”得到充分体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活动家们成功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加利西亚并没有被分割，那里依然没有乌克兰语的大学，[①] 除了产出重要的谷物外，乌克兰人也无法在公共生活和教育领域享受到和波兰人平等的待遇。普通乌克兰农民的民族自觉意识依然较浅；在社会经济方面，乌克兰人的地位仍远比德语居民、波兰人和犹太人低下。和波兰或匈牙利的民族主义相比，乌克兰民族主义缺乏对大众的动员力。统一所有乌克兰人土地的长远梦想依然显得那么遥远，甚至连格鲁舍夫斯基在19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以“加利西亚与乌克兰”为标题，意为分裂的乌克兰领土也许注定无法复合。[②]

尽管如此，到了20世纪初，由于格鲁舍夫斯基等乌克兰人的努力，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一种乌克兰民族的政治自觉感逐渐形成。1900年，基辅仍然在法律上禁止出版乌克兰语的书籍，但在利沃夫已经出现了乌克兰语学校、学会、报纸、合作社和政党。1907年，波兰—犹太人将军威廉·费尔德曼（Wilhelm Feldman）写道：“20世纪目睹了众多在废墟上新兴的民族，但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奥地利的乌克兰人那样如此快速和充满活力地复兴……他们出人意料和生气勃勃的成长主要在于他们的自助和奋斗。”[③] 为了纪念19世纪末乌克兰民族运动领军人物的历史功绩，今日乌克兰的货币格里夫纳（hryvnia）上镌刻着他们的头像：弗兰科（20格里夫纳纸币）、舍甫琴科（50格里夫纳纸币）、格鲁舍夫斯基（100格里夫纳纸币）和作家莱西雅·乌克兰卡（200格里夫纳纸币）。

---

① By 1900, only about 30% of the students of Lviv University were Ukrainian, and there were only 8 Ukrainian professors out of 80 total faculty in 1911. Hrushevsky's appointment, interestingly, occurred because of a compromise between Poles and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o create an additional Ukrainian professorship at the university. See Subtelny, 2000, p. 326.

② Wilson, 2000, p. 118.

③ Quoted in Subtelny, 2000, p. 329.

五、区域差异：特兰斯卡帕提亚与布科维纳

前文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加利西亚的情况。加利西亚是哈布斯堡帝国内乌克兰人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人口比例上来说最“乌克兰”的地区。如前文所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勃兴主要发迹于加利西亚地区，格鲁舍夫斯基1906年称之为“乌克兰的皮埃蒙特（Ukrainian Piedmont）”。皮埃蒙特原指19世纪中期意大利民族主义发源地皮埃蒙特地区，此时已经成为意大利统一与真正的民族主义信仰的守护者。 74

而特兰斯卡帕提亚（匈牙利罗斯）则与加利西亚形成有趣的对比。在加利西亚，亲乌克兰和亲俄罗斯的运动产生于19世纪，但本地例外主义，即斯拉夫人定居此地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卢森尼亚”认同感，依旧十分强大。[①] 尽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强调本地区与基辅罗斯时代的联系，但“卢森尼亚”历史观则认为本地区直到15世纪为止都是由一个独立的王国所统治的，后来才被匈牙利人征服。政府试图把本地人变为好的匈牙利人，可本地人却期望成为乌克兰人，因此不得不进行抗争。他们的努力不断失败，主要归因于当地知识界的绝大部分直到1914年还在使用匈牙利语，而且学校也倾向使用匈牙利语为教学语言。比起奥地利人，匈牙利人统治的宽容度比较低，选举也往往被操纵来打压非匈牙利人。由于被喀尔巴阡山切短了与乌克兰的其余部分的联系[②]，特兰斯卡帕提亚与今日的西乌克兰其他地区相比，民族认同比较薄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兰斯卡帕提亚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直到1945年才被苏联的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并入。直到20世纪90年代，此地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支持仍然较弱，其选民甚至在1991年通过一项设立特别自治区的方案（没有被

---

① The classic on Rusyns is Paul R. Magocsi,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 Subcarpathian Rus , 1848—19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Today, the region is called Transcarpathia (Zakarpatia), meaning beyond the Carpathians. This would be the perspective from Lviv, St. Petersburg, or Kiev.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apest or the local Rusyn movement, it made more sense to refer to the region as Subcarpathia (Pidkarpatia), below the mountains.

实施）。时至今日，在特兰斯卡帕提亚仍然存在卢森尼亚和匈牙利的政治文化运动。

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另一块乌克兰土地为布科维纳，是一块长时期内为斯拉夫人、奥斯曼人和罗马尼亚人所争议的地区。许多罗马尼亚人认为布科维纳历史上就是罗马尼亚王国的一部分，并且是西欧阻挡东方斯拉夫部落进攻的最前线。而乌克兰人则认为早在成为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王国领土之前，布科维纳就是基辅罗斯及其后来加利西亚—沃伦王国的一部分。罗马尼亚人于 1359 年开始控制南布科维纳，但整个布科维纳在 1514 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1775 年为哈布斯堡帝国所占领。

75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布科维纳民族成分混杂，主要由乌克兰人/鲁塞尼亚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尽管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但乌克兰人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1] 毗邻加利西亚的北布科维纳比较乌克兰化；而南布科维纳则罗马尼亚化一些，其首府切尔诺夫策（Chernivtsi，德语为 Czernowitz）是整个帝国最为文化多元化的城市之一。由于有数量较多的德语人口和犹太人，“政治的奥地利主义”在此地得到了比在加利西亚更多的响应。和加利西亚一样，罗马尼亚人是土地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乌克兰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但和加利西亚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群之间的语言差异很大（罗马尼亚语更接近意大利语，而不像波兰语那样是斯拉夫语的一支），不过他们都信仰东正教。虽然 1858 年独立的罗马尼亚国家的成立使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得到了很大的激励，但罗马尼亚的领土统一主义受到维也纳的抵制，而且罗马尼亚人也缺乏像波兰人那样的政治影响力。到 19 世纪末，乌克兰语学校的数量开始超过罗马尼亚语学校，1875 年切尔诺夫策大学设立了鲁塞尼亚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职位。在这一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受到加利西亚的启发，纷纷在布科维纳组建自己的组织，并于 1907 年帝国大选中赢得了席位。第一次世界大战

---

① Wilson, 2000, p. 115.

后，整个布科维纳都被罗马尼亚所控制。当地乌克兰农民忍受着新主子的观念，认为乌克兰人其实是忘记自己民族性和母语的罗马尼亚人。布科维纳（与紧邻的南比萨拉比亚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并入苏联。罗马尼亚对这次兼并中持争议态度，但在1997年与乌克兰签订条约时承认了彼此之间的边界。今天，大部分布科维纳地区成为乌克兰切尔诺夫策省的一部分，只有少量罗马尼亚人仍然生活在这里。

六、乌克兰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乌克兰人夹在俄罗斯与奥匈帝国之间，所以对乌克兰人的关注经常导致19世纪罗曼诺夫王朝与哈布斯堡两大帝国之间的紧张状态。俄罗斯宣称拥有帝国之外所有斯拉夫人命运的特殊利益，对于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特兰斯卡帕提亚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无时无刻不想兼并这些“俄罗斯的”土地，并清除在他们看来是从境外蔓延进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根源。[1]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导火索是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德大公被一个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刺杀，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欧洲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与两大对抗的军事联盟。俄罗斯和奥匈帝国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围绕巴尔干半岛问题针锋相对。到1914年9月，凭借人数上的优势，俄罗斯占领了东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全境。

76

许多乌克兰人欢迎这场战争，纷纷加入两个帝国的军队中参与作战。有些人认为，面对战争爆发之际俄罗斯国内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人有可能是在伪装自己的热忱，而西乌克兰的领导人物欢迎这场战争的原因在于他们期望能够给予俄罗斯沉重的打击，以便建立起一个对乌克兰人较为有利的政治秩序。奥匈帝国的乌克兰政党领导人成立了乌克兰总拉达（Supreme Ukrianian Council），宣布其领导下的人民对皇室的忠诚，号召组建单独建制的乌克兰军队来打击沙皇俄国的军队。有超过28 000人志愿报名，但出于对

① Yekelchyk, 2007, p. 64.

组建全部是乌克兰人的军队的疑惧，这支军队被最终压缩为约 2 500 人的乌克兰塞契射击兵。

在战争中，乌克兰人的处境非常糟糕。由于加利西亚是东线规模最大也是最血腥的战场，所以平民百姓遭受严重损失。处在不同阵营的乌克兰人也被迫自相残杀。当俄军进军时，由于被波兰地方行政当局告发为叛国罪，许多乌克兰农民和教士被当做俄军间谍而被撤退中的奥军施以报复。一些人未经审判便被处以极刑；另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被关进奥利地的集中营，许多人死于恶劣的环境中。而俄罗斯占领军从不信任任何乌克兰的事物，关闭了乌克兰的文化组织并将乌克兰活动分子流放到俄罗斯。俄罗斯还取缔了乌克兰语，换俄语为学校教学语言，并打击希腊天主教的地位，把教士发配到俄罗斯再用东正教牧师取而代之。当地俄语居民欢迎这些举措，俄语媒体欢呼俄军“重归”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等“俄罗斯旧有的领土”。俄罗斯在加利西亚的行径如此残酷，以至俄罗斯政治家帕夫洛・米柳科夫（Pavel Miliukov）在俄罗斯议会（杜马）上公开指责其为“欧洲的丑闻”。[1]

在东方，俄罗斯帝国的内部也开始了对乌克兰组织的镇压。格鲁舍夫斯基被认为是政治领袖和文化名流，因而在他于 1916 年返回基辅时被逮捕，流放到俄罗斯北部。沙皇的外交大臣声称“永远根除乌克兰运动的最好时机现在来到了”[2]。

77

1915 年，奥地利发起军事反攻的时候，当局也试图借机利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他们资助了一批从俄罗斯流亡来的社会主义者，作为沙皇统治下乌克兰人的代言人。这批人被组织起来，称为乌克兰解放同盟，他们在维也纳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在乌克兰裔俄罗斯战俘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在一些欧洲国家派驻了全权代表。同盟号召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但这仅限于在俄罗斯控制之下的乌克兰，而不包括东加利西亚。乌克兰总拉达更名为全乌克兰拉达，宣布了类似的计划，

① Subtelny, 2000, p. 343.

② Subtelny, 2000, p. 343.

促进俄罗斯治下乌克兰的独立和加利西亚的自治。[1]

莫斯科和维也纳双方都感到战争的负担越来越难以承受，尤其是俄罗斯，败仗与伤亡数量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两国少数族群的活动却越来越活跃。1915 年，当俄军撤出加利西亚时，他们在当地的盟友要么出逃，要么被奥军逮捕。亲俄的少数派被消灭后，乌克兰民族政党意识到维也纳赢得了更有利的地位。奥地利人答应在战争结束后进行有限的改革，可这一承诺对很多人来说远远不够，他们曾指望战争能带来合适的机遇以获得独立。在俄罗斯，半秘密的乌克兰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以争取宪法改革与乌克兰的自治权。到 1917 年，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乌克兰精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属于单一的民族，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并自由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2]。

然而，无论哪一边的乌克兰民族运动都无力推动独立的进程。一战的结束给其他东欧民族（如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带来了建立自己国家的有利环境，乌克兰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随后即被卷入俄罗斯帝国覆灭、1917 年革命与内战的历史大剧中。

---

① Yekelchyk, 2007, p. 65.
② Yekelchyk, 2007, p. 66.

第六章　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尽管乌克兰人的政治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79 但确切地说，直到1917—1918年俄罗斯与奥匈帝国的覆灭才为乌克兰人自由发展民族主义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从1917年到1920年，有数个自称为独立乌克兰国家的政治实体登上历史的舞台，但这一时期是异常纷繁混乱的，革命、对外战争和内战不断，并没有真正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许多派别在乌克兰你争我夺，而且并非所有派别都希望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后来，乌克兰大部分的土地被纳入苏联版图，西乌克兰的一部分则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所分割，乌克兰独立运动夭折。尽管如此，乌克兰已经被整合为地缘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体，而乌克兰统一与独立的梦想也保存下来。因此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些乌克兰人便声称克兰实际上拿回了70多年前曾经失去的东西。

一、1917年革命

1917—1920年被称为乌克兰历史中的“乌克兰革命”时期。应该 80 强调的是，革命开始于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彼得格勒（Petrograd），其俄语名称（同今日）为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食品短缺、反战情绪及对沙皇当局日渐增长的仇恨，引发了1917年3月8日的街头游行

示威（当日按俄历为2月23日）。当地驻军队站在了游行者一边，沙皇丧失权威，被迫退位。杜马中的自由主义者成立了临时政府，而激进的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人数更多，他们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俄语意为“大会”），与临时政府争夺权力。其他城市，例如哈尔科夫和基辅也纷纷成立了苏维埃。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处在非常脆弱的平衡中，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形成了所谓的“二元政权”局面，再加上不断恶化的经济问题和俄军在一战中的军事失败，所有这些都成为民众不满的助力。

而在乌克兰，可以说存在着“三元政权”，主要指全俄罗斯的临时政府、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及民族主义者。[①] 就在沙皇退位后的2天及基辅苏维埃成立1天后，乌克兰渐进主义者协会（Society of Ukrainian Progressives）的活动家们于1917年3月17日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乌克兰中央拉达（乌克兰语意为“议会”），流放归来的著名历史学家格鲁舍夫斯基被选为主席，已经可以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的乌克兰政党向中央拉达派出代表。

沙皇政府的垮台带来了乌克兰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复兴。在中央拉达，不同的政治党派发表自己的意见。乌克兰社会主义—联邦主义党是最为温和的政党，它号召在俄罗斯国家内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同时反对获取更多的领土。格鲁舍夫斯基加入的乌克兰社会主义革命党则要求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以迎合最渴望土地的农民阶级的需要。乌克兰社会主义革命党成为乌克兰最大的政党，通常与俄罗斯帝国的其他社会主义革命（SR）党派相联合。更倾向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中包括一批青年激进分子，例如弗拉基米尔·温尼琴科（1880—1951）和西蒙·彼得留拉，后者从一名神学学生转变为热血的民族主义者。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教育和文化社团、经济合作社及报纸也重新出现，乌克兰活动家希望用各种方式来动员大众为其政治

81

①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8.

理想服务。4 月 1 日，有约 100 000 人高举乌克兰蓝黄双色旗在基辅游行，要求实行自治。1 周后，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将于第二年 1 月召开的全俄罗斯制宪大会应该承认乌克兰的自治权。夏季，当临时政府许可成立民族军队的时候，旧俄军队中有 300 000 士兵对中央拉达宣誓效忠。中央拉达在争取乌克兰更多权利的同时，试图通过土地改革和结束战争等口号赢得大众的支持。

然而中央拉达并非由选举产生，一开始的规模也不大，主要由教师、教士、学生和乌克兰文化界的代表组成。换句话说，它还不能代表整个乌克兰社会。不过中央拉达也尝试着扩大自己的基础，在 4 月 17—21 日间召开的全乌克兰民族议会吸引了 1 500 人参与者。[①] 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只有在其民族领土之上实行自治，才能满足乌克兰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但这份宣言并非要求独立地位，相反，它宣称乌克兰应该成为一个改革后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的组成部分。1917 年的春季，中央拉达帮助组建了其他的代表大会（如第一乌克兰农民大会、第一乌克兰工人大会），这些代表大会同样宣布争取自治权与保护乌克兰语。到了夏季，几经扩大的中央拉达已经有超过 600 名代表并成为事实上的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的集会地点在基辅教育博物馆，馆里悬挂舍甫琴科的画像以及用写有“俄罗斯联邦下自治的乌克兰万岁”字样纹章装饰的乌克兰旗。[②]

中央拉达对自治权的诉求被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所拒绝，原因之一在于临时政府注意到中央拉达并非由选举产生，因此无权代表所有乌克兰人民。作为回应，中央拉达于 1917 年 6 月 23 日签署了第一份乌尼维尔萨尔（Universal，此名称源自哥萨克盖特曼所使用的“政令”一词），单方面宣布乌克兰自治。乌尼维尔萨尔宣布：

乌克兰将成为自由的乌克兰。在不同整个俄罗斯分裂、不割断与俄国联系的前提下，乌克兰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权自己安排自己的

---

① John Reshetar,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1917—1920: A Study in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2), p. 49.

② Reshetar, 1952, p. 64.

生活。让全民、平等、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选举出的全民乌克兰大会（议会）去决定在乌克兰应实行的秩序与制度……从现在起我们将自己来创造我们的生活。[①]

82　可这份声明在很多方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中央拉达缺乏对乌克兰领土的权威影响力，并且依靠志愿缴纳的税款来填补巨额消耗。就像乌克兰模糊的边界一样，中央拉达没有对什么是“自治”给出明确的阐释。临时政府先是试图忽视第一份乌尼维尔萨尔，后来呼吁“兄弟的乌克兰人民”不要“因为不谨慎而踏上颠覆自由俄罗斯力量的道路”。[②] 尽管如此，中央拉达依然坚持了下来，组建了由社会主义者温尼琴科领导的总书记处（实际上相当于政府内阁）。在东线被奥匈帝国和德国打得接连失败的临时政府此时正处于政治上的守势，虽然拒绝承认中央拉达，但承认了总书记处在 9 个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区域中的 5 个——基辅、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波多利亚和沃伦——的权力，这 5 个区域都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同时，包括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也在下一轮中央拉达的扩大中获得了超过 1/4 的席位。

7 月，城市及其地方议会的选举开始了。乌克兰政党在乡下的发展势头不错，但在主要由俄罗斯裔和犹太人居住的大城市中只拿到不到 10% 的选票。乌克兰政党在俄罗斯化的东乌克兰进展尤为不顺，东部的工人阶级人口较多，自然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党派。在基辅，乌克兰政党只拿到不到 20% 的市议会席位，而一些反乌克兰政党，例如小俄罗斯果戈理联盟（Gogol League of Little Russians）和俄罗斯民族联盟（Russian National Union）则积极反对在学校中使用乌克兰语。基辅大学校长认为中央拉达的举动是危险的，并表示了谴责。[③] 然而最为致命的是总书记处拒绝实行土地改革，因此未能满足农民最强烈的

① Quoted in Reshetar, 1952, p. 61。本段文字的翻译参考《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第 299 页，赵云中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 Reshetar, 1952, p. 64.

③ Reshetar, 1952, p. 137.

需求。农民对所谓自治权等抽象概念并不关心，只对自身的经济地位感兴趣。[1] 到 1917 年的秋季，农民已经普遍地采取暴力方式夺取土地。而且，除了基辅和其他主要城市中围绕政治权力的明争暗斗外，农村中的秩序失控仍然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温尼琴科和信奉“摧毁国家”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其他乌克兰领导人没有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民族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尽管有众多争夺权力的机构，甚至可以说恰恰因此，乌克兰仍然处于政治的真空状态。

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屡见不鲜。1917 年 11 月（俄历 10 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彼得格勒的权力。在基辅，乌克兰中央拉达领导的军事力量帮助布尔什维克党战胜了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接着，中央拉达便宣布对所有乌克兰 9 个省份的主权，11 月 20 日的第三份乌尼维尔萨尔宣告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为未来俄罗斯民族民主联邦的自治单位。乌克兰的国旗、国歌、标志和货币也相应颁布和发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在后来苏联解体后又重返历史舞台。

83

上述事件导致乌克兰爆发内战。在东部获得巨大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拒绝接受乌克兰的独立。1917 年 12 月，布尔什维克党召集的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试图推翻中央拉达，但没有成功。12 月 25 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哈尔科夫成立了忠于列宁政府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Soviet Ukrainian Republic）。来自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乌克兰军队一同进军基辅。尽管规模不大，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不但组织有序，而且通过支持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获得了许多乌克兰人的支持。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则虚弱得多，特别是不具备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基辅，亲布尔什维克的的工人起义爆发，经过异常惨烈的战役和无数乌克兰学生志愿者丧身沙场后，布尔什维克党于 1918 年 2 月占领了基辅。中央拉达在仓促颁布取消土地私有的法令

---

①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4—126.

后，逃往西北的日托米尔（Zhitomir）。

中央拉达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从 1917 年 12 月起，它与挺进中的德国军队进行秘密谈判，以期缔结和平条约。德国和奥匈帝国自然乐于见到俄罗斯帝国被肢解，沦为东方的弱小国家。虽然只有完全独立的国家才有资格签订国际条约，但中央拉达还是在 1918 年 1 月 25 日签署了第四份乌尼维尔萨尔，谴责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传播“混乱、屠杀和犯罪”，正式宣布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为“乌克兰人民的独立的、不从属于的、自由的主权国家”。[1] 1918 年 2 月 9 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与德国和奥地利签订了和平条约，条约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对乌克兰 9 省的权力，但条约附加的秘密条款却规定乌克兰须向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提供给养。为了回报乌克兰人“现实的态度”，德国在与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的谈判中施加压力，要求其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从乌克兰撤出军队并停止建立乌克兰苏维埃政权。[2] 布尔什维克在基辅和各地处决了上千名“阶级敌人”后，于 1918 年 4 月撤离乌克兰。许多领导人逃往俄罗斯，并在那里成立了乌克兰共产党。

84

二、德国的占领与盖特曼政权

至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转而求助德国和奥地利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尽管格鲁舍夫斯基向乌克兰人保证德国军队将“按照我们政府的需要待到直到乌克兰被解放为止”[3]。虽然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仍然保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它打算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取缔土地私人占有制。后一项改革在 1918 年仓促颁布，显然得不到地主的支持；而在农民方面，由于期望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而对土地国家化表示不满。[4]

---

① Quoted in Reshetar, 1952, p. 111.

② Reshetar, 1952, p. 116.

③ Quoted in Reshetar, 1952, p. 119.

④ Yekelchyk, 2007, p. 73.

这种左倾态度也没有得到保守的德国军方当局的支持，而德国人现在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靠山。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虚弱且“虚拟的国家”①，缺少执行法律、维持秩序的政府，而这对德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需要乌克兰来筹备军粮并运送到德国。1918 年 4 月，德国控制了铁路系统，取消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关于土地制度的法令，还下达戒严令。与此同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一项协议，包括 7 月份前向德国和奥匈提供 100 万吨谷物。温尼琴科不禁哀叹道，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已经遗忘了“你必须哼唱你搭乘的车主人爱听的曲子”这句谚语。②

显而易见，中央拉达无力兑现这份协议。德国启动了后备计划，开始与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1873—1945）接触，讨论在乌克兰建立君主制，以及授予其王爵的可能性。斯科罗帕茨基讲俄语，是前沙俄将军，为 18 世纪哥萨克盖特曼的后代。对此，斯科罗帕茨基表示同意。1918 年 4 月 29 日，保守派乌克兰农人代表大会宣布其为乌克兰盖特曼，旧时哥萨克的称号被重新启用。就在同一天，中央拉达颁布宪法，并选举格鲁舍夫斯基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统。但 1 天以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便不复存在，格鲁舍夫斯基在同情他的士兵的协助下徒步逃出基辅。

由于德国人的帮助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软弱，尽管有一小部分忠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团进行了轻微的抵抗，斯科罗帕茨基以基本和平的方式获得了权力。斯科罗帕茨基在乌克兰的历史上是富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斥其为德国人的傀儡，是忠于沙皇时代旧传统的反动分子。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当然没错：斯科罗帕茨基依赖德国人的支持恢复了很多旧俄时代的行政体制；他禁止罢工并恢复了检查制度；他的大部分政府成员并不会说乌克兰语，而且许多人支持在革新后的俄罗斯范围内重建乌克兰。中央拉达的所有主要政党均视其统治为非

85

① Wilson, 2000, p. 124.

② Quoted in Reshetar, 1952, p. 119.

法，拒绝与斯科罗帕茨基合作。

然而，最近的学术成果却对斯科罗帕茨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尽管并非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但他按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乌克兰的国家建构，并“致力于引入新的乌克兰民族的概念，这个概念并非基于乌克兰语言，而是建立在对乌克兰国家的忠诚上”。[①] 在他统治时期，政府开办了超过150所乌克兰语中学和2所大学，乌克兰文化和教育得到了发展。斯科罗帕茨基政府成立了乌克兰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乌克兰艺术学院和其他文化机构，许多仍保存至今。在外交政策方面，乌克兰与许多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这些方面来说，斯科罗帕茨基为确立独立乌克兰国家概念的合法性做出了很多贡献。

他的统治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德国人征集粮食的行为使农民的怨恨情绪上升，并导致农民起义。乌克兰民族联盟（Ukrainian National Union）中的政治反对派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巩固，并选举温尼琴科为领导人。到1918年秋季，德国的战败已经逐渐迫近，而斯科罗帕茨基为挽救其统治的措施也最终失败，其中包括与乌克兰民族联盟谈判，以及后来组建亲俄的内阁，以此来博取西方国家的欢心——她们倾向于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温尼琴科和彼得留拉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名称执政内阁（Directory）取自1795—179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督政府，以推翻盖特曼政权。成千上万名农民志愿为督政府而战。意识到风向已变，许多盖特曼政权的部队也相继投诚。1918年12月14日，德国人离开了基辅，斯科罗帕茨基假扮成受伤的德军士兵，和德国人一并撤离。

三、西乌克兰的发展

如前一章所述，西乌克兰的部分土地，包括加利西亚历史上的一部分曾隶属于奥利地—匈牙利（哈布斯堡）帝国。因此当俄罗斯帝国崩溃后，这块土地上的乌克兰人至多只是对那些试图摆脱俄罗斯控制

① Ukrainian historian Yaroslav Hrytsak, quoted in Yekelchyk, 2007, p. 74.

的乌克兰人报以同情的态度。

临近1918年末，哈布斯堡帝国面临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最终命运，当局表示愿意与帝国的少数民族妥协，就像1918年10月所做的那样，来换取保留一个自由的民族联邦。10月8日，来自帝国和省议会的代表与主要政党的代表在利沃夫成立了乌克兰民族委员会（Ukrainian National Council）。就在大战结束前几天，乌克兰民族委员会于11月1日宣布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86

可是，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遭到了同样有领土和民族抱负的波兰的反对。波兰人在包括利沃夫的所有城市中人口占优，因而宣布对加利西亚的所有权。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巷战于11月打响，到11月22日，波兰人把初生的西乌克兰政府逐出利沃夫。这场冲突酿成了乌克兰与波兰的全面战争，后来发展为苏波战争。大约在同一时期，以乌克兰人为主的布科维纳和特兰斯卡帕提亚被扩大后的罗马尼亚与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所占据，这一事实被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所肯定。

不过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因此消失。多半是由于奥地利人统治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乌克兰人组织良好的市民社会，并且团结一致对抗世敌波兰人。共和国军队中还留用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军官，有趣的是有2个总司令还是前俄罗斯将军。

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也向东方寻求支持，希望与前沙俄治下的乌克兰国家进行联合。盖特曼政权已经垮台，意味着相对保守主义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在关键领域上只能求助于左翼人士主导的执政内阁。执政内阁此时已取代盖特曼政权重建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9年1月22日，两个乌克兰国家正式合并，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成为扩大后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西部省份。但出于军事形势的考虑，西部区域实际上保留了自治权和自己的法律。

这个国家“身处东方布尔什维克和西方波兰人的枪炮声之下”①，一直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在西部，乌克兰加利西亚的军队向波兰人

① Yekelchyk, 2007, p. 77.

发起反攻，遭到了失败。部分原因在于波兰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协约国的支持，以在东方制衡德国和布尔什维克俄国。尽管英国人更加同情乌克兰人，然而决定权却在美国人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巴黎和会的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诺德·马尔格林（Arnold Margolin）说，美国人“对乌克兰的了解和一般欧洲人对无数非洲部落一样贫乏”。[①] 美国人选择站在波兰人一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并没有应用到乌克兰的土地上。

87 为了击败乌克兰人，波兰调集在法国训练且装备齐全的 10 万大军攻打乌克兰军队，而这支军队本来是准备对付布尔什维克的。由于土地改革迟迟未能展开而导致的农民起义，加上西乌克兰主要工业中心德罗戈比奇（Drohobych）爆发亲布尔什维克的起义，都削弱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9 年 6 月，就在《凡尔赛和约》将加利西亚的控制权“暂时”移交给波兰人后，乌克兰加利西亚的残余部队渡过了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传统边界——兹布鲁赤河（Zbruch River）。

西乌克兰向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寻求支持，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中提及。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自己也在多个阵线上节节败退。两个乌克兰政府有各自的地缘政治重心。西乌克兰人希望东部的同胞能够帮助他们抗击波兰人，而执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内阁领导人却把波兰人看做对抗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同盟军。在 1919 年大部分时间内，乌克兰加利西亚军队的确与执政内阁在同一阵线上并肩战斗，甚至在 8 月末占领了基辅。因为在更大的“俄罗斯”内战中分别与红色（共产党人）和白色（反共产党人）军队经历大战，加之严重的伤寒病大面积流行，乌克兰加利西亚军队最后于 11 月向白军投降。与此同时，与乌克兰执政内阁单独媾和的波兰军队深入西乌克兰，占领了沃伦州和波多利亚地区。

---

① Arnold Margolin. *From a Political Dirary: Russia, the Ukraine, and America, 1905—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41.

1920 年，尽管波兰与苏维埃的军队开始在西乌克兰交火，波兰军队甚至在 5 月到达了基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已经无法重振旗鼓了。苏维埃军队最终迫使波兰军队后撤，并通过 1921 年 3 月的《里加条约》承认了波兰对加利西亚和西沃伦州的控制。

四、执政内阁与内战

当执政内阁于 1918 年 12 月进入基辅时重建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可重建后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却与之前的共和国不同，既没有重开中央拉达，也没有邀请格鲁舍夫斯基返回政治舞台。相反，由 5 人组成的执政内阁掌握最高行政权和立法权，并行使类似于今天军政府似的统治。执政内阁主要由来自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 2 位领导人控制，一位是曾参与前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温尼琴科，一位是更为民族主义倾向的彼得留拉。

温尼琴科试图使执政内阁左倾化，提议没收大地产并将工厂交由工人控制。1919 年 1 月，执政内阁在基辅召集了劳工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非经选举的议会组织并执行批准政府决策的任务。执政内阁将乌克兰语定为官方语言，宣布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出来。如前文所述，1919 年 1 月，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在基辅组织集会，正式将东西乌克兰共和国合并为一个国家。

88

正如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样，乌克兰执政内阁的主要问题在于恶劣的军事环境。乌克兰的局势依然尘埃未定，甚至可以说混乱无比。自封为盖特曼或奥塔曼尼（otamany，据传说有些是女性）的农民军占领了大半农村地区，其中最有势力的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涅斯托尔·马赫诺（Nestor Makhno）领导的一支力量。此人非常出名，曾颁布自己的货币制度，但同时发表一份免责声明，允许任何人制造假币。[1] 为了驱逐布尔什维克，法国军队在敖德萨登陆以支援白军，而布尔什维克重新集结军队并从北部进军，这也许是最严重的情况，因此温尼琴

① Wilson, 2000, p. 125.

科试图与布尔什维克谈判，但以失败告终。规模更大的农民军此时站在执政内阁一边，反对盖特曼政权对农村卷土重来。1919 年 2 月，基辅由布尔什维克党控制——这一事件在出生于基辅的小说家米哈伊洛·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1891—1940）所撰写的小说《白卫军》(*The White Guard*，1924）一书中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乌克兰也成为俄罗斯内战的主要战场。而所谓俄罗斯内战这一表述明显有失公允，忽略了卷入这场战争中的很多力量并非俄罗斯人这一事实。

基辅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后，彼得留拉成为执政内阁的主席。为了赢得盟友的支持，彼得留拉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组建了非社会主义的内阁。然而这项举措并没有赢得协约国的信任，他们把赌注押在更有希望的白军一边。1919 年 4 月，当波兰军队进入西部并将乌克兰加利西亚军队逼退到东部时，执政内阁全面撤退到西部，将乌克兰大部分土地拱手让与布尔什维克和白军。其他人，例如格鲁舍夫斯基支持与布尔什维克党谈判，以保留某种形式的乌克兰自治，而至今在俄罗斯仍被视为土匪的彼得留拉则拒绝走这条路。

在红军的控制下，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行使对乌克兰领土的管辖，俄语重新成为教学和行政语言。征粮队被派往农村征收粮食，农民被迫加入国家经营的集体农庄。在城市中，秘密警察组织契卡（Cheka）四处搜寻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许多地方，尤其是乡下并不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农民们希望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非加入集体农庄，而农民起义——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直接与外国势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白军作战——的扩散变得更为严重。

89

1919 年，在一片喧嚣混乱之中，乌克兰各地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导致 30 万犹太人丧生，酿成纳粹欧洲之前对犹太人最大规模的暴行。所有的势力——白军、红军、奥塔曼尼和执政内阁——对此都负有责任。尽管有观点认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对待少数民族的记录较佳”，并且是历史上第一个成立犹太人事务部的现代国家，以及致力于保护犹太人的文化权利，但有史料证明大屠杀很大一部分是在彼得留拉执

政内阁军队的指使下进行的，这使他与赫梅利尼茨基一样，在成为乌克兰历史伟人的同时被世界犹太民族所谴责。彼得留拉于1926年在巴黎被一名曾在红军中服役的犹太人所刺杀。尽管刺客手持冒烟的枪支站在彼得留拉的尸体上，经过3周的审判他被宣判无罪开释。[1]

然而此时，布尔什维克党却无法维持对基辅的控制了。8月，来自南部的白军联合被加利西亚军支持的彼得留拉一起攻占了基辅。白军的目的在于重建统一的俄罗斯，因而无意承认单独的乌克兰国家。他们视加利西亚军队为外国军队，命令其撤军。加利西亚军撤走后，白军废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并在其控制的领土上恢复某些革命前的社会秩序，包括禁止出版乌克兰语作品，把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白军的政策和布尔什维克一样不受欢迎，执政内阁随后对白军宣战。但是乌克兰的军队缺少武器供给，疾病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到11月，正如前文所述，乌克兰加利西亚军队向白军投降。与此同时，在与俄罗斯军队的作战中近乎绝望的彼得留拉与波兰人达成协议，从而导致西部与东部军队的分裂。

正当波兰军队向前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土地进军的时候，执政内阁陷入了分裂，不但受到农民团伙的袭击，财物也被盗窃。曾宣布自己为独裁官的彼得留拉逃往华沙。与此同时，组织良好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在东面击溃白军的抵抗。到1919年12月，红军第三次夺取基辅。布尔什维克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没有采取过于严苛的策略：列宁同意承认乌克兰语的地位，并相对温和地对待农民，把土地分配到他们个人手中。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与个别乌克兰社会主义革命党派别结成联盟，使自己控制的政府多少有了些“乌克兰的面孔”。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建立起对东乌克兰的控制，而实力大为削弱的白军直到1920年11月仍控制着克里米亚。

革命时期的终结篇是1920—1921年发生的小规模苏波战争。身处 90

[1] Yekelchyk, 2007, p. 81, and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Boulder: Westview, 1997), p. 102.

波兰的彼得留拉设法取得波兰人的支持，发动对布尔什维克的征讨。他的举动受到格鲁舍夫斯基和从前的盟友，包括温尼琴科在内的一些人的批评，认为这证明了他执意追求血腥利己的民族主义而放弃社会主义的意愿。温尼琴科毫不留情地称彼得留拉“是病态疯癫的野心狂、被犹太人的鲜血淹没到耳朵根、政治上愚蠢无比……是协约国（西方盟国）恶劣肮脏的角斗士奴隶”。[①] 反俄罗斯的波兰人欣然启用彼得留拉，希望他能建立一个俄波两国间的缓冲国家。波兰和乌克兰军队于1920年5月再次攻占基辅，并最后一次复辟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但到了6月，布尔什维克的红军击退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并把他们一路赶到华沙。在波兰取得一次成功反击后，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波兰人占领东加利西亚和西布科维纳，承认布尔什维克在东部的统治。

五、苏联的成立

乌克兰独立国家的梦想至此宣告破灭。由于具备武装力量、优越的组织、来自俄罗斯后方的支援和对手的虚弱与错误等多方面优势，布尔什维克党人得以控制住大半的乌克兰。尽管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者中不仅有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人——在这里应该回想一下创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时同样十分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建立意味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再次被确立起来。

尽管沙皇的统治和共产主义的中心都在俄罗斯，而且都对乌克兰带来了灾难性的（如果说不是致命的话）损失，共产主义统治却与俄罗斯的君主专制有着很大的区别。共产主义依托一党专制和秘密警察和笨拙的官僚巨人的支撑，建立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集中讨论共产主义统治的种种方面。而本章目的的关键区别在于讨论对乌克兰领土和制度上的统治方式。

在沙俄时期，乌克兰领土被划分为9个不同的省份，而且不存在“乌克兰”这个地区。与1918年的德国人一样，布尔什维克必须承认

① Quoted in Reshetar, 1952, p. 306.

存在着一个被成为“乌克兰”的区域[1]，因此在1919年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技术上来讲，她是一个独立国家，并试图赢得数个欧洲国家的外交承认。这个共和国由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分支乌克兰共产党所领导，它的权威主要由红军的军事存在而得到保障。换句话说，共和国并非是纯正乌克兰人的产物，但是列宁也认识到俄罗斯化的道路走不通，因此必须具备一些乌克兰的成份。列宁酝酿出一项民族政策，允许旧俄境内的非俄罗斯族裔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成为“形式上的民族而内容上的社会主义”，主要用意在于巩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这样，当所谓的独立乌克兰国家于1922年加入苏联时，乌克兰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苏联最初是由4个独立的、民族自我定义的共和国所组成的，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和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2] 苏维埃乌克兰有自己的政府（自然是共产主义的，1934年之前其首府不是基辅，而是更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哈尔科夫），有权控制经济生活，并且建立文化科技机构来促进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Khristian Rakovsky）在1919年到1923年间任苏维埃乌克兰政府领导人。他从否定乌克兰民族存在转变为其文化和制度的捍卫者，并和未来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就独立国家权利问题发生过冲突。[3] 乌克兰的独立地位（公民身份为“苏维埃”一词）得到法律的承认，因此保留了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认同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6年以后的称呼）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从长远角度看，从苏联退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至少按照苏联的思维方式——苏联是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所有的分歧将在

---

①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 1917—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

② As the Soviets gained control over more territory, the number of republics grew, eventually reaching 15.

③ Yekelchyk, 2007, p. 91.

共产主义下逐渐消失，因此退出也是没有必要的。直到 1991 年，苏维埃乌克兰才最终能够行使其从苏联退出的权利。

六、异乡人：波兰治下的西乌克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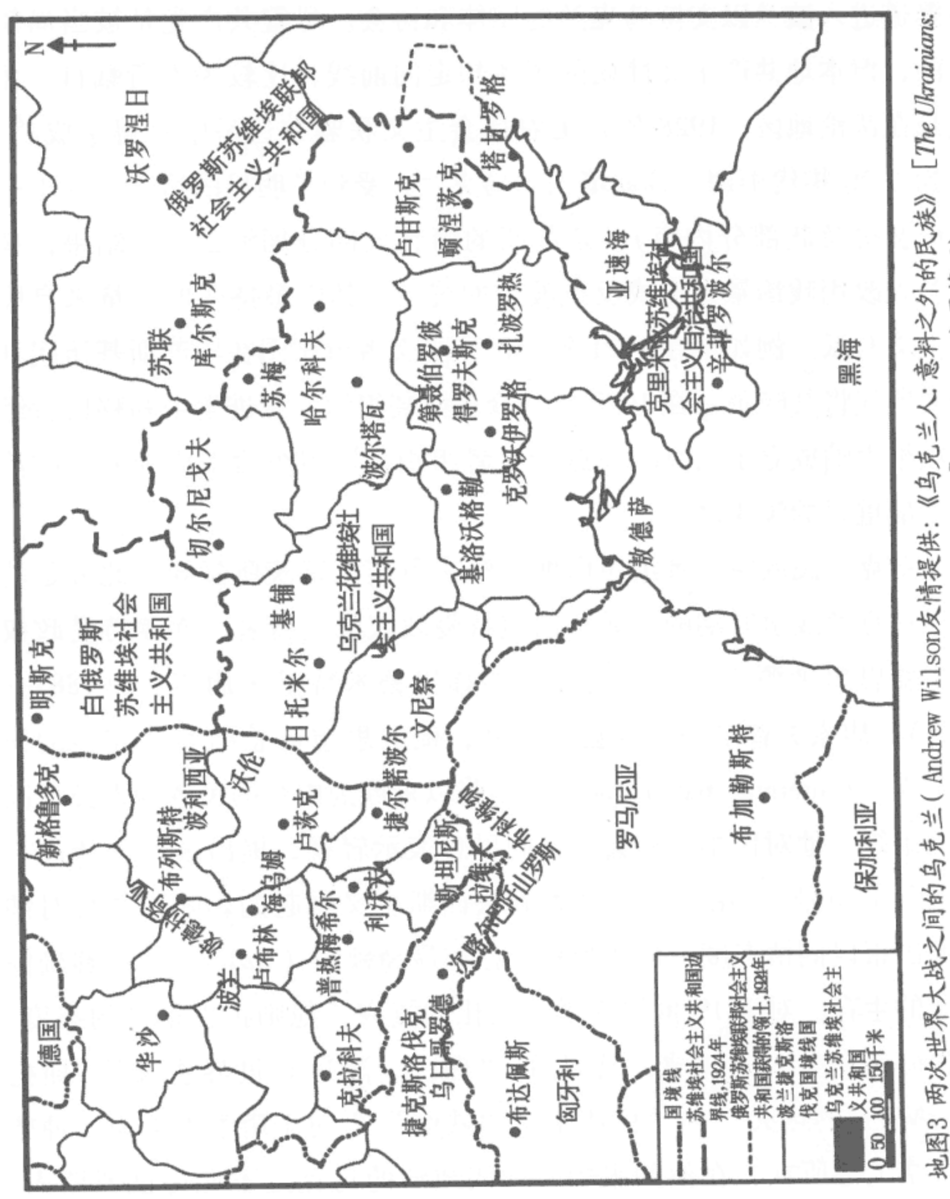
正向前文所提到的，20 世纪 20 年代初，苏联并没有占领今天乌克兰的全境。超过 700 万的乌克兰人做为欧洲最大的、没有祖国的少数族裔生活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境内。奥地利统治时期人口最为稠密的加利西亚和邻近的沃伦州一部分被并入波兰后，有 500 万乌克兰人成为波兰公民。国际联盟不顾乌克兰人对自治的渴求，于 1923 年承认了波兰对这些地区的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被苏联和波兰分割的乌克兰领土。（参见地图 3）

92

正如人们预想到的，许多乌克兰人，尤其是在加利西亚地区的乌克兰人憎恨波兰统治之下的处境。波兰和乌克兰人之间的对立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发酵，而且在 1918 年到 1920 年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也比其他地区更为发展。乌克兰人口占到新建的波兰国家人口的 14%，波兰也向国际联盟承诺将在乌克兰人的土地上实行自治，允许在政府中使用乌克兰语，并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大学。但这些承诺无一付诸实施。尤其是在 1926 年，在对布尔什维克战争中的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波兰变得愈加专制和民族主义。乌克兰语学校被关闭或改用波兰语教学，利沃夫大学的乌克兰语教授的资格——当然和以往一样绝大部分是波兰人——被取消，报纸必须通过审查，乌克兰人被禁止参与政府事务，乌克兰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然也被排除在选举活动之外。东正教堂要么被摧毁，要么改为天主教堂。有超过 20 万波兰人迁居到乌克兰农村，成为政府土地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改革的目的即是要变这些土地为波兰人自己的领地，而华沙政府也开始称加利西亚为“东方小波兰（Małopolska Wschodnia）。[①]”

---

① Anna Reid, 1997, p. 105, and Yekelchyk, 2007, p. 123.



地图3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乌克兰（Andrew Wilson友情提供：《乌克兰人：意料之外的民族》［*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0］，Bookcomp公司修正）

许多乌克兰人抵制政府的上述行为。最大的乌克兰政党——乌克兰民族民主同盟（Ukria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Union）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试图与华沙达成妥协但没有成功，包括受到波兰政府压迫的乌克兰文学社团、合作社和报纸等机构纷纷表示对乌克兰民族民主同盟的支持。结果，公众舆论也渐渐转向鼓励对波兰人采取对抗的态度。一些左派人士力主推动与苏维埃乌克兰合并，而苏联的援助也通过地

下渠道进入波兰以支持乌克兰的团体和协会。尽管共产党是被当局禁止的，但本地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却走向前线，比较为人所瞩目，尤其是在沃伦地区。1928年，工农社会主义联盟在选举中获得了成功。但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境内的乌克兰人受到了明显的迫害（在下一章中会提及此部分内容），亲苏联的情感大部分烟消云散。结果，乌克兰人改用政治暴力形式反抗波兰的统治，其中最持久的力量来自民族主义右派。例如早在1921年，民族主义者就试图在毕苏斯基访问利沃夫期间将其暗杀。在1929年，众多武装组织、激进学生和移民者组织在维也纳成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该组织后来成为波兰政治动荡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94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由耶夫汗·科诺瓦莱茨所领导。此人是波兰—乌克兰战争时期的老兵和前盖特曼政权的支持者，而盖特曼政权的主要思想来源于一个东乌克兰的移民德米特里·唐索夫（1883—1973）。唐索夫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被总结为“完整的民族主义”（intergral nationalism），主张以种族为内容的民族为人类最高一级组织。他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表示轻视，提出了“民族高于一切”的口号。[①] 由于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影响，并且对纳粹德国报以同情态度，他认为只有存在最高领袖（vozhd）才能够确保民族的生存。对于19世纪文学—文化的复兴，他则报以批判的态度，并告诫乌克兰人远离老一辈人的“理性、渐进和世界主义”，拥抱“狂热崇拜的热火”和“民族主义的铁血”。[②] 对于唐索夫来说，种族划分是关键所在，在他的眼中，种族纯洁的乌克兰不允许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的存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获得了乌克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广泛支持。“它强调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和激进的抉择并且创造一个‘超级’乌克兰人种。这些都对那些受波兰人

① Yekelchyk, 2007, p. 127.

② Wilson, 2000, p. 131.

压迫、处于失业中并对老一辈人的失败而幻灭的年轻人有很强的吸引力"。[①]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渗透到经济、教育和青年组织中；渗透到有组织的抗议和抵制波兰货的行动中；渗透到为其宣传活动服务的作家和诗人中。民族主义者组织最为关键的活动主要体现为暴力方式，仅在 1930 年夏季，直接打击农村中的波兰地主阶级的行动就有 2 000 多次。

为了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活动，波兰政府在农村发动了反扑。波兰士兵认为乌克兰村民缺乏合作态度，便对这些人进行殴打；乌克兰的图书馆、艺术品和商店被破坏；因为受到进行肉体惩罚的威胁，乌克兰牧师被强迫公开表示对波兰国家的忠诚；有上千人被捕，许多活动分子，包括波兰色姆（众议院）中的乌克兰人也被审判。作为报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使其活动升级，杀害波兰官员和他们认为不忠于乌克兰解放事业的乌克兰人。波兰内务部长布朗尼斯拉夫·皮拉科（Bronislaw Pieracki）和伊万·巴比（Ivan Babii）——乌克兰高校的校长，禁止学生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都在 1934 年被刺杀，成为影响颇大的案例。波兰当局再次加大打击力度，将成百上千名激进分子投入新建的布列扎·卡尔图斯卡（Bereza Kartuzka）集中营。[②]

除了遭受政治暴力的骚扰外，这个地区还承受着经济方面的困难。波兰人的统治对经济毫无裨益，农业依旧是经济支柱。在大萧条时期，农产品价格猛跌，令许多持有小块土地的人顷刻间一贫如洗。而农村中的赤贫更为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许多乌克兰人移民到欧洲、加拿大、美国和阿根廷，以逃避悲惨的境遇。

95

但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并没有达成其建立乌克兰独立国家的目的。乌克兰民族民主同盟和更为关键的希腊天主教会——两次大战间波兰最为重要的乌克兰人组织——都反对使用暴力。1935 年，波兰政

---

①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 444.

② Yekelchyk, 2007, p. 128.

府开始与乌克兰民族民主同盟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其领导人瓦西里·穆迪礼（Vasyl Mudry）被选为色姆的副议长。1938 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科诺瓦莱茨在荷兰被苏联特工所刺杀。后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分裂为两部分，一支为更为温和的欧洲移民所领导，另一支在加利西亚活动且更为激进，由斯蒂潘·班德拉所领导。不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参与了 1939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喀尔巴阡—乌克兰国（Carpatho-Ukraine）的创立。喀尔巴阡—乌克兰国是短命的，在希特勒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后被纳粹德国支持的匈牙利军队所占领。

在德国和苏联的双重威胁下，波兰同样也无法保全自己的独立。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由此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序幕。到 9 月 17 日，苏联军队从东部入侵波兰，占领了乌克兰人口众多的领土。此后，纳粹、波兰人、苏联人和班德拉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之间的斗争，加上纳粹主导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蹂躏着西乌克兰的土地。我们在接下来的重要一章中将有详细叙述。

有关于两次大战间乌克兰的混乱可参见两位来自于此地区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他们是用德语写作的约瑟夫·罗斯（1894—1939）和用波兰语的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在《拉德茨基的远征》(*The Radetzky March* ）中，罗斯直率地描绘了加利西亚的情况。“任何来到这儿的陌生人都会渐渐枯萎。无人能和这儿的沼泽较量。无人能和边疆之地抗衡”[①]。舒尔茨对其故乡德罗戈比奇（Drohobych）的描述充满了超现实主义，如飞翔的锅碗瓢盆、鳄鱼在大街上游行、人们变成甲虫等。尽管手法不同，两位作家都哀悼逝去的旧秩序并反映出新时代的变化不定，特别是舒尔茨（和罗斯一样住在加利西亚）表现了一个地区不同种族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德罗戈比奇的犹太人聚居区在 1941 年被德国人占领后，舒尔茨被一名德国军官开枪击毙。

① Quoted in Reid, 1997, p. 109.

第七章　苏联治下的乌克兰

97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乌克兰人生活在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共产主义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书面上加盟共和国保有一定的权利，但大部分基本决策是由俄罗斯主导的苏共领导层作出的，这使许多乌克兰人把苏联看作前沙俄时期统治的延续。但是，乌克兰在苏联时代经历了根本的变革，包括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广泛的社会变革。在理论上，共产主义承诺给予充裕的自由和经济。但承诺并没有得以实现，许多乌克兰人（及其他苏联公民）遭受了政治压迫和饥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受到毁灭性打击，犹太人也因遭到纳粹德国和其帮凶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而人口锐减。尽管苏联当局希望民族主义思潮萎缩，但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并未消失，不断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坚持对个人和民族自由的追求。尽管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压制，他们的声音还是对 80 年代的独立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

一、20 世纪 20 年代的乌克兰化

98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波兰人的冲突，内战中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白军（反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力量以及各色农民团伙之间的冲突，乌克兰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21 年的《里加条约》结

束了波兰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战争，确认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西部边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936 年后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22 年 12 月正式成立，成为苏联最初的 4 个加盟国之一。

在前沙俄帝国的境内建立起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共产党人面临重建国家和创立共产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艰巨任务。战时共产主义（1918—1921）时期的严酷和快速的共产主义化政策，包括强制征收谷物和将农民迁往集体农庄，招致政治上的抵抗，并对经济造成了破坏。因此，从 1921 年开始，苏联领导人列宁改变了方针，并且接受了所谓的新经济政策，这被视为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更温和渐进的道路。

新经济政策贯穿 20 年代。[①] 国家并没有将所有财产国有化，而是允许小规模的私有企业继续存在。尽管许多产品的价格是固定的，但是农民被允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政府放弃了早先的集体或国家农庄的计划，允许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列宁期望新经济政策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工人和农民能够自觉接受包括集体农庄在内的共产主义制度。尽管经济相对自由，但政治体制依然集权，包括实行一党制——共产党，建立一个可以逮捕“阶级敌人”和其他反党分子的秘密警察组织。

姗姗来迟的新经济政策并未能阻止饥荒的到来。1921 年，饥荒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到了 1923 年，乌克兰经济渐露起色，农业生产、小商铺、租赁企业有所发展，对大型工业项目的国家投资催生出一个较大的乌克兰工人阶层。到 1927 年，乌克兰经济已经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准也显著提高。尽管取得了成功，苏联当局却时刻警惕着新经济政策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新经济政策造就了一批农村中相对富有的农民阶层（kulaks，俄语中被讥讽为富

---

① Definitive works on the NEP include Stephen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Moshe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农，乌克兰语中为 kurkuly）的产生。1927—1928 年，国家对富农——一般只是泛称——发起了几场运动，强迫他们向国家出售更多的谷物以向工人提供粮食，并出口以换取投资工业所需的资本。

99

政治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乌克兰共产党成立于 1918 年 4 月，受列宁领导下的全苏共产党的指挥。1922 年，乌克兰共产党只有 56 000 名党员，只不过占乌克兰人口的 0.2%，大部分党员为俄裔或犹太裔，只有 1/4 的党员为乌克兰裔，而且只有 11% 的人懂乌克兰语。[①] 因此，乌克兰共产党有必要使其党员的来源更广泛，也更本土化。1920—1921 年，乌克兰共产党吸收了从其他乌克兰政党分裂出来的亲布尔什维克的人士，并正式取缔了众多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1923 年，共产党通过本土化政策（korenizatsiia）提拔了一些本土的领导人，使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普遍呈现出"乌克兰"面孔。随后的乌克兰化遭到了乌克兰俄裔领导人的抵制。不过，到了 1925 年，苏共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的盟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一名乌克兰犹太人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提拔乌克兰本土的官员，其中包括曾被俄裔主导的领导层所清洗的乌克兰官员。到 1927 年，乌克兰裔首次在党员和政府官员的人数中占了半数以上。

此时的乌克兰化超越了政治范畴。政府积极推广在教育、媒体和艺术领域中使用乌克兰语，个中秘诀就是"表面的民族主义，实质的社会主义"，只要不超越规定的意识形态界限，可以用乌克兰语表达任何事情。到 1927 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务中 70% 使用乌克兰语，而在 1925 年仅仅 20%。但是有些人认为不要太过于重视这些数据，因为据研究显示，高层官员中只有少部分人可以熟练使用乌克兰语。值得关注的是，到了 1929 年，83% 的小学和 66% 的中学使用乌克兰语教学，几乎所有乌克兰裔学生能够进入乌克兰语学校

①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P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0.

学习，而在沙俄时期乌克兰语学校是被禁止的。[①] 同样，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大部分书籍和报纸使用的是乌克兰语，苏联对于教育的投资使识字率提高到了 1927 年的 50% 以上。得益于政府的资助，艺术领域——包括戏剧、音乐、文学、美术和电影——经历了复兴。更值得注意的是，1924 年，在欧洲自我流放的格鲁舍夫斯基被邀请回来，成为乌克兰科学院中的一员，同时担任乌克兰研究领域中的领军期刊《乌克兰》（Ukraina）的编辑。当局甚至允许宗教，尤其是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的存在。1919 年，在当局支持下，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接管了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国家议会同样接纳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希腊人、捷克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并且给予他们在政府事务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100

但是对于乌克兰化并非没有批评的声音。几个信仰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和民族建设的“民族共产党人”令莫斯科当局坐卧不安。例如，乌克兰教育部长亚历山大·舒姆斯基（Oleksandr Shumsky）于 1925 年主张在乌克兰共产党内选举乌克兰裔最高领导，对乌克兰的俄语居民进行强制乌克兰化，争取乌克兰更大的经济政治自治权。莫斯科驳回了他的要求，并撤销他的职务，指责他的“偏离主义”思想和对苏联及乌克兰文化的进攻。[②] 另外一些作家认为乌克兰被莫斯科所殖民掠夺，乌克兰艺术应更加“欧洲”，同样受到了训斥并被要求收回观点。1928 年，卡冈诺维奇被莫斯科召回。与“民族共产党人”希望任命一位乌克兰裔领导人的愿望相左，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波兰裔的斯坦尼斯拉夫·柯西尔（Stanislav Kosior）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

二、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

1924 年，列宁病逝。他并没有指定接班人。经过一番党内斗争后，斯大林凭借自身的冷酷无情和对党组织的控制于 1929 年成为党的

---

① Yekelchyk, 2007, pp. 93—94.

② Robert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s: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 Fam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1.

最高领袖，并把潜在的反对者清扫出门。斯大林早先支持新经济政策，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的批评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效果缓慢且过于资本主义。到20年代末，斯大林以包括快速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的方式实现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利用政治上的高压和恐怖方式，斯大林把苏联变成一个强大然而集权的国家。①

1. 工业化

斯大林认为，“落后的”俄罗斯必须实现现代化，以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下来，因此重点强调工业化。他放弃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依赖，倾向以国家所有制和计划为特征的“指令经济”。国家控制经济的各个方面，决定生产什么、价格多少和如何分配产品和服务。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成立于1928年；1929年，苏联领导层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以推动苏联工业生产的飞速增长。

乌克兰在斯大林式的工业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乌克兰接受了大量的投资，国家对乌克兰工业的投资从1928年到1929年几乎翻了3倍。400个新工厂在苏维埃乌克兰拔地而起，大部分工业化集中在沙俄末期就有一定基础的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地区。比较著名的工程有座落于第聂伯河下游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欧洲最大），庞大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和扎波罗热与克罗沃伊罗格的钢铁厂等。顿巴斯地区仍然是煤矿中心。到1932年，乌克兰生产了全苏联超过70%的煤、铁矿石与生铁。②

101

尽管经济增长的具体数据是有争议的（苏联官方夸大其成就），但乌克兰乃至整个苏联都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增长。乌克兰的

---

① Sources on Stalin are legion. For general coverage of Soviet history and Stalin in particular, see Ronald Suny, *The Soviet Experi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d Robert Conquest, *Stalin : Breaker of Nations* (New York: Penguin, 1992) . For a work devoted to Ukraine, see Hryhory Kostiuk, *Stalinist Rule in the Ukraine : A Decade of the Study of Mass Terror* (New York: Praeger, 1961) .

② Yekelchyk, 2007, p. 105.

城市人口在30年代翻了一番，许多农民进入城市和工业中心寻找工作，乌克兰裔的居民占乌克兰共和国工人阶级的多数，并且首次在城市人口中占多数。尽管工业化的进度在第二个（1933—1937）和第三个（1938—1941，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中断）五年计划有所放缓，到30年代末，乌克兰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金属和机械产量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几乎与英国并驾齐驱。[①]

然而这些成就并非没有代价。大部分工业化的投资来自于粮食出口，而粮食的获取——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代价——则来自农民。被认为是反抗苏联统治的人们被关进劳改营，他们从事奴隶般的工作，造就了苏联的许多大工程。工业化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建设失误、错误的目标和速度迟缓）被归咎于肇事者和破坏分子。由于制定计划的人不重视个人消费，因此当钢铁、煤炭、化工、拖拉机和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不断攀升时，食品却在30年代一直保持配额供应，住房也是一大难题，消费品的匮乏（如服装、生活用品）长期得不到解决。严苛的法律保证了劳动者的纪律性。那些关心乌克兰经济自治的人们意识到，斯大林式的经济集权意味着乌克兰的工业已经从属于莫斯科的政府部门了，尽管在20年代是由乌克兰当局掌握的。1932年，乌克兰的经济学家抱怨乌克兰在苏联计划经济下受到不公平待遇，乌克兰提供原材料，而俄罗斯的工厂却负责生产产成品。[②]

2. 大饥荒

我们可以把苏联时代工业化的一些特征看做现代化或进步的标志，但同样应该承认斯大林对乌克兰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负有责任，那就是1932—1933年的大饥荒。由于政府从乌克兰农户手中强制征收粮食和其他食品，有百万计的人口——研究大饥荒的领军学者“保守估计”约为500万[③]——被饿死。请注意，这并不是出于粮食歉收或战

102

① Yekelchyk, 2007, p. 106.
② Yekelchyk, 2007, p. 105.
③ Conquest, 1986, pp. 306—307.

争等通常会造成饥荒的原因，相反，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政府坐视人民忍饥挨饿，仍将粮食从他们手中拿走，出口换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在饥荒的背后隐藏着几个动机。首先，苏联政府寻求对农民的控制。在新经济政策下，人们认为农民向国家出售谷物是受到鼓励的，会自愿放弃私有地产，加入意识形态正确的集体或国家农场。[①] 然而粮食采购却成为一项长期的难题，农民也没有显示出加入集体农庄的积极性。斯大林掌权后承诺不会再一味娇惯农民。他使用高压手段强制农民把农产品交给国家，并在 30 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许多人抵制这项政策，宁肯屠宰自己的家畜家禽也不愿把它们交给集体农庄。这些抵制者被斯大林扣上富农的帽子，并认定他们是必须被消灭的阶级敌人。苏联境内有上百万人被当作富农而遭到逮捕，被当众处以极刑或被发配至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劳改营中。苏联当局的宣传尤其体现在 1930 年的电影《土地》（*The Earth*）中，该影片拍摄于 1930 年，导演为亚历山大·杜甫仁科（Oleksandr Dovzhenko），影片把集体化赞颂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集体化残酷却效果显著：到 1932 年，70% 的乌克兰农民在集体农庄里工作，获取微薄的收入。

饥荒的第二个动机在于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1929 年，秘密警察开始抓捕乌克兰知识分子，指责他们为非法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在 1930 年，哈尔科夫发动了一场游行，以莫须有的罪名声讨政治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非共产主义党派）、作家、教士和学生。1931 年，乌克兰最知名的公众人士格鲁舍夫斯基被迫前往莫斯科，他在科学院的许多同僚被冠以参加非法组织的罪名而送往劳改营。这些举动旨在将乌克兰的知识分子“斩草除根”。但是，斯大林明白乌克兰民族主义根源在于农民阶层，集体化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且扩展开

① Karl Marx had foreseen collective farms, under which property was owned by a group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as akin to a worker-owned factory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us compatible with communism. Under the Soviet Union, real control of these farms resided with the state, not the workers themselves.

来，饥荒本身的目的）在于“消除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社会根基——私有地产”。①

造成饥荒的直接原因是1932年苏联政府要求乌克兰提交谷物。尽管770万吨粮食的目标在乌克兰共产党内也被认为过高而且不现实——如果向国家上交这么多粮食，农民就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莫斯科的官僚却不愿做任何让步。苏联高级官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一次会议上告诉乌克兰共产党，对减少粮食份额的言论将被视为“反布尔什维克”，并且“党和苏联政府制定的计划必须得到实现，不得有迁就和犹豫不决”。于是，所有讨论就此打住了。因此，“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这样一个命令如果实施的话只能使乌克兰农民陷入饥饿之中”。②

1932年8月，政府命令所有集体农庄的财产——包括牲畜和农产品——都是国家财产，并将严厉惩罚那些将财产挪作私用的人。有军队撑腰的党干部们派遣队伍到乡下从农民手里征收粮食。农场里正常产出的产品是不够的；干部们被派往农户家里，检查是否窝藏粮食和食品。那些被发现“私藏粮食”的人——哪怕只有少许的几袋——也被赶到劳改营或被执行枪决。当地的党干部如果完不成规定的份额将被视为软弱不可靠，并被撤职。1932年冬季，尽管已经不遗余力，政府终究没能完成粮食份额的征收。党所控制的媒体以及党的高级官员将失败归咎于富农和破坏分子，号召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施加更苛刻的手段。于是，一纸政府命令禁止将任何货物与赊购品运往执行粮食上交任务落后的地区。

结果便是大面积的饥荒，基本没有剩下什么可以果腹的东西。有些人试图逃往国外，但国际边界，甚至是与俄罗斯的边界也被封锁了。虽然农民进入城市是不合法的，但有些人还是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尽管那里的食品也是实行配给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中还是有储

① Conquest, 1986, p. 219.

② Conquest, 1986, p. 223. Much of account of the famine comes from Conquest, 1986, pp. 223—261.

存在谷仓中的只供非常时期使用的粮食，部分农民通过抗争夺取了一些。不过党的干部们，包括在乌克兰农村的党干部却有足够的粮食吃。虽然部分地区也遭遇了饥荒，但俄罗斯的粮食还比较多，不过不许运往乌克兰。苏联高级官员对饥荒是知晓的。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当时在乌克兰任职，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自己知道"人们在大量死去"。据说一位向斯大林汇报实情的官员被解职，斯大林指责他在捏造"童话故事"。一个共产党活动家回忆道：

> 在我的后半生中，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结果可以使手段合法化。我们伟大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此目标，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去欺骗、去偷抢、去消灭成千成百万阻碍或可能阻碍我们工作的人的性命……在1933年可怕的春天，我看到人们在死于饥饿。我看到妇女和儿童鼓胀的肚子，肤色变得发蓝，虽然还在喘气但眼神空洞无神。还有尸体——裹在破烂羊皮袄和廉价毛皮靴里面的尸体；在农民草房、老沃洛格达融化的积雪下、哈尔科夫桥梁下的尸体……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没有精神失常，也没准备自杀。我也没有诅咒那些人：他们派我在冬天去征收农民的粮食，在春天让我去劝那些站不稳脚、只剩皮包骨或浑身肿胀的人们下到地里，以骇人的工作方式来完成布尔什维克党的播种任务。[1]

104

农民们卖掉了一切可以卖的东西以换钱买东西吃，苏联政府也允许用金币、古玩和外币来换取一块面包或一磅黄油。人们开始吃树皮、荨麻、虫子、狗、猫，甚至吃人充饥。人吃人的恐怖记录从吃死人到抓小孩，再到年老的父母恳求孩子在自己死后吃掉自己。

有上百万人最终惨死在饥荒中。大部分发生在乌克兰，但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有上百万人在同样的状况死去下。苏联政府自然否

① Quoted in Conquest, 1986, p. 233.

认饥荒的存在，顶多只承认因为破坏活动和工人的懈怠而造成食品短缺。在斯大林时期，胆敢谈论饥荒的人肯定要被逮捕，即使在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也不鼓励对此进行调查研究。但关于饥荒的报道出现在西方报纸上，尽管有些是为斯大林辩护——主要是英国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通讯员沃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当时他们都在苏联。他们和斯大林的声明保持一致，认为不存在饥荒。但是有一名西方记者在1933年5月观察到了一个“战场”：

> 在一边，上百万农民在饿死，他们的尸体经常被当做食物充饥；另一边，契卡（GPU，秘密警察）的成员在宣讲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像蝗虫一样卷走全国的食品；他们枪毙和流放了上千的农民，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庄；他们把一些全世界最富庶的土地变成令人悲叹的沙漠。①

“种族灭绝”一词由一名曾在波兰治下的乌克兰利沃夫大学学习法律的波兰犹太人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创造。那么，这次饥荒是否是一次种族灭绝呢？莱姆金以及许多乌克兰活动家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把这次事件看作是对乌克兰人和乌克兰文化有计划的消灭。研究饥荒最知名的西方学者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和詹姆斯·梅斯（James Mace）也使用了这个词。② 今天，乌克兰为饥荒（乌克兰语为holodomor，意思是“饥饿而死”）设立的纪念日一直是件大事。乌克兰议会多次宣布，确认此次饥荒是一场种族灭绝，这一立场也被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其

105

① Conquest, 1986, p. 260.

② Conquest, 1986, p. 272. Mace (1952—2004) worked with Conquest on his book, wrote many articles on the famine, and was the lead author of the U. S. government's examination of the Great Famine. See *U. S. Commission on the Ukraine Famine,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A monument has been built in Kiev honoring Mace.

他25个国家所接受，当然这中间不包括俄罗斯。有批评意见认为，尽管饥荒是灾难性的，但从技术上讲并不是种族灭绝，因为并非只有乌克兰人遭遇了饥荒，城市人口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或者可以说这是一场由意识形态所驱使的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结果。① 联想起斯大林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敌视态度——乌克兰的集体化在1932年就已经大体完成，从俄罗斯向乌克兰运输粮食被明令禁止，而且俄罗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位于乌克兰裔人口密集的北高加索的库班（Kuban）——这都是称此次饥荒为种族灭绝的有力证据。这无疑是一场足以和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的可怕事件，是20世纪重大灾难之一。

3. 大清洗和大恐怖

当乌克兰还在饥荒中煎熬时，斯大林发动了一场针对契卡内部官员的清洗运动。如前文所述，很多乌克兰官员遭到斯大林的猜疑，其中包括一些敢于说实话或者至少为阻止饥荒做些实事的勇敢者。1933年，一批乌克兰党政干部被捕，被指控参加由波兰地主和德国法西斯资助的乌克兰军事组织，遭到逮捕的人包括党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主要监视者马特维·雅夫尔斯基（Matvii Yavorsky）和乌克兰国家出版社主编米哈伊洛·雅洛维（Mykhailo Yalovy）。成百上千名作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被公开指责为反对苏联的煽动者，是"躲在"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Mykola Skrypnyk）"背后"的。斯克里普尼克自1926年起担任乌克兰教育部长，曾力争维护乌克兰语言文化的权利。为了免遭被逮捕的命运，斯克里普尼克选择了自杀，后来他被国家控制的媒体称为"堕落的民族主义者"。② 1933年到1934年间，乌克兰所有主要的文化机构——科学院、剧院、媒体、科研所——都因反苏反革命的嫌疑受到清洗。数千人被赶到艰苦的劳改营，很多人死在那里。

---

① Mark B. Tauger, "The 1932 Harvest an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1933", *Slavic Review 50*, no. 1 (Spring 1991): pp. 70—89. For an alternative view, see Yaroslav Bilinsky, "Was the Ukrainian Famine of 1932—1933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 no. 2 (1999): pp. 147—156.

② Conquest, 1986, pp. 267—268.

俄语成为苏联境内的通用语，乌克兰语出版业就此衰落下去。[①]

从1935年到1938年，整个苏联都被卷入清洗与大规模的恐怖浪潮中，借口则是1934年12月一名苏联共产党的高官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在列宁格勒（Leningrad，之前的圣彼得堡）被刺杀。106 基洛夫被刺是斯大林所指使的，但是他却利用这次事件作为清除所谓党的叛徒的借口。党的高级官员被非法"公开审判"并被处死。普通百姓被鼓励互相揭发，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任何理由而被逮捕。因为熬不过警察的拷打，人们把自己的邻居、同事和家庭成员也一一供出。上百万人被押往劳改营，许多人死于恶劣的环境中。[②] 苏联媒体把这些受害者描述为间谍、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将这一切的策划者斯大林赞誉为仁慈如上帝般的人物。

在乌克兰，党员和普通民众都成为受害者。[③] 大部分死去的人被指控为富农，而这样看起来富农却似乎躲过了大规模的放逐和饥荒，仍然在对集体农庄搞破坏活动。作为基洛夫死后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一部分，无数本地的党员和集体农庄的普通工人因子虚乌有的罪名而被送上审判台。乌克兰党的干部经常被控以民族主义和反苏倾向的罪名，下场往往是被处决。这种情况比在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得多。1938年，乌克兰共产党大会上新产生的86名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中只有3名是上一届的成员，其他人都被撤职或处决了。斯大林的亲信、俄罗斯裔的赫鲁晓夫出生在乌克兰，于1938年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忠实地执行了所谓完全清除党内敌人的命令。

斯大林的表现也许看起来是不理智甚至是疯狂的。他基本上摧毁了共产党组织并杀害或囚禁了上百万无辜者，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恐怖的环境。从经济上讲，集体化导致粮食歉收和周期性的食品短缺。尽管大批钢铁化工厂被建造起来，但1938年普通人民的生活还比不上

---

① Yekelchyk, 2007, p. 116.

② A premier source for these events is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The best source on Ukraine specially is Kostiuk, 1961.

1928 年。然而权力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他保证了党对他的忠诚，没有人敢也没有人能够对他进行挑战。一个集权的国家形成了。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乌克兰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可以说是在二战中赢得了对纳粹德国的胜利，而这也是斯大林在今天仍受到一定褒扬的原因之一。有观点认为，尽管苏联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斯大林的工业化使得苏联经受住了德国战争机器的考验。在战争中，乌克兰是一个重要的战场。苏联的胜利使得莫斯科的统治扩张到所有乌克兰的土地，统一了这块几个世纪以来被诸多国家和帝国所瓜分的民族。

1. 苏军占领西乌克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 1939 年 9 月 1 日打响。作为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的一部分，德国和苏联在 8 月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德国在 9 月 1 日发动了对波兰的入侵，迫使英国和法国对其宣战。9 月 17 日，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其大部分占领地区为今天的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 107

苏联迅速在西乌克兰巩固了自己的权威[1]，把入侵描绘为对乌克兰的统一。亲苏联的“乌克兰民族议会”在入侵后有争议的气氛中被迅速选举出来，并于 10 月召开会议，递交了加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申请，苏维埃乌克兰的议会于 11 月 15 日接受了申请。许多波兰统治时期的乌克兰报纸和期刊被苏联当局查封，并成立亲苏媒体。非共产主义的乌克兰政党领导人被捕后便杳无音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也纷纷成立，当局也试图建立集体农庄。莫斯科派遣了几千名党政官员和军事人员接管了西乌克兰。同样，苏联把近 100 万社会政治背景不良或被怀疑有反苏情绪的人[2]——大部分为波兰人和犹太人，

① John Armstrong, *Ukrainian Nationalism*,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63—70.

② Yekelchyk, 2007, p. 133.

也有乌克兰人——迁往西伯利亚、中亚和俄罗斯北极地区。1940 年夏季，上述情况重演，根据德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协议，苏军占领了北布科维纳。

但是在加利西亚，苏联并没有全面移植其极权体制。虽然批评希腊天主教会并没收了其部分财产，但苏联并没有逮捕教会领袖或全面取缔教会组织，这反映出苏联并不想与所有人都产生嫌隙。比起波兰统治时期，乌克兰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利沃夫大学在语言和人员上也显著地“乌克兰化”了。东西乌克兰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得到迅速发展，尽管到 1940 年当局已经明显感觉西乌克兰人对苏维埃乌克兰并不欣赏，而东乌克兰处于沾染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病毒的危险中。

由于缺乏对抗苏联的实力，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没来得及逃走而被抓捕、接受审判，并因反苏活动而被判死刑。然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核心仍在西欧和波兰得以存续。组织中的许多干部同情纳粹德国，1940 年，新老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组织的分裂。班德拉成为更为激进的军事派别（OUN-B）的领袖，而安德烈·梅里尼克在 1938 年科诺瓦莱茨被刺杀后，成为温和派（OUN-M）的领导人。1941 年初，德国人开始在波兰对许多 OUN-B 成员进行军事训练，以准备发动对苏联的军事进攻。

108

2. 德国的入侵与占领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斯大林惊讶于希特勒的背叛行为，而苏联军队明显不及装备组织均占优的德军。到 6 月 30 日，德军抵达利沃夫，而此时已经有 4 000 名乌克兰政治犯死于苏联秘密警察的监狱中①，其余数千人被转移至东部，苏联官员和犹太人也纷纷撤往东部避难。许多西乌克兰人欢迎德军的到来，指望能够得到比苏联更好的待遇。

OUN-B 的军队此时也跟随着德军前进。6 月 30 日，他们在利沃夫

① Armstrong, 1963, p. 77.

宣布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在宣言中，OUN-B 号召全体乌克兰人加入打击“俄罗斯占领者”的斗争中并向未来的首都基辅挺进。[①] 雅罗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宣布自己为国家元首，而班德拉因被德国人排斥继续待在波兰。争取独立乌克兰的口号得到了希腊天主教会的赞成。大主教舍普蒂茨基（Sheptytsky）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欢迎胜利的德军把我们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并且承认斯特茨科为新乌克兰国家的领袖。[②] OUN-B 的组织向乌克兰纵深发展，建立起独立的乌克兰行政机构。

然而，建立独立乌克兰国家的尝试却没有成功。德国人最初对乌克兰活动者表示了一定的宽容，但后来逮捕了 OUN-B 的领导人，包括利沃夫的斯特茨科和在波兰的班德拉。忠于 OUN-M 的组织开始进入德国控制的乌克兰。8 月，OUN-M 的几位领导人在乌克兰中部的日托米尔被刺杀。尽管一些证据指向苏联人，但很多人为此谴责OUN-B。[③] 无论 OUN-B 还是 OUN-M，都无力建立起有效的政府，而且很明显，德国人对乌克兰另有打算。虽然一些德国军官认为允许非俄罗斯人建立起某种形式的自治政府，有助于德国人得到民众的支持，但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把乌克兰人视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的次等人类（Untermesnchen）。1941 年，希特勒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的立场，宣布德国对一个自由的乌克兰没有兴趣。[④]

与此同时，德国军队在向东挺进。到 8 月时，德军占领了乌克兰东南部的大部分土地。经过血战，基辅于 9 月 19 日落入德军之手。在基辅的战役中，有 60 万名苏军阵亡，另有 60 万被俘。[⑤] 10 月，敖德萨被罗马尼亚仆从军占领，哈尔科夫也被德军攻占。克里米亚的战事一直持续到 1942 年夏天，经过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海峡的一系列战

109

① Armstrong, 1963, pp. 79—80.
② Armstrong, 1963, p. 81.
③ Armstrong, 1963, pp. 94—96.
④ Armstrong, 1963, p. 139.
⑤ Armstrong, 1963, p. 136.

斗后，苏联红军才被击败并被迫后撤。上百万乌克兰平民逃往俄罗斯。在撤退之前，苏联人炸毁大坝、桥梁和工厂，淹没矿井并焚烧油田，不给德国人留下任何东西。一些工厂被拆解，设备被装上火车运往东部，抵达后重新组装并投入战时生产。

德军对乌克兰的占领带来了压迫和灭绝政策。被称为别动队（Einsatzgruppen）的机动屠杀部队跟随德军前进，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吉普赛人，特别是犹太人，并进行处决。在乌克兰的许多地方都有人与德军合作，帮助辨认、追捕和杀害犹太人。[1] 针对犹太人最大的一次大屠杀发生在1941年9月末。33 771名犹太人被协从军从基辅城带到娘子谷（Babi Yar），然后被C别动队集体屠杀，尸体一层一层地堆叠在深深的山谷中。据估计，总共有超过150万乌克兰犹太人死于大屠杀，或被别动队和其协从者处死，或被送往大多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在占领期间，也有一些乌克兰人冒险庇护犹太人，其中有1 984人被以色列授予“外邦公义者（Righteous Gentiles）”的称号。[2] 相比之下，苏联当局没有为在大屠杀中受害的犹太人建立起任何特别的纪念碑。例如，在1941年到1943年间共有超过15万人（包括犹太人、战俘、共产党员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娘子谷被处决，但苏联当局在1966年树立起一座悼念“基辅市民和战俘”的纪念碑，有意否认大部分人遇害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1991年，犹太人团体在娘子谷树立起一座自己的纪念碑——10英尺高的犹太烛台。[3]

尽管没有像犹太人一样遭受灭绝的命运，乌克兰人同样遭到歧视与压迫。在许多乌克兰城市中出现了仅为德国人开放的学校、餐厅和公共交通设施。当地媒体被限制播放时间。德国人计划把乌克兰变为农业殖民地，认为当地人没有必要接受教育，因此学校只开设到4年

① Martin Dean, *Collaboration in the Holocaust: Crimes of the Local Police in Belorussia and Ukraine, 1941—1944*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② Yekelchyk, 2007, p. 139.

③ James Waller, *Becoming Evil: How Ordinary People Commit Genocide and Mass Killing*,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2—97.

级。德国人接管了集体农庄，禁止向城市自由运输物资，结果导致饥荒，并使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有超过 200 万年轻工人被强迫送往德国的工厂，成为奴隶工人。同样处于纳粹占领中的波兰（包括加利西亚）情况反而好一些，因为德国人更倾向于和乌克兰裔而非波兰人接触。尽管如此，政治恐怖和经济剥削仍然是德国的主要政策。

因此，反抗德国人的统治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在乌克兰，苏联游击队活跃在德军的后方。一些人估计在占领期间，有 20 万名亲苏联的起义者和游击队员——大部分为乌克兰裔——袭击德军的补给和交通线。1942 年，一小队最初组织起来是为了抗击苏联的队伍——乌克兰起义军（UPA）调转枪口，开始针对德军作战。OUN-B 和 OUN-M 也成立了军队抗击德国人。1943 年，众多队伍集结在乌克兰起义军的旗帜下，汇集成一支 4 万人的队伍，于 1942—1945 年间打击德国人、苏联游击队、苏联红军和波兰游击队。[①]

110

3. 战争的结束

到了 1943 年初，东线的战况已对德国不利。在付出百万人的牺牲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扭转了战局，将战线往西部推进。1943 年夏季，苏军在乌克兰北部赢得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库尔斯克战役（Battle of Kursk）。到了 8 月，苏军已经解放了东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并在 11 月夺回了基辅。1944 年 7 月，苏军占领利沃夫，并于 1944 年 10 月挺进特兰斯卡帕提亚，苏联媒体宣布乌克兰全境已获解放。

当然解放的代价是高昂的。乌克兰又一次变为战场，城市被夷平，田野被焚烧，德国人摧毁了许多村庄以搜捕苏军和游击队的合作者。尽管苏联的宣传机器赢得了乌克兰人的支持，但效果却并没有持续太久，尤其是在苏军进入乌克兰西部后。苏军在那里遭遇了乌克兰起义军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的抵抗。在 1944 年和 1945 年间，当苏联红军推进到波兰和其后的德国时，数千苏联安全部队也被部署在西乌克兰，

① Yekelchyk, 2007, pp. 144—145.

目的是镇压乌克兰起义军和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活动。希腊天主教会和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被压制并最终取缔，苏联当局同时不情愿地同意对没有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予以支持。许多西乌克兰人跟随德国人撤退，许多在德国的乌克兰工人和战俘担心受到迫害而拒绝返回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当时为俄罗斯领地而非属乌克兰管辖），由于一些鞑靼人曾在占领期间与德国人合作，苏联当局将超过 20 万人鞑靼人流放到中亚，作为集体惩罚措施。他们中几乎有半数死在途中，或者在重新安置地中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111

战争一结束，斯大林就坚持全部乌克兰领土都应该统一在苏联的领导之下，意味着加利西亚、沃伦、北布科维纳和特拉斯卡帕提亚将脱离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加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边界的西移使得超过 80 万波兰人迁往波兰，近 50 万乌克兰人从波兰迁往乌克兰。[①] 这样，乌克兰的所有领土得到了历史性的统一，尽管其国家仍然在莫斯科的统治下。斯大林设立了单独的乌克兰国防部和外交部，并利用这种实际上被架空的体制在联合国内争取到了乌克兰的席位（在白俄罗斯也是如此）。

四、战后的乌克兰：重建与报复

二战后，苏联统治的重建有着自身的困难之处。和其他地区一样，乌克兰被战争摧毁殆尽，800 万乌克兰人的死亡——士兵和平民——导致了劳动力短缺。战时的破坏和干旱造成的饥荒在 1946—1947 年间又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具体数据众说纷纭，可能会达到上百万人。

苏联模式在战后也未发生真正的改变。农业仍然保持集体化，国家也有意忽略对农业的投入。一党专政的苏联行政体制控制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依赖国家计划的苏联人在东乌克兰重建了

① Yekelchyk, 2007, p. 147. In 1947, in Operation Wisla, the Polish govenment moved to remove vestiges of previous Ukrainian settlement in areas such as Kholm and Peremyshl.

大部分的工业，到 1950 年，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在战争时期享有较大自由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尽管没有被完全取缔，但重新回归国家控制之下。

但是西乌克兰的情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更困难和残酷。战前没有经历苏联的统治；战争期间，苏联人和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过冲突。后来，乌克兰起义军在美国和英国的秘密援助下继续对苏军发动袭击。乌克兰起义军被苏联安全部队在加利西亚和沃伦的清扫行动中赶到波兰东部，后在 1947 年苏波维斯瓦联合行动中被镇压。针对苏联的零星战斗和破坏活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①] 作为对抵抗的回应，苏联当局放逐了超过 20 万西乌克兰人，大部分为家庭成员是民族主义战士的人。赫鲁晓夫后来承认斯大林曾想把对付鞑靼人的手段应用到西乌克兰人身上，但是大规模迁移没能实施，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来放置他们”。[②] 希腊天主教会被关闭，许多教士被关进监狱，财产被转交给俄罗斯东正教会。意识形态的净化运动用以打击可疑的乌克兰作家、历史学家和戏剧导演，以清除西方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农业集体化和 30 年代一样，也遇到某些抵抗；一些投资也投入到当地的工业，包括利沃夫的矿厂、巴士车厂和收音机厂。然而并没有大量俄罗斯人移民到西乌克兰，使当地保持了乌克兰语学校和媒体。共产党员的数量也比较少。尽管在苏联的绝对控制之下，西乌克兰成为苏联境内“苏联色彩最淡”和“俄罗斯人最少和俄罗斯化最低”的区域。[③]

112

五、反对派运动的活跃

斯大林于 1953 年去世。经过短暂的权力之争，曾在 1938 年到 1949 年间几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

① The best source on this period is Armstrong, 1963, pp. 290—321.

② Yekelchyk, 2007, pp. 148—149.

③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d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267.

书记。1956 年，通过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政策的指责，赫鲁晓夫迅速得到了改革者的名声。

赫鲁晓夫的上台给乌克兰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他把乌克兰看作自己的权力基地，大力提拔乌克兰干部进入莫斯科的苏联领导层。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首次由乌克兰裔主宰了乌克兰共产党的最高层，经济权力的下放也给乌克兰的部委更多对乌克兰经济企业的控制权。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赫鲁晓夫对农业注入了更多的国家投资，50 年代的食物供给和农民收入都有所增加；城市中公寓楼的建设缓解了住房压力；众多艺术领域的表达也被给予了更大的自由，而在斯大林时期被打压的政治人物、艺术家和作家，例如乌克兰化的象征人物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Mykola Skrypnyk）被恢复名誉；许多政治犯，包括乌克兰起义军成员在内被释放。很多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讨论保护乌克兰语的必要性，以阻止变俄语为公共领域主导语言的企图。尽管一些改革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所推翻，但有一个举措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乌克兰的地图。1954 年，为了纪念《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 300 周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的管辖权交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在流放鞑靼人之后很多俄罗斯人占了克里米亚人口的多数。在苏联的统治下，这次领土变迁无足轻重，但在 1991 年乌克兰独立后，尽管有人口构成、历史联系和重要苏军基地等方面的因素存在，克里米亚已经（而且现在也）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113

赫鲁晓夫一直未能建立起像斯大林一样的个人权威。他在 1957 年成功挫败了罢免他的图谋，但其外交冒险（如引发古巴导弹危机，与中国交恶）和内政的失败（如他对种植玉米的偏执导致了 60 年代的粮食歉收）使党内保守派人物试图将其免职。1964 年，他们成功地迫使赫鲁晓夫辞去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06—1982）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

与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是出生于乌克兰的俄罗斯裔，并在乌克兰逐步升迁。但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个改革者。和斯大林时代最高领导权不同，勃列日涅夫实行集体领导制，通常依赖于自己早先在乌

克兰建立起来的支持者网络。一些人将之戏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黑手党”。他把政治稳定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尽管到70年代稳定的代价已经在经济停滞和腐败上清楚地体现出来。

1963年，乌克兰裔的彼得罗·谢列斯特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他产生了分歧。尽管谢列斯特曾支持罢免赫鲁晓夫，但由于强烈支持发展乌克兰经济与文化而与勃列日涅夫以及莫斯科的领导层产生了摩擦。谢列斯特并非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共人士，但对他来说“苏维埃乌克兰意味着乌克兰要享受充分发展的经济和民族化”。[①] 作为一名前工业主管，谢列斯特坚持乌克兰应得到国家投资中公正的份额，抗议将乌克兰煤炭和冶金业的资金转移到开发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中。他使用母语乌克兰语，并在公开讲话中赞颂乌克兰的语言和传统。他也反对对大胆直言的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拘禁。当勃列日涅夫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获取更多权力后，开始对付谢列斯特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谢列斯特在1972年被解职，并于1年后被迫完全退休。苏联媒体批评他犯了多项错误，其中包括将乌克兰历史理想化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当谢列斯特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许多在赫鲁晓夫时代较为宽容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乌克兰知识分子开始要求党减少对艺术领域的控制，并对乌克兰文化表示更多的尊重。被称为“六十年代人”（shistdesiatnyky）的运动包括诗人伊万·德拉克（Ivan Drach）、琳娜·科斯藤科（Lina Kostenko）和德米特里·帕夫里奇科（Dmytro Pavlychko），散文作家弗拉基米尔·德罗左德（Volodymyr Drozd）和瓦莱丽·谢夫楚克（Valerii Shevchuk），戏剧导演列斯·塔纽克（Les Taniuk），文学批评家伊万·德祖布。德祖布的手稿《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1965）曾单独提交给谢列斯特，并成为乌克兰持异议者最受欢迎的作品。在此文中，他认为苏联当局已经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开始推行与沙

114

① Yekelchyk, 2007, p. 159.

俄时期相似的俄罗斯文化同化政策。德祖布和其他作家的作品通过非法的地下渠道出版或自行出版（乌克兰语中为 samvydav，俄语为 samizdat），而且还送到国外以多种外文出版。德祖布没有被逮捕，原因多半在于其号召对苏联体制进行改革而非推翻政权。其他自行出版的作家却遭到逮捕并接受审判。他们的遭遇促使人们为争取人权和公民自由而奔走，其中包括记者维亚切斯拉夫·乔诺维尔在内。

其他呼吁改革和异议的声音也不绝于耳。60 年代最富争议的小说《大教堂》（*The Cathedral*，1968）的作者为奥列西·冈察尔（Oles Honchar）。冈察尔是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是老一辈声名卓著的作家。这部小说记述了东乌克兰一个小镇的居民努力挽救一个老哥萨克教堂免遭拆毁的命运，清晰地表明乌克兰应该保护苏联之前的古迹。这本书被查禁，但却提升了它在知识界的知名度。另外一些人，例如历史学家瓦伦丁·莫罗兹（Valentyn Moroz）和记者斯蒂潘·卡马拉（Stepan Khmara）在研究乌克兰起义军的历史中，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反苏倾向，谴责非民主而且本性压迫的苏联政权及其对乌克兰文化的摧残。在 70 年代末，苏联签署保障包括言论自由等人权的《赫尔辛基公约》后，众多“赫尔辛基团体”要求政府忠于自己的承诺。乌克兰赫尔辛基团体的领袖为苏联战争英雄尼古拉·鲁登科（Mykola Rudenko）。希腊天主教会的地下组织在西乌克兰出现。1978 年，劳工活动家试图在东乌克兰建立起一个独立工会。克里米亚鞑靼人也通过请愿，争取结束放逐并返回故乡的权利。

谢列斯特和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谢切尔比茨基时期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镇压了异议运动。活动者们被秘密警察所监视，一些人失去了学术或文化地位，许多人遭到逮捕。德祖布于 1972 年被捕，在公开收回自己的批评意见后被释放。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有的人死在狱中，有的一直被关押至 8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全苏联政治犯（包括俄罗斯人）中乌克兰人占到多数。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例如德祖布、乔诺维尔、莫罗兹、卡马拉和德拉克在 80 年代后期再次脱颖而出，并成为推动乌克兰独立的领导者。

115

不过持不同政见者在西乌克兰和基辅之外并没有众多的追随者。一份调查显示，大概有不到 1 000 名持不同政见者。[1] 和很多苏联公民一样，大部分乌克兰人不愿意冒险参加反政府的政治运动。尽管赫鲁晓夫赶上美国生活水平的许诺没有实现，但人们已经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获得了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各种条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到 70 年代末，乌克兰的城市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了农村人口。许多乌克兰人，尤其是居住在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人主要讲俄语，并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并向往一种大苏联（俄罗斯）文化的概念。但是如前文所述，苏联对西乌克兰的影响较小，那里的乌克兰语学校占据主导地位，苏联时代以前的记忆仍然鲜活。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乌克兰统一在苏联的领导下，但认同——苏联的、俄罗斯的、乌克兰的，或某种混合形式的——仍然保持分裂并且呈持续的区域化发展趋势。[2] 这种现象在推动乌克兰独立过程中和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中都有所表现。

---

①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53.

② Wilson, 2000, pp. 147—148.

第八章　乌克兰走向独立

119　在 1985 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时候，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的确，许多乌克兰人和海外移民群体有过这种梦想，但在苏联的高压统治下很难成为现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使苏联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意不在此，改革使民族主义的浪潮喷涌而出，并席卷了貌似强大的苏联全境。短短 6 年后，乌克兰独立国家地位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通过全民公决得到确认，有 90% 的乌克兰投票者表达了对独立的支持。这项成就被许多人视为整个乌克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一、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境内民族主义的崛起

乌克兰走向独立的故事应该从莫斯科、维尔纽斯、塔林和里加，而不是从基辅、利沃夫或顿涅茨克讲起。的确，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120 曾为争取更多的民主和文化自由而英勇斗争，但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效果却微乎其微。苏联领导人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自信满满地宣布已经通过创立一个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多民族在内的统一苏联民族，顺利解决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苏联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看似平静的少数

民族问题而最终解体。[1]

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在1985年3月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带来的效应。[2] 戈尔巴乔夫是新型的苏联领导人：年轻（54岁）、西化并且意识到苏联必须通过认真的改革来战胜经济困难以赢取民心。戈尔巴乔夫称勃列日涅夫的时代为“停滞时期”，认为苏联正面临威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严重危机。他意识到，苏联要在经济，尤其是技术领域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军事开支拖了经济的后腿。和其他大多数学习工程学的苏联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学的是法律。在大学时代，他就结识了很多“改革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物。他的家庭曾是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受害者，因此对苏联的压迫性政策有着切身体会。

戈尔巴乔夫是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i Andropov）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是前苏联克格勃的领导人，并曾于1982—1984年间短暂地担任过总书记一职。安德罗波夫把自己塑造成改革者，他强调劳工纪律、打击腐败，而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中实行了名为“加速度”的政策，正是建立在安德罗波夫工作的基础上。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种改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便开始酝酿更为激进的方案。

1986年到1988年间，戈尔巴乔夫启动了3项主要的改革：公开化（glasnost）、经济改革（perestroika）和民主化（demokratizatsiia）。公开化也许是他最为人所知的改革计划，公开化意味着减少对媒体的审查，鼓励人们对新观点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希望这项计划可以赢得更多人对改革的支持，鼓励更多社会的参与者加入改革的进程，带来更多的改革思路，并赋予他一种武器——一个生气勃勃的媒体——使

---

① The most commonly cited exception is Helene Carriere d'Encausse, *Decline of an Empire*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80), who mistakenly argued that the main problem would be Muslim uprisings in Central Asia. Even as late as 1990, many leading scholars thought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unlikely. See various contributions in Alexander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The best treatment of Gorbachev is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他可以对付党内的腐败和保守势力。他预见到，经济改革可以通过限制中央计划者的权力并给予管理者和工人更大的自主权来激发各层面 121 的经济动力。民主化的进程始于为公民提供选举共产党员候选人参政的机会（一开始选民只能“选举”仅有的一名候选人）。1989—1990年间，非共产党组织也可以提名候选人参加竞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实现资本主义或西式民主，而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且得到广大公民积极拥护的较少压迫的共产主义体制。

我们不再一一讲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改革并没有如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公开化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期，在苏联境内出现了对戈尔巴乔夫和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攻击；经济改革引发混乱并产生了更多的经济问题；民主化则促成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甚至反对苏联的机制的建立。我们的关注点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一揽子改革是如何导致苏联境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的。

这场运动的领袖并非乌克兰人，而是波罗的海沿岸民族——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独立，后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成为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的牺牲品。和西乌克兰人一样，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反抗苏联的统治，并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惩罚。二战后，许多俄罗斯人移民到波罗的海三国中，并把持当地政治经济的高层领导位置。当地的语言降到次等地位，俄语在很多领域成为主流语言。许多波罗的海人感到自己被殖民化了。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鼓励人们开放地讨论斯大林的错误，允许人们表达对苏联当局的不满，而一直感到自己被奴役、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被莫斯科非法兼并的波罗的海人民也受到鼓舞。他们不仅希望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希望能真正改变现状。运动最初集中在对本土语言和文化的保护上，后来发展为在苏联体制内争取主权并最终实现完全的独立。经济改革政策之所以有利于运动的发展，原因在于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是最富有的，相信经济去集中化对其有利，因此许多人努力推动争取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最后，民主化为民族主义团体提

供了组织和争权的手段——他们在1990年三国共和国级别选举中获胜——并促使当地共产党干部为了获得民众支持而转向民族主义。尽管在1986—1987年间发展较慢，但民族主义的声势还是在波罗的海国家迅速发展壮大，当地精英阶层和莫斯科当局无力或不愿去阻止他们的活动。波罗的海国家作为榜样，很快便影响到包括乌克兰的苏联全境。[①] 在1989年到1990年间，在莫斯科看来，一些共和国的局势已相当严重。就像电影《幻想曲》（*Fantastia*）中魔法师的学徒一样，虽然并非故意释放民族主义的妖精，但已经无法把它再装回瓶中了。

122

二、切尔诺贝利事故

虽然民族主义运动最初在乌克兰之外兴起，但一场重大事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上任初期的乌克兰：在基辅以北60英里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座核反应堆发生泄漏事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讨论切尔诺贝利安全措施匮乏、工人纪律涣散和劣质工程的文章成为苏联公开化政策的先声。[②]

然而，几乎无人能够想象1986年4月26日早晨在切尔诺贝利究竟发生了什么。4个核反应堆中的1个发生泄漏并爆炸，向大气中释放了120万居里的放射性物质，大约是1945年投到日本的2颗原子弹辐射量的100倍。2名工人在最初的爆炸中死亡，20多名工人和消防员在次周死于爆炸的直接影响。尽管受害者的具体数据很难统计，但估计大约有6 000—8 000人死于辐射，并且有数千人患上癌症或有出生缺陷。[③] 这次事故并非是人为失误或设备出错造成的，而是在一次实验进行过程中反应堆的自动关闭系统被错误地关掉了。[④]

---

① Mark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Bohdan Nahaylo, *The Ukrainian Resurgence*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9), pp. 57—58.

③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Boulder: Westview, 1997), p. 201.

④ Reid, 1997, pp. 194—195.

切尔诺贝利事故本是一次单纯的环境灾难，但是因为苏联当局处理措施不当，从而使事故变成一场政治危机，成为政府漠视民众的标志性事件。消防员和负责清理事故的人员缺乏有效的针对辐射的保护，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日常生活——包括足球赛和户外婚礼——在靠近核电站附近的地区仍照常进行。苏联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的2天半才发布官方声明，而且是在瑞典政府在其领土上检测出辐射云之后不断质询的情况下才做出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谢切尔比茨基曾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询问是否取消基辅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据称戈尔巴乔夫回绝了他的要求，并威胁将其开除党籍。① 结果，庆祝五一节的户外活动在基辅照常进行，尽管城市的辐射指数已经超过安全级别。直到5月6日，事故发生10天之后，乌克兰卫生部长才发布警告，随后25万人从基辅暂时撤离。党的高级官员已经在几天前将家眷秘密送出城。戈尔巴乔夫直到5月14日才发表声明，主要是指责西方媒体散布此次事件的谣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苏联当局一直阻止对这次事故的独立调查。当面对切尔诺贝利附近区域非正常的高癌症患病率和出生缺陷数据时，在基辅的国家辐射治疗中心竟把口腔癌归因于牙病，把畸形说成是近亲通婚的结果！后来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独立后乌克兰驻美大使的尤里·谢切尔巴克（Yurii Shcherbak）医生说过：“切尔诺贝利并非像是共产主义体制。他们本身就是一体的。”②

123

切尔诺贝利事件在乌克兰乃至整个苏联都产生了社会和政治后果。它清楚地暴露了公开化政策的局限，并激励了记者和作家们勇敢地争取更多的政治公开性。同时，它也开创了环保运动的先河。它全面揭露了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控制，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更加坚信乌克兰只是俄罗斯的殖民地。因此许多人开始对共产主义和乌克兰在苏联的位置提出质疑。后来成为乌克兰环境部长的尤里·科斯藤科（Yurii Ko-

---

①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9.

② Reid, 1997, pp. 194, 204.

stenko）承认切尔诺贝利事故“粉碎了我对极权体制最后的一丝幻想”[1]。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纪念后来成为反苏反共产主义游行示威的原因。用一句观察家的话来说，切尔诺贝利“使人民精神遭受重创，后来又激励了人民”[2]。它成为其后动员大众争取主权和独立的强有力的象征。正如罗曼·索尔查尼克（Roman Solchanyk）所解释的：

在这次核灾难之后，乌克兰的作家和记者们在讨论苏联对乌克兰语言和文化长达 70 年的实验时，开始使用“语言学的切尔诺贝利”或“精神的切尔诺贝利”的字眼。简而言之，对乌克兰人来说，切尔诺贝利已经成为苏联体制表里不一和失败，总之完全破产的象征”。[3]

三、乌克兰人为变革而动员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大爆发始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后。在 1986 年 6 月乌克兰作家协会的大会上，代表们讨论了乌克兰民族权利的问题，并含蓄地对当局，尤其是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切尔比茨基提出批评。乌克兰最资深的作家奥列西·冈察尔（Oles Honchar）为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背书，同时也强调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乌克兰作家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强调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诗人、共产党员伊万·德拉克（Ivan Drach）进一步将切尔诺贝利与大饥荒、他称之为“实质上的种族文化灭绝”的乌克兰语教育出版的匮乏、俄语成为公共交流主要工具等现象联系在一起。苏联晚期的一个笑话颇为传神：“你可以立刻教会一个犹太人说乌克兰语，教一个俄罗斯人大概要两三年，但要教一个野心勃勃的乌克兰人那要花上一辈子。”[4] 对许多人来说，罪魁祸首就是不遗余力打击任何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迹象的行为的谢切尔

124

① “Waiting for the Next Chernobyl,” *Financial Times*, April 21, 1993.

② Nahaylo, 1999, p. 60.

③ Roman Solchanyk, *Ukraine: From Chernobyl to Sovereignty* (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p. xiii.

④ Reid, 1997, p. 205.

比茨基。德拉克后来评论道："在莫斯科他们剥掉你的指尖，但在基辅他们砍掉你的手指。"[1] 尽管公开化政策已经实施，但德拉克在1986年的演说还是被媒体过滤掉了，他的同事后来回忆说他的讲话是"乌克兰民族革命的第一声号角"。[2]

这一民族复兴的号角——如果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肯定会让德拉克坐几年监狱的——也被其他乌克兰团体所接受。这些团体大部分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非正式组织。有几个团体接纳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有不少是在1986年和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缓和中被释放的。最为出名的当属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它于1988年3月正式成立，并把自己看作70年代乌克兰人权团体的继承者。曾作为政治犯服刑达26年之久的列夫科·卢基安年科（Levko Lukianenko）被选为首任主席，他在1988年的《接下来怎么办?》（*What Next?*）一文中哀叹乌克兰已经"被迫害、掠夺、俄罗斯化和撕裂"，经济改革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或死亡"。[3] 尽管很多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的成员希望实现乌克兰独立，但这种想法被视为过于激进而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1988年，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的原则宣言强调促进人权和民主化，对乌克兰语进行保护，将权力下放到共和国一级。

在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创建者的协助下，独立于官方的作家协会——乌克兰独立创新知识分子联盟以及乌克兰文化和生态俱乐部成立了。尽管这两个组织最初的重点都在乌克兰的文化复兴上，但其工作却表达了更多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关注。例如，他们要求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死于苏联监狱的乌克兰作家重新安葬，并正式出版他们的作品。他们要求研究如饥荒问题等乌克兰历史的"空白点"，并要求庆祝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的千年纪念。这一切都令当局十分不快。

---

① *Literaturna Ukraina*, July 9. 1987.

② Nahaylo, 1999, pp. 62—63.

③ Quoted in Taras Kuzio and Andrew Wilson, *Ukraine: Perestroika to Independ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pp. 66.

因此，尽管这些组织自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对抗保守派的同盟者，但国家控制的媒体还是对他们进行了袭扰和攻击。例如在 1988 年，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2 周年之际，当乌克兰文化和生态俱乐部在基辅组织抗议时，当局利用扬声器干扰发言，还逮捕了 17 个人。媒体宣称“一股极端分子……试图制造骚乱、干扰街道整修并阻碍交通”。[1]

125

学生也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1987 年，狮子社（Tovarystvo Leva）在利沃夫成立。作为一个纯青年组织，它致力于“通过文化和知识来复兴乌克兰独立国家”。[2] 尽管这个组织的政治色彩较淡，其活动主要包括教堂和公墓的修葺、教授传统陶艺、环境保护研讨会以及乌克兰艺术家的音乐会和演出，但也是通过与当局进行长达 2 年的斗争才获得正式注册。在基辅，学生成立了一个以 19 世纪乌克兰文化社的名字来命名的独立学生组织——格罗马达（社团），出版地下（samvydav 或 samizdat）期刊，抵制在基辅大学组织的强制性军事教程，并争取在一处被军校占据的地点重建基辅—莫吉拉学院。到 1988 年秋季，格罗马达和环境组织——绿色世界联盟（Green World Association）成功地在基辅举行了超过 1 万人参与的游行，成立了乌克兰人民阵线并举行反对核武器的活动，还向领导层提交了公开信，要求谢切尔比茨基和其派别对乌克兰文化和语言犯下的罪行负责并将其撤职。在此之后，当局对其活动非常警惕，并将许多格罗马达的成员从大学里开除。

在苏联统治时期长期受到压制的宗教组织同样诉诸民族主义行动。无论是信教者（当时为少数），还是不信教的人，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帝皈依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被说成是俄罗斯的节日。许多乌克兰人感到自己的历史被掠夺了。在西乌克兰，被取缔的希腊天主教会的教士和虔诚的教徒展开争取教会地位合法化的活动。在西乌克兰有深厚根基的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在公开化政策后复兴，西乌克兰的很多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士纷纷投奔。1989 年，

---

① Quoted in Kuzio and Wilson, 1994, p. 71.

② Kuzio and Wilson, 1994, p. 74.

这两个教会都得到官方许可进行宗教活动，于是产权之争成为焦点，因为苏联当局把教会财产转交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宗教因此成为乌克兰人维护民族文化权利的战场。

126 到1988年，人们已经试图模仿波罗的海国家民族民主动员的成功模式，并将众多乌克兰文化、宗教、环保和青年组织整合进人民阵线中。最大规模的集会发生在利沃夫，一些当地的共产党官员也对这种努力表示了同情。1988年夏天，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的前身——支持改革民主阵线召集了2万—50万人在利沃夫大学前集会。政府派出军警破坏了集会，后来又拒绝承认集会权。在基辅，人们进行了小规模集会。因此可以说，乌克兰社会的某些层面虽然已经觉醒，但缺乏做出决定性政治突破的手段。

四、独立运动的发展

乌克兰社会的活跃表现初期体现在对戈尔巴乔夫和其改造苏联计划的支持上。当然有些人向往乌克兰的独立，但大部分乌克兰团体倾向于在重建的，或许更加宽松的苏联国家内部争取更大的文化表达权和民主自治权。但是到了1989年，形势开始有利于乌克兰的独立。到1990年，乌克兰人口的大部分都被动员起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向当局提出更多的诉求。

1989年发生的3件大事推动了乌克兰独立事业的前进。1989年2月，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被称为鲁赫，Rukh，或“运动”）起草了第一份行动草案。关于建立如立陶宛萨尤迪斯（Sajudis）或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民阵线那样有着更广泛群众基础运动的讨论，从1988年就开始了。成立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的动力来自于乌克兰作家协会和1989年初正式成立的塔拉斯·舍甫琴科乌克兰语社团，而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绿色世界和众多文化组织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苏联官方意见认为人民阵线的成立与公开化、民主化的精神相符，但更加保守的基辅共产党领导层却对此疑虑重重。包括众多共产党员会员和会刊《乌克兰文学》（Literaturna Ukraina）的作家协会

成为在乌克兰公开化政策最突出的例子，它主张推动乌克兰语为公共语言，调查斯大林时代的罪行，采取切实的行动保护环境。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在 1989 年 2 月的行动草案将组织界定为“建立在乌克兰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上的大众的、自发的组织”，致力于“国家、公共和经济生活领域根本的社会主义的革新”。尽管苏联当局认为至少这部分声明是无害的，但鲁赫走得更远，它宣布运动的目的是要重新界定乌克兰在苏联政府中的地位并将乌克兰变为一个主权共和国。尽管运动并没有要求直接的独立，但明确表示乌克兰应该掌握自己的资源和企业，乌克兰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鲁赫直接挑战共产党，宣布将积极参加竞选并提名自己的候选人。[①]

127

鲁赫在 1989 年 3 月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首次展示出自己的政治力量。戈尔巴乔夫把代表大会视为苏联体制民主化的一部分，尽管有 1/3 的席位预留给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组织（如工会），剩下的席位由共产党之外的政党组织竞争。在实际选举过程中，共产党操纵的竞选机制尽全力给对手制造障碍，使选民无法真正对候选人进行挑选，但在一些地区非共产党员候选人确实得到了参选的机会。基辅的共产党领导人想方设法诋毁并遏制鲁赫，然而在基辅和利沃夫的公共抗议活动给予了鲁赫必要的支持和鼓励，有几名鲁赫的成员成为代表大会的候选人。竞选的结果是非共产党的反对派获得小胜，几个候选人赢得了基辅和西乌克兰的部分选区，几名没有对手的共产党官员没有得到必需的 50% 以上的选票（选民直接划掉了他们的名字），部分同情民族运动的共产党员如鲍里斯·奥利尼克（Borys Oliinyk）也成功当选。到 1989 年 4 月，鲁赫和其盟友在利沃夫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曾被查禁的乌克兰蓝黄双色旗重新出现。

当局感到十分紧张。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阵线在选举中也表现出色，并继续伸张主权。4 月，苏联军队在格鲁吉亚杀害了民族主义抗议者。莫斯科当局要求对民族主义者以及在他们眼中以改革为借口破

---

① Nahaylo, 1999, pp. 172—173.

坏法律和秩序的人施以强硬手段。基辅当局担心自己会丧失权威与合法性，并不仅仅是因为选举，同时也因为许多人选择退党。当局阻止鲁赫的领导人德拉克参加在利沃夫的决定性竞选，并设法败坏其他候选人的名誉。这些举动反而导致更多的民众抗议。同时，谢切尔比茨基严惩了那些与反对派为伍的党员，并宣布鲁赫的行动是“实质上的分裂主义的”“破坏性的”和“极端主义的”。[1] 掌管乌克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重申乌克兰蓝黄双色旗和三叉戟标志为“肮脏和血腥的象征”，仍然是被禁止使用的。他还警告，鲁赫有可能会被反苏势力所接管。

128

1989 年 6 月和 7 月间，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种不满的声音——民族主义、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不绝于耳，不过大会仍然掌握在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手中，戈尔巴乔夫甚至在会议中无礼地关掉了苏联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洛夫（Andrei Sakharov）的麦克风。尽管如此，大会仍然成为众多不满意见的扩音器，而会议一直在苏联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那些争取扩大乌克兰权利的人们聚在一起，并与其他志同道合者结成非正式的联盟。

1989 年 9 月 8 日，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在基辅召开了成立大会，1 158 名代表中有超过 1 100 人参加了大会，而鲁赫的成员已经达到 28 万人。尽管数目不少，但仍不及乌克兰共产党党员总数的 1/10。大会在基辅的理工研究所举行，会场里到处装饰着乌克兰民族标志和地区徽标，一首乌克兰哥萨克进行曲成为大会主题曲。尽管有人发言要求争取独立，例如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的卢基安年科就呼吁运动“废除现在最大的恶魔——帝国（苏联）”[2]，但大部分人要求发展乌克兰文化和语言，扩大政治和经济主权，并将苏联改造为一个邦联。这些究竟指的是什么——一位发言者号召建立“自由国家联合体中独立的乌克兰”——十分模糊不清。[3] 许多人偏离轨道，转而呼吁乌克兰

① Nahaylo, 1999, pp. 192—193.
② Kuzio and Wilson, 1994, p. 111.
③ Nahaylo, 1999, p. 218.

的少数族裔——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和鞑靼人给予支持，以实现乌克兰社会民主化的目标。大会集中了乌克兰所有州的代表，力图体现最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代表中有 72% 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10% 为工人，只有 2.5% 的人是集体农庄工人；半数代表来自西乌克兰，并且有 1/5 的人来自基辅。[①]

新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中的区域特性格外值得我们注意。大部分民族—民主活动集中在西部，首都基辅自然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焦点。西乌克兰，尤其是历史上的加利西亚和沃伦等区域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相比，有着众多不同的特点。其在 1939 年加入苏联就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后苏联占据波兰东部的产物。与波罗的海人民认为自己在协定后遭受苏联入侵的看法相似，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认为苏联非法进入了这个地区，反苏游击战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西乌克兰在历史上不曾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其人口构成中乌克兰裔占到绝大多数，许多人是希腊天主教会和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的成员。在地理上，乌克兰与西方更近，也和反共运动活跃的波兰紧紧相邻。比起其他乌克兰人，西乌克兰人更倾向于认为苏联是由残暴的帝国主义者“莫斯科人（moskali）”所统治的，是其本土文化的大敌。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在西乌克兰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表明了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成长和局限”。[②] 因此威尔逊给乌克兰民族运动贴上“少数派信仰”的标签，因为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并没有向西部那样狂热地拥抱民族主义和独立。[③] 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大会之后，来自哈尔科夫的代表以辞职作为对他们认为是极端主义的议程的回应。即使到 1989 年末，大部分乌克兰人也并不支

129

---

① Kuzio and Wilson, 1994, p. 111 and Nahayli, 1999, p. 218.

② Ilya Prizel, “Ukraine Between Proto-Democracy and ‘Soft’ Authoritarianism,”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eds. *Democratic Changes and Authoritarian Reactions in Russia, Ukraine, Belarus, and Moldov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38—339.

③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①]

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其他地区风平浪静。1989年夏季，第二次转折性事件发生了，地跨俄罗斯和东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矿工罢工事件。[②] 这些罢工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丰富商店中的商品，尤其是肥皂。这些罢工是由经济改革混乱所带来的经济滑坡所造成的，而且和其他众多人民阵线一样，工人们也宣称自己是改革的支持者。但他们并非民族主义者，并且对当地鲁赫或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的个别代表报以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顿巴斯曾是（并且现在也是）乌克兰境内高度俄罗斯化的区域，俄罗斯裔占到人口的40%以上，而且俄语也是当地众多乌克兰裔人口使用的语言。东乌克兰是乌克兰多数"重工业"（如钢铁厂和化工厂、矿场、国防工业）的集中地，该地区的工业工人在苏联官方教义中是受眷顾的阶级，而且重工业在国家预算中占到较大的比重。经济改革承诺要改变这一切，令许多东乌克兰人开始担忧自己的未来。1989年，矿工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以抗议政府和工厂的政策。在莫斯科答应了诸如给予他们对矿场的自主管理权等要求后，矿工于7月底返回工作岗位。工人被迫组织起来对抗一个自称为工人的国家，充分说明了人民对当局的信赖到底有多少。

130

尽管我们可以把在1990年和1991年反复发生的罢工事件单纯视为经济问题，但确实对民族问题产生影响，即使没有几个顿巴斯工人会承认自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③] 社会经济问题最终变成一台"独

---

① Alexander Motyl and Bohdan Krawchenko, "Ukraine: from Empire to Staehood",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ew State, New Politics: Building the Post- Soviet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6.

② A good source for worker mobilization in Ukraine is Sue Dvis, *Trade Unions in Russia and Ukraine, 1985—1995* (New York: Palgrave, 2001).

③ Members of the Donbass Regional Strike Committee were present at *Rukh's* founding congress,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ers and the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involved with *Rukh* was always tenuous. For example, the miners' movement agreed with *Rukh* about republican sovereignty, but it expresse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use of Ukrainian national symbols, which subsequently were not adopted as the official symbols of *Rukh*.

立的发动机"[1]，因为很多人开始争论莫斯科的统治对乌克兰的经济是否有益处。中央政府几乎控制了乌克兰的全部经济、直接投资和税收，并拿走了几乎所有的硬通货（外币）收入，而对于文化、住房和科研的投入，乌克兰则要比俄罗斯少得多。糟糕的环境——除切尔诺贝利之外还包括受到污染的空气和水源，在东乌克兰尤其严重——成为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原因，其中包括预期寿命降低和高流产率（40%）等。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乌克兰的经济如果得到更多的自主权，而非完全独立，会更好一些。乌克兰总理维尔托德·福金（Vitold Fokin）是民族主义活动者们的主要打击对象，他在 1990 年也承认"我们唯一的希望和改善现状的机遇就是经济独立"。[2]

第三次转折是 1989 年 9 月谢切尔比茨基被撤销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此事发生在鲁赫成立大会的 2 周以后，乌克兰共产党此时也发起一场针对这个组织的运动。在许多人看来，谢切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门徒，是政治局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政治局是当时苏联最高政治决策部门，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之一。戈尔巴乔夫曾经容忍谢切尔比茨基，并希望他能支持其改革计划。但到了 1988—1989 年，形势已经很明朗，谢切尔比茨基并不想改变强硬路线。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谢切尔比茨基的保守主义立场和对改革的抵制是有害的，因此在幕后进行了干涉。谢切尔比茨基于 1989 年失势，他被撤职的消息被苏联媒体说成是退休。其实这次行动的伏笔在 1989 年初就已经打好了，在戈尔巴乔夫的坚持下，一个更具调和性的人物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Volodymyr Ivashko）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谢切尔比茨基于 1990 年初去世，伊瓦什科就此接替他的位置。但伊瓦什科没能像谢切尔比茨基那样巩固自己的权威，1990 年 7 月卸任后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然而，谢切尔比茨基的下台"使当时铁板一块的党的精英阶层分裂为赞成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派，从而除去了民族运动

---

① Motyl and Krawchenko, 1997, p. 244.

② *Literaturna Ukraina*, April 5, 1990.

发展的一大障碍”。[①] 就在伊瓦什科掌权的 1 个月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就通过了一部语言法，提升乌克兰语为官方语言，并提交了逐渐在政府、媒体和教育领域推广乌克兰语的方案，尽管在条款中同样确保俄语作为交流的重要语言工具。最终，党内的几位高级人物成为“民族共产党人”，后来转而接受民族独立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131

与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同时，民族主义的民众动员也席卷了 1990 年的苏联和乌克兰，莫迪尔（Motyl）和克拉夫琴科（Krawchenko）称其为“决定命运的一年”。[②] 1990 年上半年，民族主义势力所控制的波罗的海三国已经清楚表明了退出苏联的愿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共和国也在辩论宣布主权的好处。

在乌克兰，这一年一开始就发生了一次颇具戏剧性的群众动员。1990 年 1 月 22 日，也就是 1918 年短命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独立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鲁赫号召乌克兰人仿效波罗的海“人链抗议”的方式。1989 年曾有 200 万人手牵手参加纪念《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的活动。结果，450 000 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汇聚到连接利沃夫和基辅的道路上。当然，人们并没有走得更远，这一点都不奇怪。

1990 年 3 月，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是一次决定性的事件。40 个独立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民主集团（Democratic Bloc），呼吁争取乌克兰政治经济主权、新宪法，民主化、国家重生和销毁核武器。民主集团组织了多次游行和集会，在对苏共统治逐渐幻灭的东乌克兰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尽管选举要比在典型的苏联统治时期自由许多，但仍存在问题，包括缺少选举监视人，并且当局一直到注册候选人的截止日期过去后才同意将鲁赫注册为合法组织。虽然如此，民主集团做得确实不错，赢得了大约 25% 的席位。在加利西亚，它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47 席中的 43 个），在基辅赢得了可靠的多数（22 席中的 16

① Motyl and Krawchenko, 1997, p. 247.

② Motyl and Krawchenko, 1997, p. 248.

个）。民主集团在东乌克兰表现不佳，但也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赢得了一些席位。尽管苏共仍主导全国的政局，但许多党员也承认，党必须考虑民众的要求，打造“与人民之间真正的而非从属性的关系，以体现党所声称的代表人民的利益”。[①]

同时进行的还有地方选举。民主集团在加利西亚的地区议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与鲁赫的领军人物之一、前政治犯的维亚德切斯拉夫·乔诺维尔成为利沃夫州议会领导人，苏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宣告终结。在利沃夫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中，它宣布自己为“自由的孤岛”，决心致力于“终结极权主义体制”并且“争取建立我们民族未来独立、民主的乌克兰国家”。[②] 利沃夫议会颁布条例，以乌克兰的标志取代苏联标志，将希腊天主教会合法化，注册了众多独立的非共产党团体，关闭了工厂和各机构中的共产党支部。在此之后，基辅当局发布警告，称“破坏性因素”已经占据了西乌克兰。

132

然而民族民主的势头愈发强劲。在西乌克兰有上千人退党，到1990年末有超过25万人退出共产党，比1989年的6 200人多出许多。[③] 共青团利沃夫支部变身为反对派的利沃夫青年民主联盟，鲁赫的成员总数达到了50万人，民众动员和大选的胜利确保了乌克兰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尽管民族民主反对派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中仍是少数，却有着较好的组织体系，并且利用对议会会议进行全国广播的机会向更广泛的听众传达自己的信息。尽管共产党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450个席位的选举中赢得了385席，然而到议会召开时，共产党员只占到微弱多数的239个席位。被任命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伊瓦什科在7月份突然辞职，令共产党更加被动。与此同时，共产党内的温和分子表现出与反对派合作的意愿。他们在最高苏维埃内部结成一

①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0.

② Kuzio and Wilson, 1994, p. 127.

③ Yekelchyk, 2007, p. 184.

个独立的团体民主平台（Democratic Platform）以支持民主化和经济改革，并开始使用鲁赫的关于争取乌克兰主权的口号。

尽管西乌克兰处于苏共的势力范围内（最高权力仍然归属于基辅和莫斯科），到1990年夏季，东乌克兰开始了新一轮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虽然莫斯科曾做出保证，工人们的处境依然随着1989年以来苏联经济的总体危机愈演愈烈而不断恶化。这一次矿工们更为激进，他们要求乌克兰政府辞职，清洗当地党组织，将党控制的资产国家化。部分工人表达了支持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呼声。

乌克兰的众多团体呼吁变革，苏共丧失了政治主动权。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以355票对4票通过了主权宣言，而在1个月前，俄罗斯已经在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通过了相似的宣言。这份宣言借用了许多在鲁赫成立大会上所表述的观点，声明乌克兰法律优先于联邦法律，乌克兰在经济上获得自主权，有权发行自己的货币，创立独立的银行系统，并且有权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但这仍不是一份独立宣言，因为它不止一次强调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设想通过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来改革苏联。两股势力都宣布赢了，鲁赫成员和其盟友把其看作通往独立的第一步，而共产党员倾向于视其为通往新苏联的一步。

133

1990年秋季，乌克兰更加体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由于害怕局势失控，当局取缔了议会附近的游行，限制反对派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还通过新法律限制当地议会的权力。军队也在基辅郊外大规模集结，民族主义的旗手斯蒂潘·卡马拉（Stepan Khmara）被人捏造罪名而遭到逮捕。有些人开始担心主权宣言可能永远不会付诸实践。不过，1990年10月，反击以绝食抗议的学生占领基辅市中心广场为开端，要求民主化、经济改革和履行乌克兰主权的许诺。乌克兰的大学生纷纷罢课，1990年10月16日，学生、工人、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知识界的成员共计15万人向议会进军，他们的诉求经广播和电视广为传播。政府拒绝谈判，但在10月18日，大批来自基辅兵工厂的工人加入学生的队伍，乌克兰总理维塔利·马索尔（Vitalii Masol）辞职，其

继任者福金保证实行一系列改革。

到1990年末，乌克兰与莫斯科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但取得完全独立的前景还不明确。1990年10月，鲁赫召开第二次大会，从其名称中去掉了改革的字眼，并明确提出要争取独立，尽管鲁赫57%的代表来自加利西亚或基辅，它能否代表大多数乌克兰人是令人怀疑的。相对中庸的民主平台试图走介于乌克兰和苏联之间的中间路线来争取沉默的大多数，但问题是，沉默的大多数仍然保持沉默，只有克里米亚是个例外。1991年3月，民众对建立自治共和国的呼吁得到了回应，不过俄罗斯裔和乌克兰裔的居民没有被动员起来。加利西亚的许多公民参加街头游行或加入市民组织，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和基洛夫格勒的市民的政治积极性则落后得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不同，鲁赫缺少对于主导乌克兰政治的全国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克拉夫丘克站到了台前。[1] 当共产党在1990年与乌克兰国家不再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克拉夫丘克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尽管他曾是民族主义持不同政见者眼中的煞星，但却非常了解现实。拥抱民主和主权，能使政治精英们比坚持苏联正统信仰得到更多的政治合法性。他公开使用乌克兰主权的概念，但在行动中又表现得模糊。1990年10月，新任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斯坦尼斯拉夫·古连科（Stanislav Hurenko）称克拉夫丘克“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2] 因为乌克兰没有设立总统一职，作为议会议长的克拉夫丘克开始代行国家首脑职务。1990年11月，他邀请叶利钦来基辅，并签署了两国之间内容广泛的条约，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好像已经无足轻重了。克拉夫丘克反对使用武力镇压立陶宛的争取独立团体，并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关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计划。

134

① Wilson, 2000, pp. 163—165.

② Yekelchyk, 2007, p. 186.

五、苏联的解体与乌克兰宣布独立

到1991年初，苏联的未来看起来暗淡无光。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宣布独立，乌克兰等众多加盟共和国也发布主权宣言，经济还在持续衰退，整个国家日益被民族主义、民主派势力和共产党当局撕裂。戈尔巴乔夫在公众和党内都得不到支持。很多苏联公民都感到了内战的不祥预兆。

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改革后的联邦体制维持苏联的存在。1991年3月，苏联公民参加新联盟条约的投票，决定他们是否支持维持苏联为一个“平等主权国家的新型联邦”。有6个国家要求完全独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因而拒绝参加此次投票。加利西亚的公民组织对联盟条约进行抵制，并质问选民：难道你们不希望乌克兰独立吗？此外，克拉夫丘克成功地在乌克兰地区的选票上增添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乌克兰在《乌克兰主权国家宣言》的原则下成为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一员？”

投票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小胜。在9个参与投票的国家中，78%的选民赞成保留苏联。在乌克兰，有超过80%的具有选民资格的公民前往投票站，有70.5%的选民投票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后来，这项数据被部分人引用，以证明苏联解体未能反映苏联或乌克兰人民的真实意愿。

135

但重要的是有80.2%的人投票肯定了克拉夫丘克增加的问题。虽然在问题中使用了主权的字眼，但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意味什么仍然很模糊。因此，克拉夫丘克可以用他的“胜利”来解释戈尔巴乔夫所设计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也可以是“主权国家联盟”。他宣布全联盟投票的结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戈尔巴乔夫提议进行“9+1”谈判，即9个共和国加上被削弱的中央政府，但克拉夫丘克更倾向于“9+0”——不要中央，简而言之仍是要求乌克兰独立。因此尽管加利西亚88%的选民在1991年3月的投票中要求独立，但主权“仍然

是政治想象力所达不到的界限”。[1]

1991年春季发生的诸多事件反映了气氛的白热化。加利西亚人通过选票推动乌克兰仿效其他共和国，正式脱离苏联；东乌克兰的矿工们发动了另一轮罢工，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并确认乌克兰主权宣言的宪法地位。克拉夫丘克试图在戈尔巴乔夫和乌克兰的激进势力之间找到一种中间立场，宣布希望见到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但包括乌克兰共和党（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的分支）在内民族主义政党威胁说，如果签署新盟约就进行总罢工，学生领袖们也发誓继续进行绝食抗议。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在进行国家的构建，包括在政府中设立总统一职、工业企业国家化、成立国家银行并可以发行独立的乌克兰货币。

至此，乌克兰的独立看起来已经近在咫尺了。然而部分人对前景仍保持着警惕。尽管徒劳无功，很多俄罗斯裔试图创立一个类似于波罗的海国家的国际组织来维持苏联的存在。很多莫斯科人对同为斯拉夫兄弟的乌克兰从俄罗斯分离出来的愿望迷惑不解。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在1991年8月前往基辅发表演说，警告“自杀性民族主义”的危险，因此被美国国内讥讽为“基辅孱鸡”。

正如戈尔巴乔夫上台引发了乌克兰民族民主运动的开端，乌克兰争取独立的最后一件大事也发生在莫斯科。1991年8月19日，就在新盟约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前一天（克拉夫丘克没有打算参加），苏共保守主义势力和警备部队成立了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将仍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软禁。躲过逮捕的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前集合了民主派和反共产党的势力，在苏军转而支持叶利钦以后，这次组织仓促的政变便告瓦解。叶利钦受到胜利的鼓舞，进一步禁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 136

在这次戏剧性的事件中，基辅的局势比莫斯科要平静很多。古连科领导的乌克兰共产党站在政变的一方，要求各地党支部领导人

---

[1] Nahaylo, 1999, p. 352, and Wilson, 2000, p. 165.

团结所有爱国力量，禁止所有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不过，克拉夫丘克更为谨慎。他在乌克兰电视台声明，“我们的立场是审慎再审慎”。克拉夫丘克做出上述举动的解释之一就是他已经准备接受莫斯科那边的任何结果。[1] 克拉夫丘克并没有观望太久，政变使苏共更加被动。

1991年8月24日，也就是政变流产3天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以346票对1票通过了独立宣言。接下来一系列议案——同样获多数票通过——宣布控制所有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国防军，并采用乌克兰货币。鲁赫及其盟友意识到他们的对手已处于守势，便推动对独立议案的快速投票。共产党员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左右大多数（在政变发生后立即有更多的党员退党），也投票赞成这些使乌克兰政府和社会去集体化的议案。乌克兰共产党于8月30日正式被取缔，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员仍然保持席位，其中有很多人加入新成立的社会党。换句话说，乌克兰共产党员给了民族民主反对派真正想要的东西，但通过对独立的投票，至少阻挡了潜在的会直接伤害到他们利益的通往民主和经济改革的议程。对克拉夫丘克个人来讲，他获取了紧急状态权力并无疑将会成为乌克兰的首任总统。议会副议长弗拉基米尔·格里诺夫（Volodymyr Hrynov）警告说：

> 我并不反对乌克兰独立，但我能看到我们今天通过这项决议所造成的危害。在没有达成乌克兰去共产化的决定之前，这项决议只是一纸空文。我们正在乌克兰建立一个极权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提议我们只有把这项决议和（其他）废除乌克兰极权主义社会的方案达成一揽子协议才能将其通过。[2]

很多人并没有预见到这可能会对新生的乌克兰国家的发展造成障

① Wilson, 2000, pp. 166—167.

② Wilson, 2000, p. 168.

碍。（参见第九章）相反，很多人都在庆祝几年前还仅仅是梦想，而现在即将实现的独立。

六、乌克兰独立全民公决

137

有2个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乌克兰的独立宣言真的获得大部分乌克兰人的支持吗？换句话说，它是否是合法的、建立在公意之上的？另外，在苏联迅速解体的混乱中，乌克兰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后苏联时代国家关系呢？换句话说，苏联的分家事宜如何处理呢？

第一个问题在1991年12月1日得到解决。乌克兰人参加了关于独立和选举第一届总统的投票。自8月的独立宣言以来，苏联和俄罗斯当局并没有进行干涉，乌克兰已经按照独立国家的姿态行事，所有主要政党和大众媒体建立起了一个支持独立的平台。乌克兰独立在全国各个州都获得支持（详见表2）。不仅西乌克兰以压倒优势支持这项决议，东部和南部，甚至以俄罗斯裔为主的克里米亚地区也赞成乌克兰独立，尽管数据比起其他地区较低。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乌克兰人都是积极的民族主义者。据调查显示，投票者关注的主要是经济问题，乌克兰文化复兴或维护乌克兰政治主权的考虑则排在次席。调查同样反映了乌克兰种族文化的分裂，俄罗斯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成员明显比乌克兰裔或希腊天主教会及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的成员对独立的支持率低很多。[①] 尽管如此，绝大部分乌克兰人还是拥抱了独立，这在6个月前还被称为“极端”的观念，也表明1991年下半年乌克兰的变化究竟有多么大。

---

① Kuzio and Wilson, 1994, p. 190.

表 2　1991 年 12 月投票结果

地区	支持独立%	支持克拉夫丘克%	支持乔诺维尔%
西部	97	37	50
中部	95	69	17
东部	88	71	13
南部	87	71	14
克里米亚	54	54	5
总计	90	62	23

资料来源：引自 Taras Kuzio and Andrew Wilson, *Ukraine : Perestroika to Independence* , New York：St. Martin's, 1994, p. 187, 189.

138　有 6 名候选人竞选乌克兰总统，2 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克拉夫丘克和乔诺维尔此时已经成为鲁赫最为显赫的政治人物。克拉夫丘克把自己描述为经验丰富的稳健派。在承诺乌克兰独立的同时，他共产党高级官员的背景也足以安抚那些不希望乌克兰未来发展走向极端方向的人。因为媒体掌握在民族共产主义者手中，所以克拉夫丘克在新闻报道中与他的竞争者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克拉夫丘克作为左翼竞选人，同样得到了社会党和其他主要集中在东乌克兰的较小的左翼政党的支持。而乔诺维尔的支持面相对较窄，许多人把他看作是激进的或不可预测的选择。乔诺维尔在西乌克兰，尤其在加利西亚的成绩不错，但如表 2 所示，克拉夫丘克在除西乌克兰以外的所有地区都轻松赢得胜利。

尽管乌克兰的新领导人需要在独立之前做出许多重要决策，例如怎样处理乌克兰领土上的核武库，如何进行经济改革，新国家象征物是什么，但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确保苏联的解体以和平方式进行。乌克兰在 8 月的独立宣言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苏联的终结，12 月 1 日以后联盟的重建已再无可能。不仅乌克兰想脱离苏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也如此打算。在 8 月至 12 月间，已经于 7 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冷淡地回绝了戈尔巴乔夫关于重组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呼吁。甚至较少有民族主义动员的中亚国家也有意脱离联盟。

1991 年 12 月 8 日，在一场狂欢酒宴后，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领导人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Stanislav Shushkevich）在昔日勃列日涅夫位于西白俄罗斯的乡间别墅会面，一致同意肢解苏联。他们引证历史——既然 1922 年这 3 个国家是苏联的创始国，那么就有权利分裂苏联，取而代之的将是随后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这一组织旨在保证苏联各加盟国家的平稳分离，并维持彼此间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纽带。其他后苏联国家（但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也陆续加入独联体。独联体的具体功能和权力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但清楚的是——克拉夫丘克也强调了这一点——它并非是改造后的新联盟。相反，独联体是一个纯粹的主权国家自愿加入的组织。克拉夫丘克返回基辅后，曾担心旧的权力核心力量——军队或克格勃——的干涉，但这些组织已经被叶利钦所控制。苏联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宣布终止，乌克兰获得了独立。

第九章　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1991—2004）

独立宣言的发布使乌克兰终止了苏联加盟国的身份，也走上了消除苏联统治时期各方面的影响，建设一个强大、稳定、民主国家的漫长历程。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国家构建、民主化、经济改革和复兴，并战胜区域分裂以创建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在许多问题上境况不佳：经济崩溃、政治改革缓慢、民众对独立的幻想破灭。到21世纪初，伴随着总统身陷谋杀记者丑闻和其他一些犯罪事件中，乌克兰陷入到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中。本章主要探讨乌克兰在克拉夫丘克（1991—1994）和列昂尼德·库奇马（1994—2004）两任总统任期内的发展。

一、维护乌克兰国家

乌克兰成为一个“没有一个现代民族或与其邻国相区别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独立国家。[①] 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成为乌克兰精英们重要的（即使不是首要的）挑战。乌克兰继承

---

① Taras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

了苏联的很多遗产（如官僚体制、法律、当地的驻军和装备），而面临的任务就是让这些东西成为乌克兰的，并使乌克兰国家不仅在国际舞台上，也在那些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新国家公民的国内民众中成为现实。

国家构建需要从高度实用主义（如，边境安全、颁布新宪法）到象征主义（如重建国家象征物、遴选国徽）的一系列构成要素。从1991年当选为总统的前共产党员克拉夫丘克，到鲁赫的民族民主反对派及其他政党，在90年代初均赞同需要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机构。部分任务进展顺利，例如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就分割苏联军队问题上进行了谈判。乌克兰的立场是驻扎在乌克兰境内的军队和装备都应成为乌克兰武装力量的一部分，80万名苏军士兵应该宣誓效忠捍卫乌克兰。在驻军问题上，乌克兰与俄罗斯产生了2点分歧：如何处理乌克兰领土上近200枚核导弹；如何分割以克里米亚为基地的黑海舰队。乌克兰拒绝把所有资产都交给俄罗斯，因而与俄罗斯以及关注苏联核武库安全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从本国角度出发，乌克兰希望获得对这些导弹的经济补偿，并且得到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其安全的保证。如果得不到这样的保证，乌克兰至少要保留足以自卫的武器装备。

乌克兰也寻求国际上承认其国家地位，进一步使自己的独立合法化。实际上，意味着乌克兰要与俄罗斯保持独立性，而后者则致力于推动独立国家联合体向前发展，以保持后苏联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乌克兰领导人对独联体的态度不温不火，并不希望其权力凌驾于乌克兰之上，他们希望世界承认乌克兰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而并非是某一机制的组成部分。包括美国、加拿大、波兰和德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迅速响应乌克兰人的要求，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称其承认乌克兰的独立。正如随后将会提到的，问题是俄罗斯议会中有些人并不认可上述要求，而是认为乌克兰的所有或部分区域（如克里米亚）应该继续归属于俄罗斯。

在乌克兰国内，克拉夫丘克采取措施强化国家和乌克兰人的民族

认同。一个方法就是推广乌克兰语的使用，原因是很多新生代精英认为，要使乌克兰国家更加“乌克兰”，就应该着重强调与俄罗斯的分离。尽管“乌克兰化”被认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克拉夫丘克在西 143 乌克兰赢得巨大支持的时候，上述举动确实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和南部区域遭到抵制。克拉夫丘克也支持使用乌克兰蓝黄色国旗（在他担任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曾经压制使用）、国徽（基辅罗斯时代的三叉戟）和国歌《乌克兰尚未灭亡》。克拉夫丘克支持乌克兰东正教会（基辅大牧首）而非俄罗斯东正教会。学校和媒体也在推动宣传独特的乌克兰民族历史，宣布基辅罗斯实际上是乌克兰国家的原型，并且把哥萨克赞颂为热爱自由的民主主义者。

克拉夫丘克经历了从“苏联国家的捍卫者到乌克兰国家的卫士，从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者到苏联无条件的批评者，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敌人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表”[①] 的成功转型。他采用了很多反共产主义民族民主分子的纲要，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转而成为他坦率的支持者。例如前持不同政见者米哈伊洛·格林（Mykhaylo Horyn）领导的共和党从一战的历史中接受教训，坚持“对国家的低估和对其发展的忽视将会导致国家地位的丧失，这促使共和党人……支持国家”[②]，实际上认可了克拉夫丘克，这位自诩为乌克兰的乔治·华盛顿的人，保护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

但是，克拉夫丘克并没有推进实质性的经济或政治改革。1992 年 11 月，乌克兰发行了临时货币——乌克兰卢布（karbovanets，或被称为 kupon），脱离了俄罗斯主导的卢布区。然而，更广泛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却没有列入克拉夫丘克的议事日程，由于腐败、法律环境不稳定、极端通货膨胀，以及与其他前苏联国家失去经济联系等诸多原因，经济开始走向崩溃。发行新的永久性货币的计划一再被推迟。在政治上，

---

① Alexander Motyl, *Dilemmas of Independence: Ukraine afte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1993), p. 150.

② "Derzhava, natsiia, svoboda" (State, Nation, Freedom), *Samostijna Ukraina*, May 1992, p. 7.

克拉夫丘克试图大权独揽而非对国家进行民主化建设，而且对国内独立团体的组建也报以消极态度。他号召“所有爱国主义力量团结在国家建设周围”来“战胜个人野心”，并且“为了更伟大的战略目标而忽略那些不重要的技术上的差异”。[①] 他把自己包装成乌克兰国家构建的重要角色，因此任何对他的批评都被看作是不爱国的。有一次，他公开宣布“我们就是国家”。[②] 如前文提到的，一些民族民主分子仍然愿意与他合作，把他看成是乌克兰国家地位的保证人；而且，相比仍由前共产党员所把持的议会来说，他更加亲近。[③] 有批评认为，某些民族民主分子正在制造一个“国家偶像”，并与克拉夫丘克合谋分化和钳制反对派，包括把媒体变为总统的喉舌。[④]

1994 年，乌克兰进行了总统选举。由于经济和民主方面的记录不佳，克拉夫丘克不得不转变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在决定性选举中，他遭遇到了库奇马。库奇马是前苏联导弹工厂的厂长，并于 1992 年到 1993 年间担任乌克兰总理。他的乌克兰语很糟，选票主要来自东部和南部地区，并且回避大部分有关乌克兰化的议题。虽然某些人对他持有异议，认为他会向俄罗斯出卖主权，但库奇马最终赢得了大选，如何完成国家构建的大部分计划也落在他的肩上。1996 年，他推动了新宪法的诞生和发行新的永久性货币格里夫纳。库奇马于 1996 年宣布放弃拥有核武器，分割了黑海舰队，并与俄罗斯签订了友好条约。到 90 年代中期，库奇马已经树立起自己国家构建者的好孩子形象，并且被很多西部的民族主义者所认同。但和克拉夫丘克一样，人们怀疑库奇马也不会致力于民主和经济改革事业。

144

① Quoted in Mykola Ryabchuk,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New Etatism: Democracy and State Building in Ukraine”, in Michael Kennedy, ed. *Envisioning Eastern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50.

② *Nezavisimost* (Kiev), June 23, 1993.

③ The Ukrainian Communist Party itself was banned in August 1991 and officially reformed only in June 1993.

④ Ryabchuk, 1994, p. 52.

二、乌克兰国家民主化?

独立宣言确立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但在政治上，苏联时代的领导层依旧没有多大变动。在1990年的选举中，民族民主分子主要在西乌克兰和基辅等地区活动，立法机关的成员大部分是共产党人，甚至在1991年8月共产党被取缔后，议员的身份仍然没有改变。克拉夫丘克确实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国家民主化上成绩甚微，他是把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手中，僭越议会，分化、压制反对派。他并没有参加或领导任何政党，但批评者抨击他建立了一个用民族主义口号取代了共产主义的“权力党”。包括热衷于国家建设的其他人也认为，民主化应该放在国家建设之后的位置才比较合理。一位作家在貌似自由的乌克兰语言学社的报纸上哀悼民主“没有引导民族意识，没有创造出它来，也没有鼓励人民要在已经去国有化时代的新国家中团结一致”。因此，解决方法就是让国家来传播民族理念并统一社会。[1] 用克拉夫丘克的话来说，提出各种计划并且诉诸选票的其他政党是“为一己私利在工人们身上投机”。[2]

到了1993年，国家明显陷入政治危机中。新宪法尚未通过，克拉夫丘克与议会之间的纷争又起。政党势力仍很弱小，政府部门表达政治观点时也缺乏自信，经济情况的恶化导致又一波东乌克兰矿工领导的罢工。矿工们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要求，同时也要求举行新的选举。1994年，乌克兰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许多人以个人身份参选议员，这也反映了政党势力的虚弱，一旦在议会中的各派形成了，很快又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如表3所示，鲁赫等民族民主政党与那些和前共产党有联系的力量（包括中央党、Yednist 和中央—地方改革集团）相比明显处于下风；投票率的低下反映了对政治的幻灭越来越

145

① *Slovo*, June 1992, p. 2.

② *Post-Postup* (Lviv), June 15, 1993, p. 3.

深，450席中只选出338席。[1] 前持不同政见者卢基安年科哀叹，民主党派和“权力党”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这在他看来已经葬送了民主党派和民主的理念。[2] 一名研究者指出，克拉夫丘克治理国家的模式承袭了苏联时代的旧体制，是“停滞、腐败和对国家权力滥用的烂方”。[3] 到1994年，民族民主党派依旧没能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而是选择支持克拉夫丘克。在大选的最后阶段，克拉夫丘克败给了被视为苏联管理阶层候选人的库奇马。

146

表3　乌克兰1994年选举

议会选举*		总统选举	
政党/派别	席位数	候选人	第一轮/第二轮得票率%
共产党员	97	列昂尼德·库奇马（独立）	31.2/52.2
中央党	37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独立）	38.4/45.1
改革团体	36	亚历山大·莫罗兹（社会主义党）	13.3
Yednist（统一党）	34	弗拉基米尔·拉诺沃伊（独立）	9.6
中央—地方改革集团	32		
鲁赫	29		
社会主义党	27		
其他	124		

*这些数据包括持续到1996年的补缺选举的结果，仍有34个席位是虚席。资料来源于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Profile，1996—1997。

① According to the electoral law, turnout had to be at least 50% in an electoral district in order for the results to be valid.

② *The Ukrainian Weekly*, April 3, 1994, p. 8.

③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3.

然而90年代的乌克兰在领导层上确实发生了其他后苏联时代国家所不及的变化。当然有人会质疑这些变化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是否真实，库奇马对克拉夫丘克的胜利是否只是“权力党”中的一派取代了另一派。与克拉夫丘克一样，库奇马也把巩固权力视为重中之重。库奇马任期第一年的主要政治焦点是通过新宪法，而胶着的问题在于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分权。从1995年开始，由左派所主导的议会对库奇马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的许多方面大加批评，我们会在后半章中做进一步阐述。在与议会长期对峙后，库奇马威胁用全民公决通过一项可以授权解散议会的法律，从此打破了政治僵局。出于维护自己生存的需要，最高拉达于1996年6月28日通过了宪法。这部宪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权力，包括任命和撤销总理和其他官员（如法官、国家检察官、国营媒体和私有化部委的领导人）。库奇马还保留了通过以法律强制力为后盾的签署法令的权力。但在其他方面，这部宪法可以说是妥协的产物，给予了民族民主党派推广“民族观念”（如乌克兰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空间并为推行社会福利留下余地，以体现国家强调的“社会特性”。[①]

与1993年的俄罗斯不同，乌克兰成功地避免了政治剧变，因而新宪法被很多人欢呼为一大进步。一些人以为库奇马将会使用他的权力推行更为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这些人的希望很快破灭了。相反，库奇马大肆任人唯亲并发展裙带资本主义，政治精英们利用职权掠夺了大量财富，其中就包括1996—1997年担任总理的帕夫洛·拉扎连科（Pavlo Lazarenko）。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拉扎连科是库奇马的党羽，在能源和交通事务中获得了一大笔财产。最终，库奇马认识到其为潜在的威胁并迫使他离职。后来拉扎连科前往美国，在那里他因洗钱的罪名而获罪。其他有政治关系的乌克兰富翁——常被人称为“寡头”——包括维克托·平楚克（Vickor Pinchuk）。他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头领，并成为库奇

① Wilson, 2000, p. 196.

马的心腹，甚至在2002年娶了库奇马的女儿。魁梧奋的雷纳托·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是与之相对立的顿涅茨克“帮”头领，在冶金、机械和交通业中得以发财致富。到1996年，年方30岁的他已是身家数十亿美元的富翁，成为众多政客和政党的后盾。尽管很多寡头和帮派参与到库奇马的“权力党”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时不时走向激化。1996年，来自顿涅茨克的议员和显要“寡头”叶夫根尼·谢尔班（Yevchen Scherban）被谋杀，人们怀疑背后黑手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领导者、总理拉扎连科。

147

乌克兰依然有选举，但已经没有多少自由度和竞争性可言了。对国营媒体和私人媒体（寡头）的控制妨碍了反对派的民主表达，而对选举费用支出的限制也形同虚设，使得有赞助者的政党获益良多。库奇马政府同样利用“行政资源”——威胁地方官员、对反对者进行犯罪调查、对国家雇员施压来选举特定的候选人、发放财物来引诱选民——来催生对其有利的选举结果。库奇马还利用自己国家建设的能力赢取民族民主分子的支持，表示自己是防止未经改革的共产党主义返回政坛的唯一选择。

1998年和1999年的选举结果并不那么令人鼓舞（参见表4）。议会选举在新选举法下进行，一半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选出，另一半席位则由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尽管有人抱怨竞选准备不足（尤其指媒体对候选人的包装）和选举日的一些不正规环节（如造票），在国际观察家眼中这些选举还是比较自由和公正的。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有着强大支持的共产党崛起为最大赢家，而民族民主党派如鲁赫只得到约10%的席位。最高拉达的权力平衡却掌握在无党派（通常是富商）和小规模的“中间派”政党手中，通常是总统府和寡头帮派的产物。例如，由大企业家创办的绿党之所以取这个名称是因为它能够取悦选民，格罗马达由拉扎连科创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由总统府主任维克托·梅德维德楚克（Vickor Medvedchuk）主持。

表4 乌克兰1998年和1999年选举

1998年议会选举		1999年总统选举	
政党	席位数	候选人	第一轮/第二轮得票率%
共产党	121	列昂尼德·库奇马（独立）	36.5/56.3
鲁赫	46	彼得罗·西蒙年科（共产党）	22.2/36.8
社会主义/农民集团	34	亚历山大·莫罗兹（社会主义）	11.3
绿党	19	娜塔莉·维特连科（进步社会主义）	11.0
人民民主党	28	叶夫根尼·马楚克（独立）	8.1
格罗马达	24	尤里·科斯藤科	2.2
社会民主党（联合）	17	格纳迪·乌都夫温科（鲁赫）	1.2
其他	161	其他	3.5

1998年的议会选举让很多渴望民主和积极政治变革的人感到失望，1999年的总统选举则更是一场灾难。破败的经济状况让很多人对库奇马心怀不满，他在公众中的声誉是如此之差①，很难想象他会再次当选。但是库奇马从一系列因素中受益。首先，鲁赫领袖、库奇马最有力的竞争者乔诺维尔在1999年3月死于车祸，这一事件被很多人认为并非“事故”。② 其次，总统府利用了广泛的“行政资源”鼓励人们投票给库奇马，封杀反对派媒体，并攻击库奇马最大的对手、社会

148

① A 1998 survey by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 (IFES) found that only 13% of voters thought Kuchma deserved to be reelected. Reports from numerous survey in Ukraine can be found at http://www.ifes.org.

② In 2006, Ukraine's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announced that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of which he is aware, he believes Chornovil's death was a murder.

主义党领导人及温和左派亚历山大·莫罗兹。再次，尽管有呼声号召各党派联合起来支持一名候选人，库奇马的中左翼反对派却没有参加。与此同时，当局谨慎地支持边缘候选人，例如进步社会主义者娜塔莉·维特连科（Natalia Vitrenko）以分化反对势力的选票。最终，库奇马得以在关键选举中面对缺少号召力而且教条的共产党候选人彼得罗·西蒙年科（Petro Symonenko）。此人在全国各地都没有多少名望，而且缺少库奇马那样的政治资源。尽管国际观察家指出民主程序多次遭到破坏，国家控制媒体，投票作假，骚扰选民和选票计票单造假，库奇马再次当选。[①]

到90年代末，已经无法说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政治反对派势力羸弱，权力掌握在总统和诸多寡头帮派手中。在1999年的调查问卷中，乌克兰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乌克兰是民主国家时，只有17%的人回答“是”，接近90%的人把腐败列为严重的问题。在同年的另一份调查中，反馈者认为共产主义体制要比乌克兰现在的体制好，76%的反馈者认为乌克兰目前的民主发展令人不满，近一半的人（47.2%）说他们支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不再被议会和选举烦恼。相比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或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对自己的政治体制更不满意，尽管他们比俄罗斯人更支持民主。[②] 总的来说，公共意见调查的结果中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东西，表现了人们高度的幻灭感、消极感和挫折感。

149

三、经济崩溃

90年代乌克兰的经济问题比建设民主政府的问题还要严重，而且毫无疑问，乌克兰的经济困难也是政治问题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说乌克

---

① Paul Kubicek, “The Limits of Electoral Democracy in Ukraine”, *Democratization* 8, no. 2 (Summer 2001): p. 124.

② First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IFES in association with Gallup and can be found at www.ifes.org. The other data come from on-line analysis of the 1999 World Values Survey, administered in Ukraine and numerous other countries. These surveys can be found at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兰至少还有一件民主的外衣（如多党选举制），但没人否认，乌克兰的经济几乎瘫痪，以至于俄语中“乌克兰化”一词意味着“使之毁灭”。

经济数据可以反映一部分问题。如表 5 所示，乌克兰经济涉及高通胀、负增长、失业和外资匮乏等诸多问题，原因在于苏联管理不当造成的基础设施老化、苏联解体对经济的震荡、克拉夫丘克政府对经济改革的犹豫不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反而继续印制钞票，并对境况不佳的企业追加补贴。即使是这样，依然有很多企业破产或负债累累，以至于无法给工人发工资；而工人们获得的是“实物支付”，即用他们生产的产品（如香肠、服装、厕纸）来代替工资，以便他们拿到市场上出售来换取现金和其他必用品。这迫使一些乌克兰人进行“手提箱交易”，他们把产品带到波兰、俄罗斯或罗马尼亚，在那里赚一点差价。数千名乌克兰妇女在绝望中到西欧找工作却上当受骗并被迫沦为娼妓。对于大部分留在乌克兰的人来说，制造业的瘫痪意味着很多必需品（如糖、奶酪、牛奶）的短缺，而恶性通胀使得很多乌克兰人买不起现有的商品。

150

表 5　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经济

经济数据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通胀率(%)	161	2730	10155	401	182	40	10	20	19
GDP * 下降(%)	-11.6	-13.7	-14.2	-23.0	-12.2	-10.0	-3.0	-1.9	-0.4
总体就业率(1989 = 100)	98.3	96.3	94.1	90.5	93.3	91.3	88.8	87.9	85.8
GDP 私有部类份额	10	10	15	40	45	50	55	55	55
人均外资	n/a	3.40 美元	3.98 美元	3.18 美元	5.26 美元	10.42 美元	12.46 美元	14.86 美元	9.92 美元

资料：来源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Anders Aslund 报告：*Building Capitalism: Markets and Government in Russia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指一国之内产品和服务总价值。

1994年秋季，库奇马启动了一揽子“激进”改革方案，试图削减国家补贴、私营化并改革法律，以营造更有利于商业的环境。如表5所见，确实有一定的进展：通胀率显著下降，使得政府可以在1996年发行新货币格里夫纳；制造业的下滑不再那么剧烈，尽管直到2000年乌克兰经济才开始真正增长；90年代，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下降54%，比俄罗斯的40%还要糟糕，① 比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还要严重2倍。在库奇马任职期间，乌克兰经济越来越私有化，但政府出售国有企业（商店、工厂、矿场、农场）的计划遭遇到一系列问题，这里尤其指腐败问题。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人有能力以极低的折扣购买公司的股份，并因此成为寡头。新的所有者通常对公司进行掠夺，卖掉公司的资产（如工业设备）、拿走利润、肢解企业，最后把工人赶到大街上去。

尽管库奇马标榜其计划为“激进改革”，但他并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工作。部分原因在于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时遇到政治阻力，尤其在东乌克兰比较明显，那里很多老化的国有工业只有靠国家援助才能勉强生存。改革在民众中也没有达成共识。1995年，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3（31.4%）的乌克兰人认为可以从私有化中受益，而更少的人（23.8%）认为自由价格制度是有益的，大部分人（54%）认为国家应该承担提供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的责任。② 库奇马乃至整个社会都对改革三心二意，“个别帮派只关注他们的私人利益，改革工程逐渐失去了动力”③，结果则是混乱与糟糕的政策。例如，对销售收入征收高达90%的税迫使经济活动转入非法或“黑市”状态。对私有化的若干承诺，例如提高效率和在乌克兰民众中扩大股份持有者阶层的数量，都没有实现。让工人们持有自己公司的股份本意在于创造工人们自己

---

① Figures from Anders Aslund, *Building Capitalism : Markets and Government in Russia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8.

② 1995 survey by Kie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KIIS), cited in Kubicek, "Post-Soviet Ukraine: In Search of a Constituency for Reform",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s* 13, no. 3 (September 1997): pp. 106—107.

③ Wilson, 2000, p. 196.

的企业，但管理层却利用手中的财政资源和影响诈取了雇员们的股份。[①] 乌克兰的私有制发展落后于所有的东中欧国家（如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俄罗斯，世界银行结构改革指数（World Bank's structural reform index，诸多部类的集合）显示乌克兰落后于许多后苏联时代的国家，包括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②] 外资少得可怜，与乌克兰最高的人均数据（1998 年为 14.86 美元）相比，同一年中波兰则达到 128 美元、捷克 256 美元、爱沙尼亚 397 美元。[③]

152 乌克兰经济的崩溃付出了政治和人道的代价。乌克兰人对政府、“民主”，甚至对国家的独立都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幻灭感。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调查显示，大约有 90% 的乌克兰人认为国家走上了歧途，[④] 甚至当 90 年代后期经济有所起色的时候，1999 年的调查仍然显示有 94% 的反馈者对国家的状况感到不满，经济（贫困的生存环境、失业、拖欠工资、经济不稳）成为不满的最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民众仍然没有就可行的前进方向达成共识，27% 的人支持市场经济，30% 的人赞同中央计划经济，另有 25% 的人希望看到两者某种程度上的结合。[⑤]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 90 年代的一些调查显示，乌克兰人越来越不钟情于独立国家的概念了。例如，1996 年的调查显示 56% 的反馈者相信乌克兰应该与俄罗斯合并为一个国家。[⑥]

四、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区域分化

为了维护一个强大并且运转良好的国家和经济，崭新的乌克兰国家需要建构某种民族认同感。如本书所述，乌克兰很多区域有不同的

---

① Paul 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From Solidarity to Infirmit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pp. 172—175.

② Aslund, 2001, pp. 161, 279.

③ Aslund, 2001, p. 436.

④ Aslund, 2001, p. 384.

⑤ IFES 1999 Survey, at www.ifes.org.

⑥ Survey from KIIS, quoted in Sherman Garnett, "Like Oil and Water: Ukraine's External Westernization and Internal Stagnation", in Taras Kuzio et al., eds. *State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Ukraine* (New York: Macmillan, 1999), p. 124.

历史经历，因而有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当谈及后苏联时代乌克兰面临的挑战时，一位作家困惑地问道："一个乌克兰还是许多个？"[1] 构建一种共同的认同、战胜区域分裂，在许多人看来对于维护独立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来说都是必需的。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基本轮廓已经在本书各部分中做了阐述。总的来说，大部分西乌克兰曾置于波兰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之下，其环境对于发展乌克兰民族意识相对便利，而且此区域的人口绝大部分为乌克兰裔并说乌克兰语。相比较而言，东部和南部乌克兰曾是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很多居民说俄语，而且很多为俄罗斯裔。这部分地区更为工业化，而且在经济上与俄罗斯联系比较密切。西乌克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加入苏联，俄罗斯裔居民占主体的克里米亚直到1954才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尽管乌克兰所有地区的大多数公民在1991年对独立投了赞成票，可西乌克兰人以及基辅知识界的一部分人才是独立运动真正的推动者。

153

尽管区域多样性情况复杂，但克里米亚才是乌克兰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克里米亚人投票赞同独立的只有54%，勉强过半。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境内唯一俄罗斯裔居民占多数（67%）的地区，那儿也没有乌克兰语学校。它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把行政权从俄罗斯转交给乌克兰而已。克里米亚自凯瑟琳大帝起就与俄罗斯帝国保持长久的联系，后来苏联黑海舰队也以此为基地，其居民中很大一部分是现役或退役的苏联军人。

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运动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乌克兰当局在1991年2月赋予克里米亚自治地位。当乌克兰宣布独立后，分离主义呼吁重新加入俄罗斯的声音也愈发响亮。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宣布独立，并建议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此举获得许多俄罗斯政治家的支持，例如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就认为赫鲁晓夫1954年的

---

① Wilson, 2000, p. 207.

行为“是宿醉或中暑的结果”，无法“抹煞克里米亚的历史”。[①]

基辅当局宣布克里米亚分离主义为非法，同时通过一项法律给予克里米亚很大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自治权，除此以外，基辅还保证为克里米亚提供经济援助。但是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1994 年，一名亲俄罗斯的候选人尤里·梅什科夫（Yuri Meshkov）被选为克里米亚第一任总统，开始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克里米亚分离主义没有取得胜利。1995 年 3 月，乌克兰议会投票推翻了克里米亚宪法，撤销克里米亚总统职务，并把克里米亚政府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克里米亚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俄罗斯方面尽管有部分政治家发出强硬的言辞，但无意进行军事干涉。克里米亚人对梅什科夫感到厌烦，一项研究表明，克里米亚的公共舆论充满了自相矛盾和犹豫不决。很多克里米亚人希望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但又不想从乌克兰分出来。[②] 当克里米亚注定不能再次加入俄罗斯后，克里米亚人大多接受了这一结果，几乎没有人组织起来上街举行抗议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在乌克兰各地都没有得到支持，调查显示乌克兰裔和俄罗斯裔居民都主张保留乌克兰国家从苏联所继承下来的边界。[③]

另一个比较严重的区域分裂问题则是东部和西部的隔阂。第聂伯河成为“两个”乌克兰的非正式边界。当然这种隔阂并非泾渭分明，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一系列问题上捕捉到东部和西部的分裂迹象。[④] 语言上的乌克兰化在西乌克兰更受欢迎，据 1989 年的人口普查，东乌克兰人口中 1/3 是俄罗斯裔，俄语是主要

154

① Quoted in Roman Solchanyk, “The Politics of State Building: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46, no. 1 (1994): p. 54.

② Paul Pirie,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48, no. 7 (November 1996): p. 1097.

③ Kuzio, 1998, p. 80.

④ Much of this section is drawn from Paul Kubicek, “Regional Polarization in Ukraine: Public Opinion, Voting, and Legistative Behaviour”, *Europe-Asia Studies* 52, no. 2 (2000): pp. 273—294.

的公共语言。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原因，东乌克兰人更愿意保持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而西部的人们普遍视莫斯科为威胁或有负面影响，并且希望与欧洲和美国加强关系。因为大部分苏联时代的陈旧的工业企业坐落在东部和南部乌克兰，那里的民众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态度更趋保守，更愿意国家对经济采取控制和支持。图 2 和 3 表现了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区域分裂程度，而如前文所述，这会使启动和维持市场化更为复杂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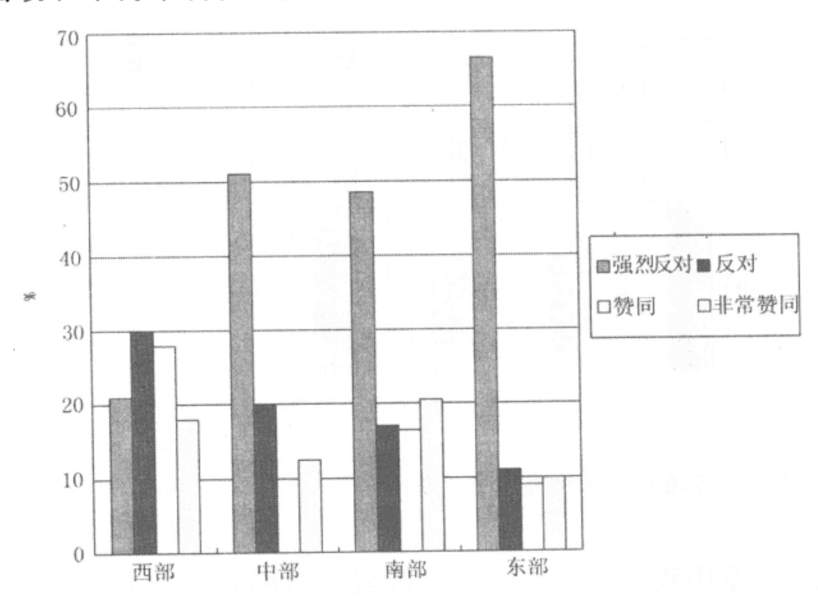


图 2　你认为自由价格制度对于经济复苏是必须的吗？

所有因素都在投票中表现出来。西乌克兰人投票给倾向于经济改革、亲西方和支持乌克兰国家地位的政党和候选人，而东部则支持如共产党那样倾向于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并维持前苏联经济体制中因素的政党。例如，1994 年的总统选举表现为高度的两极化，克拉夫丘克赢得了第聂伯河右岸（西部）70.3% 的选票，而库奇马赢得了左岸 75.2% 的选票。而这种差距在某些地方更为极端，例如克拉夫丘克赢得了作为民族民主党派基地的加利西亚 90% 以上的选票，而库奇马在

155

① Results from KIIS Survey in 1995, reported in Kubicek, 1997, p. 110.

高度工业化和俄罗斯化的顿涅茨克州赢得了接近90%的选票。[1] 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在东部拿到了44.6%的选票，而在西乌克兰只得到9.6%；鲁赫和其他民族主义或民族民主政党的选票中65.5%来自西部，而东部只有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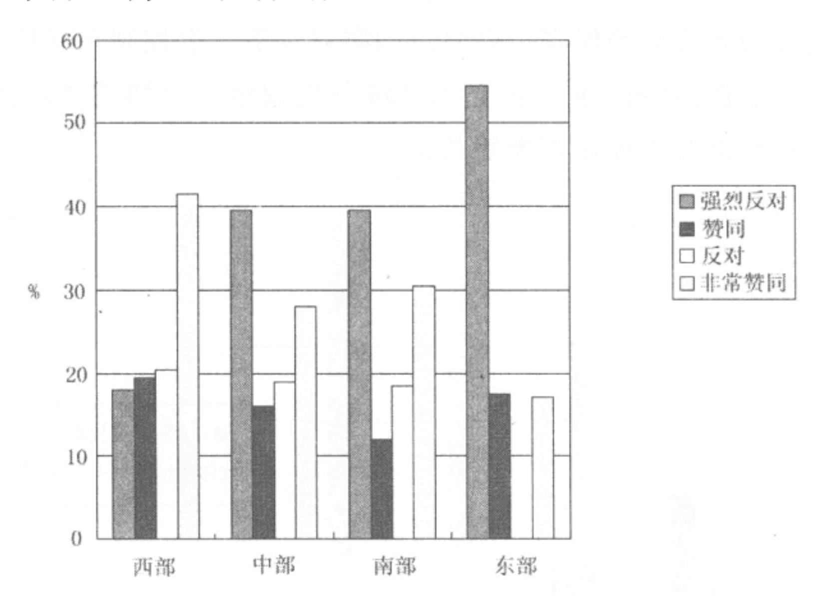


图3 普通人会从私有化中获益吗?

在下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区域分裂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橙色革命”和其后果。尽管如此，国家没有因此而解体。西乌克兰人欢迎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和逐步的乌克兰化（如乌克兰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而且或许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在很多时候视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同为国家的建立者。威尔逊指出，民族民主分子同时紧随两位总统的“巨大落差”意味着他们两人的国家建设和文化计划的大部分是由“温和派代理人”所执行的。[3] 得到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等乌克兰军事组织的启发而成立的奉行强硬路线的激进民族主义团体，确实存在于西乌克兰，但他们

156

① Kubicek, 2000, p. 284.

② Data from Kubicek, 2001, p. 120.

③ Wilson, 2000, p. 174.

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因此乌克兰不可能变成一个采取行动打击非乌克兰裔或非乌克兰语使用者的军事民族主义国家（如塞尔维亚）。事实上，政府从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或激进的乌克兰化路线。俄罗斯语使用者的权利得到了尊重。尽管政府最终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并没有从整体上放弃东乌克兰半死不活的工业企业，使东乌克兰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相反，在人均收入上，顿涅茨克等区域仍然是乌克兰最富有的区域，远比加利西亚富有得多。如本章接下来要讲述的那样，乌克兰政府也试图与俄罗斯建立友好的工作关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东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成为最有实力的经济“帮”的领导者。关于顿巴斯之所以没有出现分离主义的原因，一名作家写道：

> 总的来说，顿巴斯地区精英们把自己舒舒服服地整合进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中。顿巴斯精英们意识到在乌克兰有更好的机遇，而俄罗斯已经无法再容纳一个衰败的工业区和更多爱惹麻烦的矿工……要问如果顿巴斯属于俄罗斯的话是否更好，顿涅茨克州议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切尔班（Vladimir Shcherban）回答道：“历史没有‘假如’。我们拥有我们应该拥有的东西。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而非沉迷于猜想。顿巴斯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

五、东西之间的乌克兰外交政策

可以想见，有关后苏联时代乌克兰国家构建和区域分裂的讨论中，乌克兰外交政策的倾向尤其引人关注。当然，乌克兰和俄罗斯有着长久的历史关系。对很多乌克兰人来说，自己的历史并不很光彩，因为俄罗斯人在政治上对乌克兰的主宰使乌克兰国家独立和文化发展备受挫折。对另一些人来说，和东斯拉夫兄弟保持联系既自然而且有益。鉴于乌克兰的历史，她的独立即意味着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因而乌克

① Kuzio, 1998, p. 83.

157 兰的国家构建者们必须建立各种有别于俄罗斯的机制和认同。一些人希望乌克兰能够与西方建立紧密的联系以助其变得更加“欧洲”，从而远离“俄罗斯”或“苏联”的认同。

但在9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乌克兰的外交政策试图在西方和东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尽管乌克兰对独联体并不热忱，但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关系依旧很重要。简单来说，乌克兰无法逃避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因素。然而问题在于俄罗斯会怎样做还不甚明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并且谈到要和乌克兰结成有力而且友好的关系。但其他的俄罗斯官员很难接受乌克兰的独立，仍然视乌克兰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乌克兰人仍为“小俄罗斯人”。因此，防范俄罗斯可能的威胁、保卫乌克兰国家利益，成为包括克拉夫丘克在内的乌克兰国家地位保卫者们制定政策的主要标志。

许多乌克兰人认为和欧洲以及美国建立紧密的联系，能够为乌克兰防范俄罗斯不可预知的威胁提供保护。但问题是乌克兰在独立后的第一年里受到了西方的冷遇，部分原因在于克拉夫丘克对于经济和政治改革犹豫不决。然而最大的麻烦是乌克兰不愿把她继承下来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因为西方国家把对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放在首位，所以视乌克兰的固执己见是无谓和无效的行为。

这种僵局在库奇马任职期间被打破。尽管竞选口号中呼吁与俄罗斯的关系应该是“更少的壁垒，更多的桥梁”，但在竞选中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修补与西方的关系上。乌克兰答应放弃核武器，以换取欧洲和美国的金融援助和安全保证。库奇马的经济改革计划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赞许，经济援助也开始流入乌克兰。1994年，乌克兰与欧盟缔结了《伙伴合作协定》（PCA），1997年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库奇马把与欧盟的关系置于更长远的目标之下，很多乌克兰人也赞同加入北约。与欧盟国家的贸易不断扩大，90年代，欧盟共提供了价值超过10亿欧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美国同样把乌克兰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某种程度上使乌克兰变为其针对俄罗斯的缓冲国。到1997年，乌克兰成为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美国外援接受国。到2001年，乌克兰

共接受了美国28.2亿美元的援助。[①] 与此同时，在以针对俄罗斯权力扩张和建立新的能源市场为目标所设立的所谓GUUAM（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集团中，乌克兰起带头作用。 158

不过乌克兰仍然与俄罗斯保持着重要的联系。尽管库奇马把与欧洲的关系放在首位，但也认同乌克兰的“多向平衡”外交政策，包括维持与俄罗斯在诸多领域的重要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俄罗斯所提供的石油与天然气，而乌克兰恰恰缺少相关的碳氧化合物资源。乌克兰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加上俄罗斯对油气管线的控制，使得莫斯科在与基辅的其他争端（如黑海舰队）中有足够的空间大打能源牌。但西方的援助增强了乌克兰的筹码，因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1997年达成协议分割黑海舰队，并签署了友好条约。

乌克兰渴望与西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却因为库奇马总统任期内持续增长的腐败和国家的非民主化，变得像油和水一样不可调和。[②] 与欧盟的《伙伴合作协定》的执行面临着许多困难，条款中对欧盟和乌克兰“共同价值”的高度赞扬变得空洞虚假，而且欧盟也从来没有暗示将会给予乌克兰完全的成员资格。对腐败和法制的顾虑拖了西方援助的后腿，尤其到1999年之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民主缺陷越来越无话可说。乌克兰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也因地区而两极分化，西乌克兰人倾向于和西方建立紧密的纽带，而东部和南部愈加把与俄罗斯的关系放在首位。

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局面的混乱。“多向平衡”外交政策等同于没有明确的方向。一名观察家指出：

> 乌克兰之前谈到与西方进行整合，但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行动。基辅很乐意西方为其掏腰包，但同时也很乐于获得俄罗斯的

---

① U. S.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Powell in Zerklo nedeli (Kiev), July 7, 2001.

② Garnett, 1999.

免费天然气。除此之外乌克兰再无别的外交政策了。[1]

在90年代乌克兰的“选择欧洲”后，库奇马感觉到被欧洲和美国怠慢了，于是在新世纪伊始转向了俄罗斯。乌克兰同意加入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建立的“单一经济区域”。库奇马发表评论称，既然欧洲的市场逐渐向乌克兰关闭，那么“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2]俄罗斯接手乌克兰的炼油厂和其他企业，作为交换，同时取消了对乌克兰的能源优惠政策。然而，库奇马之所以投向俄罗斯的怀抱，既因为国内的麻烦，也因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导致不利的国际影响，而这一政治危机将直接威胁库奇马已被滥用的权力。

六、“库奇马门”和政治危机

159 尽管1999年的总统选举有很多纠纷和麻烦，但乌克兰在新千年伊始也迎来了希望。1999年12月，库奇马任命前国家银行行长维克托·尤先科为新一任总理，重启被搁置的经济改革计划。尤先科素有诚实和亲西方改革者（他在1998年与一名乌克兰裔美国女性结婚）的名声。尤先科重新对乌克兰的国际债务进行谈判，制裁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非法再出口行为，直接打击了那些曾经以此获得巨额财富的乌克兰寡头。尤先科推行了税制改革，刺激了曾被惩罚性赋税压垮的小企业的快速增长，同时取消了对寡头有利的减税优惠政策，“暧昧的”私有化被终止，乌克兰国库有了充足的资金来付清一直拖欠的养老金和工资。经过数年的衰败，乌克兰经济在2000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3]

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经济发展，但库奇马对权力的继续把持，

---

① Jason Bush, “Whither Ukraine?” *Business Central Europe Mgazine*, June 2001.

②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Poland, Belarus and Ukraine Report*, September 23, 2003.

③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8.

以及后来被揭发的库奇马和其党羽对权力的滥用却是无法掩盖的事实。这些事情被一盘录音带所曝光。2000 年 4 月，在库奇马的坚持下，乌克兰进行了有关政治改革的全民公决，目的是削减议会的规模和削弱其影响。公投的结果为超过 80% 的乌克兰人赞成这项改革，后来修正为高达 81%——这被许多乌克兰人和国外人士看成另一场被非法操纵的选举。库奇马看上去暂时赢得了对议会的最后一场胜利，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威，但是一场被称为“库奇马门”的录音带丑闻打断了库奇马的政治议程。“库奇马门”发生于 2000 年 11 月 28 日。当天，库奇马在议会中最积极的批评者莫罗兹指控库奇马下令杀害了格奥尔基·贡加泽（Georgii Gongadze）——一名报道过政府滥用职权的网络记者，他的无头尸体于 11 月初在基辅郊外树林中被发现。莫罗兹的指控得到了一盒录音带的证实。录音带为总统办公室负责安全保卫的尼古拉·梅利尼琴科少校（Mykola Melnychenko）秘密录制。在录音带中，库奇马要求安保人员“处理掉”贡加泽，并建议驱逐贡加泽到其祖国格鲁吉亚，在那里他可以被车臣游击队绑架。在接下来几个月中，更多的录音带浮出水面。在这些录音中，库奇马用他那惹人生厌的声音要求进行选举舞弊、威胁法官和地区官员、监督洗钱、合谋制造 1999 年杀害乔诺维尔的“车祸”，甚至授权向伊拉克出售一种先进的雷达设备。

尽管梅利尼琴科缘何能够进行秘密录音是惹人争议的，而且怀疑他是被某个政客，甚至是外国政府（他最终到美国政治避难）所利用，但是这些录音带中的声音被一次次证实是真实的。一些出现在录音带上的人也证实那些谈话确实发生过，不过其他同在录音带上出现且处境被动的人，比如库奇马本人，否认其真实性。直到 2001 年，库奇马才承认录音带中的声音是他自己的，但他辩解这些降罪于他的录音带在数码录音时被动过手脚。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2001 年 10 月 160

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乌克兰人（86%）认为这些录音带是真实的。[①]

“库奇马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很大影响。国际方面，这次丑闻只是证明了乌克兰在民主的道路上毫无进展。欧盟要求乌克兰调查贡加泽的谋杀案；美国对涉嫌向伊拉克出售武器尤其感到恼火，因此中断了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②] 如前所述，库奇马此时已经逐渐转向俄罗斯。在乌克兰国内，2000 年末，最初的抗议被警察用武力中止；到 2001 年初，众多的群体——学生、独立工会会员、部分商人——汇集到一起组成“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不过他们的街头游行多次被警察破坏，也没能对明确支持库奇马的议会产生任何影响。但在 2001—2002 年，反库奇马的反对派逐渐结合在 2 位政治领袖周围。

第一个投身反对派阵营的是富有魅力的尤利娅·季莫申科。她曾在腐败的拉扎连科政府中工作，最近则在尤先科的政府中担任副总理一职。2001 年 1 月，她被撤销公职并出庭接受有关 90 年代腐败的指控，当时她因与乌克兰腐败的能源业的紧密关系而被人称为“天然气公主”。但令人吃惊的是，所有关于她的指控都被撤消了，后来她逐渐崛起为一个充满激情的（或者稍许温和的）政治反对派人物。与此同时，其改革计划令许多寡头苦恼不已的尤先科在 2001 年 4 月被解职。在被解职前，他曾起草过一封信件谴责反库奇马的抗议活动。离开政府后，尤先科转变为一名有实力的、反对“权力党”的自由派改革者。2001 年末，尤先科联合了一批政党和运动组成一个称为“我们的乌克兰（Nasha Ukraina）”的政治联合，以参加 2002 年的议会选举。尽管许多尤先科的支持者来自鲁赫和其他民族民主组织，尤先科在很多敏感问题，例如语言的乌克兰化问题上保持缄默，希望能够缔

---

① Taras Kuzio, “Ukraine One Year after ‘Kuchmagate’”, *RFE/RL Newsline*, November 28, 2001.

② Paul Kubicek, “U. S. -Ukrainian Relations: From Engagement to Estrangement”,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50,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3—11.

造一个超越乌克兰区域分裂的民族运动。

尤先科和季莫申科都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尽管“我们的乌克兰”赢得了政党比例选举中最多的席位（225 席中的 70 席），但在按选区一人制的选举中战绩不佳，因为这种选举很容易收买选民并动用行政资源以保证亲库奇马的候选人当选。因此，尽管在按政党比例选举中赢得了不到 12% 的选票（为“我们的乌克兰”得票率的一半），亲库奇马的“为了统一的乌克兰”还是成为议会中最大的集团（119 席）。“我们的乌克兰”获得 113 席，季莫申科联盟只有 21 席，选举结果意味着平衡权掌握在共产党（66 席）和众多当地或地区寡头组成的“独立代表”（95 席）手中。反库奇马的团体抗议选举被窃取，结果抗议被镇压下去，异议也很快消失了。2002—2004 年，乌克兰政治仍然高度两极分化，议会也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尽管库奇马已经明显违背当年做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承诺，但仍然把持着权力，一直到 2004 年的“橙色革命”才最终扳开了“权力党”攥得紧紧的拳头。

161

第十章　“橙色革命”及其之后

165　以运动领导人尤先科的代表色命名的“橙色革命”，是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经过十几年政治和经济的停滞，乌克兰与西部邻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远，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民众却走上街头去争取民主和政治改革。“橙色革命”的最直接动因是乌克兰大选中当局的舞弊行为导致尤先科落败，而尤先科倡导的是一个更自由的市场，更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及亲西方的政策取向。

但是，“橙色革命”不仅仅是尤先科选民的运动，而且前任总统和他的幕僚统治下问题的总爆发，同时也是乌克兰人民要求更加自由民主的国家以便顺利合法加入欧盟的力证。许多观察家把它和其他的群众运动做比较，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导致了1989年东欧剧变，他们走上了民主化和西化的道路。但是乌克兰在166 1991年并没有发生类似的革命，而是在争取独立过程中，前共产党员在选举中胜出，压制如鲁赫等民族民主势力，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专制。因此“橙色革命”带来了乌克兰重归民主道路的第二次契机。

毫无疑问，“橙色革命”给乌克兰带来了真正的变化，但是它仍没有完全清除旧体制的残余。“橙色”力量之间开始互相指责对方腐败，导致2005年的“橙色分裂”，在“橙色革命”中被尤先科击败的亚努科维奇卷土重来，担任乌克兰总理一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也陷入僵局。可以有把握地说，乌克兰没有走上近似于自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2000—2008）总统上台后愈加威权主义的俄罗斯道路，但事实证明，轻而易举地建立起类似于东中欧国家那样有效的民主政府的期望还远未能实现。

一、推翻“权力党”运动

“橙色革命”的背景主要包括“库奇马门”、未成功的“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和2002年议会选举。第九章中提到，尽管库奇马总统在90年代中期标榜自己为改革者，实际上是日趋腐败的“权力党”的头目，依赖于一系列的包括（被数码录音带所证明的）谋杀反对派记者的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库奇马门”曝光所导致的大众动员并没有使政治高层产生变革，但库奇马的政治反对派开始集合在两个反对党周围。一个是“我们的乌克兰”，是尤先科所组建的联合集团。尤先科曾在1999年12月到2001年4月担任总理，力推改革扭转了乌克兰经济的破败局面。尽管他在库奇马任内担任要职，但并没有参与“权力党”，同时有着称职和诚实的好名声。另一个反对派别是以领导人尤利娅·季莫申科所命名的季莫申科联盟（BYuT）。作为前副总理的她曾受到涉嫌腐败的指控，但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尽管她穿着其工资永远也支付不起的名设计师所设计的服装），并参与召集了“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与从未对政府权威造成真正挑战的鲁赫有所不同，“我们的乌克兰”和季莫申科联盟看上去是颇为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我们的乌克兰”在2002年议会选举的政党比例选举中获得了比任何党派都要多的席位。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库奇马及其盟友成功地拼凑出一支议会勉强多数派，使反库奇马的力量无法掌握议会的主导权。

167

真正有价值的目标是掌握着大部分政治权力的乌克兰总统一职。2004年4月，乌克兰议会否决了库奇马试图修改宪法以允许其谋求3次连任的要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至少当对手胜出时他不致因腐败而遭到起诉——他试图寻找一个忠诚的继任者，以使其腐败的政治机器可以赢得总统大选。这个人就是来自东乌克兰顿涅茨克的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亚努科维奇远不是理想的候选人——他曾2次因打架和伤人罪而入狱（他经常用监狱中的黑话辱骂对手为kozly［意为坏蛋或杂种］），还因犯罪、粗暴和暴力的商业式手段而声名狼藉，在攀上政治高位的过程中疏远了很多“权力党”中的温和派。尽管如此，总理一职却成为通向总统宝座的最佳跳板，不仅从政治组织上获得认可，更可以使他在2003年和2004年乌克兰经济相对较好的表现中获得加分。

两股力量在进行豪赌。乌克兰敏锐的政治观察家塔拉斯·库泽奥（Taras Kuzio）评论道：

> 库奇马和其寡头盟友们视选举为巩固独裁统治的机遇，继而能够维护他们的私人和帮派利益。从这点来说，任何非中间派候选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会是场灾难，因为有可能导致重新分配或没收库奇马在位时积累的资产，甚至本人会遭到入狱或流放的下场。除了贡加泽的谋杀案之外，库奇马还涉及许多其他非法行为，如下令对记者和政治家施加暴力、选举舞弊、腐败、非法倒卖武器等。①

反对派打算翻盘，在许多人看来这有可能是阻止乌克兰走向独裁国家的最好以及最后的机会。反对派把赌注压在被认为希望最大的尤先科身上。“我们的乌克兰”在2002年的表现，以及亚努科维奇的弱点和库奇马低下的公共名望，令很多反对派相信他们能够赢得2004年

---

① Taras Kuzio, “From Kuchma to Yushchenko: Ukraine'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 Orange Revolu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52, no. 2 (March/April 2005): p. 4.

的总统选举。

所有阵营的人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丑陋的竞选。在2002年的选举中，库奇马动用了一系列行政资源干预选举并明目张胆地坐视伪造选票，此时却讽刺地预测2004年选举将是乌克兰历史上最肮脏的选举。不过反对派已经做好了准备：采取投票后民意测验来对付可能的选举造假；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以减少选举的舞弊行为；独立媒体——鉴于大部分电视台掌握在国家手中或归库奇马的忠诚分子所有，这点极为重要——将尽可能多地传递尤先科的信息，以平衡国家媒体对他的负面宣传；而民众也随时准备上街抗议以防选举结果被窃取。最为关键的最后一道战线是亲民主的学生组织"波拉!"(意为"是时候了!"或"够了")。"波拉!"成立于一年前，并得到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等力图推翻腐败政府的学生们的支援。鉴于库奇马执政后期的政治倒退，反对派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政府的肮脏手段。2004年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6%的乌克兰人相信自由选举的可能性，而70%的人表示不相信。[1]

168

然而没有人预测到接下来的选举活动会发生最怪异的转变。9月初，尤先科因被怀疑严重食物中毒而被送进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诊所。尤先科的病情一度极度危险，医生花了几周的时间才使病情得以稳定。尽管他痊愈出院了，但面部和身体遍布伤痕。最大的疑问当然是——谁是这次中毒事件的幕后指使？尤先科不久前与库奇马的安保主管一同进餐。其他的解释认为乌克兰的地下黑手党甚至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有可能是幕后黑手。一些尤先科的反对者认为这完全是尤先科自己干的，要么是失败的肉毒杆菌注射，要么是吃了不干净的寿司，甚至是给自己下毒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亲政府派甚至向媒体机构发送了一份伪造的传真，表示根本没有投毒这回事。到12月，2轮投票结束了，奥地利的检验结果证实尤先科血液中二恶英含量高出正常值6 000倍。但是尤先科是如何中毒的以及是谁是投

① Poll by Democratic Initiatives reported in *Ukraina pravda*, April 26, 2004.

毒者依然不能确定。

滑稽的是亚努科维奇也试图在西乌克兰竞选时，在一大批抱有敌意的人面前制造自己的“尤先科”时刻。亚努科维奇事先在人群中安插自己的人，这个人将在他演讲的过程中向他投掷石块，这次袭击不但可以为亚努科维奇赢得同情，还可以顺便把尤先科的支持者丑化为暴徒。然而事与愿违，一名尤先科的支持者先向亚努科维奇投掷了一枚鸡蛋。当鸡蛋击中亚努科维奇时，他以为是被事先安排的石块，便顺势倒地。一名体重达200磅的男子被一枚鸡蛋击倒在地，这一戏剧性场景被其抨击者大加利用。[①]

选举前几个月的民意测验显示，尤先科在民意上领先于亚努科维奇。但亚努科维奇尽其所能把选民争取到他的一边。为了赢得俄罗斯裔和俄语公民的选票，他通过法律允许拥有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国籍，169 提升俄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他还试图把尤先科描绘成一个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些人断言尤先科的美国妻子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②]一张反尤先科的竞选海报把尤先科和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脸混合在一起，并注明为“布先科”。而在乌克兰比较受欢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则站在亚努科维奇一边。据称，亚努科维奇的竞选班子得到的俄罗斯援助多达3亿美元。[③] 但尤先科也有财力雄厚的支持者——来自乌克兰国内以及海外移民——并且利用网络扩大自己的竞选面。他的竞选口号“是!”（Tak!）尽显其乐观主义精神，并公开鼓动民众运动推翻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独裁统治和腐败领导人。大部分观察家预测在第一轮投票中可能会有势均力敌的角逐，而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将会进入最终阶段的选举一决雌雄。

① Those interested can find the footage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 = qFAt-43woGQ, accessed November 9, 2007.

② Olena Yatsunska, “Mythmaking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he 2004 Ukrainian Presidential Campaign”, Demokratizatsiya 14, no. 4 (2006): pp. 519—533.

③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15.

二、选举舞弊、大众动员和橙色阵营的胜利

2004年10月31日，第一轮总统选举开始。有24名候选人参加选举，但早在几个月前人们就已经心知肚明，两个"维克托"将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选举日的报告显示存在很多选举舞弊行为，而由亚努科维奇支持者把持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直到10天后才公布正式结果。有调查显示，大部分乌克兰人认为这个结果是被篡改的。[①] 尽管如此，如表6所示，尤先科仍然赢得了比其他任何候选人都要多的选票，并且在西部以及中部的选区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根据乌克兰的法律，总统候选人只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才能当选。由于没有到达半数，尤先科必须与在俄语区的东部和南部乌克兰占优势地位的亚努科维奇进入最终回合的较量。

最终阶段的选举于11月21日进行，成为本次选举决定性的时刻。排名第三位而退出选举的莫罗兹转而支持尤先科；曾在1999年选举中获得第二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西蒙年科则支持亚努科维奇。这似乎又预示着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大部分观察家认为尤先科将在这场一对一的对抗中获胜。的确，选举日投票后进行的独立民调显示，尤先科领先对手8个百分点。选举观察家们报告了许多选举舞弊的行为：选票造假、滥用缺席选举人票、大量所谓"内部"投票和一些地区过高的投票率——最明显的当属顿涅茨克——居然有超过100%的登记选民参加投票。针对尤先科竞选的造假行为更是证据确凿：亚努科维奇竞选班子的通话显示，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修正"由选区提交的选举数据。[②] 11月22日，普京表示了对亚努科维奇"获胜"的祝贺，而亚努科维奇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的结果直到24日才正式公布。

170

① Kuzio, 2005, p. 14.

② Yekelchyk, 2007, pp. 216—217.

表6　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结果

候选人/政党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维克托·尤先科 我们的乌克兰	39.9%	46.7%	52%
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地区党	39.3%	49.4%	44.2%
亚历山大·莫罗兹社会主义党	5.8%		
彼得罗·西蒙年科共产党	5%		
结果	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进入决胜回合	选举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准备进行附加一轮选举	尤先科被宣布胜出

然而抗议活动早已经开始。"波拉!"做好了大众政治抗议活动的准备。成千上万橙色阵营的抗议者，冒着严寒聚集在基辅的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tsi）上抗议选举结果。抗议者主要是学生，但也包括家庭主妇、职业人员、蓝领工人和领养老金的人。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发表讲话，鼓励人们不要离开广场，把斗争进行到底。抗议者们在广场上搭起帐篷，以免警察用警戒线把他们隔开而使抗议中断。类似的抗议和静坐活动也发生在乌克兰其他城市，主要集中在广泛支持尤先科的西乌克兰。注意到无数乌克兰和国际观察家们做的选举违规报告，尤先科于11月23日宣布赢得大选，并象征性地在半数议席空缺的议会中宣誓就任总统。11月25日，尤先科呼吁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选举被造假以及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尤先科的竞选班子提交了由政府安保人员录制的录音带，以此来证明亚努科维奇的竞选班子和库奇马政府曾下令篡改投票报告。

171　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乌克兰一直徘徊在大规模暴乱爆发的边缘。亚努科维奇谴责"橙色分子"要发动非法的政变，警察和军队也试图阻止民众前往广场，并且阻止西乌克兰的列车驶入首都。与此同时，

众多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乘坐火车和巴士——据称许多人是被收买或提供了免费伏特加才来的——从东乌克兰进入首都。在东乌克兰，一些地区的领导人甚至威胁说，若亚努科维奇的胜利被推翻，将发起脱离乌克兰的公民投票。当地的警察和内务部队把守政府大楼，许多人担心2000年的暴力驱散民众的事件将会重演。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基辅，欧盟和美国的官员都表示对抗议者的支持，并呼吁取消选举结果。

虽然抗议者和政府之间剑拔弩张，但橙色海洋一般的独立广场上却是一派狂欢节似的气氛。学生领袖教导人们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抗议者通过互联网与国外保持着联络。“波拉!”以及“我们的乌克兰”和其他团体的代表们在广场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广场上搭建了临时厨房，诗人和歌手进行表演。来自特兰斯卡帕提亚的雪橇乐队（Hrinzholy）演唱了一曲《团结起来我们就是多数》（Razom nas bohato），成为了“橙色革命”的主题曲。

造假，不!
阴谋，不!
理解，是!
不要欺骗!
尤先科，尤先科
是我们的总统
是! 是! 是!
团结起来我们就是多数! 我们不可战胜!
我们并不卑贱!
我们不是坏蛋（kozly）!
我们是乌克兰的儿女!
现在机不可失!
不能再等!

团结起来我们就是多数！我们不可战胜！[①]

当局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很明显，将近100万的示威民众并不打算草草收场，而选举舞弊的证据也确凿如山。西乌克兰的官员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世界在注视着乌克兰，而尤先科已经向欧盟和欧洲诸多领导人173寻求帮助；军队和安全部队是否会听从命令镇压抗议者也并不确定，包括安全部队首长在内的“权力党”精英们也开始疏远亚努科维奇。[②] 11月29日库奇马接受重新选举，在次日，他提议由其暂行总统职权并安排尤先科为总理。尤先科拒绝了他的提议。12月1日，乌克兰议会投票解散亚努科维奇政府（此时他仍然是总理），清楚地表明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12月3日，最高法院宣布选举无效并下令重新进行选举。尤先科确实与库奇马达成关于削弱总统权力的修宪的共识，而且大部分人认为尤先科将给予库奇马豁免权以使其将来免于被刑事起诉。选举法也进行了修改，包括成立中央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选举，并迅速被议会通过。投票的过程迅速而坚决——450名议员中的402名赞成进行新的选举——表明老“权力党”中的多数已经快速地抛弃了亚努科维奇。12月11日，奥地利的医生确认尤先科是二恶英中毒，这再次提醒了人们，尤先科的敌人曾干出比窃取选举更卑劣的事情。

被议会投票结果以及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鼓励话语——季莫申科对库奇马政权所犯下罪行的控诉使其成为“橙色革命”真正的鼓动者——所鼓舞，示威民众一直在广场上坚持到12月26日最后一轮选举结束。这轮选举成为历史上监督力度最大的选举，有大约30万名乌克兰观察员和12 000名国际观察员在现场确保选举的公正。[③] 尤先科在这一轮获得了52%的选票，再次证明了早先投票后民调的结果是正确的。如地图4所示，尤先科除了在西乌克兰获得全胜外，还赢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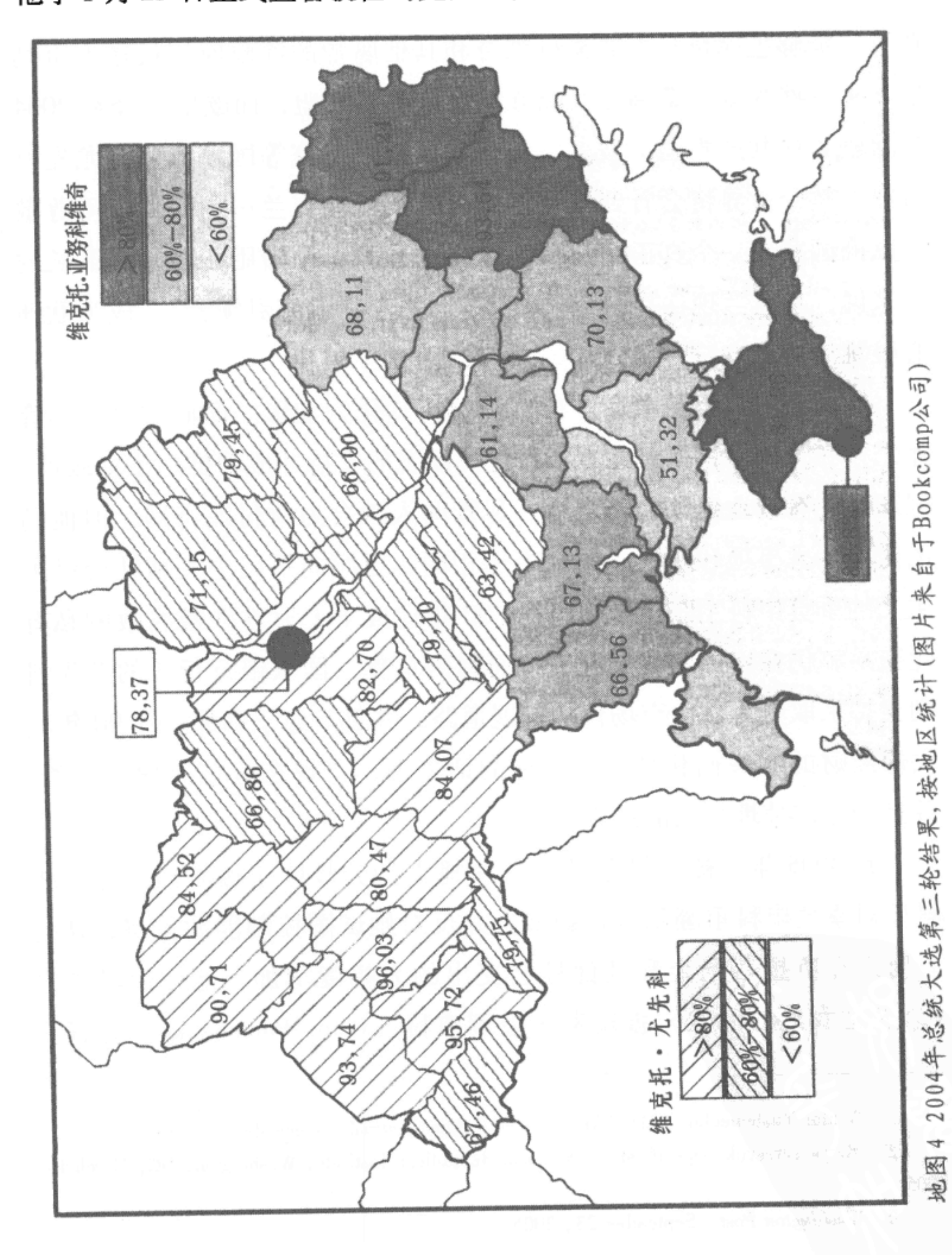
---

①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汉语译文由作者英文译文译出。——译者注

② Lucan Way, “Kuchma's Faile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no. 2 (April 2005): pp. 131—145.

③ Yekelchyk, 2007, p. 218.

中部地区的大部分，并且在南部和东部乌克兰若干地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之相反，亚努科维奇的票仓局限于高度俄罗斯化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州。亚努科维奇试图通过法院扳回劣势，但被法院驳回请求。中央选举委员会于 2005 年 1 月 10 日证实尤先科在选举中取胜，他于 1 月 23 日正式宣誓就任乌克兰总统。



地图4 2004年总统大选第三轮结果，按地区统计（图片来自于Bookcomp公司）

三、治理的难题与橙色阵营的分裂

“橙色革命”给许多乌克兰人带来了莫大的希望。“权力党”对权力的把持已经瓦解，尤先科成为了总统，广场示威民众的明星季莫申科被任命为总理。许多人期望新政府除了履行对民权和民主原则的承诺外，能够把库奇马、亚努科维奇和其他腐败的前政府官员送上审判席。另一些人则希望乌克兰能够体面地加入欧盟，而欧盟已经在2004年接纳了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入盟。尤先科宣布，整个世界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乌克兰……一个值得尊敬的欧洲国家、一个真正拥抱民主价值的国家”。[①] 借用新任外交部长的话来说，乌克兰现在是一个“奇迹”，一名“道德引领者”，成为欧洲心脏跳动的地方。[②]

然而，对“橙色革命”的诸多期待却化为泡影。简而言之，尽管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得到几百万橙色抗议者的支持并成功推翻了前政府，但却没能有效地建立起新政府。尽管两人曾合力对付库奇马，但他们的优先考虑事项和政治倾向却不尽相同。更倾向平民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季莫申科主张追查20世纪90年代成千上万件涉嫌腐败的私有化交易和仍在增加的政府开支，而曾为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的尤先科则支持采取更为自由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并且不急于和那些在90年代大肆敛财的寡头们相对抗。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应该掩埋起战斧，并且彻底忘掉埋葬它的地方”。[③]

到2005年，被“橙色革命”所掩盖的分歧终于爆发出来。尤先科反对季莫申科重翻私有化旧账，并反对她试图控制能源价格，认为政府无力负担养老金和其他社会支出的大幅度增加。他任命其老友（以及他女儿的教父）彼得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担任国

---

① Viktor Yushchenko, “Our Ukrain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 2004.

② Borys Tarasyuk, Speech at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March 10, 2005

③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2005.

家安全与国防秘书，并给予他包括给政府各部下达命令的特权，从而绕过季莫申科总理行使职权。季莫申科自然把他看作对她职位的威胁和政府的定时炸弹。尤先科则抱怨自己简直被迫成为周旋于政府各部之间的“保姆”。①

政府被无数的丑闻和腐败指控缠身，其中包括：尤先科的儿子拥有一套奢华公寓和一部价值 4 万美元的手机；尤先科所提名的司法部长伪造学历；波罗申科滥用权力，包括收受贿赂和对司法程序的干涉；广为议论的季莫申科、波罗申科等政府官员所存在的经济问题。政府面临瘫痪的困境。波罗申科于 2005 年 9 月递交了辞呈，尤先科也在同时解散了季莫申科政府，并任命尤里·叶哈努罗夫（Yurii Yekhanurov）为政府代总理。叶哈努罗夫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监督私有化进程并赞誉乌克兰的“寡头”为“民族资产阶级”，这让指望“橙色革命”能够对寡头采取行动的人们大失所望。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就议会安排达成一笔交易，地区党答应支持叶哈努罗夫的提名，以换取对选举舞弊免于起诉、对地区议会（很多人参与了 2004 年的选举舞弊）的议会豁免、立法确保现有的产权分配和 90 年代以不当手段所获得的财产。② 一位研究这些行为的外国通讯员写道：“库奇马一定在掩着嘴偷笑。出于软弱，他的继任者继承了他所开始的、也是亚努科维奇曾准备继承的腐败的政治经济体制。”③ 一名乌克兰作家认为 2005 年是乌克兰“权力寡头化”的一年。一名美国观察员注意到数千名乌克兰人——公务员、政治家、记者和企业家——“对维持腐败现状怀有深刻的经济和个人利益”，这使得“橙色革命”对付根深蒂固

175

① *Unkraina Pravda*, September 8, 2005.

② *Unkraina Pravd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September 22, 2005.

③ Peter Lavelle, “Ukraine's Post-Orange Order,” RIA Novosti (Moscow), September 12, 2005.

的腐败问题寸步难行。[1]

尤先科试图稳定政府，不过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了。尽管在2004年乌克兰经济经历了12%的强劲增长，但到2005年只有不到3%。技术官僚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方式打破了当初很多人对“橙色革命”抱有的幻想，认为革命能带来激进的变革和社会正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持续下跌，2005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反馈者认为国家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比2004年4月相似的调查结果还要高，甚至较大多数（44%）投票给尤先科的人都认为国家已经步入歧途。对“橙色革命”普遍的失望情绪反映在只有23%的反馈者认为那次选举使社会更为民主，并且仅有14%的人认为其有效减少了腐败。[2] 于此同时，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也处于停滞状态，一方面因为欧盟正专注于土耳其入盟的艰苦谈判中，一方面由于2005年的欧盟宪法被法国和荷兰所否决而陷入内部危机。[3]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针对是否提高进口天然气价格发生的争吵也影响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一度停止借道乌克兰通往西欧的天然气供应，并最终把卖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提高了1倍。许多人认为这次危机是针对尤先科亲西方立场的一次惩罚，并提高了2006年议会选举中亲俄罗斯力量的筹码。[4]

四、亚努科维奇归来

176

在所有橙色联盟所遇到的问题中，有一个人始终在尤先科脑中挥之不去：亚努科维奇。尽管在2004年选举中被击败，但他并没有因任何所犯的罪行接受审判——尽管曾有充足的余地这么做——而且他和

---

① Valentyna Hoshovsurka, “How to Stop the Oligarchization of Power?” *The Day Weekly Digest* (Kiev), January 31, 2006, and Anne Applebaum, “Poison and Power i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06.

② Freedom House, “Public Views on Ukraine's Development, Election Law Changes, and Voter Education Needs”, January 10, 2006, available from www.freedomhouse.org,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06.

③ Taras Kuzio, “Is Ukraine part of Europe's Futur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no. 3 (Summer 2006): pp. 89—108.

④ Yekelchyk, 2007, p. 223.

地区党在乌克兰议会中占有很多席位。如前文所述，尤先科甚至与地区党达成交易，以保证叶哈努罗夫成为总理。但亚努科维奇并没有感到满足。在2004年他就已经在人口密集的东乌克兰拥有了稳定的票仓，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跌以及橙色阵营的内讧令很多尤先科的支持者倍感失望，这也使他有可能成功竞选总理一职。

2006年3月的议会选举给了他机会。这次选举也是第一次采用完全比例制的方式进行投票，人们投票给各个政党，政党则根据其得票占总票数的比例获得相应的议会席位。由于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分裂，地区党很有可能就此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由于有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支持，地区党有可能组建一个联合政府，亚努科维奇就能重返总理一职。而另一个对亚努科维奇有利的条件是，在2006年经过尤先科同意所进行的修宪过程中，总理被赋予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有权提名大部分部长人选并控制国家的立法议程。认识到地区党可能卷土重来，颠覆大部分“橙色革命”的果实，包括“我们的乌克兰”、季莫申科联盟和莫罗兹领导的社会主义党在内的“橙色”政党答应进行合作，以保护“橙色”政府。

选举的结果可参见表7。这次选举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得到国内和国际观察员的认可，使得乌克兰的民主选举制度比往年有了显著的进步。如很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地区党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化及俄罗斯化的东部和南部乌克兰获得大量选票。尤先科遭遇到双重打击，“我们的乌克兰”被季莫申科联盟所超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越过了3%的议会选票比例门槛。不过曾在90年代作为乌克兰第一大政党共产党对结果尤其感到不满。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党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因此关键就看哪个政党联合或联盟能够获得议会席位的多数（450席中的226席）。人们普遍认为“橙色”3党能够达成协议，组建政党联盟以便组织新政府。 177

表7　2006年议会选举结果

政党	获得选票%	席位
地区党	32	186
季莫申科联盟	22.3	129
我们的乌克兰	14	81
社会主义党	5.7	33
共产党	3.7	21

但是，预料的结果并没有发生。几个政党之间的协商持续了足有3个月。"橙色"政党中最大的季莫申科联盟的领袖季莫申科坚持要做总理，但想起她做总理的这些年所发生的麻烦事，很多"我们的乌克兰"的成员拒绝答应，反而公开讨论是否与地区党进行交易；"我们的乌克兰"的波罗申科试图当上议会议长，但莫罗兹（1994—1998年为议会议长）试图再次担任此职。鉴于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之前的龃龉，因此季莫申科反对前者担任任何要职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最后，几个政党达成了一个暂时性的协定，但地区党和共产党封锁议会，以阻止季莫申科前往宣誓就任总理。接着，莫罗兹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曾在2000年公开"库奇马门"事件，并被认为是坚定的反库奇马的反对派力量，但此时转而投向地区党和共产党的所谓"反危机"联盟。这个举动部分原因是出于个人野心——亚努科维奇答应他担任议长的要求——但橙色阵营的政策也不能让前共产党人莫罗兹认同，他反对土地私有化和加入北约。2006年7月，在肢体冲突和"莫罗兹是犹大"的怒斥声中，莫罗兹在议会就任议长，而亚努科维奇则被提名为总理。尽管尤先科的一些盟友认为此事是一场政变，总统应该下令进行重新选举，但尤先科认为新一轮选举也不会产生什么积极的变化，因而批准了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理一职。

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之间自然很难相处。他们曾经是势不两立的政敌，而且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权还很模糊。亚努科维奇在政府中安插了很多涉嫌2004年选举舞弊的自己人，而尤先科仍然保留

任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权力。两人之间的分歧从外交政策到经济改革，再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宪法分权等各方面都显而易见。亚努科维奇声称自己已经皈依民主，而且2006年选举的胜利使他有权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对亚努科维奇的批评者不为其声明所动，坚持认为地区党“不接受整改也不加悔改”，而且“以普京的权威为模板，并且不知羞耻地让金钱渗透进政府结构中，买通那些能被收买的人。”[1]他们认为政府对自由化的监管养肥了如地区党最主要的赞助者亿万富翁阿克梅托夫那样的“顿涅茨克帮”的人。议会推迟了乌克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同时，亚努科维奇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反对派经常抵制或干扰议会的工作，乌克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橙色阵营中很多人对亚努科维奇的种种行为忧心忡忡，包括其对反对派进行议会调查，取消国家电视台的政治辩论节目，对地方媒体施加压力，并在政治上对小企业进行打压。[2] 为了淡化批评，亚努科维奇诱使“我们的乌克兰”和季莫申科联盟的成员加入“反危机联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有11名议员改变了阵营。到2007年春季，亚努科维奇的联盟看上去已经占据了300个议会席位，并且有能力驳回总统的否决以及进行修宪。鉴于代表们被禁止改变议会中的所属阵营，而改为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人存在着经济动因（如贿赂），尤先科在2007年4月宣布解散议会并要求进行新的选举。这个举动被反对派视为违宪的政变，议会也拒绝被解散。此后的僵局很像1993年发生于莫斯科、后以血腥事件告终的“黑十月事件”。尤其当尤先科控制住内务部队后，乌克兰似乎已经处于暴力动乱的边缘了。2007年5月，双方达成妥协，同意在2007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

① James Sherr, “The School of Defeat”, *Zerkalo Nedeli Weekly* (Kiev), July 22—28, 2006.

② Tammy Lynch, “The Edge of Anarchy in Ukraine”, Distributed on Ukraine List, #416, May 26, 2007, available at http: //ukrainianstudies. uottawa. ca/pdf/UKL416. pdf, accessed October 16, 2007.

五、2007年议会选举——橙色阵营的第二次机遇？

面对分裂的乌克兰社会，没人期待2007年的选举会使乌克兰政179治力量之间的权力配置发生重大的改变。不过，橙色势力认为这次选举再次给提供了机会，以弥补2005年和2006年所犯下的错误。亚努科维奇在美国竞选顾问的帮助下，试图把自己打造为合格的民主分子和优秀的经济主管（经济从2005年的低迷中已经反弹）。但其政府的行为，例如试图通过（没有成功的）对选举法进行技术性的修改（政府的政策被法院否决），从而禁止季莫申科联盟候选人参选，让很多人担忧不已。处于绝望中的橙色分子无力推翻亚努科维奇，转而发起运动以恢复"橙色革命"的荣誉。但是，支持地区党的蓝衫抗议者们在独立广场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不会再被击败。

到2007年9月末，选举观察员们又来到乌克兰。2007年9月30日的选举尽管有少数的不规范现象发生（又是出现在东乌克兰），总体评价还是自由而且公正的，这再次证明了2004年来乌克兰所取得的进步。选举结果参见于表8。地区党得到了差不多相同的选票，而且和之前一样基本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乌克兰。2006年后迅速崛起的季莫申科联盟则几乎包揽了中部和西部的选票，并且在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获得第二名。至此，可以说季莫申科联盟成为乌克兰最为全国性的政党。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和其他小党派一起，得票基本与2006年持平。季莫申科的"胜利"表明她才是橙色阵营最受欢迎的人物。共产党仍然扮演着不起眼的角色，社会主义党在遭遇2006年莫罗兹的背叛后元气大伤，这次甚至没能通过3%的门槛，从而被议会拒之门外。由弗拉基米尔·利特温（Volodymyr Lytvyn）领导的利特温联盟得以进入议会，成为"温和派"，尽管他在库奇马时代担任要职并被指控在贡加泽谋杀案中阻碍调查。

表8 2007议会选举结果

政党	获得选票%	席位	与2006年相比+或-
地区党	34.4	175	-11
季莫申科联盟	30.7	156	+27
我们的乌克兰	14.2	72	-9
共产党	5.4	27	+6
利特温联盟	4.0	20	+20
社会主义党	2.9	0	-33

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这次选举并没有带来剧烈的权力变动。由季莫申科联盟和“我们的乌克兰”所组成的橙色联合正好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450席中的228席），尤先科提议联合所有主要政党组建全国联合政府，但季莫申科反对与亚努科维奇合作。尽管“我们的乌克兰”中有些人对季莫申科重登总理宝座心存顾虑，但这两个橙色政党还是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两党在议会中占据勉强多数，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季莫申科明显已经把目光投向2009年的总统选举——政府管理将会困难重重。 180

总的来说，尽管表面上和20世纪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有相似之处，但“橙色革命”并没有产生相似的结果。毫无疑问，“橙色革命”带来了些许积极的变化，公民自由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尊重，选举更加自由和公正，经历2005年的下跌，乌克兰经济在2006—2007年度有接近2位数的增长。然而“权力党”的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根除，腐败还是老大难问题，人们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依旧怀有强烈的不满。在一部分人看来，区域分裂仍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乌克兰也不会实现加入欧盟的梦想，而与日渐趋向专制的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依然问题多多。

不过这些困难并非无可救药。东欧和其他地区年轻的民主国家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在库奇马时代，乌克兰经历了长达10年的停滞，而“橙色革命”以戏剧性的方式向乌克兰人说明，无需过分消极，他

们有能力以积极的行动去迎接变革。尽管有些人对“橙色革命”的结果大加嘲讽，但人们不会忘记它所带来的希望和对人的激励。年轻的乌克兰人愈加表现出对民主的热忱，愈加乐观地支持乌克兰转向西方。一个经历如此多苦难的国家——的确，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乌克兰遭遇过太多的灾难——现在已经能展望获得曾经只是奢望的 2 份礼物：民族独立和民主制政府。与大部分乌克兰历史相比较，乌克兰的未来掌握在乌克兰人自己手中。

乌克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斯蒂潘·班德拉（Bandera，Stepan），1909—1959。西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的重要领袖。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对抗苏联军队，后在德国慕尼黑被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特务谋杀。作为苏联的敌人，他被许多乌克兰人视为民族英雄。

维亚切斯拉夫·乔诺维尔（Chornovil，Vyacheslav），1937—1999。一位资历深厚的反苏联的乌克兰记者和政治领袖，在20世纪60、70年代因其政治主张多次被捕。他是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倡导者和成立于1989年的鲁赫的奠基人。1991年，他在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失利。在90年代，他一直是政治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99年，他在一次可疑的交通事故中丧生。

加利西亚的丹尼洛（Danylo of Galicia），1201—1264。乌克兰土地上早期的著名统治者，1237—1264年间为加利西亚（西乌克兰）的国王。1240年，他与攻占基辅的蒙古人作战。之后，他在与蒙古人作战的同时发展与欧洲的结盟关系。1249年，他发动对蒙古人的进攻，结果以失败告终，于1259年被迫投降。

米哈伊洛·德拉戈马诺夫（Drahomanov，Mykhaylo），1841—1895。乌克兰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他倡导社会主义并主张建立东斯拉夫联邦国家。他是成立于基辅的格罗马达（共同体）的领导人，于1876年被俄罗斯帝国驱逐出境。他的思想在奥地利统治之下的加利西亚民族主义者中有广泛影响，同时为1890年在加利西亚成立的乌克兰第一个政党——激进党做出了贡献。

伊万·德祖布（Dziuba，Ivan），1931— 。乌克兰作家、文学批评家，是20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手稿《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1965）批评了苏联的政策，因为在他看来，苏联摧毁了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他于1972年被捕，直到被迫收回其批评言论后方得以释放。在80年代末，他成为一名重要的乌克兰利益代言人，并随后成为独立后重要的文化官员。

伊万·弗兰科（Franko，Ivan），1856—1916。重要的乌克兰作家、文学批评家、记者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他是西乌克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在1890年帮助建立了乌克兰激进党。但后来他写了一些批评马克思的文章，1904年与他人联合建立了民族民主党。他的文学和政治作品被视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反战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Gorbachev，Mikhail），1931—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1985—1991）。他的公开化、改革和民主化政策促成苏联境内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兴起，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很多人认为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支持了他对苏联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尤其是在媒体自由领域。

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Hrushevsky，Mykhaylo），1866—1934。重要的乌克兰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乌克兰—罗斯史》

(1898)认为存在着与俄罗斯不同的独立的乌克兰历史。尽管曾担任利沃夫大学历史系主任，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度过的。1917年，他从俄罗斯返回基辅，加入了乌克兰社会主义革命党，并被选为中央拉达（议会）议长。1918年，他被选为短命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当苏联控制乌克兰后，他移民到了西欧。1924年，因同情社会主义，苏联允许他返回基辅并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31年，当局怀疑他鼓励民族主义思想，遂迫使他前往莫斯科居住。在苏联时期，他的作品并未受到重视；苏联解体后，他对独立乌克兰历史的主张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Khmelnytsky，Bohdan），1596—1657。1648—1657年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盖特曼（领袖）。1648年，他发动反抗波兰—立陶宛统治的起义，并建立了乌克兰盖特曼（哥萨克）国(1648—1782)。在与波兰的战争中，他被迫投靠俄罗斯沙皇，而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将大部分乌克兰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Kravchuk，Leonid），1934—　。乌克兰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他在苏联时期担任共产党高级干部，并于1990年担任乌克兰中央拉达议长。1991年“8·19政变”失败后，他公开鼓励乌克兰独立，并在1991年12月1日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尽管对乌克兰独立做出过贡献，但他的任期却与腐败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并且在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负于列昂尼德·库奇马。他后来重返中央拉达，并成为代表大企业利益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联合）的领导人之一。

列昂尼德·库奇马（Kuchma，Leonid），1938—　。1994—2005年担任乌克兰第二任总统。乌克兰独立前，他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尤希马什火箭导弹工厂的指挥。1992年担任乌克兰总理，1994年被选为总统。在其任期的前期，库奇马获得了亲西方改革派的声誉，但

到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政府被腐败指控所缠身，后又被“录音带门”事件指控涉嫌谋杀反对派记者。2004年，由于被禁止三次连任，他试图通过支持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当选，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但在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影响下，亚努科维奇败选。库奇马至今仍未因其任期内的犯罪行为受到任何指控。

伊万·马泽帕（Mazepa，Ivan），1639—1709。1687—1709年为乌克兰哥萨克国（盖特曼政权）盖特曼（领袖）。他曾试图把所有乌克兰的领土统一到一个国家里来。他与波兰和瑞典结盟以抗击俄罗斯，但在1709年波尔塔瓦战役中被击败。今天，他被许多乌克兰人视为爱国者与英雄。

彼得罗·莫吉拉（Mohyla，Petro），1597—1647。1632—1647年任波兰统治时期东正教会大主教。他被认为是引进欧洲的观念、改革礼拜仪式并强调宗教教育的改革者，并被许多乌克兰人视为鲁塞尼亚（乌克兰）文化的捍卫者。他于1632年成立莫吉拉学院。该学院于1991年重建，现在是乌克兰一流大学之一。

亚历山大·莫罗兹（Moroz Oleksandr），1944— 。后苏联时代乌克兰主要的政治家。作为社会主义党的领袖，他于1994年、1999年和2004年参与总统竞选。他反对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并于2000年揭露了录音带事件，暗示库奇马牵涉到几宗政治丑闻中。在2004年“橙色革命”中，他站在维克托·尤先科一边，但在2006年与尤先科的对手达成交易，以使自己成为乌克兰议会发言人。

西蒙·彼得留拉（Petliura，Symon），1879—1926。乌克兰记者、作家，1917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中争取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17年组织了乌克兰军队反抗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18年推翻亲德国的盖特曼政府的政变，并在1919年2月成为独立的

乌克兰政府——执政内阁的领导人。执政内阁被布尔什维克击败后，他逃往波兰，后前往巴黎。1926 年，他被一名乌克兰犹太人所刺杀，据称原因是其曾批准对犹太人进行屠杀。

弗拉基米尔·谢切尔比茨基（Shcherbytsky，Volodymyr），1918—1990。1972—1989 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是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4—1982）的亲密盟友。在他担任乌克兰领导人期间，以扩大俄罗斯化政策并强硬压制反对意见著称。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种种自由化改革，并对封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的消息负有责任。他于 1989 年被撤职。

彼得罗·谢列斯特（Shelest，Petro），1908—1996。1963—1973 年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在其任内，乌克兰文化曾有过短暂的兴盛。苏联领导层认为他过于独立并且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怀有同情心，遂迫使其退休。

塔拉斯·舍甫琴科（Shevchenko，Taras），1814—1861。乌克兰艺术家、诗人，其作品被认为为现代乌克兰语言打下了基础。农奴出身的他于 1840 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因对沙皇和帝国统治进行批评，他在 1847—1857 年间被逮捕并被流放。他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乌克兰民族意识的形成，在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他被广泛地赞誉为民族英雄。

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Skoropadsky，Pavlo），1873—1945。1918 年 4 月到 11 月间任独立乌克兰国家盖特曼。作为前沙俄将军，他得到了德国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从乌克兰撤退，他的统治被民众起义所推翻。随后他逃往德国。1945 年，他于盟军的一次空袭中受伤后死去。

约瑟夫·斯大林（Stalin，Joseph），1879—1953。1929—1953 年

担任苏联领导人。他的统治与工业化、集体化、对纳粹的胜利和政治压迫与恐怖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他的决策导致了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上百万人被饿死。其政治压迫的目标之一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许多人被杀害、囚禁或被送往劳改营。

尤利娅·季莫申科（Tymoshenko，Yulia），1960— 。乌克兰政治家，2004年“橙色革命”的领导人之一。20世纪90年代她担任乌克兰能源公司总裁，1999—2001年间任乌克兰主管能源的副总理。她曾因腐败而遭到指控并被政府短暂拘留，2002年成为“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2005年，她担任总理，并于2007年重返总理一职。她是“尤利娅·季莫申科联盟”的领导人，普遍被认为亲西方并支持民主改革。

弗拉基米尔一世（Volodymyr I，俄语中为Vladimir I），958—1015。基辅罗斯大公，被称为弗拉基米尔大帝。988年，他皈依基督教，并令其全部臣民进行受洗加入基督教。他在位期间扩张了基辅罗斯的版图，统一了众多斯拉夫部落，并与拜占庭帝国结盟，使罗斯成为东欧最强大的国家。

维克托·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Viktor），1950— 。乌克兰政治家。来自东乌克兰顿涅茨克。他曾2次担任总理（2002—2004，2006—2007）。2004年，尽管试图在选举中舞弊，但仍败于“橙色革命”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作为乌克兰最大政党——地区党的领袖，他在2004年后仍然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并在2007年以反对派领导人的身份就任总理。他主张与俄罗斯发展紧密关系。

雅罗斯拉夫一世（Yaroslav I），978—1054。基辅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被称为贤者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尔大帝的儿子。

他联合了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等主要公国，他在位期间（1019—1054）的基辅罗斯达到了文化和军事力量的巅峰。他的主要成就是修建了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内的几百座教堂、开办学校和修道院、普及基本法典（《罗斯法典》），并且修建了基辅金门（Golden Gate of Kiev）。

维克托·尤先科（Yushchenko，Viktor），1959—　。2004年“橙色革命”后任乌克兰总统。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1993—1999）和总理（1999—2001）。他被认为是一名政治经济改革者。2001年，他在总理任期内被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撤职，后组建了政治反对党——“我们的乌克兰”。尽管被不知名的人投毒，以及政府操纵的选举舞弊，他还是赢得了总统选举。“橙色革命”的民众抗议迫使乌克兰在2004年12月重新进行选举，尤先科取得了胜利。

参考文献

自从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重新被发现和研究，一大批关于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纷纷问世。其中许多是写给学者们的学术著作，但也不乏为对乌克兰感兴趣的普通人所写的读物。历史上，乌克兰长期被外国势力所统治，因此不奇怪，有关“乌克兰”历史的早期记录可见于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的历史文献和著作中。北美的一些研究机构出版了很多有关乌克兰的专著，例如致力于乌克兰研究的哈佛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

这里介绍一批关于乌克兰的优秀参考著作。两本乌克兰的通史，分别是 Orest Subtelny 的*Ukraine: A History*, 3rd editio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和 Paul Robert Magosci 的*A History of Ukraine*（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Magosci 的*Ukraine: An Illustrated Histor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虽然篇幅较小，但极有可读性并且提供了大量有关乌克兰历史中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信息。Andrew Wilson 的*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更有分析性，而且对被他视为围绕乌克兰民族的神话报以审视的眼光。一部纪实性但同样信息量巨大，同时又有极高可读性的著作是 Anna Reid 的*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一部研究乌克

兰伟大历史学家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著作的作品是 Michael Hrushevsky 所著，O. J. Frederiksen 所编的*A History of Ukraine*（New Haven, CT：Archon Books, 1970）。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编纂了*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Ukraine*。这部作品仍在编纂过程中，部分内容可登录 http：//www. encyclopediaofukraine. com。

关于基辅罗斯历史，《往年纪事》尽管存在缺陷，但也是不可被忽略的。现在比较流行的版本是 Samuel Cross 和 Olgerd Sherbowitz-Wetzor 所编译的*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Laurentian Text*（Cambridge：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53）。Simon Franklin 和 Jonathan Shepard 的*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New York：Longman, 1996）则写得非常详细。James Billington 的*The Icon and the Axe*（New York：Knopf, 1996）是一部关于这段历史的经典著作，而 Janet Martin 的*Medieval Russia, 980—158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也是一本不错的参考书，但两本书都认为俄罗斯是基辅罗斯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更多有关基辅罗斯遗产争议的信息可见于 Jaroslaw Pelenski 的*The Contest for the Legacy of Kievan Rus*（Boulder, CO：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98）。

关于波兰和立陶宛对乌克兰的统治的著作相对较少。有关立陶宛治下乌克兰的资料可见于 Albertas Gerutis 所编的*Lithuania：700 Years*（New York：Manyland Books, 1969）。波兰史中涉及乌克兰问题的著作可见于 Jerzy Lukowski 和 Hubert Zawadzki 的*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 Norman Davies 的*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2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关于哥萨克的历史可见于 Linda Gordon 的*Cossak Rebellions：Social Turmoil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Ukraine*（Albany：SUNY Press, 1983）和 Serhii Plokhy 的*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有许多著作是讨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复杂关系的。Peter Potichnyj 等所编的*Ukraine and Russia in their Historical Encounter*（Edmon-

ton：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1992）是一部从基辅罗斯时期到苏联时代俄乌关系相关论文的著作。Dominic Lieven 的*Empires and Russia*（London：John Murray，2000）和 Goffrey Hosking 的*Russia：People and Empire，1552—1917*（London：HarperCollins，1997）都关注于多元化的俄罗斯帝国内乌克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部对俄罗斯帝国治下乌克兰的研究更为深入的著作为 Alexei Miller 的*The Ukrainian Question：Russ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3）。关于伊万·马泽帕起义最为完整的著作是 Orest Subtelny 的*The Mazepists：Ukrainian Separatism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Boulder：East European Monographs，1981）。对乌克兰文学领军人物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著作可见于 Pavlo Zaitsev 的*Taras Shevchenko：A Life*，此书由 George Luckyj 所编译（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

有关哈布斯堡帝国治下乌克兰的著作侧重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主要有 Paul R. Magocsi 的*The Roots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Galicia As Ukraine's Piedmont*（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2），Andrei Markovits 和 Frank Sysyn 所编的*Nation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Essays on Austria Galicia*（Cambridge：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Center，1984），John Paul Himka 的*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Western Ukraine：The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Ruthe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Galicia*（Montreal：McGill University Press，1999）。

有关苏联治下乌克兰的著作相对较丰富，主要集中研究俄罗斯革命和内战、斯大林时代饥荒和二战中的乌克兰。研究 1917—1920 年革命时期的权威著作是 John Reshetar 的*The Ukrainian Revolution，1917—1920：A Study in Nation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John Armstrong 的*Ukrainian Nation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研究了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境内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其在二战中的角色。关于乌克兰饥荒的经典著作可见于 Robert Conquest 的*The Harvest of Sorro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Bohdan Krawchenko 的*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Ukraine*（London：MacMillan，1985）覆盖了整个苏联时代，并且对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崛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见解。Roman Szporluk 的论文集*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2000）研究了共产主义时代及其之后的乌克兰。

有两本描述引领乌克兰独立事件的书写得非常好。一本是由研究乌克兰政治的领军学者 Taras Kuzio 和 Andrew Wilson 所著的*Ukraine: Perestroika to Independence*（New York：St. Martin's 1994）。欧洲自由电台和 Bohdan Nahaylo 的*The Ukrainian Resurgence*（London：Hurst，1999）的内容丰富翔实。

有关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Alexander Motyl 的*Dilemmas of Independence: Ukraine after Totalitarianism*（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3）对独立初乌克兰的许多事件做了详尽的描述。Taras Kuzio 被公认为是研究独立后乌克兰问题的领军专家。他的著作包括*Ukraine Under Kuchma*（New York：St. Martin's，1997），*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London：Routledge，1998）和（与 Robert Kravchuk 和 Paul D'Anieri 合编）*State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Ukraine*（New York：St. Martin's，1999）。Andrew Wilson 的*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持质疑的观点。Paul D'Anieri 的*Understanding Ukrainian Politics: Power,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Armonk，NY：M. E. Sharpe，2006）利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乌克兰的政治，体例上更接近一部介绍当代乌克兰的教科书。外交政策事务方面可见于 Sherman Garnett 的*Keystone in the Arch: Ukraine in the Emer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1997）。关于乌克兰"橙色革命"的著作包括 Andrew Wilson 的*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Anders Aslund 和 Michael McFaul 所编

的*Revolution in Orange. The Origins of Ukraine's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2006) 和 Taras Kuzio 的*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Ukraine: From Kuchmagate to the Orange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A

Akhmetov, Rinat　阿克梅托夫，雷纳托　146—147，178

Antes Tribal Federation　安特部落联盟　19—20

Austria 见 Habsburg Empir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见 Habsburg Empire

B

Babi Yar　娘子谷　109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国家　121，126，134

Bandera, Stepan　班德拉，斯蒂潘　95，108

Bloc of Yulia Tymoshenko（BYuT）季莫申科联盟　11，166，176，178—180

也见 Tymoshenko, Yulia　季莫申科，尤利娅

Bolshevik Party　布尔什维克党　61，82—83，88—90

Brezhnev, Leonid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　113

Bukovyna　布科维纳　66，74—75，107

C

Catherine II（the Great）　凯瑟琳二世（大帝）　50，51，52，54，153

Central Rada　中央拉达

composition of　组成　80—81

declaration of autonomy　宣告自治　81—82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宣告独立 83
demise of 解体 84
Chernobyl 切尔诺贝利 122—123，124，125
Chornovil, Vẑacheslav 乔诺维尔，维亚切斯拉夫 114，115，131，138，147，159
Christianity, adoption of 接受基督教 23—24
Cimmerians 基麦里人 18
CIS 见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vil war 内战 83，87—88
Climate 气候 3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农业集体化 101—103，111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13，138，142，157，158
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 (CPU) 乌克兰共产党
banned 取缔 136，144
creation of 成立 99
in post-Soviet period 后苏联时代 145，147—148，161，176—177，179
post-World War II 二战后 112—113
under Gorbachev 戈尔巴乔夫时期 127，128，130，132，136
under Stalin 斯大林时期 100，105—106
Constitution 宪法 146，173
Cossacks 哥萨克
defined 定义 37—38
divisions among 分歧 40
massacres 屠杀 40
military campaigns 军事行动 37—38
political organization 政治组织 38
rebellions against Poland 反抗波兰 39—41
rebellions against Russia 反抗俄罗斯 48—51
relations with Russia 与俄罗斯关系 41—42
也见 Hetmanate 盖特曼政权
Courts 法院 10—11，173
CPU 见 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
Crimea 克里米亚 8，9，11
conquered by Russia 被俄罗斯征服 52
separatism in 分离主义 153
supports Ukrainian independence 支持乌克兰独立 137
transferred to Ukraine 移交给乌克兰 8—9，113
in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109，111
Crimean Khanate 克里米亚汗国 34，37
Crimean Tatars 克里米亚鞑靼人 7，38，111，114

D

Danylo of Galicia 加利西亚的丹尼洛 27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 143—149
Directory 执政内阁 85，86，87—89
Dissidents 持不同政见者 114—115，124—125
Dnieper（Dnipro）River 第聂伯河 3，18，21，37，153
Donbas 顿巴斯 59，101，129，156
Dontsov，Dmytro 唐索夫，德米特里 94
Drach，Ivan 德拉克，伊万 114，115，124，127
Drahomanov，Mykhaylo 德拉戈马诺夫，米哈伊洛 60，72，73
Dziuba，Ivan 德祖布，伊万 114，115

E

Economy 经济
post-communist reforms 后苏联时代改革 12，143，149—152，154—55，159，174—175
statistics 数据 11，12—13，150—151，159，175
under communism 共产主义治下 11—12，100—101，130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70—71
under Russian rule 俄罗斯治下 58—60
Elections 选举
in Habsburg period 哈布斯堡时代 69，72
in late Soviet era 苏联后期 127，131—132
1991 presidential 1991 年总统选举 138
1994 parliamentary 1994 年议会选举 145
1994 presidential 1994 年总统选举 144—145，155
1998 parliamentary 1998 年议会选举 147—148，155
1999 presidential 1999 年总统选举 147—148
2002 parliamentary 2002 年议会选举 161，166—167
2004 presidential 2004 年总统选举 167—173
2006 parliamentary 2006 年议会选举 176—177
2007 parliamentary 2007 年议会选举 11，178—180
Ems Decree 厄姆斯法令 58
European Union（EU） 欧洲联盟 14，157—158，160，171，174，175

F

Famine 饥荒 101—105，111

Fokin, Vitold 福金，维尔托德 130, 133
Foreign relations 对外关系
with Europe 与欧洲 14, 157—158, 160, 174, 175
with Russia 与俄罗斯 13—14, 142, 144, 156—158, 175, 178
with the United States 与美国 157—158, 160
Franko, Ivan 弗兰科，伊万 73

G

Galicia 加利西亚
center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 乌克兰民族主义中心 128—129, 131, 135, 138
medieval kingdom 中世纪王国 26—27, 32—33
Soviet invasion of 苏联入侵 107—108
under Habsburg rule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66, 72—74
under Polish rule 波兰治下 91—95
in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76—77
也见 Western Ukraine 西乌克兰
Genocide 种族灭绝
famine as a case of 以饥荒为代表的 104—105
Geography 地理 1—3
Germany 德国
during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83—85
dur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95, 106—111
Gogol, Nikolai 果戈里，尼古拉 55
Gongadze, Georgii 贡加泽，格奥尔基 159, 160, 179
Gorbachev, Mikhail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洛 119—123, 128, 130, 134—135
Governmental structure 政府结构 9—11
Great Famine 见 Famine
Greek Catholic Church 见 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

H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65—77, 85—86
education under 治下的教育 67, 69, 71
elections in 选举 69, 72
inter-ethnic relations under 内部族裔关系 66—68, 70, 74—75
Ukrainian culture under 乌克兰文化 70, 71—73
Hetman, positon 盖特曼 38—39
Hetmanate 盖特曼政权
of Khmelnytsky 赫梅利尼茨基 40—41 1918—1919 84—85
under Russian rule 罗斯治下的 42, 46—51

Holocaust, in Ukraine 乌克兰大屠杀 109
Honchar, Oles 冈察尔，奥列西 114, 123
Hromadas 格罗马达 57—58, 62
Hrushevsky, Mykhaylo 格鲁舍夫斯基，米哈伊洛
on Cossacks 论哥萨克，38
on Kievan Rus 论基辅罗斯 21, 28, 29, 72
as political leader 政治领袖 80, 84, 88, 90
professor in Lviv 利沃夫教授 72—73
in Soviet period 苏联时期 99, 102
Hryvnia 格里夫纳 12, 73, 144, 151
Hungarian rule 匈牙利治下 74

I

Independence 独立
declaration of 宣布独立 136
mobilization for 为独立而动员 131—136
referendum for 独立全民公决 137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after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11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时期 70—71
under Russian rule 俄罗斯统治时期 59
under Stalin 斯大林时期 100—101
Ivashko, Ivan 伊瓦什科，弗拉基米尔 130, 132

J

Jews 犹太人 7
dur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09
killings of 杀害犹太人 40, 43, 89, 109
under Habsburg rule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66
under Russian rule 俄罗斯治下 109

K

Khmelnytsky, Bohdan 赫梅利尼茨基，波格丹 19, 39—41, 42—43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晓夫，尼基塔 103, 106, 112—113, 153
Kiev（Kyiv） 基辅 3, 11
founding of 建立 19
Mongol conquest of 蒙古人的征服 26
Kievan Rus 基辅罗斯
destruction of 灭亡 26—27
foundation of 建立 20—21
Golden Age 黄金时代 22—25
heritage of 遗产 27—29, 143
Konovalets, Yevhen 科诺瓦莱茨，耶夫汗 94—95, 108

Kravchuk, Leonid 克拉夫丘克，列昂尼德
as communist leader 作为共产党领导人 128
elected president 被选为总统 138
helps end Soviet Union 参与苏联的解体 138
in favor of independence 支持独立 133, 135, 136
as president 成为总统 9, 142—146, 157
Kuchma, Leonid 库奇马，列昂尼德
corruption under 在位时的腐败 146—147, 151, 159—161, 166
during Orange Revolution "橙色革命"时期 170, 173
elected president 当选总统 13, 144, 155
as president 成为总统 9, 146—148, 151, 152, 157—161, 167
re-elected 再次当选 147—148
tape scandals 录音带丑闻 159—161
Kulaks 富农 98, 102

L

Lazarenko, Pavlo 拉扎连科，帕夫洛 146—147, 160
Lenin, Vladimir 列宁，弗拉基米尔 61, 82, 91, 98, 100
Lithuania 立陶宛
decline of 衰落 34
expansion into Ukraine 向乌克兰的扩张 32
union with Poland 与波兰合并 33, 34
也见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Little Russians" "小俄罗斯人" 28, 45, 53—54, 55, 70, 157
Lukianenko, Levko 卢基安年科，列夫科 124, 128, 145

M

Maksymovych, Mykhaylo 马克西莫维奇，米哈伊洛 56
Mazepa, Ivan 马泽帕，伊万 45, 48—49, 50—51
Media 媒体 147
Melnychenko, Mykola 梅利尼琴科，尼古拉 159—160
Melnyk, Andrii 梅里尼克，安德烈 108
Mikhnovsky, Mykola 米哈诺夫斯基，尼古拉 61
Military, Ukrainian 乌克兰武装力量 142, 144
Miners' strikes 矿工罢工 129—130, 132
Mining 矿业 59, 101
Minority groups 少数族裔
contemporary 当代 4

during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82
early Soviet period 苏联早期 99—100
in 1980s 20世纪80年代 128
也见 Crimean Tartars 克里米亚鞑靼人
Jews 犹太人
Russians 俄罗斯人
Modernization 见 Industrialization
Mohyla, Petro 莫吉拉，彼得罗 37
Molotov-Ribbentrop Pact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 107, 121, 128—129
Mongols 蒙古人 26—27, 32
Monomakh, Volodymyr 莫诺马赫，弗拉基米尔 25—26
Moroz, Oleksandr 莫罗兹，亚历山大 145, 148, 159, 169, 176—177
Moscow (Moscovy) 莫斯科
early incursions into Ukraine 对乌克兰早期的入侵 32—33
rise of 崛起 27—28
也见 Russia 俄罗斯

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民族意识
during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85
in late Soviet period 苏联末期 114—115
under Habsburg rule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66—67
under Polish rule 波兰治下 94—95
under Russian rule 俄罗斯治下 60—63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民族民主党 72, 73
Nationalism 见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新经济政策 98, 100, 102
1905 Revolution 1905年革命 61—62
1917 Revolutions 1917年革命 80—8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4, 157, 177, 178
Novorossiia (New Russia) 新俄罗斯 9, 52

O

Olha (princess) 奥莉加 21—22
Oligarchs 寡头 146, 151, 174, 175
Orange Revolution "橙色革命" 8, 10, 165—166
foreign involvement in 外国干涉 169, 171
preparation for 准备 166—169
protests 抗议 170—173
regional aspects 地区差异

171，173
theme song 主题曲 171
voting results 投票结果 169—170，173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94—95，107—108，111，156
Orthodox faith 东正教信仰 5—6
in Kievan Rus 在基辅罗斯时期 23
in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立陶宛时期 36—37
under Russian rule 俄罗斯统治时期 54
Our Ukraine "我们的乌克兰" 8，11，160—161，166，171，176，178—180

P

Parliament 见 Verkhovna Rada
Party of Regions 地区党 11，175，176—179
Peter I (the Great) 彼得一世（大帝） 46，48—49
Petliura，Symon 彼得留拉，西蒙 80，85，87—90
Poland 波兰
control over western Ukraine 对西乌克兰的控制 91—95
expansion into Ukraine 向乌克兰的扩张 32—33
union with Lithuania 与立陶宛合并 33，34
也见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Poles 波兰人
deported by Soviets 被苏联所放逐 111
during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86—87
early conflicts with 与波兰人的早期冲突 33，35
as rulers of western Ukraine 西乌克兰的统治者 91—95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67，70，72
Polianians 波利安人 19—20，28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military campaigns 军事行动 34
partition of 对其的瓜分 52—53，66
political system of 政治体制 34—35
Polonization during 期间的波兰化 35—36
religion in 宗教 36—37
serfdom in 农奴制 35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contemporary 当代 8，11，145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时期 72

under Russian rule 俄罗斯统治时期 60—61
也见 Elections 选举
Poltava, Battle of 波尔塔瓦战役 49
Population 人口
contemporary 当代 3—4
during 18th century Russian rule 18 世纪俄罗斯治下 53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71
Pora! 波拉! 168, 171
Poroshenko, Petro 波罗申科，彼得罗 174, 177
Public opinion 民意 137, 149, 151—152, 154—155, 160, 168, 175
Purges 大清洗 105—106
Putin, Vladimir 普京，弗拉基米尔 166, 169, 170

R

Radical Party 激进党 72
Regional Divisions 区域分裂 3—4, 5, 6, 7—9, 128—129, 133, 152—156, 171, 173, 179
Regional governments 地区政府 11
Religious belief 宗教信仰 5—6, 7
Revolutionary Ukrainian Party 革命乌克兰党 61
Riurikid Dynasty 留里克王朝 21—22
Romania 罗马尼亚 74—75
Roth, Joseph 罗斯，约瑟夫 95
Rukh 鲁赫 (Popular Movement of Ukraine for Restructuring 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 126—128, 131, 132, 133, 136, 145, 147, 155
Rus, origin of term 罗斯一词的起源 21
也见 Kievan Rus 基辅罗斯
Russia 俄罗斯
attraction to 对其的吸引 68
battles against Cossacks 对哥萨克的战争 42, 48—51
expansion into Ukraine 向乌克兰扩张 49—53
rule in Ukraine 对乌克兰的统治 53—55, 58—60
也见 Russians 俄罗斯人; Soviet Union 苏联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俄罗斯东正教会 54, 111—112, 125, 143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罗斯古编年史 19, 20—21, 23, 25
Russians (in Ukraine) (在乌克兰的) 俄罗斯人 4, 8, 59—60, 129, 152—154
Rusyns 卢森尼亚人 9
也见 Ruthenians 鲁塞尼亚人
Ruthenians 鲁塞尼亚人 28, 32
in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时期 35—36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66—70

S

St. Sophia Cathedral 圣索菲亚大教堂 24, 43, 48, 99
Sarmatians 萨尔马提亚人 18—19, 35, 40
Schulz, Bruno 舒尔茨，布鲁诺 95
Scythians 斯基台人 18—19
Serfdom, abolition of 废除农奴制 58—59
Shcherbytsky, Volodymyr 谢切尔比茨基，弗拉基米尔 114, 115, 122, 124, 125, 127, 130
Shelest, Petro 谢列斯特，彼得罗 113—114
Sheptytsky, Andrei 舍普蒂茨基，安德烈 71, 108
Shevchenko, Taras 舍甫琴科，塔拉斯 4, 45, 58
poems by 诗作 43, 50, 56—57
symbol for Ukrainian nationalism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象征 60, 61, 70, 73, 81
Shevchenko Scientific Society 舍甫琴科学社 70, 72
Skoropadsky, Pavlo 斯科罗帕茨基，帕夫洛 84—85
Slavs 斯拉夫人 19, 21
Sovereignty, Declaration of 主权宣言 132—133
Soviet-Polish War 苏波战争 90
Soviet Union 苏联
collapse of 解体 134—137
creation of 成立 90—91
economy 经济 98
elections during 选举 127, 131—132
federalism in 联邦主义 91, 97
nationalities policy 民族主义政策 99—100
political repression under 政治压制 102, 105, 106, 111—112, 113—114, 124
in western Ukraine 西乌克兰 107—108, 110—111
Stalin, Joseph 斯大林，约瑟夫
death of 斯大林去世 112
economic policies of 经济政策 100—101
emerges as leader 崛起为领导人 100
famine caused by 造成的饥荒 101—104
purges and 大清洗 105—106
World War II and 第二次世界大战 106—112
State-building, after 1991 1991 年后国家构建 141—144
Student activism 学生运动 125, 126, 133, 168, 171
Supreme Ruthenian Council 总罗斯拉

达 69
Sviatoslav (prince) 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 21—22

T

Tatars 见 Crimean Tartars
Transcarpathia 特兰斯卡帕提亚 9, 66, 74
Treaty of Andrusovo 《安德鲁索沃条约》 42, 46
Treaty of Hadiach 《加佳奇协定》 42
Treaty of Pereiaslav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31, 41, 49, 113
Treaty of Riga 《里加条约》 98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条约》 86, 87
Trypillians 特里波里人 18
Tymoshenko, Yulia 季莫申科, 尤利娅 160—161, 166, 170, 173—174, 176—177, 179—180

U

UAOC 见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Ukraine, meaning of 乌克兰的意思 38, 46
Ukrainian language 乌克兰语
  ban under Russian rule 俄罗斯统治下被禁 58, 62
  calls to revive 呼吁振兴 124—125, 130
  development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下的发展 68—69, 70, 71
  in early Soviet period 苏联早期 99—100
  features of 特征 4
  origins of 起源 19, 28
  in post-Soviet period 后苏联时代 142—143, 146, 154, 156
  use of 使用 5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UAOC) 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 6, 7, 88, 99, 110, 125
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 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 7, 8
  banned by Russia 被俄罗斯取缔 54
  creation of 创立 36
  under Poland 波兰治下 95
  under Soviets 苏联时期 107, 110, 112, 114
  welcomes Nazis 欢迎纳粹 108
Ukrainian Helsinki Union (UHU) 乌克兰赫尔辛基联合会 124, 126, 128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UPA) 乌克兰起义军 110, 111, 114
Ukrainian National Party 乌克兰民族党 61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Kiev Patri-

archate）（UOC-KP） 乌克兰东正教会（基辅大牧首） 6，7，143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Moscow Patriarchate）（UOC-MP） 乌克兰东正教会（莫斯科大牧首） 6，7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UPR）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83—84，86，87，90
Ukrainian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 乌克兰激进民主党 61，62
Ukrain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 61，80
Ukrain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乌克兰社会主义革命党 80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Ukr SSR）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91，98，107
Ukrainka，Lesia 乌克兰卡，莱西雅 57，73
Ukr SSR 见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Uniate Church 见 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
Union of Brest 布列斯特联合 36，42
Union of Krevo 克列沃联合 33
Union of Lublin 卢布林联合 34
Union Treaty 联盟条约 134—135
United Nations，Ukraine's seat at 乌克兰在联合国的席位 111
UOC-KP 见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Kiev Patriarchate）
UOC-MP 见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Moscow Patriarchate）
UPA 见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UPR 见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V

Varangians 瓦兰吉人 20
Verkhovna Rada 最高拉达 10，144，146
Volodymyr（the Great） 弗拉基米尔（大帝） 22—24，27，125
Vynnychenko，Volodymyr 温尼琴科，弗拉基米尔 80，82，84，85，87—88，90

W

Western Ukraine 西乌克兰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反抗苏联的抵制运动 110—112
base of Ukrain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基地 128—129，133，135，137，138
incorporated into Soviet Union 并入苏联 111
invaded by Soviets 苏联入侵 107—108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帝国治下 65—77，85—87

under Polish rule 波兰治下 91—95
也见 Bukovyna 布科维纳；Galicia 加利西亚；Transcarpathia 特兰斯卡帕提亚
Western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WUPR) 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86—87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62—63，75—77，83—85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95，106—111

Y

Yanukovych，Viktor 亚努科维奇，维克托 9—10，167，168—170，173，175，176—180
Yaroslav (the Wise) （贤者）雅罗斯拉夫 24—25
Yeltsin，Boris 叶利钦，鲍里斯 134，135—136，138，142，157
Yushchenko，Viktor 尤先科，维克托 8，9，10
campaign for president 竞选总统 167—173
elected president 被选为总统 173
joins anti-Kuchma opposition 加入反库奇马的反对派 160—161，166
as president 成为总统 173—178，180
as prime minister 成为总理 159，166

Z

Zaporizhian Sich 扎波罗热塞契 38，46，49，51，52
也见 Cossacks 哥萨克

[General Information 本信息由OnlyDown 1.6秋意版生成]
书名=乌克兰史
作者=保罗·库比塞克著
页码=223
ISBN=
SS号=12363520
dxNumber=000006810408
出版时间=2009.09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定价：
试读地址=http://book.szdnet.org.cn/views/specific/2929/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810408&d=B53337FDD390FB03D6B9E996FE6BB7E9&fenlei=110608#ctop
全文地址=46f1367fa934c9074f73570ab9a14a0f/img15/582C9A668591F2C78E7F6DEE3FCDF30D19736C805EB5870919F2C0876CF6C074DE86B46721ED73921FB17B23039E1A87DA3B87C8DBF4855FC90DCC42DC143B3F67E9E8B905FA4A91BE69D0932A48025A5AE37CCB6CEB665C1C4244C87B34BD105D5C2C652E88E30DCF60F6F2E228AAFEEB01/b48/qw/